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口述历史

——童年与求学

李学勤¹，于玉蓉²

(1.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北京 100081; 2.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2011 年 9 月, 笔者接受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约稿, 登门拜访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 完成人物稿《李学勤的人生路标》, 后在贵刊发表文章《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成长及治学之路——童年、青少年读书经历》, 更完整地呈现了本次采访的全部内容。后为给李先生撰写传记, 自 2012 年 9 月份开始, 笔者又先后采访李先生十余次, 整理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历史。其中再次涉及到入职历史所之前的成长与经历, 且有不少新的内容, 在此整理成稿, 以飨读者。

关键词: 李学勤; 历史学家; 口述历史; 童年与求学

中图分类号: K092; K8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05-04

收稿日期: 2013-09-15

作者简介: 李学勤 (1933—), 男, 北京人, 史学大师,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玉蓉 (1980—), 女, 山东威海人, 文学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

一、最初的记忆

李学勤: 我有的时候会想: 一个小孩子, 他的记忆最早能到什么时候? 很早以前, 我读过一本科普著作, 这本书里讲到: 从科学的角度, 只能回忆到四周岁! 也就是说长大后在脑子里能够重新映现的印象, 最早就是四周岁的时候记录下来的。实际上很多人讲起自己更小时候的事儿, 是家人告诉他的, 并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记忆。

我自己很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最初的回忆, 有印象的, 就始于四周岁。我是 1933 年生人, 四周岁的时候, 是 1937 年, 正逢“卢沟桥事变”, 我还能记得宋哲元部的二十九军, 我看见过他们, 能想起他们穿的军服的颜色。

我父亲在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饮食部工作, 也就是现在的营养部。那时候协和医院的负责人都必须外国人, 所以我父亲不能做正职, 只能做副职, 搁现在叫副主任。那时候我家住在北京东城靠近城根的地方, 就在现在金宝路东端, 今天的二环就是那个时候城墙的位置。我们住的地方在当时有危险, 怕被轰

炸。协和医院的北边有一个北帅府胡同, 有一个人家是协和的工人, 我父亲和他关系很好, 所以我们就去他那儿逃难。为什么呢? 因为协和医院是美国的, 日本人不敢炸。现在我还能回忆起来, 我们躲过去的时候, 奶妈背着我爬战壕、我趴在她的背上的情景, 进了院子之后, 抬头能看到日本的飞机。我们家在这里躲了一段时间, 等城里稍微安定了才回自己的家。

这是我四周岁那年七月底的事儿。再往前的情景, 我就想不起来了。所以, 我觉得前面说的那本书的论断是正确的。

那个时候北京沦陷, 被日本占领, 但是我父亲由于在协和医院工作, 所以不能离京避难。很多人都走了, 比如说清华、北大的教师南迁昆明, 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老百姓们能走的也走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就困守于此, 因为来不及走了, 哪有那么容易走啊? 很危险的。

1941 年的珍珠港事变, 那一天是 12 月 8 日。日本人完全都是计划好了, 就在那一天, 他们同时占领了协和医院和燕京大学。很多人被捕, 包括美国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还有协和医学院的校长和协和

医院的院长，把他们关在外交部街的一个小楼里。其他的工作人员就都解散了。

上次和你讲过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被“管制”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糟糕。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日本兵过来看看。最奇怪的有这么一个事情：有一天，有一个日本兵提着一包馒头到我们家里来，我家里就父亲、母亲、我，我们也不懂日文。他拿着一包五彩的馒头，每个馒头蒸的好好的，可却是红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他来的意思是说，给你们送礼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他是来看管我们的，他送的礼也不敢吃。后来我多次去日本，也问过“五彩馒头”的事儿，但也没得到什么答案。

因为我父亲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我小孩子的时候经常去那儿，我父亲会把我带到那边的草地上玩。可是，从协和医学院被日本占领之后，直到抗战胜利，我再也没有从协和医学院门口走过。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儿变成了日本的宪兵司令部，门口会有日本兵持枪站岗，如果经过，要向其行礼，不行礼的话可能会挨打，甚至被抓起来。为了不行礼，我们就避而不走。当时北京有两个地方很危险，一个是铁狮子胡同、后来老人民大学那儿，另一个就是协和医学院，经常逮捕人。

二、我的父亲、母亲

李学勤：据我母亲的回忆，生我之前还有过两个孩子，可是一个夭折了，一个流产了，我是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我是独生子。父亲这边，基本没有亲属，而我母亲的亲属都在上海。所以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表兄堂姐陪我玩，就像你之前那篇文章写到的，我的童年是孤单的。

虽然我出生于北京，但我并不是地道的北京人。我经常认为我是南方人，我父亲也这么认为，他长期在南方工作。他们在家都说上海话，我小时候也去南方，当时我听上海话没问题的，现在可能听力变差了。所以我的饮食、我的言行举止等很多保留了南方的习惯。可能你看不出来，因为你不是北京人，但是一个真正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肯定会看出差异。我说的话也不算是北京话，而是普通话。

于玉蓉：您好学善思，踏上了学术之路，是否受父母的影响？

李学勤：我父母是 20 世纪初的人，父亲是 1902 年生人，母亲是 1901 年生人。父母生我的时候，都 30 多岁了，生的比较晚。

我父亲所从事的工作是行政性工作，是管事儿的，

当然也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他的英文特别好，可一点没教过我什么。现在好像流行“虎爸虎妈”，而我父亲没有说一定要我怎么样，可是我如果喜欢做什么，他会全力支持我，这就是他的教育方针。唯一的一点，他希望我去汇文中学，因为他是汇文毕业的。后来证明，汇文中学确实非常好，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地址就在现在的北京火车站那儿。

我母亲读书识字，虽然不是很好，但一般的小说报纸都能看。她在上海上过私塾，还经常和老师淘气呢。她是最早的女学生，你想她十岁的时候才辛亥革命。但她从来没有工作，只是在家里作家庭主妇。我母亲教我认字，四岁之前我已经识字读书了。我很小的时候读《民间故事》，我还记得是四本一套，每本封面是不同的颜色，什么样子我还能回忆起来。

关于小学阶段上次已经和你说的比较详细。1939 年我六岁的时候去小学上过几天，但因为不适应就回来了。后来 1941 年就去“灯市口小学”，现在还叫“灯市口小学”，就是原来的“育英小学”，这个小学本来也是一个教会的学校，我父亲认识其校长，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叫李如松，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教育家。我家离学校很远，家里就包了一个洋车，每天接我上下学。全北京一直到解放，只有 6 路电车，有的还经常停驶，市民最常用的交通方式就是步行，所以我很能走。

于玉蓉：我和您的小学同桌、著名诗人邵燕祥先生联系过，他说他曾去过你家。

李学勤：我也去过他家。他的家庭背景和我类似，他父亲是留德医生。当时北京的西医有英美系的，还有德法系的，这两个系好像还不太融合。

那个时候我慢慢开始融入到学校的集体生活中，但是课堂内容已经远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因为那些东西我已经学过了。所以上课的时候看起来我好像在听课，可是脑子里却全是另一个世界。

我已经和你说过了，我从小就喜欢符号，就是有关结构和框架的东西。我爱看的书都比较特别，我给你举个例子。那个时候大家都爱看清代小说，比如李汝珍的《镜花缘》。大部分人看《镜花缘》都爱看前半部分，不太喜欢看后半部分，因为前半部分就和《山海经》类似，主人公周游天下各国，遭遇“两面国”啊、“犬封国”啊，讲了很多故事。后半部分是武则天诏开“红文宴”，天下才女汇聚于此作诗押韵，我偏爱后半部分。李汝珍是音韵学家，我就喜欢后半部分里很多的音韵学内容，比如说“张真中珠”等口诀，我看起来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还记得当时买了《镜花

缘》，一边走路一边看，旁边拉洋车的人说，“哎呀，看这小学生在笑什么呢！”

于玉蓉：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篇小学生作文《踏雪应试》，收录在抗战前出版的一本作文选中，后署名李学勤，并标明是北京华氏小学校六年级生，很多人认为是您的作品，这篇作文是您写的吗？

李学勤：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当时《北京青年报》登出来的时候，我就声明不是我写的，可能是一个和我同名、比我年长的人写的。因为什么呢？首先，他讲到冬天开始上学。到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冬季入学的，都是秋天入学。其次，他提到小朋友们是坐着骡车去的。那种大车，在我上学的时候也有，但是已经不流行了。

三、命运的殊途

李学勤：我 1945 年上的初中，1948 年初中毕业。48 年国民党颓势已定，整个社会是很动荡的。对于我们这些初中毕业生而言，时代也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当时北京至少有两个学校比较热门。一个是“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管吃管住，按照现在来说是大专水平，我考了这个学校，上次和你说的比较详细；另一个是国民党在上海新办的“国防医学院”，培养军医，也在北京开始招生，也有很多人去考，因为这个学校也是管吃管住。我没去考，因为那时我对军事没什么兴趣，并且我如果学医的话也不需要走这条路，我父亲对北京医学界还比较熟悉。我有两个很要好的同学考上了，他们 48 年一开学就跟着去了台湾。刚开始我们之间还有通信，后来就断了音讯。这两个同学一个姓张，一个姓黄。姓张的同学经受了很大的曲折，后来到美国去念书，成为著名的教授；姓黄的同学在台湾最好的医院工作，现在退休了住在国外。我当时去台湾演讲，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照片，找到我，我们那时候已经是 47 年未见了。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和时代是分不开的。

于玉蓉：就是因为初中毕业报考志愿的不同，一个班的好友同学分离半个世纪不能谋面。您们这一代人经历那么大的社会变革，每个人的命运都无法避免的受到时代影响。相比而言，我们这些 80 后好像和时代的关联没有如此紧密。

李学勤：其实不然，你仔细想想，现在也一样，每一代的人都会受到时代影响的。

于玉蓉：值得庆幸地是，你们后来都从事了自己

喜欢的工作，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都有所建树。

李学勤：都有一定成绩，只是走了不同的路。

四、清华的大一生活：上课和思想改造

李学勤：我上次和你说了我兜了一个大圈，后来又回来在汇文中学继续读高中，1951 年按部就班地考上了清华大学，就读于哲学系。

那个时候刚建国，大学里课程设置不多，并且我有几门课是免修的。入学考试我英文考了 98 分，其实没什么讹误，就是 a 和 o 两个字母写的有点像，我不记得是把 a 写成了 o，还是把 o 写成了 a，总之扣了两分，所以我的英文是免修的，我的国文也是免修的。

考清华的时候，考场是在北大红楼。国文卷子是一张纸对折，里面是作文，我很快就做完了。监考的老师看我这么快就要交卷，以为我漏答了题目，就出于好意，小声对我说：“里头还有作文呢”，我说：“我已经写好了！”于是就第一个从考场出来了。

这些当年的事情，不是你要求，我是不会讲的。既然英文免修了，我就想学德文，因为学哲学的必须要学德文，我希望自己将来能读德文版的原著，而不是翻译的。后来未能如愿，当时学苏联嘛，所有人都学俄文。大一学了俄文基础，任教的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她其实也是新学的，“现趸现卖”地教我们。后中苏友好协会在广播电台上播放俄语讲座，我一听，才发现老师讲的有些不准确。我后来自学俄文，用英文学俄文，是节姆斯卡娅和波塔波娃分别编的教材，用英文学俄文较为容易，因为语法比较接近。

那时候我们和教授们关系都挺好，因为学生比较少。同学们关系也很好。我有个同班同学叫钱耕森，安徽人，和我同年，都是当时班里年龄最小的，他后来主攻中国哲学史。那一年有两个安徽的同学，另一位叫钱广华，后来研究西方哲学史。现在他们都执教于安徽大学，都是著名教授。

1951 年寒假开始思想改造。老师和学生们都要在开会的时候谈自己的思想。学生们的思想改造相对简单；老师们的思想改造比较复杂，有的时候要开会 20 多次。

我们的这些先生们真的是非常主动、积极地进行思想改造，是非常真诚的。特别是金岳霖先生，一直到故世，他都是这样。直到今天，我敢保证，对于思想改造，他是真诚的。

于玉蓉：到了清华哲学系之后，您就师从金岳霖先生？

李学勤：作为大一新生，很难说我是谁的学生。但是金先生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学生。包括我后来去考古所，他很照顾我，要不然我怎么去的呢。我们经常去金先生家里上课，因为人少。这种授课方式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也让我的学生到我的家里来。

五、因甲骨文而入科学院

李学勤：我不经常住在学校，没事儿我就回家了，或者去北京图书馆看书。虽然当时活动很多，但是我还是会找出很多时间来继续自己对甲骨文的兴趣，这个兴趣从很早就开始了。我高小时有个同学，我还记得他叫常定一，孟子说“定于一”嘛。他父亲在中学当老师，他说最难的就是甲骨文，这个同学告诉我之后，我就开始留心甲骨文，越是难我越要学，因为它像符号，特别有意思。我是在1950年前后自己学的。

1952年，北大考古专业刚刚成立，我很想去，但是当时不让转系。金先生知道我很想做甲骨文，就给了我一个建议：你可以去上考古系的课，还在哲学系毕业，但最终没有这么做。

陈梦家先生是中文系的教授，我没有选过他的课，只是去旁听过一次。很多人认为我和陈先生在清华就很熟悉，其实不然，当时我并不直接认识他。

我上次跟你介绍了，经陈梦家先生引介，我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曾毅公先生一起完成《殷虚文字缀合》的工作，就是对郭若愚先生的原稿进行校对、补充，加了很多东西，所以最后署名是我们三个人。

这项工作1953年底结束了，由于另外一个机缘，我到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事情是这样的：我那时候经常在北图看书，有一个外交部的先生认识我，这位先生也是学者。他的一个朋友是海外华侨，想学古文，那时候我家里很困难，所以我就给他做家教，从上古《尚书》、《诗经》一直到韩愈，每星期选读一篇。

外交部这位先生认识侯外庐先生，是他向侯先生推荐我的。侯先生那个时候是西北大学校长。1953年底决定要筹备建立历史研究所，他已经到北京来了。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三个历史所：一所是上古，郭沫若任所长，尹达任副所长。二所是中古，原先是陈寅恪、后是陈垣任所长，侯外庐任副所长。三所是近代，范文澜任所长。

侯外庐先生把我叫去面谈，他对我印象不错，就

说：“你到历史所来吧。”正好考古所那边我的工作也不好安排，因为考古所已经成立了很久了，有名额限制，刚好历史所这边有机会。考古所这边说：“你先去吧，然后我们再把你要回来。”

于玉蓉：命运很偶然啊。

其实我也不认为这是偶然。如果我不是在北京图书馆学甲骨文，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我也不会认识外交部那位先生，也就不会见到侯外庐先生。另外，如果我不是学哲学的，没有古文的底子，同时又有在考古所工作这一段经历，侯外庐先生也不会要我，所有这些都是因因相生的。

六、与书的不解之缘

李学勤：如果总结这之前我的生活，有一项内容最持久，那就是：看书、买书和卖书。

因为没有钱，所以我看旧书很多。买的是旧书，看完了再卖掉，再买“新”的旧书。有些老教授很奇怪，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年轻时候很多事情，其实就是通过旧书，我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儿知道的不少。张政烺先生是历史所著名的史学家。有一天，我们看报纸上提到逯明、滕爽情杀案，我就给大家讲这是个什么故事，他听了很吃惊：“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这是在你出生之前啊。”

那时候去一趟琉璃厂是很难的。我住今天东二环那里，步行到琉璃厂，然后从琉璃厂西头开始，沿着街逛书店，这需要相当大的体力。

于玉蓉：那得走一个多钟头吧？

何止啊，两个小时走不到。你想啊，从东二环一带穿胡同走出来，到东单，一直到前门、和平门，走出去到南新华街，然后到琉璃厂西端。我每次是从商务印书馆看起，一个店一个店看下去，包括各种小书店，一直走到杨梅竹斜街。我做过好多次这种“跋涉”，每次都筋疲力尽。没办法，那个时候没钱坐车。所以，我主要是去东安市场，但东安市场的书远远没有琉璃厂的多。

到历史所工作之后，我还管过图书馆，给单位买书，历史所很多书都是经我手买的。1956年公私合营以前，很多书商每周都会过来卖书，我们收书。他们会带样书，比如说《太平广记》，他们会带第一本，要不要，如果要，他们就会全部送来。有时我还会到外地去买书。

荀子军事思想简述

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作为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 荀子军事思想也是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最系统的总结者与最权威的诠释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形态, 它的基本内涵突出地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 注重区分战争的性质, 提倡以吊民伐罪为宗旨的“义战”。第二, 突出军事对政治的从属关系, 表现出显著的民本主义色彩。第三, 文武并举, 致力于国防建设; 尊卑有序, 提倡以“礼”治军。

关键词: 荀子; 军事思想; 法家; 兵家

中图分类号: B2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09-04

收稿日期: 2013-09-09

作者简介: 黄朴民(1958—), 男, 浙江诸暨人, 历史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军事史、孙子兵法与兵学文化、两汉经学的研究。

众所周知,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内容之一, 自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建议,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后, 始终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 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 发挥过极其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学说, 它对于军事问题自然会有自己的基本认识与主张, 由是而形成了体系庞大、个性鲜明的儒家军事思想; 而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它对军事问题的一般理性认识, 也势必必要渗透和作用于中国古代兵学的构建过程之中, 在传统军事文化身上打下自己的烙印, 对古代兵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规范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 探讨儒家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主导特征以及它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有助于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和把握传统军事文化的本质属性与嬗递趋向, 客观评价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历史上的儒家, 有一个长期延续与演变的过程。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 确立其基本文化内涵与思想倾向之后, 儒家便一直处于自我丰富、自我完善之中。在战国时期, 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及其受其他学派影响深浅的差异等因素, 其内部曾有合乎逻辑的分化。用韩非子的话说, 便是儒分为八, “有子张之儒, 有子思之儒, 有颜氏之儒, 有孟氏之儒, 有漆雕氏之儒,

有孙氏之儒, 有仲良氏之儒, 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有两派: 一派是发轫于子思、成熟于孟子的思孟道德学派; 另一派就是“孙氏之儒”, 即以荀子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它们都尊奉孔子的基本理论, 宗仁尚义, 但是却各有自己的特色。即思孟学派侧重于对仁义的阐述, 特别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 而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 尤其是兼采管仲学派的思想成分的特色, 侧重于对“礼制”与“礼教”的阐述, 注意克服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弊端。

作为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 荀子军事思想也是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最系统的总结者与最权威的诠释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形态, 它的基本内涵突出地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 注重区分战争的性质, 提倡以吊民伐罪为宗旨的“义战”。

荀子根据其政治思想的原则立场, 十分强调对战争的性质加以区分, 把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战争明确划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在他看来, 凡是基于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之中的立场而从事的战争,

就是正义的、合理的，应该拥护；反之，凡属于以满足统治者私欲为宗旨而进行的战争，则是非正义的、逆天背道的，应该加以谴责和反对。这是其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观点。

荀子认为那种拯民水火、吊民伐罪，为实施仁义而开辟道路性质的“义战”，不是虚幻的想象，而是普遍存在于历史上的：“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荀子·议兵》）。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义战”也是应该成立并积极推行的。荀子进而指出，“义战”顺乎天而应乎民心，“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因此必定是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

“义战”既然如此合乎天道人心，又这样成效显著，荀子就据此而逻辑地得出结论，从事“义战”，就是用兵上的最理想境界，是任何战争指导者都应该执著追求的战争宗旨：“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喜悦”（《荀子·议兵》）。

荀子既然将战争的宗旨简单规范衍化为仁政、德治原则的推行与实现，那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战争活动要采取基本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了，在他们看来，与“义战”相比，社会生活中“不义之战”要多得多，它们给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

荀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正是战争高度频繁、激烈，其后果日益残酷，历史正进入从兼并逐渐显现天下统一端倪的阶段。然而荀子拿自己的政治原则与当时的战争现实进行衡量，衡量的结果是将当时顺应历史进程的战争定性为“不义之战”，予以抨击和斥责，反对动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指出“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荀子·仲尼》），并强调倚恃武力的不美妙结果：“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荀子·议兵》）。

由此可见，荀子所秉持的是“义兵”至上，“礼乐”为先的基本立场，对兵家“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孙子·军争》）的观点予以全盘的否定。以下的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荀子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态度：“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除阨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

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荀子·议兵》）。

显而易见，荀子区分战争的性质，明确提出“义战”与“非义战”的对立范畴，这是其军事思想，特别是其战争观比较成熟的标志。先秦诸子中其他学派虽然也对战争的“义”与“不义”性质有所阐述，但就深度而言，却似乎不逮于荀子，当然也包括孟子在这方面的建树。应该说，荀子的认识为中国古代军事价值观的确立提供了座标，也为后世军事思想发展“兵儒兼容”主流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突出军事对政治的从属关系，表现出显著的民本主义色彩。

荀子的学说与孔、孟一样，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因此其军事思想在其整个理论建构中居于从属的地位，强调军事对于政治的依附从属关系，乃是其军事思想的特色之一；而崇尚民本、重视民心归向对于战争成败的意义，则是荀子军事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荀子是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军事从属于政治、民心归向决定战争胜负的认识可谓是十分深刻与透彻。他肯定“仁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强调指出“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天下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荀子·王制》）。

为了达到这一理想，荀子认为，一是要提倡附民爱下，力行仁政：“行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荀子·议兵》）；“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同上）。

二是要修礼。荀子视礼为“治辨之极”“威行之道”，“功名之总”，认为只有尊奉礼义，遵循制度，尚贤使能，教化百姓，顺从民心，才能造就军事上的强盛：“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慕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廓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荀子·君道》）。否则，便会民众离心，导致军破国亡：“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同上）”

由此可见，荀子始终把政治清明、民心向背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强调只要赢得民心，便可

以无敌于天下。而争取民心的关键，在于修明政治，推行“仁政”与“礼乐”。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民本观”问题上，荀子与孟子的思想有一定的重合性，不过，也有侧重点上的差异，孟子更注重行“仁政”以争取民心；而荀子似更提倡修“礼乐”以赢得民意。荀子军事思想中的这种民本精神，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不无积极影响。

第三，文武并举，致力于国防建设；尊卑有序，提倡以“礼”治军。

儒家是“家国一体论”者，因此对国防问题予以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提倡气节，严格夷夏之防，主张抵御外侮，团结民众共同对敌，追求国家安定、民众安居乐业，保持中华文化的承续性，从而奠定了儒家国防理论的基本立场。在具体国防建设指导方针问题上，儒家主张文武并举，政治与军事相互倚重，密不可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深刻地阐明了政治与军事、经济建设与国防巩固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一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国防建设指导方针。

荀子沿着孔子的思路前进，在具体的国防建设措施方面，提出了不少精彩的意见。首先是要顺从民意，以民为本，积极调动普通民众参加国防建设事业，尽可能使民众与统治者的意愿统一起来。其次主张加强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提倡教育与训练民众，使其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能够从军作战，共卫社稷，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其三，主张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建设起一支能征惯战的强大军队，并注意造成一种清明和谐的政治环境，以求在战争中牢牢立于不败之地：“辟四野，实仓廩，便备用，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荀子·王制》）。当然荀子的国防建设主张与法家等学派还是有重大区别的，这就是它以仁义为本，而不一味推崇暴力，迷信武力，所谓“无兼并之心”和“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荀子·议兵》）云云，正反映了荀子国防观的独特性格。

荀子在治军问题上也有比较系统的主张，其基本内容是提倡以“礼”治军，重视将帅道德品质的修养，强化军队内部的等级秩序，这一切正是荀子“礼治”理论在治军问题上的具体反映。

荀子讲究“礼治”，在治军上就是主张运用“军礼”来治理军队，指导各方面的工作，以期行必中矩。孔子曾就此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以之田猎有礼，故

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礼记·仲尼燕居》）。所谓“军礼”以是军队根据儒家“礼乐”精神而具体制定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到了荀子那里，对“礼治”的强调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礼乐”成为军队强盛，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上不隆礼则兵弱”（《荀子·富国》）；“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荀子·王霸》）。

在治军中认真贯彻“军礼”的基本前提下，荀子十分强调将帅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对将帅品德修养问题作出了全面的阐发：“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荀子·议兵》）；提倡以虔诚恭敬之心做人办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敬谋无圻，敬事无圻，敬吏无圻，敬众无圻，敬敌无圻”（同上），审慎谋划，认真做事，尊重属员，厚待民众，重视对手。认为能够做到以上几点，这样的将帅以是杰出的将帅，“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圻，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同上）。

二

很显然，在先秦诸子之间，有着一一种学术思想在对峙冲突中走向兼容的倾向。这一是表现为诸子各家对不同学派的抨击和攻讦；一是表现为诸子在自己的学说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汲取他家的某些思想，来丰富自身。前者，体现了诸子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反映出其“异质”的一面。正是由于这种“异”的存在，诸子各家间就有了“交流”的必要性。后者，体现了诸子间的内在联系与贯通，反映出其“同质”的一面。恰恰是这种“同”的现实，又给学术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这一学术思潮嬗变的大趋势，决定了诸子的军事思想同样有一个由“异”趋“同”的过程。

一般地说，在战国中期之前，诸子学术思想的对峙性尤其显得突出。当时诸子间，对于吸收自己对立面的有用东西来丰富充实自己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而往往以比较决绝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学派，将排斥他说、攻击异端引为己任。孔子曾明确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孟子之排斥异端，尤其是众所周知：“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

充塞仁义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墨家、法家、道家等学派同样也致力于“攻乎异端”，如墨家曾借晏婴之口极力贬斥儒家：“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业……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

这样的社会思潮氛围，反映在当时儒家的军事思想上，就无疑要使其更多地凸显自己独特的风貌，表现出应有的纯粹性。这里我们可以举孟子为例。在孟子那里，当时的战争完全都在被否定之列，任何有违于“仁义”的军事活动都受到无情的抨击，“霸道”毫无立足之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对于那些同自己战争观念不合的学派，如提倡“农战”的法家，讲求战胜攻取之道的兵家，推行合纵连横之术的纵横家以及农家等等，孟子都主张处以严厉的惩罚，“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可见，孟子是要在强调学派对立的前提下，通过排斥、反对的途径，来确立自己军事思想的正统地位。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之间交流的增强，先秦诸子代表人物也渐渐开始考虑如何在保持自己思想主体性，肯定自己思想正确性这一前提下，借鉴和汲取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荀子》对此有比较集中的反映。他一方面同样尖锐地抨击除自己学说之外的诸子百家，继续在那里大力提倡“统一思想”：“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荀子·非十二子》）。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承认和肯定不同学派具有某些合理内涵：“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荀子·解蔽》）。这种学术发展史上的新气象，同样要对荀子的军事思想的构筑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作为儒家历史学派的代表者，他的学说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之长的强烈的时代特色，这在其军事思想方面也同样有鲜明的体现。他一方面同其他儒家一样，也崇尚人本精神，构筑用兵的理想境界，提倡“仁义”“礼乐”，主张行“仁义”之师。但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性，故退而求其次，也肯定霸道的地位，将军事上的成功划分为二个层次，一是高层次的，即王道的层次；二是低层次的，即霸道的层次。这样荀子比孟子等人就大大前进了一步，使自己对战争问题的思考从政治学领域真正跨入了军事领域。

从《荀子·议兵》诸篇所反映的内容来看，荀子的军事学术造诣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包括：第一，荀子仔细分析了当时列国诸雄的军事状况，指出其军事制度上的利弊得失，正确预测了其日后军事的发展前途以至整个国运的盛衰：“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第二，荀子对将帅品德修养和有关指挥艺术，进行了精湛的分析总结，提出了“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圯”等一系列具体的理论。第三，荀子阐述了某些具体的军事纪律和战争善后措施，如“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不获。”“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荀子·议兵》）第四，荀子注重战前的军事准备，以保证战争的结果符合当事者预期的目的。

与当时兵家借鉴儒家相仿佛，儒家同样从兵学中吸取有益的成分。荀子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注意到军事自身所具有的独立价值，认识到要最终赢得战争，必须通过必要的军事手段。这样，像孟子那样侈谈“仁者无敌”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充分借鉴和吸取兵家的理论和智慧。基于这样的认识，荀子借助兵家的观念来阐述军事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如对将帅品德修养和有关指挥艺术进行精湛的分析总结。提出“六术”：“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阐述“五权”：“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不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荀子·议兵》）荀子这些关于将帅修养以及作战指挥原则的概括，可以从兵家那里寻找到思想的渊源与理论的出处。如“五权”的精神直接脱胎于孙子的“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思维；又如“三至”的要义纯粹渊源于孙子“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论述。

荀子既重仁义，也言实力，广泛引入兵家的理论，从而使战国中晚期学术兼容大背景下的兵儒合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六韬》一起，共同奠定了两汉以后兵儒合流文化格局的基础。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战国中晚期诸子军事思想由对峙向融汇过渡的基本趋势。这也是荀子军事思想源于孔、孟，又远远高于孔、孟的缘由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荀子为先秦整个儒学军事思想的总结与传承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乃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荀子与《孔子家语》

杨朝明

(中国孔子研究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 由于《孔子家语》“伪书”说的影响, 荀子研究中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荀子与《家语》的关系。实际上, 荀子在秦昭王时将该书材料带到秦国, 《孔子家语》才得以传到汉代并流传至今。《孔子家语》内容丰富, 资料宝贵, 《荀子》与之思想相通、材料一致, 了解二者的关联, 对荀学研究十分有益。

关键词: 荀子; 孔子家语; 荀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22.6;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13-04

收稿日期: 2013-11-10

基金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曲阜儒家石刻文献集成”, 批准号: 13AZD025;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曲阜石刻视域下的儒学与历代中国, 批准号: 13BLSJ01

作者简介: 杨朝明(1962—), 男, 山东梁山人, 当代著名学者,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荀子研究中, 有一个向未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 这便是“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问题。就实际荀子研究的基本材料而言, 除了《荀子》一书, 其他就只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寥寥二百余字。实际上, 荀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绩, 这便是《孔子家语》一书经由荀子而传承下来, 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值得特别重视。

荀子是汉儒所总结的“六经传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司马迁评价说:“孟子、荀卿之列, 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 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列传》)在汉代学者看来, 荀子、孟子对儒家学术的传播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另一位汉代学者孔安国则指出:“六国之世, 儒道分散, 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 唯孟轲、荀卿守其所习。当秦昭王时, 荀卿入秦, 昭王从之问儒术, 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 由此秦悉有焉。”(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 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他不仅将荀子与孟子并提, 还将荀子与《孔子家语》联系在一起。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载着孔子其门人与时人交往、应答的重要文献, 是研究早期儒学的重要资料。然而由于传统学术的偏见, 宋明以来, 多数学者将之斥为伪书而弃置不用。近年来, 随着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

《家语》伪书说已逐渐为学界所抛弃。在此背景之下, 以《孔子家语》孔安国序的相关记载为契机, 深入探讨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荀子传承《孔子家语》的这一事实, 仅见于孔安国的《孔子家语后序》, 而不见于《史记》等书的记载。荀子出生于战国晚期的赵国, 具体生卒年不详。关于他的生平事迹, 史书记载仅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的那段文字, 在这段没有荀子生年、卒年乃至师承门派的记载中, 没有提到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应该是十分正常的。可有意思的是, 唯一记载着二者关系的《孔子家语》孔安国《后序》也在传统学术对古书的考辨工作中被断为“伪作”了。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记载了《家语》成书及早期流传的历史。孔安国认为:《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于“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 当时“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 也就是说, 《孔子家语》材料来源于孔门弟子的亲手记录, 乃是第一手的资料(参见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说》, 载杨朝明注说《国学新读本·孔子家语》,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当年, 孔子曾长期从事教学活动, 那时, 孔子弟子会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时记录孔子言论, 有时, 他们还会安排专人负责记载孔子及当事人的言行, 如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说：“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叔仲会与孔璇都是孔子弟子中年龄较小者。每当需要有人在孔子身边执笔记事时，他们二人常常轮流在孔子左右服侍。由此，孔子的许多重要言论被记录下来。

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汇集整理孔子遗言，形成一批孔子遗说。这批真实可靠的材料经历了孔门弟子的进一步编辑，将其中“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此后，《孔子家语》经过百余年的辗转流传，由荀子带入秦国。不过，荀子带入秦国的书籍并不仅仅只有《孔子家语》一书而已。孔安国称：荀子“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呈给了秦昭王，这说明《孔子家语》可能混迹于众多书籍之中，“由此秦悉有焉”，说明荀子呈献给秦昭王并被收入秦国秘府的《孔子家语》乃是全本。这部《孔子家语》后来逃过了秦火，流传到了汉代。（详请看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六卷第一期，2008年秋季；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说》，载杨朝明注说：《国学新读本·孔子家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刘邦入关后，秦秘府所藏图籍在萧何的主持下被汉朝政府“悉敛得之”，孔安国描述这批竹简的性质是“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后来吕氏专权，《孔子家语》竹简被吕氏取回家中收藏。吕氏伏诛后，《孔子家语》流落在外，“散在人间”，经历了不少“好事者”出于己意的“增损”。直到汉景帝时期搜求古书时，《孔子家语》才重回秘府。在儒学地位渐渐提高的背景下，汉武帝元封年间在京任职的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听说了这批材料，他担心其“先人之书”因此而泯灭，遂拜托朋友帮忙，得到了《孔子家语》的副本，并整理成今本《孔子家语》。

从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的内证看，该序出于孔安国没有问题，因此，孔安国所描述的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就十分值得关注了。不言而喻，就儒家学术史的研究而言，了解《孔子家语》与荀子的关系，无论对于荀子其人还是《荀子》其书，都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借助《孔子家语》来看荀子所谓“儒家别宗”问题

荀子弟子韩非在说到“儒家八派”的时候，曾说

到其中有“孙氏之儒”（《韩非子·显学》），目前，学术界公认“孙氏之儒”指的是荀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孙卿子》乃是被列入“儒家类”的。可以说，无论战国时期还是汉代的学者，都没有任何疑问地将荀子看作儒家的一份子，甚至可以说唐朝以前大抵都是如此。即使是一味褒扬孟子而贬抑荀子的韩愈，在要削去“荀氏之不合者”以“附于圣人之籍”（韩愈：《读〈荀子〉》，《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的同时，也没有否认荀子思想学说的儒家学派属性，不过是认为荀子思想“大醇而小疵”（同上）而已。

然而，宋代的理学家们在尊奉子思、孟子学说为儒学正统，说孟子去世后“千载无真儒”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对荀子学说进行攻击。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便以荀子为法家，认为：“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四库全书本）而在人性方面，朱熹甚至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识道理。”（同上）总之，多数学者将荀子视为儒家异端、“儒家别宗”而加以摒弃。

正因如此，认识《家语》与荀子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荀子其人及其学说。荀子入秦带去《孔子家语》，对于该书的流传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说：“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其中“故不见灭”的“故”字颇值得玩味。我们认为，这其中表达了孔安国对《家语》能够幸存下来的感慨或者庆幸的心境。杨树达先生曾举“故”字作“表态副词”一例说：“反也。按实假作‘顾’字用。”（杨树达：《词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在这里，孔安国的意思是：从性质上看，《孔子家语》应该属于“诸子”之书，恰在秦始皇禁灭焚毁之列，可是，《孔子家语》竟然能够幸免于难，得以保留下来，真是难以想象或不可思议！

战国之世，孟子、荀卿坚守儒学阵地，在孔安国所说“儒道分散”的背景之下，他们积极为守护儒学“正统”而努力。《韩非子·显学》所说的“儒分为八”，与这里所说的儒学之道分散，都反映了孔子之后至战国时代儒学的情形。在彼此之间互相争“正统”的过程中，孟轲、荀卿“守其所习”。就《孟子》、《荀子》二者与《孔子家语》之间的关系而言，《荀子》与《孔子家语》更加密切。《荀子》批评各家，包括子思、孟子以及被他批评为“俗儒”、“贱儒”不少人，荀子可

能就以《孔子家语》为标准、尺度。

在孔安国看来，荀卿入秦，使《孔子家语》传入秦国，是使《家语》得以流传的功臣，也正是因此，《孔子家语》才得以流传至汉代，从而避免了战国时期“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对于《孔子家语》乃至儒学的影响，荀子不仅坚守儒学阵地，而且对两汉以后儒家学术影响深远。

二、借助《孔子家语》来看《荀子》的可靠性问题

像其他众多的典籍一样，《荀子》书也存在所谓“真伪”问题的论争。此书是否可靠，或者说是否完全可靠，还存在不同看法。唐朝学者杨倞在为《荀子》作注时就已怀疑《宥坐》以下各篇，以其为“记传杂事”。宋代学者王应麟因为看到《韩诗外传》引述《非十二子》的内容只有十子，没有子思、孟子，便说“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王应麟：《困学纪闻》，四库全书本），从而怀疑《荀子》的可靠性。

后来对荀子提出怀疑的人更多。概括起来基本上有两类观点：第一类怀疑整部《荀子》，如杨筠如、胡适、吕思勉等学者；第二类认为《荀子》中的部分篇章并非出于荀子，有认为《仲尼》篇非荀子所作，有的认为《仲尼》、《致士》、《君子》皆非荀子所作的，有认为《大略》以下七篇并非荀子著作的，而认为《成相》、《赋》等篇与荀子无关的学者更多。

通观以上观点，对《荀子》可靠性的怀疑多集中于《赋篇》或《大略》以后各篇，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杨倞曾指出：问题较多的《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五篇“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杨倞：《荀子注》第341页，重印《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这五篇中，除《尧问》篇末章“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一节应为荀子后学的评论外，其他应该大多都出于荀子引述的既有材料。即使到现在，学者依然多认为《宥坐》等五篇的成篇时代较晚，甚至认为是“汉代荀子之徒所纂集”（金德建：《古籍丛考》之八《荀子大略篇作于汉人考》，中华书局，1941年），从而否定了这五篇与荀子的直接关系。

出土文献的发现与研究，终于使我们认识到这些看法的偏颇。1973年，在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中有《哀公问五义》，与其类似的内容亦见于《荀子·哀公》，竹简中被定名为《儒家者言》的文献中有“子

贡问为人下”一章，亦见《荀子·尧问》。据推断，该墓主人为卒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的中山怀王刘修（《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载《文物》1981年第8期）。这些内容与《荀子》相同的著作在西汉中期的流行，告诉我们不能对《宥坐》等五篇的纂辑年代过度后置（廖名春：《荀子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更为重要的是，荀子传播《孔子家语》的事实，再次印证了《荀子》的可靠性，《孔子家语》可以视为最为直接的证明材料。以前，人们以《孔子家语》为伪书，丧失了以此为基础探讨包括《荀子》在内的许多文献成书问题的机会，导致不少学者走了很大弯路。而今，对于《孔子家语》价值的重新认识，对《荀子》成书问题的研究价值重大。将《家语》与《荀子》相比较，会发现二者具有相互联系的篇章不少，其中，篇幅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各篇（表1）：

表1 《荀子》和《孔子家语》篇章比较

《荀子》	《孔子家语》	《荀子》	《孔子家语》
《大略》	《困誓》	《法行》	《三恕》
《宥坐》	《始诛》	《哀公》	《五仪》
《宥坐》	《三恕》	《哀公》	《好生》
《宥坐》	《颜回》	《哀公》	《颜回》
《子道》	《三恕》	《尧问》	《困誓》
《子道》	《曲礼子夏问》	《仲尼》	《六本》
《子道》	《在厄》	《乐论》	《观乡射》
《法行》	《问玉》		

不难看出，《荀子》与《孔子家语》相同的材料，比较集中于《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篇，而《荀子》与《家语》的这种关系，恰好旁证了前揭杨倞之言及《家语》孔安国序对荀子传播《家语》的记载。从这种程度上说，《荀子》书中有《家语》的材料，不仅不能说明《荀子》之“伪”，反倒应该是《荀子》可靠的一个重要证据。

三、借助《孔子家语》与荀学的关系思考古籍成书问题

战国时期，《荀子》各篇很可能都是单篇流行的，而这些篇章绝大多数出于荀子本人亲手所著，部分为荀子所整理、纂集的资料，还有荀子后学所记录的荀子言行，最后经荀子后学之手统编为《荀子》，这样的判断符合古籍成书、流传的一般规律。在汉代，《荀子》经过了刘向的再整理，他对《荀子》篇章的重新编次

和材料的删繁就简，绝不应该被看作是什么“主观作伪”的过程。对于《荀子》所经历的这些成书及流传的过程，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今非古，将其成书时代人为后置，须知，古人并没有今人的著作权观念或逻辑学程式，而且任何古籍都存在着动态的流传过程，对此问题的片面理解或对其可靠性问题的简单判断，都将导致我们的认识偏差。

具体到学者对《荀子》可靠性的怀疑，其中最为重要的理由之一是认为该书体裁杂乱，不似细密的学术著作。例如，被认为是“辨伪学名著”的《伪书通考》曾转引杨筠如的观点，认为《成相》篇不像《赋》篇附在整部书的后面，原本位置比较靠前，却居然使用了韵文，所以它“明明是与荀子不相干的东西”，以这样的研究方法，杨筠如甚至得出结论说：“除《正名》、《解蔽》两篇略为完全以外，几乎没有一篇没有杂凑的。”（张心澂：《伪书通考》第 736-737 页，商务印书馆，1937 年）这是典型的以今非古，彻底割裂了《荀子》各篇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其他古书所存在的相关信息。杜国庠先生就以其他史料参照《成相》篇，得出了该篇可靠性自有内证的结论（杜国庠：《先秦诸子

的若干研究》第 76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年）。显然，那种认为《荀子》“与荀子不相干”或者“杂凑”的说法，显然缺乏细致的研究，则有先入之见的嫌疑。

至于那些以“荀子思想自相矛盾”、“与儒家尚德不相容”之类说法来否定《荀子》可靠性的做法更为危险。儒家思想本来就体大思精，人们贴标签似地研究先秦思想家，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窃以为应该先考察文献记载的可靠性，然后综合研究文献所显示的思想家的学说主张，而不是先确定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再以之判断文献记载是否与之相合。荀子处在战国后期，他的思想可以损益诸子，牢笼各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因此，对荀子思想的研究，恐怕应以对《荀子》文本的考察最为紧要、根本。然而，在所谓辨伪学大盛的年代里，不少可信的古籍都被打入伪书的行列，大量古籍的成书年代被人为后置，另一方面，由于材料的限制，人们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到古书形成的一般规律，而凝固地看待古书的传流问题，遂造成了不少错误的认识，这也启发我们对文献研究方法进行反思。

Xunzi and Confucius Homely Talks

YANG Chao-ming

(Confucius insititutions of China, Qufu, 273100,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pseudonymous saying of *Confucius Homely Talks*, almost no one in Xunzi studies notices the relation between Xunzi and *Confucius Homely Talks*. In fact, Xunzi took this book material to Qin State in the period of Qin Zhaowang, after that *Confucius Homely Talks* was handed down to Han Dynasty up to now. *Confucius Homely Talks* is rich in content and has valuable materials, which has the interlinked thought and the same material with Xunzi. It is beneficial for Xunzi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between Xunzi and *Confucius Homely Talks*.

Key Words: Xunzi; Confucius Homely Talks; Xunzi study

《荀子集解》点校本校勘检讨（上）

王天海，宋汉瑞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检讨对象为中华书局 1988 年版沈啸寰、王星贤所撰《荀子集解》点校本（简称点校本），兼及清光绪十七年王先谦《荀子集解》思贤讲舍刊本（简称光绪刻本）。本检讨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一是《荀子》原文与杨倞注文的文字讹误、脱衍、误倒、失校、误删、误改；二是沈啸寰、王星贤所撰《荀子集解》点校本断句不当、标点符号的失误；三是对沈、王点校本 39 条校勘记的分类统计。全文检讨共计 300 条。本文拟分为上中下三次刊出，此为第一部分，包含本文序言、例略，共检讨《荀子集解》点校本“考证”部分与正文部分《劝学篇》至《儒效篇》失误 99 条。

关键词：《荀子集解》；点校；勘误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13)04-0017-10

收稿日期：2013-11-11

作者简介：王天海（1948—），男，四川苍溪人，国家二级教授，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民族大学学术带头人、硕士生导师；宋汉瑞（1988—），女，河南南阳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

《荀子》一书至唐代杨倞作注以来，评注者虽多，然多依从杨注。直到清朝乾隆时方有卢文弨、谢墉校本为世人所重，其后日人久保爱之《荀子增注》亦为精审之作。清光绪十七年，长沙王先谦有《荀子集解》思贤讲舍刊本问世。此本以卢、谢校本为据，取《古逸丛书》影刻宋台州本及明虞九章、王震亨校本合校，并采集郝懿行《荀子补注》、王念孙《荀子杂志》、俞樾《荀子平议》等入注。此本算得上是对清以前《荀子》校注成果的一次总结，影响很大，翻刻者众。1935 年国学整理社将此本编入《诸子集成》，由世界书局排印刊行，中华书局于 1954 年、1956 年、1959 年、1986 年曾多次进行重印。1988 年，中华书局将沈啸寰、王星贤所撰《荀子集解》点校本收入《新编诸子集成》，是现代《荀子集解》通行之本。200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了王天海撰《荀子校释》，此本以《古逸丛书》影刻宋台州本为据，以清以前旧刻诸本参校，广采古今中外学者校勘注释《荀子》成果，并特别更正了王先谦《荀子集解》光绪刻本与中华书局 1988 年点校本之若干失误，故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被广大荀学研究者置为案头必备的参考之书。

笔者在从事《荀子校释》工作时，对中华书局 1988 年《荀子集解》点校本中发现的若干校勘问题随手标记，现经过整理核实，共梳理出校勘记 300 条，提供给荀学研究者参考。其校勘例略如下：

其一，本文检讨对象为中华书局 1988 年版沈啸寰、王星贤所撰《荀子集解》点校本，兼及清光绪十七年王先谦《荀子集解》思贤讲舍刊本。

其二，本文检讨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荀子集解》考证部分引用文献；二是荀子原文与杨倞注文的文字讹误、脱衍、误倒、失校、误删、误改；三是沈啸寰、王星贤所撰《荀子集解》点校本断句不当、标点符号的失误；四是对沈、王点校本校勘记的分类统计。

其三，本文校勘主要参校本为《古逸丛书》影南宋台州本、影南宋浙北本（简称宋台州本、宋浙北本），清乾隆五十年卢文弨、谢墉合校安雅堂刊本（简称卢、谢校本），清光绪十七年王先谦《荀子集解》思贤讲舍刊本（简称光绪刻本）及王先谦所用各本，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其四，本文校勘采用简体字横排版式，凡《荀子集解》光绪刻本及其点校本因版本不同而产生的文字差异，

在不影响原文文意时，不在检讨之列；凡因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通假字而产生的文字差异，亦不在检讨之列。凡点校本的标点符号在两可之间又于文意无妨时，不在检讨之列。

其五，为方便读者查检，本文检讨以中华书局 1988 年版《荀子集解》点校本篇目、页码、行次为序，通编校勘记号码。每条所录与校勘相关的文字皆以加粗宋体字显示，其后以笔者按语说明校勘理由。

一、考证部分

考证上

1.第 4 页第 11 行（台州本国子监劄子官衔）：**国子监准熙宁元年九月八日中书劄子节文，校定荀、扬书所状。先准中书劄子，奉圣旨校定《荀子》、《扬子》。内《扬子》一部，先次校毕，已于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纳讫。今来再校到《荀子》一部，计二十卷，装写已了，续次申纳者申闻事。**

今按：所引《古逸丛书》影刻宋台州本国子监准中书劄子，其中“已于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纳讫”，原文作“已于治平二年十二月内申纳讫”。申纳，为古人惯用词，意即再行纳入。下文“续次申纳者申闻事”是为证。光绪刻本不明此义，将“内”字改作“丙”，以为“十二月”下必是“丙申”之日，故有此误改。点校本从之。这是不明古词、自以为是，妄改原文的典型之例。

2.第 6 页第 5 行：引用《古逸丛书》影宋台州本唐仲友序：**不得如向言后孟子百余岁。**

今按：考刘向《孙卿书录》云：“孙卿后孟子百余年”，可知“后孟子百余岁”是引用刘向原话，“言”字后应加上引号。点校本脱引号。这是不明间接引用之语当用引号标示之例。

3.第 6 页第 14-15 行：**自董仲舒、韩愈皆美卿书，言王道虽不及孟子，抑其流亚，废于衰世，亦命矣夫！学者病卿，以李斯、韩非。**

今按：此处标点应作“亦命矣。夫学者病卿，以李斯、韩非。”点校本在“夫”下断句，使文气不畅，句意不明。“夫”字应属下，为句首发语词，不应作上句句末语气词。这是不明语法与辞气，断句、标点皆有误之例。

4.第 7 页第 13 行：引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载钱佃《荀子考异》“**凡二百二十六条**”。

今按：据南宋淳熙八年钱佃《荀子考异》刊本可知，钱佃共改正 154 字，考异 126 条。故应作“凡一百二十六条”。卢文弨校本、光绪刻本皆失校，点校本误从之。这是不查原文，以讹传讹之误。

5.第 8 页第 15 行：引用《困学纪闻》十：“**君子如响矣**”作“**知响矣**”，

今按：此句已经结束，句末当用“句号”，点校本误用“逗号”。

6.第 8 页第 15 行：引用《困学纪闻》十：**监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胜纪。**

今按：“**建本未必非**”后当用“逗号”，因所引句意未完，其下尚有“餘不胜纪”方能结束本句。此为点校本不明语法，误用“句号”之例。

7.第 9 页第 7 行：引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则春申君死之年卿年当一百三十七岁**”。

今按：“**则春申君死之年**”后，当有逗号，方能与下文区别，此为点校本不明辞气，漏标逗号之例。此句末光绪刻本在“岁”后脱“矣”字，点校从之。

8.第 10 页第 13 行：引用《天禄琳琅书目》载钱佃《荀子考异》：**凡二百二十六条**

今按：据影南宋淳熙八年钱佃《荀子考异》刊本可知，本应作“凡百二十六条”。光绪刻本失校，点校本误从。这是不查第一手资料，以讹传讹之误。

9.第 12 页第 3 行引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见存之宋槧则纸质破损**

今按：原文本作“现”，光绪刻本不明通假原则而误作“见”字。虽“见”与“现”在一定条件下可通用，但此处必须用“现”字以说明现存之宋槧，而非所见存之宋槧。点校本误从。

10.第 13 页第 3 行引用谢墉《荀子笺释序》：**《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法行篇》大同。**

今按：光绪刻本因习惯“德行”一词而误“法”为“德”字。点校本校勘记曰：“法行篇”，原本误为“德行篇”，据本书《法行篇》改。

11.第 13 页第 9 行引用谢墉《荀子笺释序》：**厉人怜王**

今按：句中“厉”字，卢、谢校本原作“疒”字。序文所引原出《战国策·楚策四》：“孙子为书谢曰：鄙谚

曰：‘病人怜王。’此不恭之语也。”病人，本指染上恶疮或麻风病的人。病人怜王，意即麻风病人都怜悯作国王的人。厉，虽可通“疠”，但“疠”却不可通“厉”，故应遵从原文以避免产生歧义。光绪刻本错用通假，误改作“厉”，点校本从之。

12.第16页第4-7行引用郝懿行《荀子补注》之《与王引之伯申侍郎论荀卿书》一文：**迨春申亡而兰陵归，知道不行，发愤著书，其指归意趣，尽在《成相》一篇，而托之瞽瞍之词以避患也。杨倞**

今按：此“杨倞”下脱28字，所脱之文为“何人，不知其字，里居事实，尤所未闻。《唐书·世系表》检无其人，愿具示之。其”。下文“知其持择未精，亦由”之下脱“训诂未明”4字。此文落款“道光四年甲申二月”下脱“日具”2字。此段三处，光绪刻本共脱34字，点校本从之。

此外，引用书信题名中的“王引之伯申”原文本作“王伯申引之”。“引之”是名，“伯申”是字。旧时称呼对方，必先称字而后称名，以示谦恭。光绪刻本不明古人称呼惯例，先称名后称字，将其误倒，点校本从之。

13.第16页第8-11行引用郝懿行《与李樟煜月汀比部论杨倞书》中一文共有5处脱文。

今按：“而《宰相世系表》则载汝士三子”下脱“一名知温，一名知远，一名知至”12字；“无名倞者”句下脱“表志同出欧阳手，不知何以互异”13字；“意者，倞或改其名”句中脱“者”字；“意倞或改其名”句下又脱“如温庭筠之一名岐欵”9字；下文“然千载下遂不知倞何为人”句下脱“虽疑则疑载。”5字。以上五处，光绪刻本共脱40字，点校本从之。

此外，引用书信题名中的“李樟煜月汀”，原文作“李月汀樟煜”。“樟煜”是名，“月汀”是字。旧时称呼对方，必先称字而后称名，以示谦恭。光绪刻本不明古人称呼惯例，先称名后称字，将其误倒，点校本从之。

14.第18页第14行引用影宋台州本《经籍访古志》二跋：**去年三月**

今按：据宋台州本《经籍访古志》二跋原文，光绪刻本“三月”下脱“内”字，点校本从之。

考证下：

15.第23页第7行正文**“宿昔而杀之”。**

今按：原文本作“夙昔而杀之”，光绪刻本因音近而误，点校本从之。

16.第37页第8行引用胡元仪《郇卿别传》：**则大臣主断国私**

今按：句中的“国”字，原文本作“图”，光绪刻本因形近而误，点校本在校勘记中指出：“图”，原本作“国”，据《韩诗外传》四改。

17.第39页第15行引用胡元仪《郇卿别传》：**生俭、缙、靖、焘、汪、爽、肃、专**

今按：句中的“专”字，光绪刻本脱漏，点校本在校勘记中指出：“专”，原本无，据《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补。李贤注：“专，本或作敷。”

18.第47页第1行引用胡元仪《郇卿别传》“楚元王交尝与鲁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

今按：点校本在校勘记中指出：“白公”《汉书·楚元王传》作“百生”。

19.第51页第2行影宋台州本杨倞《荀子序》：**故仲尼定礼乐**

今按：《礼》、《乐》二书为孔子所删定，标点应为“故仲尼定《礼》、《乐》”。点校本误以“礼乐”为一词，漏标书名号。

20.第51页第5行影宋台州本杨倞《荀子序》：**敷陈往古**

今按：“敷陈往古”，原文本作“敷陈往昔”。光绪刻本因习惯用语而误，点校本从之。

21.第52页第1行**或徵诸方言**

今按：“或徵诸方言”，原文本作“或徵之方言”。光绪刻本因习惯用法而误，点校本从之。

22.第52页第3行影宋台州本杨倞《荀子序》：**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卿子》**

今按：杨倞序原文本作“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子》”，光绪刻本不明《荀子》乃杨倞校改后书名，误从别本而衍“卿”字，并漏标书名号，点校本误从之。

二、正文部分

《劝学篇》

23.第13页第8-9行正文“故不闻而告谓之傲”下引杨倞注作“或曰：读为噉，口噉噉然也。”

今按：影宋台州本杨倞注原文作“或曰：读为噉声，曰噉噉然也。”光绪刻本、点校本据卢文弨校皆删“声”字，且将“曰”字误改为“口”字。

24.第13页14-15行正文“问一而告二谓之𠵼”，下引杨倞注作“‘𠵼’即‘讚’字也。谓以言强讚助之。今赞礼为之讚，‘𠵼’古字，‘口’与‘言’多通”，

今按：据影宋台州本，杨倞注文本作“‘𠵼’即‘讚’字也。谓以言强讚助之。今赞礼为之赞唱，古字‘口’与‘言’多通。”光绪刻本误脱“唱”字，点校本从之，且“古字”下误标逗号。

25.第15页第3-9行正文“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漏儒而已”。此文下引用郝懿行《荀子补注》作“谓漏儒但能彙志顺读诗、书，末世穷年，不知理解也。”

今按：据郝懿行《荀子补注》原文，可知“谓”前，光绪刻本误脱“此”字，点校本从之。“彙志”后应有逗号，方与正文相应，点校本漏标逗号。

26.第19页第14行正文“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羣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下引杨倞注文作“覆说为学，学则物不能倾移矣”。

今按：据影宋台州本杨倞注原文，光绪刻本因上文而误衍后一“学”字，点校本从之。

《修身篇》

27.第24页第10-11行正文“易忘曰陋。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秬”下，引杨倞注：“少，谓举其要，而有条理，谓之治。”

今按：杨倞此注文解释“少”与“治”，故“要”字之后应用分号，点校本误标逗号。

28.第35页第8-10行正文“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今按：“求利”、“远害”、“避辱”应与“行道”相对成文，故知“理”字必衍。光绪刻本失校，点校本从之。

《不苟篇》

29.第38页第4行正文“山渊平，天地比”下引用杨倞注文：“地去天远近皆相似，是山泽平也”，

今按：杨注原文为“地去夫天，远近皆相似，是山泽平也”。“去”字与“天”字之间的“夫”字，光绪刻本以为衍文而误删，点校本从之；且“天”下当用逗号，点校本漏标。

30.第38页第10行正文“钩有须”下，俞樾注引《说文·女部》：“媼，媼也”

今按：点校本引俞樾注文“也”下脱句号。

31.第43页第1-2行正文“知则明通而类”下引杨倞注“显，谓知通类。”

今按：“显”字，杨倞注文原作“类”。光绪刻本因形近而误“类”为“显”，点校本从之。

32.第44页第7-8行正文“穷则弃而僇”下引杨倞注：《韩诗外传》作“弃而累也”。

今按：考《韩诗外传》卷四，知原文作“弃而累”，无“也”字。故标点当作：《韩诗外传》作“弃而累”也。点校本标点有误。

33.第48页第12-14行正文“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下引杨倞注文“故荀明之”。

今按：据杨注原文为“故荀卿明之”，光绪刻本脱“卿”字，点校本从之。

34.第51页第2行正文“若是则可谓慤士矣”，下引杨倞注文作“端慤不貳”。

今按：杨注原文本作“端慤不回”，光绪刻本将“回”讹为“貳”、点校本从之。

35.第51页第8-10行正文“然后定其欲恶取舍。”下引顾千里注文“上下文皆即此义明甚”。

今按：所引顾千里注文标点当为“上下文皆即此义，明甚。”“此义”下，点校本漏标逗号。

《荣辱篇》

36.第52页第13行正文“僇泄者，人之殃也”，下引杨倞注文“泄与媼同，媼也，慢也。”

今按：据杨倞原注，光绪刻本脱“媼也”二字、点校本从之。

37.第53页第4行正文“恭俭者，僇五兵也。”其下引杨倞注文“说文有‘僇’字，僇，蹇也，与此义不同。”

今按：杨倬注文本作“《说文》有‘僻’字，僻，窳也，与此义不同。”光绪刻本将“僻”字误作“僻”，点校本从之。

38.第53页第4-7行正文“恭俭者，僻五兵也。”下，王先谦案：“五兵说见《儒效篇》”。

今按：王先谦按语标点应作“五兵，说见《儒效篇》。”点校本漏标逗号。

39.第53页第13行正文“巨涂则让，小涂则殆，虽欲不谨，若云不使。”下引杨倬注作“凡行前远而后近，故近者亦后之义。”

今按：杨倬注文“凡行”下应加逗号。点校本不明注文之意，漏标逗号。

40.第55页第1行杨倬注：专行，谓不度是非，好复言如白公者也。

今按：杨倬注文“是非”下应加顿号，“好复言”下应加逗号。点校本标点既误且脱。

41.第55页第4行杨倬注：盖当时禁斗杀人之法戮及亲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为民伤斗，则以亲戚徇一言而不顾之也。”

今按：考《尸子·广泽篇》原文：“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非之，怒则以亲戚殉一言。”故杨倬注引《尸子》“则以亲戚徇一言”下应先加句号，然后用引号。因“而不顾之也”五字为杨倬注文，并非《尸子》之文，点校本不查原文，皆误标。

42.第55页第13行杨倬注：鑱，刺也，之欲反。故良剑谓之属镂，亦取其利也。

今按：所引杨倬注中“利”字，杨注原文本作“刺”字，光绪刻本不谙上文，以其形近而讹，点校本从之。

43.第58页第7行正文“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王先谦案：“反之人，与《君道篇》‘反之民’‘反之政’同，意言反求也。”

今按：王先谦按语“民”下应加顿号，“同”下逗号应加在“意”之后，点校本不明训诂惯用之语，标点皆误。

44.第58页第11行引汪中注“‘材’，疑当作‘朴’，字之误也。‘材慤’与‘荡悍’，‘乐易’与‘幽险’，‘寿长’与‘夭折’，皆对文。”

今按：所引汪中注文中的“幽”字，原文本作“忧”，光绪刻本音近而讹此字，点校本从之。

45.第59页第7行引用杨倬注文：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书，

今按：杨倬注原文本作“度，尺丈。量，斗斛。刑辟，刑法之书。”光绪刻本在“刑法之书”前脱“刑辟”二字，点校本从之；点校本在“刑法之书”后误用逗号。

46.第60页第9行正文“陶诞、突盗”下引用郝懿行注“陶诞即谣诞，谓好毁谤夸诞也，突盗，谓好侵突掇盗也，每二字为一义。注似失之。”

今按：所引郝懿行注标点应作“陶诞即谣诞，谓好毁谤夸诞也；突盗，谓好侵突掇盗也；每二字为一义。注似失之。”点校本在两“也”字下应标分号，不应标连用逗号。

47.第62页第4-5行正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下引杨倬注作“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谓之雅。诗曰：‘弁彼鸛斯，归飞提提。’鸛斯，雅鸟也。”

今按：杨注原文本作“鸛斯，雅鸟也。”《诗经·小雅·小弁》“弁彼鸛斯。”毛《传》“鸛，卑居。卑居，雅鸟也。”光绪刻本因形近而将“鸟”讹作“乌”字，点校本从之。

48.第62-63页第2行引杨倬注“崔云：‘淫衍也。’”

今按：杨倬注标点应作“崔云：‘淫，衍也。’”点校本不明训诂术语，在“淫”下漏标逗号。

49.第63页第12行正文则尧、禹则常安荣。

今按：此句各本皆作“为尧、禹则常安荣”，与后文“为桀、跖则常危辱”相对为文，光绪刻本不误，点校本将前“为”字误作“则”字。

50.第63页第14-15行正文“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今按：上文句读当为“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修之待尽，而后备者也。”其“为”字当乙于上“修”字下，“待尽”二字当在“之”之下。如此，方文从字顺，与上下文相贯。光绪刻本失校，点校本从之，句读、标点皆误。（参见《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第3期王天海《荀子·荣辱篇句读新辨二则》）

51.第69页第14-15行正文“以治情则利，以为名则荣，以群则和，以独则足。乐意者其是邪？”

今按：“意”乃“易”之音讹。本篇前文曰“安利者常乐易”，“乐易常寿长”，故此文必当作“乐易”，方与上下文相呼应也。光绪刻本失校，点校本从之。（参见同上）

《非相篇》

52.第73页第11行正文“突秃长左，轩较之下，而以楚霸。”下引杨倞注作“突，谓短发可凌突人者。”

今按：杨注原文本作“突，谓发短可凌突人者”，光绪刻本将“发短”误倒为“短发”，点校本从之。

53.第74页第5-6行正文“故事不揣长，不揆大，不权轻重，亦将志乎尔。”

今按：影宋台州本原文作“故士不揣长，不揆大，不权轻重，亦将志乎心尔。”光绪刻本从别本将“士”字作“事”。然此句意在说明士人所重不在长短、大小、肥瘦等外形长相，而在于内心有志向罢了。故正文作“事”字与文义不合。此因“事”与“士”音近而讹。光绪刻本又脱“心”字，点校本从之，皆误。

54.第77页第1-2行正文“知行浅薄，曲直有以相县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下引杨倞注作“曲直，犹能不也。言智虑德行至浅薄，其能不与人又相悬远，不能推让明白之。”

今按：上引杨注原文“能不”二字本作“能否”，光绪刻本将两个“否”字作“不”字，点校本失校从之。“不”，虽可与“否”通，但此处正文与杨注中皆有“不能”一词出现，如不严加区别，则极易产生歧义。

55.第88页第4行正文“居错迁徙，应变不穷”，点校本引杨倞注“错，干故反。”

今按：杨倞注原文本作“错，干故反。”光绪刻本同，点校本误“干”为“干”，形近而讹。

56.第88页第10行引杨倞注：故致实党正为重也。

今按：据杨倞注原文，光绪刻本衍“也”字，点校本从之。

57.第89页第1行正文“然而口舌之均，嗜唯则节”下引杨倞注：盖谓聘其口舌之辨也。“嗜唯则节”四字未详，或剩少错误耳。

今按：剩、少、错、误，四字为训诂术语。剩，为衍文；少，为脱文；错，为错字；误，为形音义之误。故当在杨注“剩”“少”“错”三字后分别加上顿号，点校本不明训诂术语，未标三个顿号，容易引起误解。

《非十二子篇》

58.第90页第1行正文“饰邪说，交奸言”

今按：“交”，各本皆作“文”，光绪刻本不误，点校本因形近而讹“文”为“交”。

59.第90页第5行杨倞注：《晏子春秋》曰：“不以上为本，不以民为忧，内不恤其家，外不顾其游，夸言僥行，自勤于饥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王之所禁也。”

今按：上所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王之所禁也”二句，杨倞注原文本作“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光绪刻本误将“僻”作“辟”，误将“上”作“王”，点校本从之。杨注所引《晏子春秋》文中“为忧”、“其游”、“饥寒”之下皆当用分号，点校本连用逗号，不当也。

60.第91页第8-10行正文“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下引杨倞注：妄称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论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众人”矣。又引郝懿行注：故者，皆于故实之故，谓其持论之有本也，成理，谓其言能成条理也，故皆足以欺惑愚众。

今按：“言之成理”乃杨注所引正文，其下应加双引号；“足以欺惑愚人众人”为杨倞注文，不应当在引号内。所引郝懿行注文标点亦误。当在两“也”字下分别加分号。点校本皆误。

61.第93页第6-7行正文“终日言成文典，反纠察之，则偶然无所归宿”下引杨倞注作“虽言成文典，若反覆纠察，则疏远无所指归也。”

今按：杨倞注原文本作“虽言成文典，若纠察，则疏远无所指归也。”光绪刻本衍“反覆”二字，点校本从之。

62.第94页第2-3行正文“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下引杨倞注“统，谓之纪纲也。”

今按：杨倞注原文本作“统，谓之纲纪也。”光绪刻本将“纲纪”倒为“纪纲”，点校本从之。

63.第95页第13行正文“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若夫总方略，……”

今按：标点应作“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若夫总方略，……”据文意可知“也”为上句句末语气词，“若

夫”为句首发语词，故当在“也”之后加句号。点校本断句、标点皆不当。

64.第98页第9行正文“**辩不惠而察**”下引杨倬注“**辞辩不顺，道理不聪察也**”，

今按：杨倬注文原作“辞辩不顺道理而聪察也”，本为完整一句，光绪刻本将“而”讹为“不”字，点校本从之，并于“辞辩不顺”下误加逗号，大失杨注原文之意。

65.第101页第13行引王念孙注：《庄子·在宥篇》“**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

今按：王念孙注原文本作：《庄子·在宥篇》“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光绪刻本将“臂”字讹作“背”，点校本从之。

66.第102页第14行正文“**傴然，壮然，祺然，蕤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

今按：点校本将“傴然”误为“伛然”字。光绪刻本不误。

67.第103页第2行正文“**訾然洞然，缀缀然，瞽瞍然，是子弟之容也**。”

今按：“訾然”与“洞然”之间应有逗号或顿号，点校本在此脱漏标点。

68.第103页第11-12行正文“**莫莫然，睭睭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下引杨倬注“**莫，读为貌。貌，静也，不吉之貌**。”

今按：杨注原文作“莫，读为貌。貌，静也，不言之貌。”点校本将“言”误为“吉”字，与正文、注文之意皆不合。光绪刻本不误。

69.第104页第13行正文“**弟佗其冠，神禔其辞**”下引杨倬注“**谓其言淡薄也**。”

今按：杨注原文作“谓其言淡泊也。”光绪刻本因音近，将“泊”误为“薄”字，点校本从之。

《仲尼篇》

70.第109页第3行正文“**故道岂不行矣哉!**”下引杨倬注：**以此言之，道岂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

今按：所引杨倬注文，光绪刻本作“以此言之，道岂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胡之。”点校本在校勘记中指出“‘明’，原本作‘胡’，形近而误，今改。”杨注原文本作“明”。

《儒效篇》

71.第110页第4-5行正文“**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

今按：据影宋台州本《荀子》，正文“善”上有“言”字，光绪刻本从王念孙之说误删“言”字，点校本从之。然若无此“言”字，则上下文意阻隔，故当有。且标点当为“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言‘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故点校本标点亦有误。（参见王天海《荀子校释》第246页）

72.第114-115页第1-2行正文“**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下引杨倬注“**邗、晋、应、韩，武之穆也**。”

今按：杨注原文本作“邗、晋、应、韩，武之穆也。”《说文》“邗，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内野王是也。”“邗”古国名，后属吴国，不为“武之穆”。光绪刻本不误。点校本将“邗”误为“邗”字。形近而讹。

73.第119页第15行正文“**居于阙党，阙党之弟子罔不分，有亲者取多**”下引杨倬注“**阙党之弟子罔不分均有无，于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

今按：“阙党之弟子罔不分”，为杨注所引正文，故当先用引号后用逗号标示；“均有无于分均之中”，为杨倬一句完整注文，故“有无”下逗号不应有。点校本不明注文之意，标点错误。

74.第117-120页正文：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今按：“如是矣”下，点校本漏标后引号。

75.第121-122页第1-3行“**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重而行之**。”下引王念孙注：杨以比为比类，未确。

今按：点校本未在“比”和“比类”二词处加双引号，使王念孙注文文意不明。

76.第123页第6-9行正文“**若夫謫德而定次**”。

今按：影宋台州本原文作“若夫謫德而定次”。点校本将“謫”误为“謫”。下文引洪颐煊注中含有三个“謫”

字、引王念孙注文中有一个“謫”字，共 5 个“謫”字皆误作“謫”。此二字音义皆不同，点校本因形近而误，光绪刻本不误。

77.第 125 页第 14 行正文“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下引杨倬注“为学之后，则谁能禁我是不为圣人士君子也。”

今按：应在正文“士”与“君子”之间加顿号。所引杨倬注文“则谁能禁我”是对正文“孰禁我哉”的注解，故当在“我”后加逗号，在“圣人”、“士”后应加顿号。点校本标点皆误。

78.第 126 页第 8-9 行正文“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下引杨倬注作：《汉书》所谓“银镗”者也。

今按：杨注原文本作：《汉书》所谓“銀镗”者也。点校本将“銀”误为“银”字，因形近而讹。光绪刻本不误。

79.第 127 页第 6-7 行正文“是杆杆亦富人己，岂不贫而富矣哉！”下引杨注：杆杆，即于于也，自足之貌。庄子曰“听居居，视于于”也。王引之注：听居居，视于于，与富意无涉。

今按：王引之注文中“听居居，视于于”六字乃引用庄子之语，当加引号，点校本漏标。

80.第 127 页第十三行至 128 页第一行正文“争之则失去，让之则至，遵循则积，夸诞则虚。”下引王念孙注“遵循”则积承上文“让之则至”而言，“夸诞”则虚承上文“争之则失”而言。

今按：“遵循则积”及“夸诞则虚”为王念孙注文所引正文，故王念孙注文标点应作：“遵循则积”承上文“让之则至”而言，“夸诞则虚”承上文“争之则失”而言。点校本不明王念孙注文之意而错用双引号，使注文意义含混不清。

81.第 128 页第 8-9 行正文“《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下引杨倬注“《诗·小雅·鹤鸣》之篇。……，喻声远也。”

今按：所引杨注中“声”字，影宋台州本原作“深”，光绪刻本误，点校本校勘记曰：“‘声’，《诗·鹤鸣》郑笺作‘深’”。

82.第 129 页第 6-7 行正文“是犹伛伸而好升高也，是指其顶者愈众。”引杨倬注作“伛，倮也。伸，读为身，字之误也。伛身之人而强升高，则头顶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众。”

今按：据影宋台本、宋浙本，正文“伛伸”本作“伛身”。杨注原文本作“伛，倮也。伛身之人而强升高，则头顶尤低屈，故指而笑者愈众。”可知光绪刻本在“伛”之下脱“伛”字；衍“伸，读为身，字之误也”8字；“笑”字后又衍“之”字。点校本误从之。

83.第 130 页第 12 行正文“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下引杨倬注“若天告四时使成万物也。”

今按：正文“巧”下应加逗号；杨倬注文“若天告四时”后当加逗号。点校本皆漏标。

84.第 131 页第 14-15 行正文“严严兮其能敬己也”下，引杨倬注：“严”，或作“俨”。

今按：杨注原文本作：“严”，或为“俨”，光绪刻本将“为”误作“作”字，点校本从之。

85.第 132 页第 1-6 行正文“分分兮其有终始也”下，引俞樾注：《语论》曰：“文质份份”，“分分”即“份份”也。

今按：俞樾原注作《论语》，点校本误倒为《语论》，光绪刻本不误。

86.第 133 页第 2 行正文“绥绥兮其有文章也”下，引杨倬注“绥绥，安泰之貌，‘绥’，或为‘葳蕤’之‘蕤’。”

今按：应在杨注“安泰之貌”下标句号或分号，点校本误标逗号。

87.第 133 页第 4-5 行正文“此其道出乎一。曷谓一？曰：执神而固。”下引杨倬注“执持精神坚固。”

今按：杨注“执”后应加逗号，因为“持精神坚固”是对“执”的训释，点校本不明此理而漏标。

88.第 133 页第 12-13 行正文“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今按：正文标点应作“《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此文言《诗》、《书》、《礼》、《乐》、《春秋》分别表达的是圣人的情志、政事、行为、和谐、微言大义，点校本所加 5 个逗号使文意含混，都应删除。

89.第 134 页第 7-10 行正文“是殆非周公之行……履天子之籍，负宸而坐”下，引杨倬注文“户牖之间谓之宸也”，引王念孙注：汪氏中亦云：“作，当为立，古无坐见诸侯之礼。”

今按：杨倬注原文本作“户牖之间谓之宸”，光绪刻本衍“也”字，点校本从之。

王念孙注中光绪刻本将“坐”讹为“作”，点校本在校勘记中指出：“作”，据正文似当作“坐”。

90.第 135 页第 1-2 行正文“至汜而汎，至怀而坏”下，引杨倬注“谓至汜而适遇水汎涨，至怀又河水汎溢也。”

今按：杨注原文本作“谓至汜而适遇水汎涨，而至怀又河水汎溢也。”光绪刻本脱下一“而”字，点校本从之。

91.第 140 页第 13-14 行正文“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下，引杨倬注：“卒，于忽反。”

今按：杨注原文本作“卒，千忽反。”点校本将“千”误作“于”字，形近而误。光绪刻本不误。

92.第 141 页第 5 行正文“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

今按：当在“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之后加逗号，点校本漏标。

93.第 142 页第 3-4 行正文“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下，引杨倬注“言圣人无他，在止于行其所学也。”

今按：杨注原文“学”下本有“者”字，光绪刻本脱“者”字，点校本从之。

94.第 144 页第 1 行正文“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下，引杨倬注“言天性非吾自能为也，必在化而为之也。”

今按：杨注原文，“之”下本有“一”字。光绪刻本脱“一”字，点校本从之。

95.第 144 页第 3 行正文“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下，引杨倬注“错，干故反。”

今按：杨注原文本作“错，千故反。”点校本将“千”误为“干”字。光绪刻本不误。

96.第 144 页第 12 行正文“纵性情而不足学问，则为小人矣。”

今按：影宋台州本本作“纵情性而不足学问，则为小人矣。”光绪刻本将“情性”误倒为“性情”，点校本从之。

97.第 145 页第 7-10 行正文“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汙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下，引王念孙注：凡《荀子书》言“汙漫”者竝立。

今按：王念孙注文“凡《荀子书》”下应加逗号。点校本漏标。

98.第 146 页第 8-10 行正文“言道德之求，不下于安存”下，引杨倬注“谓人之政治来求则以安存国家已上之事语之也。”

今按：杨注“谓人之政治来求”之后应加逗号方与正文相应，点校本漏标。

99.第 146 页第 10 行正文“言志意之求，不下于上”。

今按：影宋台州本作“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点校本将“士”误为“上”字。光绪刻本不误。

（本文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王念孙. 读书杂志[M]. 王氏家刻本.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2]冢田虎. 荀子断[M]. 日本宽政七年（1795）京师水玉堂刊本.

[3]鍾泰. 荀注订补[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刘师培. 荀子斟补·荀子补释[M]//刘申叔先生遗书. 1934年宁武南氏校印本、1936年排印本.

[5]久保爱. 荀子增注[M]. 日本文政三年（1820）平安书林水玉堂本.

[6]于省吾. 双剑謄·荀子新证[M]. 北京：大业印刷局，1940.

[7]鲁实先. 荀子札记[J]. 贵善半月刊，1941，1(23-24).

[8]物双松. 读荀子[M]. 日本宝历十四年（1764）京师水玉堂刊本.

[9]朝川鼎. 荀子述[M]. 日本昭和八年（1933）排印本.

[10]俞樾. 荀子平议[M]. 光绪刊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1]刘如瑛. 荀子校释补[J]. 中华文史论丛，1980(4).

- [12]杨柳桥. 荀子诂译[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5.
- [13]卢文弨, 谢墉. 荀子笺释[M]. 浙江书局汇刻《二十二子》影印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4]郝懿行. 荀子补注[M]. 清刻《齐鲁先喆遗书》本.
- [15]包遵信. 读荀子札记[J]. 文史, 1978-1979, (5,6).
- [16]安积信. 荀子略说[M]. 日本昭和八年(1933)排印本.
- [17]梁启雄. 荀子简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8]熊公哲. 荀子今注今译[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5.
- [19]王引之. 读书杂志[M]. 王氏家刻本.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 [20]潘重规. 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札记[J]. 制言, 1936(12).
- [21]北京大学荀子注译组. 荀子新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2]顾千里. 读书杂志[M]. 王氏家刻本.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 [23]李中生. 荀子校诂丛稿[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24]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光绪辛卯思贤讲舍本、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5]徐复. 荀子臆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26]陶鸿庆. 读诸子札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7]龙宇纯. 荀子集解补正[J]. 大陆杂志, 1955(8,9,13).
- [28]郭嵩焘. 荀子集解[M]. 光绪辛卯思贤讲舍本、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9]杨树达. 积微居读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0]骆瑞鹤. 荀子补正[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 [31]郭庆藩. 荀子集解[M]. 光绪辛卯思贤讲舍本、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32]帆足万里. 荀子标注[M]. 日本昭和二年(1927)排印本.
- [33]章诗同. 荀子简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说明: 因文中各种标注符号太多, 为避免混乱, 文后参考文献的序号不在文中引文后标注。)

《荀子》文献与荀卿思想的关系探析

佐藤将之

(台湾大学 哲学系, 台湾 台北 10617)

摘要: 首先阐述《荀子》的成书、编辑以及流传; 其次, 则针对《荀子》是否能代表荀卿本人思想这个问题之五种观点, 比较评述其得失。并不再赘述文本流传的文献学上的问题; 而是由思想史的观点, 试图阐述刘向、杨倞等人之编纂所带来的思想意义。另外, 有鉴于中文学界对《荀子》版本流传至日本之后的过程较不太熟悉的情形, 故本文也将叙述《荀子》“台州刊本”东传之后, 直到 1884 年黎庶昌将之重刊于《古逸丛书》的过程。

关键词: 荀卿; 《荀子》; 刘向; 杨倞; 《荀子》; “台州刊本”

中图分类号: B2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27-09

收稿日期: 2013-11-10

作者简介: 佐藤将之 (1965—), 男, 日本川崎人, 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

一、导论

笔者在观察过去 20 年, 尤其是最近十年中文学界《荀子》^①思想研究的情形之后, 有了以下两点感触。第一点是, 无论是大陆或港台澳的研究, 除了对文献考据问题较为敏感的少数学者, 似乎并未先考量过《荀子》文本流传的历史, 就无意识地挑选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为底本, 以至于文本考据的问题, 就完全依靠《集解》所搜集的历代注解以及王先谦的注释。其结果是, 往往完全不知悉《集解》所未载录的其他成果。当然, 笔者并非意图主张《荀子集解》内容不佳, 而只是提出一个观察: 中文学界的研究者迄今尚未充分利用自德川时代末期到明治时代 (大概 19 世纪之间) 于日本出版的考据和注解——特别是久保爱的《荀子增注》 (这些问题后文都将详述)。这样的情形让笔者认为, 从东亚思想史研究的观点, 阐述《荀子》文本的渊源、西汉刘向的整理、唐朝杨倞的“重编”, 以至于清代中国、德川日本之考证此一整体脉络之必要性。

第二种观察则是, 在中文学界的《荀子》思想研究中, 也许是 20 世纪初“古史辨”疑古观点研究的“风暴”或“教训”所遗留之负面效果之故, 在 20 世纪后半以后, 学者之间除了有最后七篇 (按照刘向的排序为: 《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大略》、《尧问》、《君子》之七篇) 恐为荀子后学所汇集而成的共识之外, 越来越少学者意识到今本《荀子》是否代表荀卿的著作之问题。然而, 若把这项问题与上述第一项问题放在一起思考, 就会大大影响我们用以理解《荀子》思想的框架, 以及对其整体的评估: 在刘向把当时存在的 322 篇冠上荀卿之名并整理成 32 篇时, 他将《性恶》放在第二十六篇, 亦即被放在与当代学者视为所谓“杂录”部分的七篇一起。是唐代的杨倞, 才把《性恶》从原来的第二十六移为今本的第二十三篇。若按照其原本排序来思考, 我们便应该将《性恶》看作属于后学“杂录”中的一篇。虽然如此,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以此事实来主张《性恶》就属于荀卿后学的作品。同样地, 笔者也不认为过去的《荀子》研究者, 都没有思考过今本《荀子》是否代表荀卿本人思想的问题。笔者只是想要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至少据笔者所悉, 一般而言, 在 20 世纪后半之后的中文学界之中, 《荀子》思想的研究者, 再也没有对此问题提出较具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更何况, 如本文所述, 对于此项问题的见解其实也相当多种, 而其见解的差异也会影响对《荀子》整体思想之理解。是故, 在尚未适

① 本文为了明确其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区分, 系指其文本时将使用“《荀子》”; 而系指其人时则将使用“荀卿”。

当地整理与评述此问题的情况之下，要进行比较具有说服力的《荀子》思想研究，恐怕也较为困难。

有鉴于此，本文的前半将探讨《荀子》的成书、编辑以及流传；后半则针对《荀子》是否能代表荀卿本人思想这个问题之五种观点，比较评述其得失。事实上，高正等学者业已详细研究过刘向将各种原始资料整理为现本《荀子》的格式和份量后流传至今的各种版本的历史。并且，到目前为止，也尚未出现能够推导出新版本的资料。因此，本文不会再赘述文本流传的（如甲版的母本为乙版之类的）文献学上的问题；而是由思想史的观点，试图阐述刘向、杨倞等人之编纂所带来的思想意义。再者，由于中文学界中的大部分学者，对《荀子》版本流传至日本之后的情形迄今还不太熟悉，故笔者将叙述“台州刊本”东传之后，直到1884年黎庶昌将之重刊于《古逸丛书》的过程。

二、《荀子》的文献形成与流传

关于《荀子》文本的相关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个：第一，西汉刘向（前77—前6）删定《荀子》三十二篇之后的文本流传的问题；第二，今本《荀子》一书能否代表荀卿本人思想之问题。就笔者所悉，日本针对今本《荀子》各篇之间思想关系的研究，是从1930年代开始崛起。当时木村英一^①、金谷治^②、豊島睦^③等学者，各自发表了对《荀子》文本成书和流传的研究。至于今本《荀子》的各种版本之间的流传关系，近来高正对所有中国保存的现有文本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描述出文本流传的详细系谱。^④在英美学术界中，德效騫（Homer H. Dubs）也曾经叙述过文本的历史。^⑤率先提供《荀子》全英译本的John Knoblock，也在“介绍文本”的讨论中，说明过主要版本的来源和特色，以及彼此之间的引述关系。^⑥鲁惟一（Michael Loewe）同样也提供了《荀子》主要版本的简介。^⑦在这些先行研究当中，高正的专书最为详细。因此，刘向编纂之后《荀子》文本历史的阐述，大概都基于上述的研究。而笔者在此的论述，则较注重这些文本的流传背后，所能观察到的思想意义。

根据上面列举的文献学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荀卿去世后，《荀子》成书及流传的过程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下面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说明其文献流传的思想意义。

（一）从荀卿生前到西汉刘向对文本的编纂（约前250年至前20年）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撰写关于荀卿的情况时，如此写道：“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而现本《荀子》则总共大概有九万一千多字。虽然我们目前无法得知司马迁是否看过现本《荀子》的全部内容，而荀卿的弟子们应该各自流传了不同样貌的荀卿书（此“荀卿书”在什么样程度上能代表荀卿本人的思想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任何有关此时被冠上“荀子”之名的书本是如何流传的记录。然而，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关于此问题的线索。事实上，在西汉时代撰写或编辑成的文献中，有许多与《荀子》相似，或甚至几乎一样的章节段落文字，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在刘向编辑之前，“荀子”原型文献的情况之蛛丝马迹。

在可以认定为西汉前期撰写或编辑的文献当中，含有与现本《荀子》类似或一样的段落文字的文献有《韩诗外传》、《史记·礼书》、《礼记》以及《大戴礼记》此四者。其实在20世纪初期，学者们便已讨论过，究竟这些段落是抄录自冠上“荀子”之名的原型文献，还是现本《荀子》（西汉时代）的作者或编者从上述文献抄下来之问题。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形，最近五十年的日本文献学家大概一致认为，现本《荀子》的几种母本，在刘向编纂之前应该已存在。^⑧

首先，《韩诗外传》中与现本《荀子》相似的章节段落高达55处。^⑨《韩诗外传》的编者韩婴（韩生）是汉

① 木村英一：《荀子三十二篇の構成について》，《支那學》（卷8，1935）第15-45页；木村英一：《讀荀子二則：書誌學的劄記》，木村：《中國哲學の探求》（東京：創文社，1981），第183-197页。

② 金谷治：《荀子の文獻學的研究》，《日本學士院紀要》（卷9-1，1950），第9-33页。

③ 豊島睦：《荀子文獻批判の一方法》，《哲學》（廣島大學，卷5，1955），第59-71页。

④ 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⑤ Homer H. Dubs: *Hsü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27, pp. 39-47.

⑥ John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 I.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05-128.

⑦ Michael Loewe: "Hsün Tzu," Loewe (ed.):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 Guid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3, pp. 178-188.

⑧ 在下节中，考察这节课的内容以及学者们的观点。

⑨ 豊島睦：《韓嬰思想管見—《韓詩外傳》引用荀子句を中心として》，《支那學研究》第三十三號（1968），第50-58页。此外，余崇生也详尽地以列表的方式，对比了45段《荀子》和《韩诗外传》相近的文句。余崇生：《〈韩诗外传〉研究（一）——〈荀子〉引用文との對照表》，《待兼山論叢》第十七號（大阪：大阪大學文學部，1983），第21-36页。

文帝时期博士之一，而《韩诗外传》是在汉文帝统治期间，即大约前 177-157 年时期著作所编成。^①因此，《韩诗外传》是可以证实今本《荀子》内容存在过的，最早时期的文献。众所周知，《韩诗外传》一书是搜集许多故事而组成的，并且藉由引述《诗经》的一节来当作总结。这种在结论部分引《诗》来证实自己的论点的写法本身与《孟子》和《荀子》的论述方式近似。

若我们假定荀卿于前 230 年左右逝世，《韩诗外传》的撰作时期则会落在荀卿死后的八十年以内。这一点也让我们得以推测，韩婴可能曾遇过荀卿的弟子，比如说浮丘伯。《汉书》上记载，浮丘伯在吕后（前 241—180）统治期间的公元前 187 年到 180 年，居住在汉朝首都长安，而当时正好是韩婴担任博士的几年前。^②因此，韩婴至少应该接触过，由浮丘伯或其他荀卿弟子所传抄的《荀子》原型文献。也就是说，《韩诗外传》中与“荀子”相关的段落，很可能是从荀卿弟子的传抄本中直接抄录下来的（若韩婴见到浮丘伯，那他甚至可能看过荀卿亲笔的文稿！）。若是如此，笔者倾向于认为：《韩诗外传》中的引文或多或少反映了荀卿的思想，也就是说，《韩诗外传》无疑是一本，可以用来重建《荀子》一书内容之原始状态的最为核心的资料。

此外，《礼记》与《大戴礼记》也含有六段与《荀子》相似的文字。其中有些因为篇幅够长，甚至几乎可以自成一篇。^③正如豊島陸与廖名春都指出的，《史记·礼书》也引用了《荀子·礼论》的大量文字。豊島陸进一步主张，《礼书》所保存的与“礼”相关的论述，甚至比现存《荀子》中所保存的更为完整。^④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司马迁对“礼义”（即国家的伦理大纲）与“礼制”（即国家机构）的说明，基本上仍依据我们在现存《荀子》中所看到的内容。例如说，“礼者养也”、“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等，司马迁用以界定“礼”的意义内容，都是可以在现本《荀子》文本中找出来的文句。^⑤

（二）从刘向之后到唐朝杨倞的重编（约前 20 年至 818 年）

西汉时期的多种文献，如《韩诗外传》、《礼记》、《大戴礼记》以及《史记》等，都引述与现本《荀子》同样的段落和句子。这个情形，暗示了冠上“荀子”的几种版本——无论是以数万字的整份文本，或只不过几千字之单篇的形式——在刘向之前便应该已在汉代知识分子社群之间普遍流传。以此为背景，刘向整理汉成帝（在位前 33 年至前 7 年）的帝室书库之藏书，并且编辑在《孙卿书》名下保藏的各种文本。他在其《叙录》中如此说明文本的状况：

所校讎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

此引文的大意是：“所校勘过的是，汉朝的皇家书库，所收集的冠上“孙卿”之名的书籍，总共有 322 篇。互相比校核对这些文本之后，除掉重复的 290 篇，最后校订为 32 篇。”根据刘向之说，在《孙卿书》名下有 322 篇文本。或许在当时，现存《荀子》文本中可见的篇章已有数量不少的重复，因此刘向在校对后，除去重复的 290 篇文章，将其余的内容编辑成 32 章的文本。如金谷治所指出的，相较于从 30 篇校除成八篇的《晏子春秋》，以及从 20 篇校除成八篇的《列子》，刘向所收集到的“荀子”母本，其规模十分庞大。^⑥此外，从此我们也可知“荀子”母本在当时确实是相当广为流传的。

值得注意的是，若从字面上来理解刘向所言，原来称为《孙卿书》的诸抄本的数量，几乎与他最后定下的文本相差了十倍，因而可知当时应该有许多套的《孙卿书》。如此大量的文献来源，可能使刘向并不需要再从其他文本来抄写，其工作反而是要致力去除重复的部分。刘向将其汇编的文本称做《孙卿新书》，而此“新”的《孙卿书》，除了已删除重复的内容之外，对于后世的影响其实还有更重大的意义。亦即，此《孙卿新书》比过去流传过的任何版本的《孙卿书》，都具备更为“完整”的内容。因此《孙卿新书》和《孙卿书》的区分，等于是在说一份唯一完整的文本，和全部其他不完整文本之间的差别。

在刘向之后，《孙卿新书》以抄写为主的方式流传下来。如上所述，由于《孙卿新书》比之前的任何版本都更为完整，所以《孙卿新书》必然逐渐取代了所有其他版本的《孙卿书》。而一旦其他“不完整”的版本逐渐被淘汰且不再流传，此“完整”版本的名字中的“新”字也不再需要，而可能开始只被称为《孙卿书》。在《隋书·

① 请参照《史记》第 61 章，第 3124 页。

② 请参照《汉书》第 88 章，第 3608 页。

③ 杨筠如：《关于荀子本书的考证》，罗根泽编《古史辨》卷 6（香港：太平书局，1963），第 138 页。

④ 请参照豊島陸：《荀子文獻批判の一方法》，第 59-71 页。

⑤ 请参照第 23 章，第 1161-1171 页。

⑥ 请参照金谷治：《荀子の文獻學的研究》，第 12-13 页。

经籍志》中可以看到十二卷的《孙卿子》版本，而其中“新”字已经不存在。而其卷数的减少，则是由于纸的发明使得抄写者能够缩减文献抄录体积的大小。唐代政治哲学的文选《群书治要》的第38章，引述了杨倞之前《荀子》版本中的29条句子。^①但不幸的是，所有杨倞之前存在过的版本后来都亡佚了。

（三）从杨倞的重编至今（818年至今）

唐朝宪宗（778—820；在位805—820）时的朝臣杨倞（生卒年未详），在818年（元和13年）对当时流传文本的校勘以及变更，是自刘向以来整个《荀子》文本历史上最大的事件。杨倞的校勘包含了下面三项重要作业：第一，他把原来被称为《孙卿书》或《孙卿子》的文本重新命名为《荀子》。第二，他对当时知识分子也已经难以读通的部分加上注解。根据杨倞在前言中所言，当时文本中存在许多难以辨认的文字，导致读者在阅读上的困难。第三，他按照篇章之间的相似性重新排列文本的顺序。例如《礼论》从原本的第23章移动到第19章，也就是排到了《乐论》之前。这些改动之中对《荀子》整体思想的形象影响最大者，就是《性恶》一篇的更动。原本《性恶》列于第26章，亦即在《子道》（现本中的第29篇）之后，代表《性恶》篇在刘向的排序中原本是混居在七篇杂录之中。杨倞把它移到《正名》之后的第23篇，其结果则是给了读者一个，《性恶》篇是荀卿探讨理论性或哲学性问题的篇章之一的印象。由于杨倞以前的抄本都已佚失，现在我们能读到的所有《荀子》版本，都是基于杨倞改过篇章次序的文本。

杨倞加注以后的《荀子》文本，不再经历任何内容、顺序上的改动。而宋代开始刻印之后，要追溯版本则是较容易的。迄今研究过《荀子》文本流传历史的研究，大抵上一致认为宋代以后的文本继承，大抵是以两大系谱来展开：第一条流传系谱是从“国子监刊本”开始。此刊本在北宋神宗时期国子监的监督下，于1068年（熙宁元年）刊出。到了南宋孝宗时期的1181年（淳熙8年），则由唐仲友重刻，此版本后来称为“台州刊本”。“国子监刊本”和“台州刊本”的书本都失传，今日北京图书馆保存了另外继承“国子监刊本”系统的“浙北刊本”，只不过因其残缺不少页张，而其直接版源也不甚清楚。^②

另外，虽然“台州刊本”在中国已失传，但其中一本在传到日本之后，被保存于金泽文库，而在转手几次后的德川时代，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狩谷望之（椽斋，1775—1835）获得。其原本在狩谷去世后，却也遗失了。然而，不幸中的大幸是，狩谷还在世时有一位诸侯向他借了原本，并制作了一份完整的复本，而该复本在明治时代，为东京大学“支那哲学”讲座的教授岛田重礼（1838—1898）所购得。岛田后来获悉驻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7）有意愿重刻此版，便把此抄本赠送给黎庶昌。黎庶昌于是就请当时日本声誉最高之雕刻师第三代木村嘉平（1823—1886）雕刻。如此，保留着浓厚宋代刻本风格的《荀子二十卷：唐杨倞注，景宋台州本》，便被收入《古逸丛书》的第七卷，并在1884年出版。

另一方面，第二条脉络的文本流传系谱，则是从南宋时期的商业印刷开始。这系列的文本被称做“纂图互注本”。此刊本的文本来源，无法追溯到杨倞之前的版本，而且其雕刻也不甚精确。只不过由于“纂图”系统刊本明显和“国子监刊本”属于不同的系谱，因此如金谷治所说，此版本在校勘上还具有参考的价值。^③

关于《荀子》各种文本的校勘，清代考证家卢文弨（1717—1796）广泛地搜集当时存在的主要文本，进行了精致的校勘，并由谢墉（生年未详—1795）在1786年出版。卢刊本是在“台州刊本”出现之前，各种《荀子》文本中最精良的文本，在传至日本后由朝川鼎（善庵，1781—1849）于1818年出版。后来十九世纪初“台州刊本”的“出现”，久保爱（筑水，1759—1835）得以利用了狩谷望之借给他的“台州刊本”之原本进行校勘，并综合在他之前德川学者的主要注解，而后来在1820年出版了《荀子增注》。在中国能够参考到《古逸丛书》所收之“台州刊本”的王先谦（1842—1917），也在1891年出版了《荀子集解》，可谓是清代考证《荀子》文本之成果的集大成。此后迄今为止，虽然仍尚未出现对于校对工作有重大意义的“新”文本，但有鉴于近年来先秦以及汉代文献的大量发掘，我们也可以期待“竹简”《荀子》的相关文本的出现。^④

① Knoblock 其中索出了29条与现本《荀子》含有的一样的句子。请参照 Knoblock, I, p.110.

② 高正指出“此本共抄补12页半，尚缺2页未补。抄补之页为：杨序第1页上半页，卷5第1、2页，卷11第7、8页，卷13第1、2页及第17、18、19、20页，卷14第1、2页。”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第17页。

③ 金谷治：《荀子》（东京：岩波书店，1962）第434-435页。

④ 内山俊彦在他的新版《荀子》后言中论及郭店竹简《穷达以时》开头“又天又人天人又分”和荀子思想的可能关系。请参照内山：《荀子》（东京：讲谈社，1999）第336-338页。

三、关于《荀子》一书是否代表荀卿本人的思想之五种观点

在了解《荀子》思想的具体内容之前，若是先讨论文献内容是否真的可以代表其作者的思想，听起来有点本末倒置。因为要判定文献的真伪，或者是否代表其“作者”的思想，应该是在厘清其思想的内容后才能加以判断。如同其他战国诸子的思想文献，《荀子》文本中也包含着各种不同的观念与写作方式，甚至是互相冲突而不一的论证。在过去一百年来，因为近代的思想研究比较重视思想内部的一贯性，文本的可信度和内容是否属于荀卿此人所作，都受到学者不少的怀疑。而且，由于学者们的观点也相当多样，因此为了进行有系统、条理的《荀子》思想研究，最好先检视过去的学者对于文本与荀卿思想之关系有何看法。笔者将过去大约一百年间的学者对《荀子》文本形成的观点分为几种：第一，《荀子》文本可区分为真正能代表荀卿本人思想之部分，以及与荀卿本人思想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第二，将整本《荀子》看作是荀卿学派思想的发展或演变过程；第三，将《荀子》一书看作荀卿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第四，将《荀子》一书视为对过去诸子思想的综合；第五，基本上接受《荀子》为过去诸子思想的综合，但试图在其综合中，观察出统合其各种思想成分的构造或中心价值。

（一）第一种立场：区分出真正的荀卿思想部分与杂入的部分

在近代的中国学术史中，胡适应该是第一个基于西方近代哲学概念去怀疑《荀子》绝大多数的篇章可能不是荀卿本人所作的学者。胡适的方法是：区分出“真正的荀卿思想”和“荀卿后的思想杂入的”。他认为，单独在《荀子》一书、而无法在其他文献里找到的内容，就是真正能代表荀卿思想的部分。根据他的说法，现本中只有《天论》、《解蔽》、《正名》以及《性恶》等四篇算是“真正的荀卿思想”。^①另一方面，梁启超虽然呼吁对此问题不宜骤下结论，但他自己也认为，由于在《儒效》、《议兵》以及《强国》中荀卿均被称为“孙卿子”^②，而这应该是弟子们对荀卿的敬称，所以这些篇章中的论述基本上是由荀子弟子抄录的资料所构成。属于古史辨学派的杨筠如，则以更激进的方式发展这些推测，他得出的结论是：《荀子》是一本将西汉时期的哲学思想东拼西凑所完成的作品；具体而言，它抄录自《韩诗外传》、《礼记》等著作。^③反之，张西堂以《荀子》、《韩诗外传》、《礼记》文本的详细比较分析为基础，反对杨筠如的主张。然而，张西堂本人也认为《荀子》中有多达14篇的作品并非荀卿本人所作。^④此后，龙宇纯也藉由更细致的文献研究，指出《荀子》不是件单纯拼凑而成的作品。^⑤20世纪前半的中国学者多少都依据胡适的方法，透过辨认出“杂入”的部分，来决定文本的所谓“真实”部分。^⑥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与当时学者们尚未注意《荀子》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中之综合角色的方法论立场相关。

在上述以辨别杂入文本为主的分析脉络中，还有更为激进的论述，即认为虽然《荀子》是经由一位名为“荀子”的人之手而完成，却只是抄录他之前的作品，因而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系统。这种观点认为，现本《荀子》即便是出自荀卿本人之手，但也只不过是种拼凑而成的作品，并没有思想的创造性。刘道中即主张《荀子》的内容为“既错误又没有技巧的抄写作品”。^⑦就主张现本《荀子》中看不出作为独特哲学作品的意义这点上，刘道中与杨筠如的看法互相一致。

（二）第二种立场：视为荀卿学派演化的不同阶段

日本学界的《荀子》研究，虽然受到胡适和杨筠如等古史辨学派观点的启发，但整体而言，当时日本学者的立场仍与胡适和其追随者的主张保持一定的距离。金谷治的观点可代表当时日本学者的主要问题意识：“我们必须解释为何《荀子》里存在了不一致和多样化的思想与论述。（强调记号为笔者所加）”金谷治的研究目标，与其说是要找出荀卿“独特”原创的思想内容，不如说是要依照其思想特色，来分类《荀子》的全部内容。金谷将整个文本的思想内容分为（1）修身派；（2）治国派；（3）哲学思索派；（4）其他：各种作品（劳动歌曲以

① 请参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06页。

②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梁启超学术论集：通类》卷2（台北：南岳出版社，1978）第1035页。

③ 杨筠如：《关于荀子本书的考证》，第131-147页。

④ 张西堂：《荀子劝学篇冤词》，罗根泽编：《古史辨》卷6（香港：太平书局，1963）第147-162页。

⑤ 龙宇纯：《荀子真伪问题》，龙宇纯：《荀子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7）第25-54页。

⑥ 关于其他研究，张心征认同梁启超的观点。请参照张：《伪书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620-622页。鲁惟一（Michael Loewe）也介绍胡适、杨筠如、张西堂以及郭沫若的观点。请参照Loewe：“Hsün tzu,” pp. 179-180.

⑦ 刘道中：《荀况新研究》（桃园：各大书局，1995）第1-39页。

及其他叙事文)等四类,且认为这些讨论范围上的差别,反映出了荀卿后学学派的思想。金谷治推测荀卿后学中的每一学派,都在不同领域上发展其师说,并且传承其文献。^①为了弥补第一种观点的缺点,即讨论时排斥了那些被认定是“不能代表荀子的部分”,他将文本分为四类以讨论《荀子》思想的作法是颇值得肯定的,但恐怕难以证明将每一类都归给某一特定学派的假设。以《墨子》为例,其中与所谓“十论”相关的主题,分别被区分为三种版本,如《兼爱上》、《兼爱中》、《兼爱下》,而这三者或许可以视为是同一学说由三个不同学派所继承的版本。由是观之,我们可以推测,此三个不同的学派在原则上仍保持着同样的论点。同样地,荀卿学派的演变也不一定要按照不同论述类别来分门别类。更何况在儒学传统中,“修身”和“治国”的实践原本就不可分割,荀卿和其学生又为何一定要刻意地分类这些教学内容?我们反而可以推测这分类可能是出自刘向的编辑。

豊島睦的研究则从《荀子》和《韩诗外传》之间五十二段相同文句的比较分析开始。在此一比较分析中,豊島睦推测现本《荀子》中,有十八个篇章应该是在韩婴编辑《韩诗外传》之前就已存在。但是他也在《王制》、《议兵》中观察到:“请问~(孙卿子)曰:夫是~”的句型。此外,《儒效》、《议兵》、《强国》也含有“孙卿子曰”的文句。根据豊島的意见,含有“请问”和“孙卿子曰”句型之段落应是荀卿的弟子直接记录下来的,因此这些篇章中的内容较能反映出荀卿本人的思想。相较之下,由于战国时代还没有个人直接写下自己著作的习惯,其他篇章的内容恐怕难以判定是否属于荀卿自己的思想。

另外,豊島也发现在《韩诗外传》和《荀子》同样内容的段落中,《韩诗外传》中有七段以“传曰”开头的文字,而现本《荀子》中则没有。^②豊島据此推测,这应该是荀卿后学在撰作现本《荀子》之际,从之前的其他著作中抄录下来的部分;否则若后学真正直接记录荀卿的言论,他们应该可以直接写成“孙卿子曰”。总之,金谷治与豊島睦的研究倾向于认为,《荀子》的大部分内容是从荀卿在世时到去世后一世纪内逐渐形成。因此,《荀子》一书与其说是荀子的个人著作,不如说是收集了荀卿本人及其后学的言说内容而成的作品。

(三)第三种立场:《荀子》作为荀卿本人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

有别于将《荀子》思想区分为“真实”与“杂入”部分的第一种立场,或者将之区分为“荀卿本身思想”与“荀卿学派发展”部分的第二种立场,还有另外一种立场也试图解释《荀子》文本之不一致性与多样性之思想理由。此立场可再分为两种观点:(1)这些思想上的差异或不一致,代表了荀卿个人哲学活动发展的不同阶段;(2)《荀子》是集成其前各种思想文献的综合著作。其中全面提出前者的观点研究属于少数,而且如下所述,根据其观点来分类文本成立顺序的每个具体见解几乎会遭到更多的反驳。因此,此观点的有效性目前只能算是处在假设的阶段。赤塚忠在1950年代就曾经指出,从今本《荀子》的内容可以追溯出几个阶段的思想发展。^③但赤塚忠本人并没有展开这方面的探讨。与之相较,出版过《荀子》全文英译的John Knoblock,则试图按照荀卿生平来排序各篇撰作的先后顺序。Knoblock认为,《荀子》各篇可分别代表荀卿生平中某一时期的思想。举例而言,Knoblock主张,由于当时墨家在楚国占据思想主导的地位,《荀子》中包含有关于知识论和逻辑的《解蔽》和《正名》两篇,应是他居于楚国而受到墨家思想影响时所写成的。^④然而,像Knoblock那样将某国的思潮和某本思想文献的内容具体连结起来,反而有许多情形无法说明。如按照《吕氏春秋·去私》所述“墨者有巨子腹䟽居秦”,秦国是墨家最高领导者所居住的地方。同样的,《吕氏春秋·去宥》也记录“东方之墨者谢子”,暗示了当时齐鲁地区也有著名的墨家(而这可暗示有成立的学派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最富庶、且位居中华文明思想活动中心的齐国,会没有墨家思想活动的据点。由是观之,哪怕《解蔽》和《正名》两篇真的受到了墨家的影响,也仍然不能断定荀卿一定要在居于楚国的时期,才能写出这些篇章。简言之,尽管在《荀子》文本中可以找到大致上可辨别其发生时期的历史事件,譬如荀卿卸任兰陵令的公元前238年,然而将某些“历史事件”的时期与“荀子写作文本中的某段主张内容”的时期连起来的推论手法,难免有牵强之嫌。

除此之外,Knoblock似乎假设现本的各篇即为荀子写作的基本单位。这一点也恐怕难以证实。由于《荀子》实际上是在西汉末年被刘向整理成现有的三十二篇,现本中的各章各段,在刘向之前可能是分开流传的;要在刘向将彼此“类似”的内容连接起来之后,才成为像现本的篇章。其实中国大陆学者如廖名春和高正,也在近

① 金谷治:《荀子の文献学的研究》,第9-28页。

② 豊島睦:《荀子文献批判の一方法》,第59-71页。

③ 赤塚忠:《荀子研究の二三の問題》,收入赤塚忠:《儒家思想研究》卷三(東京都:研文社,1986),第392页。

④ John Knoblock:“The Chronology of Xunzi's Works.” *Early China*, vol. 8. 1982-1983, p. 36.

年的研究中，将《荀子》中的某些篇章归结为荀子在某一时期所写成的。^①但他们的分类，同样面临 Knoblock 所遭遇的方法论困难。

（四）第四种立场：将《荀子》一书视为对过去诸子思想的综合

另一种说明现本《荀子》思想的多样性的观点，是把“综合先秦思想”这个现象视为其内容的主要特征。事实上，早期提出这个观点亦是赤塚忠。^②不过大陆的杜国庠和后来美国的 Lee Yearley，也曾经主张过这是理解《荀子》思想特质之重要观点。然而，此观点成为《荀子》思想研究的主要潮流，是在 1990 年代以后：即由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所谓《黄帝帛书》（《黄帝四经》）的出现，使学者逐渐注意黄老思想对《荀子》的影响的时期。如此，被用来比较分析的文献，逐步扩及与《黄帝帛书》有类似内容的所谓《管子》四篇，以及《管子》其他诸篇思想所成形的齐学传统。在此研究脉络中，属于齐国稷下思潮的所谓“稷下先生”对《荀子》思想的影响，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本研究也继承此问题意识。的确，关注这些非儒家的因素对《荀子》思想的影响，会有助于说明《荀子》思想的综合性特质。但此观点所导出的结论，往往不是如王庆光般，虽然接受《荀子》思想受到儒家之外的影响之假设，但仍然在孔孟以来原属的儒学传统中试图找出《荀子》的思想的特色和意义；^③就是如赵吉惠那样，将《荀子》从儒学传统排除出去。^④于是关于《荀子》思想意义的探讨，就沦为如同在所谓“杂家”格局中找出《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的方式；也就是在“六家”之中选出哪一家的思想为其中心思想这样的方式。结果，学者对《荀子》独特思想意义的说明，又回到 20 世纪初期的学者已屡次提出过的“性恶”、“天人之分”等“刻板”内容。

（五）《荀子》作为有整体统一性和思想一致性之作品

如果要兼顾《荀子》思想是先秦思想的综合之说法，也找寻其独特思想意义，我们需要更用心地找出使《荀子》的思想得以具有高度统合性的要素。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便能够了解到，《荀子》一书的思想多样性反而会构成彼此相当一贯的整体。关于其思想整体性，内山俊彦已指出整个《荀子》的内容，仍构成具有整体一致性的思想体系。^⑤只是他认为其中最后七篇为荀卿弟子所搜集、添加，而非本人所作。然而，虽然我们同意这些部分的内容恐怕并不是荀卿直接说出来，或写的部分，但也不需要把此部分看作纯属他后学的思想之部分。因此，当我们认为“这六篇大部分的文句和段落代表荀卿学派的思想”之时，此六篇的思想不只意味着荀卿后学的思想，而且也包括荀卿以前的儒学思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此六篇的内容存在会告诉我们：荀卿本人可能将儒学传统中传诵下来的故事和对话纪录，继续整合进自己的论说中，而这些七篇即为荀卿的这样思想工夫之“材料”。

龙宇纯也认为《荀子》并非是东拼西凑组合而成的作品。他提醒学者应小心不要过于强调荀子“性恶”的观点，并且试图论证《荀子》思想的核心就是“礼”。根据龙宇纯的观点，《荀子》可能是第一位提出“宇宙本体意涵”的“礼”概念的思想家。笔者的研究立场，基本上支持上述内山俊彦和龙宇纯的观点，即认为《荀子》的整体思想是由“礼”概念来保持其统合和一贯性。^⑥

四、结语

严格而言，目前仍然难以判断现本《荀子》一书的内容是否真实地反映，或是在何种程度上能代表荀卿本人的思想。回顾以上的五种观点，除了第三种观点之外，其他或多或少都受到当时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氛围之影响：第一种观点主要是被 20 世纪初古史辨的疑古思潮所驱使。当时的学术气氛是，无论如何都要先怀疑，任何先秦作品能否代表其冠名之作者的思想。第二种观点反映了武内义雄与津田左右吉等当时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之尝试，他们试图阐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思想发展过程”。第四种观点明显是马王堆出土了帛书文献出现之情境的副产品。当时的学者因而致力于厘清《黄帝帛书》、《管子》四篇等文献与《荀子》之间的思想关

① 请参照高正：《荀子的生平 and 思想》，高正：《诸子百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 204-274 页。

② 赤塚忠：《荀子研究の二三の問題》，第 393-394 页。

③ 王庆光：《晚周天道心性说及荀子之回应》，《兴大人文学报》（期 5，1996），第 63-83 页；以及王庆光：《荀子驳正“黄老之学”并倡导“文化生命”》，《兴大人文学报》（期 34，2004），第 45-72 页。

④ 赵吉惠：《论荀子是稷下黄老之学》，收录于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 103-117 页。

⑤ 内山俊彦：《荀子》（东京：讲谈社，1999），第 67-68 页。

⑥ 龙宇纯：《荀子思想研究》，龙宇纯：《荀子论集》，1987，第 85 页。

系。由于目前“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 1990 年代以后出土的文献的内容大概属战国早中期的思想内容，故而从此获得的见解在如上所举的研究《荀子》思想的脉络中，特别对第四种观点的思想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题材。

至于笔者所采取的第五种观点应该还有发展的空间，即以“礼”的重要性为理解《荀子》思想的关键要素。豊島陸曾经指出，《荀子》最后六篇的作者应非荀子，但他承认《荀子》的核心主张为“具有仁义道德之人依循『礼』的统治”。内山俊彦也提到：“如果『礼』构成了荀子思想的核心部分，则我们应该更关注在整个《荀子》文本中每个重要部分几乎都提及『礼』这一点重要事实。”内山俊彦的提醒是极具启发性的。

总之，根据如上的讨论，在目前为了研究《荀子》思想与文献和研究方法相关的议题上，笔者认为未来《荀子》思想研究可以进一步注意的特色有两点：第一，《荀子》思想的特质在于其综合前人思想之处。这并不意味着将《荀子》的思想只看作他之前的思想的混合；而是如同德效騫所言，《荀子》将前人的思想成份转换并建构成，彼此不可或缺、且整体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在这样的假设上，我们进一步研究荀卿如何统合前人思想的理论工夫本身。第二，因此，我们不但认同“礼”概念的重要性在于《荀子》将之视为最高的实践价值；而且进一步探析“礼”概念如何使《荀子》从过去各种思想传统中所引进的多样主张，得以从一综合体，进而成为具备了一贯结构性的统合体。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内山俊彦. 荀子[M]. 东京：讲谈社，1999.
- [4]王庆光. 晚周天道心性说及荀子之回应[J]. 兴大人文社会学报，1996(5).
- [5]王庆光. 荀子驳正“黄老之学”并倡导“文化生命”[J]. 兴大人文学报，2004(34).
- [6]金谷治. 荀子の文獻學的研究[J]. 日本學士院紀要：卷 9-1，1950.
- [7]金谷治. 荀子[M]. 东京：岩波书店，1962.
- [8]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M]. 上海：商务出版社，1919.
- [9]高正. 诸子百家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10]高正. 荀子版本源流考[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11]赤塚忠. 荀子研究の二三の問題[M]//赤塚忠. 儒家思想研究：卷 3. 東京都：研文社，1986.
- [12]张心征. 伪书通考[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
- [13]张西堂. 荀子劝学篇冤词[M]//罗根泽. 古史辨：卷 6. 香港：太平书局，1963.
- [14]木村英一. 荀子三十二篇の構成について[J]. 支那學：卷 8，1935.
- [15]木村英一. 讀荀子二則：書誌學的劄記[M]//木村. 中國哲學の探求. 东京：創文社，1981.
- [16]余崇生. 《韓嬰外傳》研究（一）——《荀子》引用文との對照表[J]. 待兼山论丛：第 17 号. 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1983.
- [17]杨筠如. 关于荀子本书的考证[M]//罗根泽. 古史辨：卷 6. 香港：太平书局，1963.
- [18]刘道中. 荀况新研究[M]. 桃园：各大书局，1995.
- [19]龙宇纯. 荀子论集[M]. 台北：学生书局，1987.
- [20]梁启超. 梁启超学术论集：通类卷 2[M]. 台北：南岳出版社，1978.
- [21]豊島陸. 《韓嬰思想管見—《韓詩外傳》引用荀子句を中心として》[J]. 支那学研究：第 33 号，1968.
- [22]豊島陸. 《荀子文獻批判の一方法》[J]. 《哲学》广岛大学：第 5 卷，1955.
- [23]赵吉惠. 《论荀子是稷下黄老之学》[M]//陈鼓应. 道家文化研究：第 4 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24]Homer H. Dubs: *Hsiü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27.
- [25]John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 I.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6]John Knoblock: “The Chronology of Xunzi’s Works,” *Early China*, vol. 8. 1982-1983.
- [27]Michael Loewe: “Hsün Tzu,” Loewe (ed.):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 Guid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3.

附记:

本文根据笔者的英文专著: Masayuki Sato: *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un Zi*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p. 27-39) 的中文译稿为基础, 再增补而成。藉此机会, 笔者还补述了“台州版本”于日本的流传, 以及其最终出版为《古逸丛书》其中一卷的历史过程。笔者也衷心感谢《邯郸学院学报》编辑部提供拙文重新能面对中文界读者的机会!

A Study of the Text and Authorship of the *Book of Xunzi*

Masayuki Sat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17, China)

Abstracts: This study delineates the compilation and consequent phil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Book of Xunzi*, as well as inquiring into the issue of how much the contents of the present text can represent the actual thought of Xun Qing himself.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five perspectives on this issue. In strict sense, this article is not so much aiming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its textual transmission, as prob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image of Xunzi's thought on each turning point of the alternation of the text. This study also attempts to elucidate the history of the Taizhou edition from its import to Japan to the publication of its reprint edition as a volume of the *Guyi congshu* (the collection of the lost canonical texts) by Li Shuchang in 1884.

Key words: The *Xunzi*, Xun Qing, Liu Xiang, Yang Liang, The Taizhou Edition

台湾大学佐藤将之副教授来我校“荀子思想·赵文化讲坛”作报告

11月5日下午, 我校在学术交流中心举办“荀子思想·赵文化讲坛”报告会。邀请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佐藤将之主讲“《荀子》研究的世界化脉络: 兼论《荀子》形象之虚构与实际”。校长马计斌教授主持报告会, 聘请佐藤将之先生为我校客座教授。来自中文系、历史系、法政系、教务处、科研处和学报编辑部等系部的200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活动。

佐藤将之先生的报告分为五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导论中, 佐藤先生提出“Xunzi in Harvard?”; 其次, 佐藤先生发问:“我们从荀子能学什么?”; 其三, 对“荀子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总结; 其四, 从礼制与王朝、魏晋以后“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后代的《荀子》形象三方面分析了荀子的礼学思想不受重视的理由; 其五, 提出“荀子哲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部分教师和学生对佐藤先生的报告内容进行了提问互动交流。

马计斌校长对佐藤先生的讲座进行了精彩点评, 指出本次讲座国际视野宏阔, 立论精确, 问题意识浓厚, 对佐藤先生的荀子研究表示赞许, 并且欢迎佐藤先生再次到荀子故里邯郸访问讲学。

11月6日晚上, 佐藤先生参与我校荀子研讨读书班活动, 辅导研读《荀子·不苟》篇。(邯郸学院学报编辑部)

钱大昕的荀学思想刍议

邓国宏

(武汉大学 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从荀子思想地位的总体评价、“化性起伪”学说的澄清与辩护和“法后王”的理解三个方面勾勒了钱大昕荀学思想的基本面貌, 认为钱大昕的荀学透显着乾嘉学者由字词训诂、名物考证探讨义理问题的治学特色, 更体现了乾嘉思想学术重新肯定和发现荀子思想价值的重要动向, 这一动向最终导向乾嘉时期荀子思想的全面复兴。

关键词: 乾嘉思想学术; 荀子; 钱大昕

中图分类号: B2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36-05

收稿日期: 2013-09-21

作者简介: 邓国宏(1984—), 男, 湖北黄梅人, 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钱大昕(1728—1804), 是乾嘉时期著名的三大考证史学家之一, 在乾嘉学术的广泛领域均有杰出的贡献。他为卢(文弼)校谢(塘)刻的《荀子笺释》写有跋文, 与谢塘所撰的序文一起随书刊行。其文不长, 不妨全录如下, 以作为本文论述其荀学思想的主要基础和起点。其文言道:

荀卿子书, 世所传唯杨倞注本, 明人所刊, 字句踳讹, 读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谢公视学江苏, 得余姚卢学士抱经手校本, 叹其精审, 复与往复讨论, 正杨注之误者若干条, 付诸剞劂氏, 而此书始有善本矣。盖自仲尼既歿, 儒家以孟、荀为最醇, 太史公叙列诸子, 独以孟、荀标目。韩退之于荀氏虽有“大醇小疵”之讥, 然其云“吐辞为经”, “优入圣域”, 则与孟氏并称, 无异词也。宋儒所訾议者, 惟《性恶》一篇。愚谓孟言性善, 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 荀言性恶, 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 立言虽殊, 其教人以善则一也。宋儒言性, 虽主孟氏, 然必分理义与气质而二之, 则已兼取孟、荀二义, 至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 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然则荀子书詎可以小疵訾之哉? 古书“伪”与“为”通, 荀子所云“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 此“伪”字即“化为”之为, 非“诈伪”之伪。故又申其义云“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 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尧

典》“平秩南讹”, 《史记》作“南为”, 《汉书·王莽传》作“南伪”, 此“伪”即“为”之证也。因读公序, 则为引申其说, 以告将来之读是书者。丙午闰七月, 嘉定钱大昕跋。^{[1]365}

钱大昕此跋除了简明交待卢校谢刻《荀子笺释》的缘起、过程及价值外, 主要从总体评价和具体思想观点的认识两个方面对于荀子及其思想进行了一些澄清和辩护, 极力恢复荀子在汉唐历史上孟、荀并称的地位。

一、恢复荀子孟、荀并称的思想地位

在关于荀子思想地位的总体评价上, 钱大昕在跋文中引用和支持了司马迁和韩愈的看法, 认为二人的意见表明汉唐时代主流的观点都是把荀子与孟子并称。钱大昕的跋文是在读了谢塘的跋文之后写的。谢塘尚还只是一般地讲“盖自周末历秦、汉以来, 孟、荀并称久矣”^{[2]285}, 钱大昕则具体地拉出汉代的司马迁与唐代的韩愈作为典型的例证, 是对谢塘说法的进一步阐述和证明。司马迁将孟、荀同传并叙, 行文论述亦不分轩輊, 其孟、荀并称的态度显明, 不易为人误解。不过其文要在论列二人事迹, 未曾深入探讨二人思想异同、高下, 所以司马迁孟、荀并称的态度其实只是一种一般、笼统的倾向性而已^①。而到了后来的韩

^① 关于司马迁与荀子思想之关联的更多考察可以参见: 刘桂荣:《西汉时期荀子思想接受研究》,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80-185页。

愈那里，则对于孟、荀之学术、思想有了更为深入和具体的探讨和认识，其对荀子做出的“大醇小疵”的扼要断语成为流传、影响最广的关于荀子的总体评论。本来韩愈评断“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3]37}，言说道统时更把荀子排斥在外——“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3]18}，其尊孟抑荀的态度十分明显。荀子与孟子的地位的高下差别在韩愈那里是特别受到强调的。但是钱大昕却对此轻轻带过或者干脆抛开不提，而是专门提出韩愈仍然称扬荀子的“吐辞为经”，“优入圣域”等言语，以证成自己关于荀子在韩愈那里仍然“与孟氏并称，无异辞也”的结论。在这里，钱大昕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其对韩愈的荀子评述的引用是有自己的明显偏向的——他专门引用对于荀子思想地位有利的材料。但是，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大昕诠释出来的韩愈对于荀子的评价是否符合韩愈思想的全面的实际，而是在于其倾向性背后所透显出来的钱大昕本人的“前理解”。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钱大昕就是要逆着韩愈以降宋明儒者对于荀子及其思想不断贬抑的方向，努力为抬高荀子的思想地位找证据、作辩护。这一重新评估荀子思想价值、地位的努力，不仅在钱大昕身上可以看到，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乾嘉学者中一股普遍的倾向。如，谢墉在《荀子笺释》序言中肯定荀子“学之醇正、文之博达”^{[2]285}，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后的大儒者，不可与名法诸家并论；赞荀子“先几之哲”、“人品之高”，为纵横策士所不及；反驳宋苏轼因李斯罪荀；以孔子“性相近”及韩愈“性三品”说衡论孟、荀人性论，认为孟子、荀子均失之偏，然不失为大儒。又，卢文弨自己亦有《书荀子后》，虽对荀子思想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商榷和批评意见，但亦肯定“然其本意，则欲人之矫不善而之乎善，其教在礼，其功在学”，认为《荀子》书中“多格言至论，不可废也”^[4]。乾嘉学者关于荀子及其思想的类似看法和评论在在皆是，绝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①。钱大昕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思想背景和倾向下提出了上述那番关于重新恢复荀子孟、荀并称的思想地位的主张。

二、“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澄清与辩护

在这篇《荀子跋》中，钱大昕还具体地针对荀子的“性”、“伪”等观念做出重新理解，澄清宋儒对于荀子思想的误解，以期进一步证成其孟荀并称，抬高荀子思想地位的努力。

关于荀子的“性”论，钱大昕的辩护策略有二：

一是指出孟、荀二人的人性理论致人于善的实践宗旨不殊，只是着手的途径不同而已，从而缓解二人之间的紧张；二是证明宋儒的一些思想与荀子思想观点的实质一致，以期自然消解宋儒对于荀子性恶论的批评。

关于第一点，钱大昕说“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此种“教人以善则一”的辩护显然不够，因为任何一种伦理、宗教的学说都认为自己在教人致善，论述它们的异同的关键显然不在这一点上，而是在于对于什么是善、如何致善的理解上。不过钱大昕讲孟子“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子“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大体不差。顺此理解他本应发现却没有发现：孟、荀之人性内涵的理解本不相同，故而二人所主的道德实践之途径与功夫亦不相同，由此二人思想也许可以并行不悖，不应为求合同而合同之。另外，钱大昕对于“尽性而乐于善”、“化性而勉于善”之具体如何合同亦无深彻之思考，故而只能泛泛以“其教人以善则一也”的话语结之。所以，钱大昕的第一点论证策略虽然方向正确，但因理解终归有限，使得其效力大打折扣。

钱大昕的第二种论证策略则是认为，宋儒表面批评荀子的性恶论，实则其气质与义理二分的人性论已暗取荀子的性恶之义，其“变化气质”的功夫亦与荀子“化性”的主张一致。以“气质”来说荀子的“性恶”之“性”，类似论述不独钱大昕一人有之，卢文弨已言荀子“以气质为性而欲矫之”^[4]。但细究之，钱之论述与卢之论述仍有重大不同。卢文弨赞成荀子以气质言性，只不过不同意以气质为恶而欲矫之。卢文弨的观点仅止于此，他并未进一步引入宋儒之义理与气质二分的人性论及变化气质的功夫论来与荀子思想会通，钱大昕则都这么做了。钱大昕讲宋儒言性“必分义理与气质而二之”实已“兼取孟、荀二义”。的确，程朱言性在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本然之性）之外又益以气质、气质之性的说法，是注意到人之形气对于人之道德实践的重要影响。不过其言气质对于人之行为善恶的影响落在先天的禀受性上来说，气禀的刚柔、昏明影响了先天的本然之性的发用从而导致了人之善恶不齐，这种现实的有善有恶的人性就称之为气质之

^① 更多内容参见：田富美：《清代荀子学研究》，博士论文，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06年。乾嘉时期重新肯定荀子的思想潮流渊源有自，明代王廷相已于一篇策论之中引导学生重新反思荀子思想的评价问题（王廷相：《杂文·策问三十五首》，《王廷相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45页），李贽不仅反对韩愈和宋儒道统在孟子之后不得其传的说法，更是提出“荀孟”的说法代替“孟荀”的提法（（明）李贽：《德业儒臣·荀卿》，《李贽全集注》（六），张建业，张岱注，北京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62页）。

性^{[5]194-208}。程朱论气质的影响落在先天上说，而荀子以自然情欲言性恶则完全落在后天之作为上讲。同为强调气质——自然情欲对于道德实践的影响，但是影响的途径却是不同，宋儒程朱与荀子人性论的这种差别必须重视。所以钱大昕讲宋儒论性分别义理与气质乃是兼取孟荀虽然不为错，究之亦是半眼的论述。既然程朱之气质与荀子性恶之性仍然存在上述的根本差别，那么荀子的“化性”与程朱的“变化气质”亦不可等而同之了。田富美混同卢文弨与钱大昕之观点而加以批评，其言：

卢文弨、钱大昕等人将理学与荀子结合起来，藉此消弭宋人对荀子的抨击并证明荀子的合理性，只能展现出评价荀子价值的转向，但在荀子学说的探究上，不仅有违荀子之意，且仍然是以孟子思维模式为立足点，显然是不够严谨的。^{[6]116}

此处对卢文弨的批评是不成立的，若专用以针对钱大昕则稍为妥当，不过亦须具体分疏。对照上述程朱理学与荀子思想差异的理解，对于钱大昕汇通程朱理学与荀子人性论的做法，笼统地讲其有违荀子的意思显然还不够充分和具体。另外，钱大昕对于荀子的把握虽然有限，但毕竟还是把捉到了宋明理学与荀子思想的一些相同之处——在人性的理论之中都注意到人由形气而来的自然情欲对于人之道德实践的影响。钱大昕在扬荀的同时并不废孟，其对孟子思想的把握如何暂且不论，但说其仍然“以孟子思维模式为立足点”来探究荀子学说似乎亦过。若有以孟子思维模式为立足点，钱大昕如何能够在孟子“尽性而乐于善”之外肯定荀子“化性而免于善”之主张。田富美自身的表述亦“显然是不够严谨的”。

关于荀子“伪”的观念，钱大昕以其史学考据大家的功夫，举出《尚书》、《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中的文例，证明“伪”实即“为”。关于《荀子·性恶》所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唐杨倞注已指出“伪，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者，皆谓之伪。故伪字人旁加为，亦会意字也”^{[7]935}，但是自宋至清仍有人不断误解荀子的“伪”为矫伪、诈伪。对于“伪”字的此种理解常常与将荀子礼义积伪的功夫看作是对于人性的一种违逆的看法联系在一起，造成一种训诂与义理彼此相互支撑和加强的效果。卢文弨就仍然批评荀子将礼作为一种矫伪的工具^[4]。钱大昕在为卢校《荀子笺释》所作此跋中重新提出“伪”字的此一训诂，实有针对将荀子“化性起伪”的功夫看作是对于人性的一种异化的误解，来为荀子思想澄清、辩护的意思，在其表面的

字词训诂中透显出的是义理的考辨关怀。

钱大昕有了关于“性”、“伪”的这些考辨之后，甚至不满意韩愈关于荀子“大醇小疵”的已是颇高的评论，说道：“荀子书诂可以小疵譬之哉？”他希望将自己的以上认识“以告将来之读是书者”，推动学人对于荀子的重新认识和评价的意图十分显明。实际上他的这个意图也是得到了实现。钱大昕对于“伪”字训诂的考辨虽然并不是一种新见，但是其由《荀子》关键概念之训诂的厘正来澄清对于荀子义理的误解的做法和认识却不断为后来学者所呼应。譬如，章学诚有言：

荀子著《性恶》，以谓圣人之为之“化性而起伪”。“伪”于六书，人为之正名也。荀卿之意，盖言天质不可持，而学问必藉于人为，非谓虚诬欺罔之伪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谓诬圣为欺罔，是不察古人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也。^{[8]111}

不仅章学诚，郝懿行、《四库全书总目》均是持此理解。这样，“伪”训为“为”的重新厘正，在乾嘉时期的思想学术环境中具有了新的意义，那就是消除历来荀子思想理解中的误读，为重新认识和评估荀子的思想价值打开了大门。当然，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学者通过训诂的办法来解决义理的问题，虽然不能否认其重大的说明力量，但字词的训诂只是为义理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基础，义理的理解还要求在文本训诂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文本之各部分内容的整体联系，训诂终究代替不了义理的思索。所以钱大昕、章学诚、郝懿行等人通过“伪”字的训诂来重新理解和评估荀子的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具有乾嘉考据学的特色，但是真正论证荀子思想中礼义与人性的统一关系，还得靠戴震、焦循等义理学家们的进一步的思辨工作。这就是钱大昕等人厘正荀子“化性起伪”之“伪”的训诂的积极意义及其限度。

三、“法后王”的通达理解

在人性与道德的理论之外，钱大昕还以其历史学家的通达，发表了对于荀子“法后王”学说的相关认识。宋代王应麟以孟子“法先王”的主张简单地否定了荀子“法后王”的主张。其言曰：

学古入官，然后能议事以制。伯夷以礼折民，汉儒以春秋决狱。子产曰：“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荀卿始为法后王之说，李斯师之，谓“诸生不师今而学古”。太史公亦惑于流俗之见，《六国表》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文帝谓“卑之无甚

高论”，宣帝谓“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犹行也。孟子曰：“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9]294}

王应麟批评荀子“法后王”主张以及秦汉时代与其类似的一些言论，而其引为根据的即是《孟子》“法先王”的文本。钱大昕不同意王应麟的看法，认为在荀子那里“法后王”与“法先王”是统一的，荀子的主张与孟子的主张并不矛盾，故而其言道：

荀卿“法后王”之说，王伯厚深诋之。愚以为王氏似未达荀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孟、荀生于衰周之季，闵战国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王，与荀所言后王，皆谓周王，与孔子“从周”之义不异也。荀卿岂逆料李斯之仕秦，而令其用秦法哉？七国僭号，名虽王，实诸侯也，孰可以当后王之名，而荀子乃肯法之耶？方是时老庄之言盛行，皆妄托于三皇，故特称后王，以针砭荒唐谬悠之谈，非谓三代不足法也。王安石以本朝制度为流俗，谓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谈尧舜，躬行商韩，此宋之所以亡也。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徒为世主轻儒者借口，是不如法后王之说为无弊矣，要非荀卿立言之本旨。^{[10]494}

钱大昕指出荀子所言“后王”皆为周王，荀子与孟子一样都与孔子“从周”之精神不异。他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从荀子的整体思想来讲，荀子亦是提倡王道的，所以不会赞成战国末世之诸侯国包括秦国风行的法家政治；二是“七国僭号，名虽王，实诸侯也”，不可以当荀子所谓“法后王”之后王。第一条理由从荀子的整体思想来理解其个别主张，比较好的注意到了解释活动中部分对于整体的依赖关系；第二条理由从典章、名物的训诂上着手，认为战国之诸侯不足以当后王之名号，更是体现了乾嘉儒者治学的方法特色——重视名物制度的训诂，并以其去理解古书的义理，此种理路也是符合理解活动中整体对于部分的依赖关系的。钱大昕的论证不仅有理有据，而且在其论证中很好地符合了现代解释学所谓的“解释学循环”的要求。钱大昕还比较正确地指出，荀子反对法先王的一些言论乃是针砭道家等妄托古人、欺诬后世的做派，并非真正认为三代不足法。其实这种托古欺时的现象，并非仅在道家学派中存在。《荀子·儒效》篇即批评俗儒“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的做法。钱大昕基本把握了荀子“法后王”的精神，并协调理解了《荀子》文本“法先王”与“法后王”并存的表面不一致。关于荀

子“法后王”的此点理解，今人普遍能言之，几近成为学者的共识，但在乾嘉时代钱大昕的理解实亦无人出其右。

钱大昕以此“法后王”的理解论史，一方面批评王安石变法“以本朝制度为流俗，谓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谈尧舜，躬行商韩”，认为这是北宋所以灭亡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批评一味复古的迂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徒为世主轻儒者借口”^①，认为若依此类儒者之主张为“法先王”之义，则“法先王”反而“不如法后王之说为无弊矣”。可见，钱大昕既以为王安石变法蔑古乱今，更反对张载、二程等变法反对者的一味复古，认为二者均未能符合荀子“法先王”之真实要求。他的这种理解是符合荀子“法后王”主张中“体常尽变”之精义的——所谓的“常”即为周孔为代表的儒家王道之真精神，所谓的“变”即是如周代之井田在宋则必为不可行等。

王应麟批判荀子“法后王”学说，认为李斯等后来者师从其说，可见在这一点其将荀子、李斯置于同样的立场上一同理解。而钱大昕则认为荀子“法后王”仍然主张儒家之王道，没有预料到也不会赞同李斯后来在秦国所实行的商韩法家之道，否定了李斯之作为与荀子“法后王”思想之关联。对于荀子未能逆料李斯后来之主张、作为，钱大昕亦以“知人之难”和“君子不能保其终”给予同情的理解。其言曰：

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荀卿门人有李斯，程氏门人有邢恕，章惇从学于邵尧夫，秦桧见称于游定夫，大奸若忠，君子不能保其终也。郑渔仲为秦熺所荐，吴康斋为石亨所荐，当辞而不辞，于出处之义有遗憾矣。^{[11]494}

钱大昕所举事情，正面、反面的都有，且都为宋明理学家的例子。宋明儒者若是要求荀子为李斯的思想作为担负责任，那么程颢、邵雍、游酢等是不是也得为邢恕、章惇、秦桧的恶行负责呢？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样以李斯相秦之作为乃“法后王”主张影响下之政治实践，从而因李斯罪荀的主张，经过钱大昕的辩驳，就显得其逻辑极为不合理了。通过严辨李斯与荀子“法后王”主张理解上的不同以及否定要求老师为学生言行负责的不合理逻辑，钱大昕比较好的驳斥了宋儒因李斯罪荀的做法。

如同钱大昕在荀子的人性论理解上犹存在不足一样，在“法后王”的理解上，钱大昕虽然达到很高的

^① 钱大昕此处所谓迂儒，实指张载、程颢、程颐等人。他们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洛阳议论”记载有他们三人议论井田如何施行于后世的事情。

程度，但于更深的一层终有亏欠。直指荀子的“后王”为周代圣王，虽不为错，但终究于荀子思想只得其皮毛。荀子所以主张法后王，是因后王之政距今相近，粲然明备、记载详明，易于征之为据；且后王之道乃百王累积损益而成，继承和保留了历代先王的创制成就在里面（所以这样的法后王并不废法先王）；更有荀子“以近知远，以一知万”（《非相》）、“天地始者，今日是也”（《不苟》）的历史哲学之认识论基础。荀子主张中的“先王”、“后王”等概念中的先、后显然是相对而言，并无固定指称，只不过在荀子的时代，周王相对于尧、舜、禹、汤等恰即是后王了。后来俞樾就注意到这一点，其认识就比较畅达了。其言曰：

然则荀子生于周末，以文、武为后王可也，若汉人则必以汉高祖为后王，唐人则必以唐太祖、太宗为后王，设于汉、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谓“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岂其必以文、武为后王乎？^{[11]337}

在更为抽象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荀子“法后王”显然不可指为周之文、武。这样，简单地如钱大昕所言“孟、荀生于衰周之季，闵战国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王，与荀所言后王，皆谓周王，与孔子‘从周’之义不异也”显然未得荀子“法后王”学说的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哲学的意涵，亦未辨荀子思想与孔、孟之异以及对孔、孟的发展所在。

四、结语

钱大昕对于荀子的再释与重估，具有鲜明的乾嘉时期考据学者治学的特色。一是，文字的训诂、制度的厘正、史实的类比通观等乾嘉考据学常用的方法在其诠释荀子思想的时候，都运用到了；二是，囿于传

统尊经、尊孟的立场，虽然极力抬高荀子的思想地位，但终不能跳出孟子的一些论述主张，而是采取调和荀子与孟子、荀子与宋明理学的做法来为荀子争取地位；三是，由于义理的涵养与创发不够，其对荀子性恶论、法后王等学说的理解虽有其史学家论学的通达、宽容之表现，且实有所见而欲为荀子做一澄清和辩护，但其于荀子思想的真义终究差着一层。更为重要的是，钱大昕重新理解和评估荀子思想内容及其价值的努力背后蕴含着乾嘉思想学术的一个重要动向，那就是《荀子》思想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肯定。这一动向最终导向乾嘉时期荀子思想的复兴，而钱大昕的荀学思想则是这一荀学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 [1]清]钱大昕. 荀子跋[G]// 二十二子. 缩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清]谢墉. 荀子序[G]// 二十二子. 缩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3]唐]韩愈. 读荀[G]// 韩昌黎文集校注. 马其昶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清]卢文弨. 书荀子后(丙申) [G]// 抱经堂文集. 卷第十. 民国十二年夏五月，北京直隶书局影印本.
- [5]陈来. 朱子哲学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6]田富美. 清代荀子学研究[D].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06.
- [7]王天海. 荀子校释（下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8]清]章学诚. 说林. 文史通义[M]. 吕思勉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9]宋]王应麟. 困学纪闻（上）[M]. [清]翁元圻等注，乐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0]清]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G]// 嘉定钱大昕全集（七）. 孙显军、陈文和点校.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11]清]俞樾. 荀子评议. 诸子评议[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A Discussion on Qian Daxin's Commentary for Xunzi

DENG Guo-h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Qian Daxin's commentary for Xunzi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overall assessment of Xunzi's thoughts, Clarification and defension of the doctrine of transforming inborn nature through accumulated effor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following the model of the Ancient King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this paper affirms that Qian Daxin's commentary for Xunzi typically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study in Qianjia Times, and reflects the trend of re-understanding and assessment of Xunzi.

Key words: Academic in Qianjia Times; Xunzi; Qian Daxin

“邯郸学步”的定型源流和文化解读

李红霞, 贾建钢

(邯郸学院 中文系, 河北 邯郸 056005)

摘要:“邯郸学步”在定型源流中经历了邯郸步、学步、失步、学步邯郸、邯郸之失等语词的选择过程, 最终因其表意丰富完整、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被社会习用而固定下来。历代文献使用“邯郸学步”多讥模仿之失, 但亦有学步之难和学步者稀少的感叹, 这是对邯郸学步的多重文化解读。

关键词: 邯郸学步; 邯郸步; 模仿

中图分类号: B2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41-06

收稿日期: 2013-11-14

作者简介: 李红霞(1976—), 女, 河北滦南人, 博士, 邯郸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贾建钢(1976—), 男, 山东临清人, 硕士, 邯郸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邯郸学步”是常用成语, 源出《庄子·秋水》:

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 未得国能, 又失其故行矣, 直匍匐而归耳。”郭象注: “以此效彼, 两失之。”成玄英疏: “寿陵, 燕之邑。邯郸, 赵之都。弱龄未壮, 谓之余子。赵都之地, 其俗能行, 故燕国少年远来学步。既乖本性, 未得赵国之能; 舍己效人, 更失寿陵之故。”^{[1]266}

诚如晋代郭象和唐代成玄英注疏, 在“邯郸学步”逐渐定型的过程中, 该成语往往用为“比喻模仿别人不成, 反而丧失固有技能”之义。但是, “邯郸学步”的定型经历了较长的时期, 在此期间, 文献中除用此义以外, 还有其他语义, 也隐含了不同于前者的褒奖之情, 对此学界少有关注。本文遵从典故特点和语义形成的规律, 从梳理成语源流入手, 详考“邯郸学步”从典故逐渐凝固为成语的过程及其原因, 考察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非主流用法, 对其进行文化意义的解读。

一、“邯郸学步”定型源流

成语是一种相沿习用, 具有书面语色彩的固定短语,^{[2]335}来源有多种, 其中之一即来源于典故, 包括神话寓言、历史故事、诗文语句等^{[2]336-337}。根据上文所引, “邯郸学步”来源于寓言或历史故事, 在今邯郸市市区虽有“学步桥”之迹, 但其真实性难以确考, 只能看

作庄周为了说明道理而预设的一个故事。作为故事, 它具备故事构成的基本要素, 如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 从不同角度指称该故事, 就会产生多个不同的典故语词, 启功先生说“从前的人, 很长的一件故事, 是一个典故, 从一个角度加以概括, 就是一个词。”^[3]正是此意。这些词同时作为指称该典故的语词, 或者同时存在, 或者产生历时变化, 最终哪个词被固定下来, 还要取决于社会的习用。

寿陵少年学行于邯郸的故事, 自《庄子》首创之后, 历代典籍使用颇多, 故事最终凝固成“邯郸学步”这一成语, 经历了不同语词的选择过程。细检历代文献, 发现典籍中指称该故事的语词主要有: 邯郸步(邯郸之步)、邯郸学步(邯郸之学步)、学步邯郸、学步、邯郸匍匐、失步(失故步)、邯郸之失、寿陵步、失步人、步类寿陵等等。分类举例如下。

1. 邯郸步

未攀偃蹇桂, 一臂连蜷; 不学邯郸步, 两足匍匐。(唐·卢照邻《释疾文序》)

幸依南郡帐, 不学邯郸步。自守终日愚, 都忘向时虑。(宋·梅尧臣《依韵和胡武平怀京下游好》)

有类邯郸步, 两失皆茫茫。(宋·欧阳修《文忠集·镇阳读书》)

端能不学邯鄲步，正可同尝沆漉杯。（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次韵君俞四首》之四）

释耒入市朝，徒失邯鄲步。（宋·陆游《剑南诗稿·读何斯举黄州秋居杂咏次其韵》其九）

寻迹以求之，似学邯鄲步。（宋·李觏《盱江集·和育王十二题·佛迹峰》）

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澹而腴，断不容作邯鄲步也。（宋·姜夔《白石诗说》）

赞曰：“大令好书洛神赋，后人犹袭邯鄲步。”（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孙过庭摹洛神赋帖》）

鹤龟长短天所付，追随恐失邯鄲步。（宋·赵蕃《淳熙稿·读去非有行集》）

予尝题《浣女图》诗，纯用太白语意，“红颜素足女，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山花屐齿香。天然去雕饰，梅岑水月妆。肯学邯鄲步，匍匐寿陵傍。”盖窃病近日学诗者，拘束蹈袭，取妍反拙，不若质任自然耳。”（明·杨慎《升庵集·素足女》）

俄承畿辅麾，遂抗邯鄲步。（明·皇甫汙《皇甫司勋集·广平郡观莲寄翁守旧南比部郎》）

世上亦何有，悲此邯鄲步。（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祝京兆允明》）

或作“邯鄲之步”。例如，

所谓进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寿陵之义者也。（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

平生得失盖亦可知，若欲逆闲其间，必至弄巧成拙，失邯鄲之步。（宋·周必大《文忠集·札子二·程泰之侍郎文昌》）

今之临文荒率者，动以二公为口实，是寿陵学邯鄲之步，良可笑哉。（明·杨慎《丹铅总录·诗话类：玉瑕锦类》）

拟造十二曲，览者勿哂，邯鄲之步愈趋愈失也。（明·皇甫汙《皇甫司勋集·拟古乐府小序》）

2. 邯鄲学步

论文要得文中天，邯鄲学步终不然。（宋·姜夔《白石道人诗集·送项平甫倅池阳》）

踏尽冰霜历岁寒，邯鄲学步路偏难。（清·嵇永仁《抱犊山房集·紮足》）

“什么古迹？”娄朴道：“学步桥。”盛希瑗道：“是‘邯鄲学步，失其故步’么？”（清·李绿园《歧路灯》第一〇一回）

或作“邯鄲之学步”。例如，

郑子未见齐韩而遽弃毛氏，不几于邯鄲之学

步者乎！（宋·周孚《蠹斋铅刀编·非诗辨妄》）

呜呼！此自得所谓真诗者，而岂颦里之冶容、邯鄲之学步所摹拟其万一与？（清·魏裔介《兼济堂文集·杨犹龙诗序》）

3. 学步邯鄲

不可以圣人体道之权籍口，恐有学步邯鄲之患也。（《朱子全书·佛胎召章》）

岂止学步邯鄲，效颦西子已哉。（明·杨慎《升庵诗话·右丞诗用字》）

4. 学步

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后汉赵壹非草书》）

画虎既败，学步无成。（南朝宋·鲍照《鲍明远集·侍郎报满辞阁疏》）

昔余迷学步，投迹忝词源。（《全唐诗·骆宾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政学士〉》）

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全唐诗·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耻矜学步貽身患，岂慕醒狂蹶祸阶。（《全唐诗·李绅〈州中小饮便别牛相〉》）

问津邹鲁，未知经术之渊源；学步班扬，詎识词章之统纪。（宋·吕祖谦《东莱集·中两科谢主司启》）

君得此居宜勇进，勿使学步讥邯鄲。（宋·楼钥《攻媿集·赠黄真护道人游茅山》）

笑我效颦忘露丑，不知学步返难前。（宋·赵蕃《淳熙稿·别徐运使》）

不为效颦学步，而萧散闲逸之趣宛然在目。（清《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六·书画家·陈淳》）

5. 失步

适鄢郢而迷涂，入邯鄲而失步。（《隋文纪·王贞〈谢齐王暕启〉》）

青娥莫怪频含笑，记得当年失步人。（《全唐诗·胡曾〈邯鄲〉》）

不分寿陵终失步，更怜蘧瑗早知非。（宋·邹浩《道乡集·次韵刘世德见赠》）

不惮浮湘去，其如失步归。（宋·周必大《文忠集·次折仲古枢密韵寄题莱阳曹钦臣彦若藏书室》）

虽自觉学行而失步，亦未忍转衣而为裳。（宋·崔敦礼《官教集·上范舍人启》）

抱关从苑候，失步向邯鄲。（宋·许纶《涉斋

集·见提刑巩大监三十韵》)

又作“失本步”、“失故步”等。例如，

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全唐诗·李白〈古风〉》其三十五）

皆失故步，名亦稍退。（张彦远《法书要录·南齐王僧虔论书》）

6. 寿陵步

空愧寿陵步，芳尘何处寻。（《全唐诗·刘禹锡〈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僚故〉》）

虽惭寿陵步，犹拟旧君傍。（宋·赵蕃《淳熙稿·寄周文显二首》其一）

世闻难学者，惟鍾、索、二王耳，黄庭、兰亭、曹娥、洛神，即百重茧追之，恐终为寿陵步也。（明·孙鑛《书画跋跋续·墨迹》）

7. 邯郸匍匐

旧见魏鹤山取篆字施之行书，常笑其自苦无益。近年如杨慈湖画心字，文本心画，云字在邯郸匍匐中曲折，愈不相似。（宋·刘辰翁《须溪集·答刘英伯书》）

着脚绳桥已足忧，邯郸匍匐更堪羞。（金元好问《遗山集·刘君用可庵二首》其二）

有的将“邯郸”、“匍匐”二词分开。例如，

邯郸笑匍匐，燕蒯受揶揄。（《全唐诗·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

8. 邯郸之失

扶步有邯郸之失，勉视无离娄之明。（北周·庾信《庾子山集·代人乞致仕表》）

以上诸例，基本反映了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之典在文献使用中语词选择的情况。据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各语词使用频率看，“邯郸步（邯郸之步）”使用频率最高，下文第三部分所列文献用例也以“邯郸步”最为常见。其次是“学步”、“失步”，而“邯郸学步”（或“邯郸之学步”、“学步邯郸”）的使用频率远不及这些语词。

第二，就使用时代而言，指称该典故的语句在晋代葛洪《抱朴子》中出现，但其文“邯郸之步”与“寿陵之义”相对以足语义，还未完全凝固成特指该典故的语词。后来凝练为特定语词指称该典故则在隋唐时期，主要用为“失步”、“学步”。“邯郸步”最早出现在唐代，卢照邻《释疾文》首次使用，其大量使用则是在宋代，尤以宋代文学文献中使用频繁最高，因该典故多喻指模仿他人而致两失，这是否与宋人的文学革新有一定联系，值得考证。“邯郸学步（或邯郸之学

步）”在宋代首次使用，最早出现在周孚、姜夔的作品中，清代用例逐渐增多，但仍不及同时期“邯郸步”的使用。

第三，虽然“邯郸步”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邯郸学步”或“学步邯郸”，但该典故最终以“邯郸学步”一语为社会所习用，这与文献传承、汉语语法特点和典故词语表意的丰富性、完整性有直接关系。

首先，与“邯郸学步”一语有相关的最早文献是《汉书》。

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汉书·叙传上》）

《汉书》所记与《庄子》基本相同，而“学行”改为“学步”，“故行”改为“故步”，这是词语的同义换读。其后宋元明清各代皆有使用，清代用例稍多，现代则最为通行。

其次，“邯郸学步”最终凝固为最常用的语词，恐怕与一些大型类书罗列典故，单列该词语作为条目也有一定关系。如清代纂修《御定渊鉴类函》卷 274 中单列“学步邯郸”条，使人们在使用成语时优先选择“学步邯郸（或邯郸学步）”。

再次，作为典故成语，其背后都有隐含的故事，故事内容丰富，而用以指称的语词却非常简练，为了便于理解语意，后人选用相关语词时，也尽可能选择表意相对丰富的语词。就以上所列各语词相较，表义相对完整和明确的，当首推“邯郸学步”或“学步邯郸”。

最后，“学步邯郸”和“邯郸学步”分别代表了古今汉语中状语表达的不同形式。两者相较，之所以选用“邯郸学步”，是因为地点状语“邯郸”前置的语法结构与人们习用的现代汉语相吻合，故逐渐被固定下来，成为专用于指称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的成语。

综而论之，我们未见“邯郸学步”在清代以前的文献中大量使用，结合其作为典故语词的表义和语法特点来看，它的最终定型应该在清代以后的现代汉语中。

二、“邯郸学步”原型解读

作为来源于故事而凝固的成语，除了成语作为语词的能指和所指，它还有“信号”^[3]的功能，即成语所隐含的两个要素：典故原型和典故原义。《庄子》之后，历代文献，如《汉书·叙传上》、《歧路灯》及历代诗歌^①等亦有复述，其对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的记载，与《庄子》基本一致，但多数文献大都只是片面截取邯郸学步之事，而忽略了《庄子·秋水》用这一故事要

① 诗歌中用典亦同《庄子》故事原型，如元代侯克中《艮斋诗集·掩扇》：“寿陵未得邯郸术，匍匐归来失故行。”

表达的观点。《庄子·秋水》所载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之典，是魏牟回答公孙龙想探知庄周学说时所用的故事。之前，魏牟还用了坎井之蛙观天之典，这一故事与公孙龙的行为极为相似。略陈如下。

第一，公孙龙与坎井之蛙的自信。

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庄子·秋水》）^{[1]263}

吾（坎井之蛙）乐与！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跖；还虵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时埴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秋水》）^{[1]264}

公孙龙“自以为至达”，实已表明他对自己的学说是非常自信的；坎井之蛙的“亦至”也表明了它“擅一壑之水，而跨时埴井之乐”的自信。

第二，公孙龙与坎井之蛙的茫然。

今吾闻庄子之言，汙焉异之。（《庄子·秋水》）^{[1]264}

于是埴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庄子·秋水》）^{[1]264}

《秋水》描述公孙龙和坎井之蛙的茫然之态也十分相似。公孙龙对庄子学说感到奇异，茫然无所适从；坎井之蛙听东海之鳖谈东海之大乐，亦感到惊异和自失。

在坎井之蛙观天的基础上，魏牟用“蚊负山”、“商虵驰河”比喻了公孙龙之智不宜窥探庄周之学，之后又用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之典再一次否定了公孙龙意欲探知庄周之学的做法。寿陵余子与公孙龙的行为的相似之处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孙龙和寿陵余子都有各自原有的能力。即公孙龙有自己的一套学说体系，寿陵余子有自己走路的能力。

第二，公孙龙和寿陵余子都有学习其他美好事物的意愿。庄周之学在当时已有一定影响，否则以公孙龙的学识不会特意向魏牟问询，而公孙龙出于本能愿意探知其究竟；寿陵余子已有走路之能，而因“赵都之地，其俗能行”，愿就学于邯郸，这里邯郸之步和庄周之学都是美好的、先进的事物。

寿陵余子学步未成，《庄子》虽未言其因，但由于他已具备基本的行走能力，所以合理地推测大概源于方法不当。试想两种体系截然不同的学说相杂在一起，必不能容贯而通之，公孙龙既不想抛弃自己的学说，又想探知庄周之学，其结果正像寿陵余子学习走路一

样，各自原本的技能都是个人独有的，不能舍之而学他人之步，所以未能学成反而失其故能。亦即《秋水》文末所言“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所以并非仅仅是“知不知是非之竟”所能解释的。

就其原型之义和上举绝大多数文献用例来看，“邯郸学步”应当属于典故喻意延续至今没有发生改变的成语。

三、“邯郸学步”解读的多重性

成语具有“表意的双层性”^[4]特征，其意义可分为表层语义和隐含语义。以“邯郸学步”为例，寿陵少年到邯郸学步，未能学到邯郸步，反而失去他原有的走路技能，这是表层语义；而模仿不成，反而丧失固有技能，则是其隐含语义。隐含语义的产生与表层语义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历代文献多用“邯郸学步”的隐含之义。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用例，从不同角度运用意义，既与表层语义相关，但却与隐含之义有细微差异，体现了“邯郸学步”理解的多重性。

成语作为一种特殊的固定短语，具有稳定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意义改变了，也有的更换了构成成分。^{[2]338}“邯郸学步”，与“邯郸步”、“学步邯郸”、“学步”、“失步”等一样，都仅仅是指称“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之典的众多语词中的一个，它们虽然构词成分略有差异，但实指相同。在使用中，它们逐渐凝固为成语，皆为大型辞书收录。例如，台湾编《洪叶活用成语典》在“邯郸学步”条下注：“或作——学步邯郸、邯郸学行”。^{[5]0797}《辞源》在“学步邯郸”条下释为“也省作‘学步’”。^{[6]0797}《汉语大词典》解释“邯郸步”为“犹言邯郸学步。”因此，下文讨论不限于“邯郸学步”一个词形。

1. 对“邯郸学步”的否定

由以上诸例可见，自《庄子》以来，历代文献使用这一典故时，大都持否定态度，很少有中性和褒义之用。

2. 对“邯郸学步”的肯定

欲仰天庭掞，终知学步艰。（《古诗镜·南朝梁庾肩吾〈和竹斋〉》）

闻风甚伟，学步良难。（宋·洪咨夔《平斋集·谢庄中书举自代启》）

踏尽冰霜历岁寒，邯郸学步路偏难。（清·嵇永仁《抱犊山房集·繫足》）

按：第一例诗题名和诗，故其“学步”，一则指出此诗系模仿原诗而作，又赞美了原诗的美妙。诗人并

未如一般所用谴责“学步”之失，而是用“艰”道破学习模仿他人之难。后二例“学步良难”、“路偏难”亦同。又如，

学步邯郸未可非，寿陵余子古来稀。百川学海终成海，一钵穿衣始得衣。西子捧心原暖昧，南车指路自光辉。国能未得无坚志，莫怪当年匍匐归！”（明·李光远《学步桥》）

按：李光远，邯郸人，诗人对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指出其之所以未得国能的原因。就此陈光唐、梁辰等人予以了高度评价：“对寿陵余子之举，世人大都持批评嘲讽态度，作者独具只眼，在肯定其勇于学习别人长处的前提下，指出所以未学成，是因为学步不到底，半途而废了。效果不佳但精神可嘉，这和‘东施效颦’的盲目学人是不一样的。此论颇有见地。”^{[7]200}

3. 把“邯郸步”作为美好事物的代称

不落江西派，肯学邯郸步。（宋·孙覿《鸿庆居士集·虎邱沼老豫章诗僧也与余相遇于枫桥方丈诵所作徐献之侍郎生日诗有东湖孺子南极老人之句余爱其工赋小诗寄赠》）

自安邯郸步，不效文公习。（元·刘诜《桂隐诗集·和张自翁答娄广文雪篷足疾》）

按：二例中“邯郸步”径指“邯郸学步”典故中学习的对象，即邯郸人美好的步态，并进而代指诗歌创作中的学习的对象，其言外之意又暗指了自己不惧邯郸学步之失、之讥。又如，

蹉跎已失邯郸步，悲壮空传勅勒歌。”（宋·陆游《剑南诗稿·忆昔》）

自怜终失邯郸步，不是重来旧路迷。（宋·王阮《义丰集·过桃川万寿宫二首》其二）

窈窕或崎岖，不是邯郸步。因来此凭栏，又送孤鸿去。（宋·张镃《南湖集·桂隐纪咏·兴远桥》）

已失邯郸步，难从泽畔吟。（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答周正平郎中韵》）

以上诸例，虽然所用都意在说明“邯郸学步”之失，但其用“失”、“是”与“邯郸步”相连，从诗意看，亦皆代指美好的事物，尤以第三例最具代表性，以邯郸学步桥与兴远桥相拟。

明代著名诗人、诗评家杨慎曾作二诗，见于《升庵集》，“姍袅轻盈邯郸步”（《珠履曲》）、“邯郸步弱西陵远”（《红蕖引用李长吉体》）皆用“邯郸步”，又清代乾隆帝称“赵女邯郸步”（《御制诗集·拟燕赵多佳人》）亦用之，三诗皆指女子轻盈袅娜的步态和舞姿，

与“赵都之地，其俗能行”，以及赵女善舞的风俗相应，虽与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之“邯郸步”意义有别，但其皆用指美好事物的功能则是一致的，应看作是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之“邯郸步”的派生之用。

4. 代指学习

文献有用“学步”代指学习者，但所用很少。例如，
方期学步于百察之上，尤惧代庖。（宋·洪适《盘洲文集·谢表》）

亦偶有误用者。例如，

言学步邯郸者新无功，失其本质，故使邯人匍匐而归。（《弘明集·晋释慧远〈答桓南郡书〉》）

间为此幅，生涩自不足观，犹邯郸人学步，而并失其故矣。（《续书画题跋记·明沈周〈仿吴仲圭笔意〉》）

四、“邯郸学步”之精神解读

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模仿学习邯郸人的步态，实出于人的本能。亚里士多德曾经谈到诗歌艺术的源头，认为“人类对摹仿的喜爱与生俱来，天生就有认识和探知事物的愿望。”^{[8]4}亚里士多德之意虽在探讨文学的起源，但却指出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属性。也正因为人的模仿本能，才有所谓主流或流行之事、之风。但是，人的模仿是一种理性行为，他首先要对模仿对象的是非美恶作出判定。因为“赵都之地，其俗能行”，寿陵余子年岁少，却对美好步态充满向往，不计艰辛慕名远来，此其精神可嘉之甚。学习美好又陌生的事物之难人所共知，诚如庾肩吾所云“学步艰”，因此肯学者向来绝少，故李光远谓“寿陵余子古来稀”，因此更应该受人称颂。这是故事本身，如果回归到《庄子》原文，“邯郸之步”是学习模仿的对象，它是被作为美的事物加以赞扬的，魏牟用此暗指庄子学说，人类追求美的意愿无可厚非，包括公孙龙亦如是，魏牟所担心的是学习方法不当可能导致的两失。下文用例“拘拘规效”正是指出学习他人方法不当，如同“学步邯郸”。

需要指出的是，“邯郸学步”与“东施效颦”常被看作喻意相类的两个典故并行使用，其使用与“邯郸学步”的使用时间和逐渐定型的过程基本一致。举例如下。

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杂文》）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

杀邯郸人。(《全唐诗·李白〈古风〉》其三十五)

局蹐邯郸步，惭惶西子颦。(明·王樵《方麓集·读书》)

难效西施颦，虑失邯郸步。(明·郑潜《樗庵类稿·徐仲仁以使君天上来六诗投赠遂歌山中人次韵答之》)

若拘拘规效，如邯郸之学步，里人之效颦，则陋矣。(明·王鏊《震泽长语·文章》)

将效西子之颦，又恐失邯郸之步。(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见林郎中》)

学步邯郸而失邯郸，效颦西子而失西子。(宋·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中说》)

后来者谁可与言，东里之颦邯郸步。(清·吕履恒《长歌行送友人游大梁》)

“东施效颦”也源于《庄子》。《庄子·天运》曰：

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絜妻子而去之走。成玄英疏：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极妍丽。既病心痛，颦眉苦之。而端正之人，体多宜便，因其颦蹙，更益其美。是以闾里见之，弥加爱重。邻里丑人见而学之，不病强颦，倍增其丑。^{[1]228}

“邯郸学步”与“东施效颦”的故事原型确有很多相似之处，邯郸人的步态和西施（包括其颦眉）都被看作美好的事物，寿陵余子与东施所做都是为了追求美，但二人有两个明显的差异：其一，《庄子》以“丑”描绘东施，这是她自身的条件，而对寿陵余子则未置一词，据此可推断寿陵余子并非不会走路或走得很难

看。其二，西施颦眉本因病痛而起，不是健康之美，但是东施却以之作为模仿对象，就本质而言，她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与寿陵余子以本就美好的邯郸人的步姿作为学习对象截然不同。因此，东施效颦的模仿具有盲目性，与寿陵余子的理性学习不可概而论之。

一个成语的字面义（即表层语义）与文旨的距离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性的约定，不能按个体的语言运用者自己的意愿随意来阐发或补足；也就是说，成语解释的理据是基于该成语形成时的特定背景或始作俑者的意图。^[9]本文第一部分对“邯郸学步”定型源流的考察和对原型文献的梳理，正可以表明“邯郸学步”隐含之义，即文旨的根源。但是在第三部分我们又看到，古人对“邯郸学步”的使用和态度却又不止于此，“邯郸学步”讥失之意的定型并不能妨碍人们对学步精神和学步过程艰难的肯定和感叹。

参考文献：

- [1]郭庆藩释. 庄子集释[M]//诸子集成. 上海：上海书店，1986.
- [2]黄伯荣，廖旭东. 现代汉语（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3]启功. 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J]. 文学遗产，2000(1).
- [4]刘叔新. 关于成语惯用语问题的答问录[J]. 南开语言学刊，2002(12).
- [5]李添富. 洪叶活用成语典[Z]. 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
- [6]辞源[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7]陈光唐，谢立新，梁辰选注. 赵都诗词选注[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8]达维德·方丹著，陈静译. 诗学——文学形式通论[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9]徐盛桓. 成语的生成[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1).

Study On the Stream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Idiom, “The Walk of Handan.”

LI Hong-xia, JIA Jian-g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Handan College, Handan, 056005)

Abstract: The idiom “The Walk of Handan” (邯郸学步) used to be called, “The Handan Walk” (邯郸步), “Learning the Walk” (学步), “Out of Step” (失步), “Learning the walk in Handan” (学步邯郸), and “The Loss that Happened in Handan” (邯郸之失). Throughout the idiom'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the phrase, “The Walk of Handan” has become the phrase that is currently used today because it matches the correct structure of Chinese grammar and contains the rich and historical meaning behind the idiom. In ancient literature works, people use it to mock who simply imitate without think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hows that it's hard to learn how to walk and there're very few people who would actually learn how to walk. This illustrates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lk of Handa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Key words: “The Walk of Handan”; “The Handan Walk”; Imitation

从目的论角度析邯郸赵文化旅游景点翻译

韩淑英

(邯郸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05)

摘 要: 从功能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出发, 以邯郸古赵文化旅游景点翻译为例, 分析古赵旅游文化资源的翻译现状, 指出现存旅游景点汉英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运用目的论作为理论指导, 进一步探讨邯郸古赵文化旅游资源翻译应遵循的几项原则, 以达弘扬文化和促进旅游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 目的论; 邯郸; 赵文化; 旅游景点;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47-04

收稿日期: 2013-11-10

作者简介: 韩淑英 (1970—), 女, 山东梁山人, 邯郸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邯郸被誉为“露天博物馆”, 拥有三千年都市史, 蕴藏着灿烂的历史文化。1994 年, 邯郸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具有磁山文化、赵文化、太极拳文化等文化遗产。其中, 赵文化作为一种区域历史文化, 并未因赵国的灭亡而终止, 而是自赵国以后一直在传承和延续。赵文化是古人几千年智慧的结晶, 它以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独特的艺术价值而著称^{[1]25-28}。邯郸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 境内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其古老文明和文化遗产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旅游景点的文化内涵已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来自国外的游客只有通过翻译过来的旅游资料, 才能感悟到邯郸悠久的历史, 领会中国古文明的思想精髓及文化内涵。因此, 旅游景点的翻译对游客来说非常重要。

一、邯郸赵文化旅游景点简介

邯郸是全国唯一的古赵文化集中地, 文化积淀深厚, 文化源远流长。邯郸赵文化遗迹, 包括赵王城遗址、丛台公园、赵王陵、回车巷、广府古城等旅游资源^{[2]16-17}。近十多年来, 许多具有很强研究能力的专家、学者致力于赵国史、赵文化研究, 除了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 还充分利用研究成果发展旅游业, 抓住目前区域历史文化发展的热潮, 利用好文化的一切资源, 进一步巩固邯郸在中原文化旅游区的中心城市地位。目前, 邯郸市正在以“赵文化”品牌发展旅游业, 促进邯郸经济发展, 例如市博物馆更新布置了“邯郸历史陈列”, 火车站广场建立了“胡服骑射”大型雕塑; 武灵丛台、学步桥、回车巷等 21

个传统景点升级; 兴建古赵文化一条街; 建成了 10 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广场, 使邯郸旅游业的文化品味全面提升^[3]。可见, 邯郸正在全面提升自身在四省交界区域经济的中心地位, 其中作为第三产业的旅游业发展在建设区域经济中心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景点是旅游的核心吸引物, 是诱发游客旅游的重要动因。邯郸古老文明和文化遗产不仅吸引着国内游客, 也正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各国的游客。游客不再满足于游山玩水, 更渴望在旅游过程中欣赏、了解到邯郸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因此, 邯郸景区的赵文化旅游翻译起了重要的作用。

旅游资料的翻译主要包括旅游景点介绍、旅游宣传广告、旅游告示标牌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景点介绍翻译最具旅游特色, 目的是让游客读懂看懂, 了解中国旅游资源的窗口, 并能从中获取相关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知识, 起到传递信息、诱导游客、宣传当地文化的功能。因此, 旅游翻译语言必须准确、通俗、明了, 富有吸引力, 能雅俗共赏, 利于不同层面的读者的理解和接受^{[4]107}。因此, 旅游资料应具备三个主要功能: 信息功能、吸引功能和劝说功能。总之, 旅游资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游客, 其英译也应该具有相同的目的。鉴于此, 从目的论角度出发, 探讨邯郸赵文化旅游景点的翻译现状及有效指导翻译的理论和方法, 以促进赵文化的对外交流, 吸引国外游客, 弘扬区域文化, 促进邯郸经济发展。

二、翻译目的论

20 世纪 70 年代, 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莱斯 (Katharina R

eiss)、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ristiane Nord)为代表,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该理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翻译视角,实现了翻译理论从静态的语言翻译象征论向动态的功能翻译分析法的转化^{[5]74-79}。功能翻译理论是一种翻译行为理论,其核心概念是目的论。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强调译文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目的论对翻译进行了新的阐述:翻译是再目的的文化中对源文化或语言的一种不可逆的信息传递,是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具有文化性和交际性,翻译的标准是翻译活动的目的指向^{[6]124-132}。翻译的目的就是由翻译任务决定的目标或意图,而译文主要取决于它的目的和任务。目的论有三个法则: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其中,目的法则是指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该法则是所有翻译所要遵循的首要法则;连贯法则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即让接收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法则指原文与译文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即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这三种法则并非平等并列,其关系是:忠实法则从属于连贯法则,而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都从属于目的法则^{[7]79-83}。目的论摆脱了传统翻译中原文与译文的等值或对等翻译的局限,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的功能为目的,根据语境因素来选择自己的翻译策略。

三、邯郸赵文化旅游景点的翻译现状

随着邯郸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古赵旅游文化的翻译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但是,在对邯郸市赵文化旅游景点资料翻译的调查中发现,现存的旅游资料翻译中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1. 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

在赵王城遗址公园中,“赵王城遗址公园……,集文物保护、生态建设、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遗址公园”的翻译,“The Park of Ruins of Zhao's Intramuros……,…….with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relics,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这句英文中“and”前后成分是并列的,但是却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relics”用的是所有格形式,“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用的是名词短语,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表达形式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同样的表达形式也出现在赵苑公园简介中,“以赵文化和成语典故文化为核心”被译成了“……the culture of Zhao and idiom culture as core”,这里的“the culture of Zhao”和“idiom culture”是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

在丛台公园的南门,入口与出口分别译成了“way in”和“way out”,显然这是不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正确的译法应

为“entrance”和“exit”。在丛台公园、赵苑、赵王城,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达“绿草茵茵,踏之可惜”,英语译文“Please keep off the grass land”;“手上留情花自香,足下当心草如茵”,英文译为“No picking”;“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译文“Please protect the plant”等等。而符合英语习惯的翻译为“Keep off the grass”。

2. 译文矛盾

译文矛盾主要表现为在相同景点介绍中,相同汉语的英译文不同;不同景点中,相同汉语的英译文不同;同一景点中的景点介绍中与告示牌中,相同汉语的英译文不同。

同一景点介绍中的译文矛盾。在赵苑公园简介中,先后出现两次“文物遗址”,第一次出现译文为“cultural sites”,而第二次的译文为“cultural relics”。赵苑公园简介中的“北大城遗址”被译成了“the site of Dabai City”,而在赵王城遗址公园简介中的“赵王城遗址”被译成了“Ruins of Zhao's Intramuros”。在丛台公园中,“望诸榭”被译为“Wangzhu Pavilion”,而在告示牌中“望诸榭”被译成“Wang Zhu Pavilion”。

不同旅游景点中,相同名称的译文不同。丛台公园中的“赵国”被译为“Zhao State”,而在赵苑公园中“赵王”被译成“Zhao Kingdom”。赵苑公园中的“赵文化”的译文为“the culture of Zhao”,而在赵王城遗址公园中,“赵文化”的译文为“Zhao's Culture”。

景点介绍与告示牌中的译文矛盾。在赵苑公园简介中,“典故苑”被译成了“Illusions Park”,而在告示牌中的“典故苑”译成了“Illusions Garden”;赵苑公园简介“梳妆楼”译成了“Dressing Platform”,而赵苑遗址区介绍与告示牌中的“梳妆楼”的译文是“Dressing Building”。丛台公园简介中“五灵丛台”译文“Wuling Contai”,而在告示牌中的“五灵丛台”却为“Wu Ling Congtai”。

3. 用词不当、错误或拼写错误

在丛台公园中,“喜迎着八方来客”译成“It is meeting with the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英文中的“meet”是及物动词,后面可以直接跟宾语,显然这是个病句,“with”是多余的。同样,在赵苑公园简介中,“……是一处以文物遗址为依托”,英译文为“……with cultural relics as support”中的“as”应该去掉。

丛台简介中,“赵武灵王”的译文“King Wulirg of Zhao”,这里的“Wulirg”拼写错误,应该为“Wuling”。在赵苑公园与丛台公园简介中,“综合性公园”分别被译成了“a multifunction park”和“an integrated garden”,“multifunction”意思为“多功能”,“integrated”指“混在一起”,所以这两个词用在这里都不合适,应该译为“a comprehensive park”。

赵王城遗址公园中,“赵王城”被译成了“Zhao's Intramuros”,

并且重复出现 4 次。在英语词典中, 没有查到 “Intramuros” 这个词。“赵王城”可以译成 “Zhaowang City”。

赵苑遗址区介绍中, “两汉时”译文为 “In the time of the Eastern Han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其中的 “western” 的首字母没有大写。另外, “梳妆楼分为南、北相连的两个夯土台基”的英译文中, “Dressing Building have two ramming boules in north and south connecting to each other”, 该译文中, 首先这个句子谓语错误, 应该用 “has”, 另外 “boules” 这个词没有 “台基”的意思, 可以用 “platform” 或 “foundation” 表示 “台基”。

4. 汉英交叉

丛台公园的告示牌中, “盆景园”与 “牡丹园”分别被译为 “Bonsai Garden”与 “Peony Garden”, 而 “梅园”译成了 “Mei Garden”。显然, 在 “盆景园”与 “牡丹园”中的 “盆景”与 “牡丹”用的是英语表达, 而 “梅园”中的 “梅”的译文用的是汉语拼音。

赵王城遗址公园中, “平面似 ‘品’ 字型”被译成了 “Its plane surface is like a Chinese ‘pin’”, 汉字 “品”用汉英拼音翻译, 这样会让外国人看后感觉还是不清楚, 从拼音上看不出 “品”的形状, 所以此处翻译应该用汉字 “品”或拼音后加汉字 “品”。“占地面积 876 亩”中的 “亩”用了汉语拼音 “mu”, 同样这种翻译会让外国人感到迷惑, 不知 “mu”指什么, 应该用英文 “acres”或 “mou”表达。

5. 病句

赵王城遗址公园中, “平面似 ‘品’ 字型, 分北、西、东三个小城”被译成 “Its plane surface is like a Chinese character ‘pin’, and is composed of three small cities……”。从句子结构来看, 这个句子就一个主语 “Its plane surface”, 但是主句的汉语意思应该是 “(赵王城)的平面似 ‘品’ 字型, (赵王城)分北、西、东三个小城”, 显然英译中的后半句应该加上主语 “Zhao’s Intramuros”。同样的英译问题也出现在 “城内总面积为 505 万平方米, 1961 年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译文中, “Its total area is 5,050,000 m², and was announced as one of the initial key historical sites……”。表面上看, 改句就一个主语 “Its total area”, 其实后半句的主语应该是 “赵王城 (Zhao’s Intramuros)”。

在赵王城遗址公园中, 介绍 “插箭岭”时有这样的描述 “相传为赵国演练骑兵队伍的场所”, 其译文为 “Legend goes that it was the place where the army of cavalymen of Zhao Kingdom.” 这个英语句子是个复合句, 首先句首应该有个冠词, 如 “The 或 A”, 另外, “……the place where the army of cavalymen of Zhao Kingdom.” 是关系从句, 但是这个句子中缺少了谓语动词。在 “铸箭炉”的介绍中, 也有类似的翻译, “相

传赵国进行骑射操练和对外征战所需的箭头都出于此处”的译文 “Legend goes that the arrows used for the soldiers to practice riding and shooting and fighting there.” 这句译文的句首也应该有个冠词 “The 或 A”, “that”。

6. 漏译

丛台公园简介中 “丛台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 虽然历代修缮和改建, 仍保留着古代亭台的独特风格。它是赵文化保持最完整的建筑。丛台是邯郸的象征, 它以古老的雄姿, 喜迎着八方来客。”的译文 “In the long history of more than 2 000 years, Congtai Terrace, although repaired and rebuilt many times, still remains its unique style of ancient terrace and pavilion of China and the magnificence of Zhao Terrace has become the symbol of Handan city. It is meeting with the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显然, 在该部分翻译中, “它是赵文化保持最完整的建筑”与 “它以古老的雄姿”没有翻译。

赵王城遗址公园中, “二期工程是建设文化展示区西部, 占地约 1300 亩的高品位生态公园”被译成 “the second stage is to build a high grade ecological park, being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culture exhibition area”, 很明显的, “占地约 1300 亩”被漏译了。

四、目的论对邯郸赵文化旅游景点资料英译的启示

功能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 译者应该根据译文预期的目的和功能来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翻译的标准不再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 而是译文预期目的的实现程度^[8]。针对上文对邯郸古赵文化旅游景点翻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分析, 以目的论为指导, 对邯郸古赵文化旅游景点资料的翻译提出以下几条原则。

1. 遵循以目标读者为中心的原则

旅游资料英译的最终目的, 就是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消费旅游资源。旅游景点翻译也要服务于这一目的, 要迎合外国游客的审美观, 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心里需求和接收能力, 从更大程度上吸引更多的游客。译者要把自己放在英语旅游资料读者的位置上, 根据译文的信息功能、吸引功能和劝说功能来决定具体的翻译策略, 从而达到预期的翻译目的。因此, 译者在翻译邯郸赵文化旅游景点时, 一定要在保留邯郸古文化的意蕴的同时, 又要使外国游客明白易懂, 为他们提供旅游景点的信息, 吸引潜在游客的注意力, 并劝说他们消费旅游资源, 从而达到满足读者的期望和交流需要。

2. 遵循以传递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原则

文化景点翻译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景点旅游资料与文化密切相关。国外游客只有通过翻译过来的旅游资料, 才能

切实感受到文化的悠远、深邃。邯郸是一座具有 3000 年都市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而赵文化是古人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它正以古老文明和文化遗产吸引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也正是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正在吸引着国外游客来邯旅游。因此，翻译者应该邯赵文化旅游景点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信息传达到译文中，实现传递中国文化的使命，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满足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了解到古老邯郸灿烂辉煌的历史，以达到弘扬文化，吸引游客，促进邯郸旅游发展的目的。

3. 遵循中英文旅游资料差异的原则

汉英民族分属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造成了不同的审美观。汉民族注重感性思维，注重表达形式，善用华丽的词藻，而西方人强调理性思维，语言表达形式简介自然，通达直观。因此，邯郸古赵文化景点英译时，译者要具备跨文化意识，充分考虑中英旅游资料的差异，遵循中英旅游资料差异的原则，对邯郸古赵文化景点进行翻译。在展现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时，可用汉英拼音，或者采用音译加解释的翻译方法，不仅可以保持中国的地名特色，让外国人了解到中国地名的发音，而且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让读者感到既陌生又新奇，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对于一些外国游客认为冗余累赘的信息、过于夸张或者过于华丽的表达，译者可以进行删减或改译，对于一些可能缺乏的信息，译者可以进行增补或释义。

4. 遵循翻译策略灵活性的原则

翻译功能派强调译者应该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于旅游资料英译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译者可以运用目的论为指导，在全面理解旅游资料原文的基础上，根据旅游资料的信息、吸引和劝说功能，以及译文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和功能，来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因此，在对邯郸古赵文化旅游景点资料进行翻译时，译者可以使用删减、改译

等手段，以目的论的三原则为基准，译文应该尽量做到符合英语旅游资料的表达习惯，根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来传递信息，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技巧，向世界介绍邯郸古赵旅游景点文化，使外国游客在观赏风景的同时，体会到邯郸古赵文化蕴涵，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实现其预期的译文目的。

五、结语

由于旅游资料的翻译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译者可以运用目的论指导翻译，遵循以目标读者为中心和以传递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原则，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来选择最佳的翻译方法或策略。根据目的论，译者可以以目的论的三原则为准则，翻译时则可以恰当地采用删减或改译的手段，使译文符合英文读者的心理需求和审美习惯，

同时结合跨文化知识，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根据旅游资料的信息功能、吸引功能和劝说功能，灵活地选择翻译策略，使译文达到预期功能，同时起到宣传古赵特色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邯旅游，进一步促进邯郸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郭子新, 肖咏梅. 邯郸赵文化功能文本型翻译研究[J].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2).
- [2]王海燕. 邯郸市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研究[J]. 山西建筑, 2013(1).
- [3]马朝阳. “赵文化”促进邯郸旅游经济大发展[J]. 中国文化报, 2001(11)
- [4]马玉红. 从目的论看旅游资料的翻译[J]. 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5).
- [5]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 Routledge, 2001.
- [6]潘艳红. 目的论研究在中国[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5(3).
- [7]卢立程. 目的论指导下对外宣传材料汉英翻译中的归化[A].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6(6).
- [8]林玉华. 从目的论看旅游资料汉译英[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高教版, 2007(12).

On Translation of Tourism Areas of Zhao Culture in Hand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 Theory

HAN Shu-ying

(School of Chinese, Handan College, Handan, 05600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kopos Theory form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taking the tourism areas of Zhao culture in Handan as examples, analyzed the translation situation of the ancient Zhao culture and 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tourism areas. By taking Skopos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direc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d some principles in translating tourism resources of the ancient Zhao culture in order to popularize Chinese culture 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Key Words: Skopos Theory; Zhao culture; tourism areas; translation

太极拳伟业发展构想

段玉铭

(邯郸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05)

摘要: 太极拳源于中国, 与中华文明同生同长。太极拳文化底蕴厚重, 价值丰厚, 其核心价值是技击为根, 健身为用, 文化为魂。要以太极拳的“科学化发展, 国际化传播, 社会化推广, 产业化发展”为发展方向, 推进实现“太极瑰宝, 源于中国, 融入世界, 造福人类”的太极拳中国梦。

关键词: 太极拳; 太极文化; 杨露禅; 武禹襄; 发展构想

中图分类号: G85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51-03

收稿日期: 2013-11-10

作者简介: 段玉铭(1953—), 男, 河北涉县人, 邯郸学院党委太极工委书记、研究员。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宝藏, 其中有颗璀璨的明珠, 她就是太极拳。太极拳以她独特的魅力傲立于中国文化宝库。一代伟人邓小平讲出了: 太极拳好。

瑰宝太极拳

厚重内涵。太极是宇宙之象数, 是自然之基因, 是道之本真, 是孔子之学说。简而言之用现代语言概括太极为: 中国人观察世界, 认识世界, 描述世界, 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 是中华文化的智慧与灵魂的结晶, 是学习中国古典哲学的总开关。

太极拳源于中国, 与中华文明同生同长, 承载着《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的智慧, 蕴含着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奇妙思维, 秉承以和为求、以意引导, 舍己从人, 积柔成刚的理念, 独占世界武林鳌头。太极拳是以太极文化理论为指导的拳术, 太极拳是国术(武术)、是艺术、是医术、是学术, 是战术。

核心价值。太极拳以她的自身价值诞生、立世、辉煌。核心价值**技击为根, 健身为用, 文化为魂**。技击为根, 根源于技击, 技击为其根本, 技击为核心价值的载体; 健身为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 科学技术的进步, 徒手技击市场逐渐萎缩, 此时太极拳先贤大师, 把太极拳内涵的健身功能挖掘出来, 随之广为流传, 造福民众; 文化为魂, 太极拳以她的阴阳、虚

实、动静、变化、进退、柔刚、缓急为灵魂, 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故说太极拳是文拳、哲拳、养生拳。

靓丽拳姿。太极拳的拳姿端庄大方, 轻盈飘逸, 刚柔相济, 连绵不断, 动静相间, 和谐靓丽。自己打太极, 自身内心和谐, 与他人和谐, 与社会和谐, 与大自然和谐; 他人眼里是一道美丽风景, 十分养眼。一人打太极是一朵靓丽的鲜花, 一群人打太极是一片盛开的花园, 大家都来打太极, 将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

辉煌太极拳

太极拳文化底蕴厚重, 价值丰厚, 简单易学, 堪称文化瑰宝。适逢盛世, 中国人有责任、有义务担当把太极拳瑰宝推向辉煌的历史使命。我们要以太极拳的“科学化发展, 国际化传播, 社会化推广, 产业化发展”为发展方向, 推进实现“太极瑰宝, 源于中国, 融入世界, 造福人类”的太极拳中国梦。

科学化传承。国家民族崛起复兴之际, 要改变太极拳家传秘传、社会设馆授徒的原始传承模式, 要进高校协同创新, 科学传承, 以满足中国小康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以贡献与人类实现共同追求和谐健康幸福的普世价值。科学化传承基于将太极拳科学地立起来, 强起来,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首先要

做好三各方面工作：**创立太极拳学说**。集高校、社会、太极拳界、太极文化界聪明才智，创编太极拳学，使之成为准确规范科学的学科。**完善人才培养链条**。科学传承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进高校设专业，招收本科生，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规范的培训培养，使之成为能打能讲能教能研究创新的太极拳文化新型传承高级人才。邯郸学院于2010年开始了探索，创立了太极文化学院，2011年开始招收本科生，被太极拳界誉为“太极黄埔”。2013年参加香港国际武术大赛、厦门第三届“市长杯”、焦作第八届国际太极拳竞赛取得骄人的成绩。太极拳人才培养要建立完整的教育链条，从娃娃抓起，建立太极拳特色的幼儿园、邯郸太极文化学院附小、附中，将在中国武当山、梁山、峨眉山、少林寺、陈家沟、广府等武术圣地，武校集中的地方招收具有童子功的五年制专科生，创造条件申办专业硕士点，进而创造条件创办太极拳博士点，进而创办中国太极大学。**科学研究**。用现代科学方法解释太极拳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后发先至、以静制动的神奇功效的原理。**健康研究**。运用生物力学研究习练太极拳对神经、肌肉、骨骼、血管、淋巴等生命系统的影响，用数据说明太极拳有益健康的原理。心理学研究太极拳对心理的影响。运用对比统计法，研究习练与不习练太极拳者不同的康复疗效。**拓展研究**。太极拳是文拳、哲拳、智慧拳，要深入开展太极拳文化研究，要与医学、心理学、历史学、艺术学、预测学、军事学、战争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战略学、哲学等多学科相融合研究，最大限度地挖掘太极拳文化的内在价值，让太极拳文化为人类创造更多更大的福祉。**创编新套路**。目前流行的太极拳套路主要适合中老年人习练，推广普及，需要创编适合生命阶段人群习练的太极拳套路。创编适合习练的青少年时尚太极拳套路，创编适合白领人群的座椅式太极拳套路，创编适合残疾人习练的轮椅式太极拳套路，创编适合弱势群体习练防身用的太极拳防身术套路，实现太极拳生命阶段全覆盖，人人皆可享受到太极拳瑰宝的魅力。

国际化传播。胡锦涛同志曾经讲过：中国目前是贸易顺差，文化赤字。为此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泱泱五千年文明古国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太极拳恰恰可以完成此任务，她以简单的肢体语言承载人类追求和谐健康的普世价值，蕴

含着厚重中国文化内涵与思维模式，走出去深受欢迎。**推动太极拳进奥运**。日本的柔道，泰国的拳击这些简单体育项目早已成为奥运竞赛项目，可我们的武术太极拳却迟迟进不了奥运，原因何在？有诸多原因，根本原因是武术太极拳缺乏科学的标准与规则，太极拳的推手可以经过研究，完全可以制定出科学的标准与规则，满足奥运项目的竞技要求。这就需要集全国、集高校、集太极界精英力量，协同创新研究制定太极拳推手的标准与规则，为国家推进太极拳推手进奥运做好基础性工作。**融入孔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在全世界出现了学汉语热、学习中国文化热，国家为适应世界对汉语对中国文化的迫切需求，确立了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战略，建立了以服务各国民众学习汉语需求的孔子学院，成为学习中国文化的载体。随着孔子学院持续发展，又提出了多样性的需求，特色孔子学院应运而生。太极拳作为中国功夫的代表在国外深受欢迎，太极拳应该积极纳入国家战略，融入孔院，在孔子学院先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开，然后在孔子学院普遍设立太极拳课堂或太极拳课程传播太极拳。融入孔子学院需要做好课程设计、教材创编、教学教法、教师教练培养培训等系统工作。**高端合作**。太极拳走出去，必须牵手高端媒体，营造舆论氛围，共同推进，才能事半功倍。邯郸学院从2011年就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家主流媒体签订了合作推进太极文化外宣战略协议。国际台是具有65种语言，90个落地台，聚广播、电视、网络、纸介等全媒体，全球覆盖，传播力影响力居全球之首。国际台秉承“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怀”理念，传播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友谊。邯郸学院勇当弘扬太极拳文化历史使命，三年来与国际台一起合作制作太极拳文化宣传片《嗨·太极》，创编《太极拳英语教程》，开办太极拳夏令营，培训孔子学院师生学习太极文化，学习太极拳，向孔子学院派遣专职太极拳教师传授太极拳，开展太极拳空中课堂教学，在孔子学院设立太极文化课堂，深受欢迎，取得了显著成效，受到国家汉办领导的高度评价，促进了太极拳文化走出去。**联合民间**。太极拳之所以在国外深受欢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民间先行，在中国先走出去的先民中会打太极拳的，到国外仍习练不辍，当与外国人比试时常常被太极拳师击败，外国人尝试了太极拳的厉害，对太极拳十分看好，便要求跟着学，于是国外太极拳武馆应运而生。实现太极拳走出去，必须联合民间，联手共同把太极拳瑰宝贡献于世界人民，

造福人类。

社会化推广。太极拳是国术，应该国人首先享受，成为国拳，下大力普及。为服务广大民众健康。**太极拳段位制推广。**解决太极拳推广中存在的误传，肢解不规范的问题，实现太极拳传播的标准化、科学化。**推进太极拳“六进工程”。**太极拳进学校、农村、社区、车间、机关、军营的普及活动，满足民众学习太极拳的迫切需求，活跃基层群众文化体育生活，占领基层文化体育阵地，抵制邪教侵蚀。**组织太极拳运动赛事。**激发太极拳习练者兴趣，树立习练太极拳样板，用典型带动。**太极拳社会化推广需要社会各方共同推进。**太极拳社会化推广是系统工程，政府要作为民生工程，制定太极拳普及纲要，列入对下级政府的考核，要组织太极拳运动会；体育部门要设立太极拳辅导站，负责太极拳推广的具体组织工作；教育部门要制定获得太极拳竞赛奖牌的师生的奖励政策，激励师生深入持久习练太极拳，培养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接班人；高校要创编适合各类人群需要的太极拳教材，培养适应各个层面需求的太极拳教师教练。

产业化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大背景下太极拳的弘扬与传播，必须借助产业化发展才能持久实现，太极拳事业才能活起来。产业的基础是产品，太极拳产业化发展必须立足太极拳产品。太极拳产品可初步分为三类，**教育产品、旅游产品、文化产品。****太极拳教育产品。**太极拳教育产品面对的是专业学生和社会各类太极拳爱好者，是一个有面广量大的需求市场。教材（纸质的、音像的，中文的、外文的），太极拳器械（刀、剑、枪、棍），教学器材，训练服装，教学场地，太极拳会馆。**太极拳旅游产品。**太极拳旅游是健康旅游，有十分广泛的市场前景。太极拳旅游既然是旅游，就要具备广义旅游的游购娱吃住行六要素，更要有太极拳旅游景点规划建设，与太极拳旅游线路设计，太极拳技能、理论、知识、故事、人物、历史的书籍制品，太极拳外语导游，太极拳饮食，太极拳体验，太极拳表演等系列产品。**太极拳文化产品。**太极拳的繁荣需要太极文化的支撑，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和胸怀。要高扬中华太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旗帜，允许和支持各个流派争鸣竞争，允许和支持国内外各种武术门类与太极拳竞争与融合，相互汲取对方的营养，永葆太极拳生机活力。要**办好论坛，办好擂台，办好网站，建立太极博物馆。**太极拳论坛要以广府命名。广府论坛要办成向发展中国家经济论坛的博

鳌论坛，发达国家的达沃斯论坛，尼山文化论坛，名扬四海，威震四方，成为太极文化的权威论坛。太极拳论坛宜建在太极拳中兴之地广府，广府地处具有八千年历史的邯郸，区位居中原腹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人杰地灵，交通便利，广府又四面环水，古城墙保留完美，广府古城曾是竇建德的夏朝都城，素有古城、水城、太极城之称，产生了文拳、哲拳、养生拳的杨武式太极拳。此地诞生了太极拳宗师杨露禅，父子两代“杨无敌”；孕育了太极拳理论集大成者武禹襄；杨、武式就诞生于此，且是“太极拳五分天下，生其四”，派生出吴、孙两大流派。**太极拳擂台**要设在广府，以广府命名——太极拳广府擂台。擂台要办成顶级太极拳武术擂台，纳入国家计划，要汇集太极拳界精英，打造拳王，要设重奖，要联合多媒体直播扩大影响。**太极拳网站。**网络是当今社会离不了的信息传播方式，太极拳要造福人类必须借助网络力量与方式。太极拳网站要以传播太极拳文化正能量为己任，以服务民众便利学习太极拳为目的，以传播、交流、教学为手段，建立开放的便捷的快速的太极拳学习网站。**太极博物馆。**要以历史厅、流派厅、人物厅、典籍厅、器物厅五板块，全面展示太极拳永恒魅力。

共襄太极拳

太极伟业是在中华民族崛起复兴时刻产生，必将搭乘时代的列车，必须形成**政府主导，高校主力，协同主体，民间助推**的共襄太极拳的局面。**政府主导。**政府要作为重大文化项目工程和重要的民生工程，制定太极拳发展规划，制定政策引导，运用行政手段推动。**高校主力。**高校具有文化创新传承之职能，高校要发挥人才聚集之优势，在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上下功夫，做贡献。**协同主体。**仅靠高校一校孤军奋战不行，各高校单兵作战也不行，必须是高校、企业、媒体联手，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合力攻关，形成协同创新主体，方可完成共襄太极拳伟业赋予的历史使命。**民间助推。**民间力量是太极拳传播的重要力量，民间传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在政策上对民间传播太极拳的贡献予以奖励。鼓励太极拳民间大师、民间团体独立走出去弘扬太极文化，传播太极拳。鼓励民间与高校联合，与企业联合走出去传播太极拳，鼓励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走出去传播太极拳。上下齐心，各方努力，太极拳社会共襄机制形成之日，便是太极拳中国梦实现之时。

太极拳发劲的动量转递解析

顾 杰，郭振兴

(邯郸学院 太极文化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摘 要：劲是人体的动量，劲法是人体动量的有机构成和有效使用。在太极推手或自由搏击时，双方的身体接触是一个动量传递过程。太极拳推手的精妙在于三个方面：如何有意识的造成我方动量；如何将作用冲量和对方动量叠加而使对方失稳；如何在反作用冲量叠加于我方动量时我方仍然保持稳定。

关键词：太极拳；太极拳与力学；动量转递

中图分类号：G85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13)04-0054-16

收稿日期：2013-08-05

作者简介：顾杰（1955—），男，江苏苏州人，邯郸学院太极文化学院客座教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高级工程师，美国奥克兰大学机械制造博士；郭振兴（1950—），男，河北邯郸人，邯郸学院太极文化学院原院长，高级政工师，华中科技大学铸造机械专业。

一、引言

本文从力学的角度探讨了太极拳中“劲”和“劲法”的定义：劲是人体的动量；劲法是人体动量的有机构成和有效使用。其实这个定义不但适用于太极拳，也适用于其他拳种。在太极推手或自由搏击时，双方的身体接触是一个动量传递过程。动量传递过程是将我方的一部分动量转换传递给对方，同时对方将一部分动量转换传递给我方。太极拳推手的精妙在于三个方面：如何有意识的造成我方动量；如何将作用冲量和对方动量叠加而使对方失稳；如何在反作用冲量叠加于我方动量时我方仍然保持稳定。本文详细论述了太极拳棚捋挤按四种主要技法的动量传递过程。

二、拳劲可用力学概念动量来定量描述

在力学中，（线）动量是指物体质量和速度的乘积（见附录二）。据有关报道，李小龙（1940—1973，截拳道创始人）能在一秒钟内发十拳。2000年金氏世界纪录（Guinness Book of Records）记载：李小龙一拳能打出400磅的力量，与拳王阿里相同，而阿里的体重是260磅，李小龙的体重只有130多磅。这是说李小龙和阿里都能营造同样的拳劲。但阿里的体重多李小龙一倍。可以推论，李小龙的拳头没有阿里的大，李小龙的后盾（支持手的身体）也没有阿里的大。这是说李小龙拳劲的物质较少。或者说李小龙劲的质量（见附录一），力学上用质量表示物质的多少）没有阿里劲的质量大。那为什么李小龙拳劲和阿里拳劲一样呢？那是因为李小龙拳劲的速度高。李小龙拳劲的高速度弥补了质量的不足之处。由此可见拳劲取决于质量和速度，两者缺一不可。我们可以把打拳的拳劲定义为质量和速度的乘积。所以，拳劲可用力学概念动量来定量描述。

三、两方对抗是动量的对抗

用动量定义拳劲既科学，也符合常识。假如有两个人一个是高个子，一个是矮个子，都学过一模一样的武术，有一模一样的拳劲。大个和小个对抗，有人赌大个赢，有人却给小个加油。大个重，要是单纯较力，大个有优势。

小个灵活，要是比快慢，小个有优势。输赢要看谁将自己的优势运用的恰到好处。从力学上分析，大个占质量的优势，小个占速度的优势。三个回合下来，可能还是平手。大个和小个的对抗，用力学术语来说是大个的动量（见附录二）和小个的动量对抗。他们打了个平手是因为他们的动量一样，大个质量大但速度慢，小个质量小但速度快。要想赢得对抗的胜利，需要既有高质量又有高速度，需要有足够大的动量。动量是质量和速度的乘积（见附录二）。作为个体是增速度，还是增体重，要因人而异，只要总动量有增加就行。前面仅是定性讨论，实际对抗要复杂的多。因为动量既有大小，还有方向，我们将在后面的文章中作相关的讨论。

四、法向力和切向力

在力学中，力是指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见附录三），也称作用力。由此可知，对抗双方接触前不会有相互的作用力存在；相互的作用力只能产生于两方接触时和接触过程中；随着双方接触的脱离，相互的作用力也随之消失。李小龙一拳能打出 400 磅的力，这个力产生于李小龙的拳和被打的物体间。李小龙打出的力当然和李小龙的发劲功能有极大关系，但是这力也和被打物体的状况有关。假如李小龙猛击空气中的气球，肯定打不出 400 磅力，恐怕都不会有 4 磅。产生 400 磅力的拳应该是打在一个固定在墙上的传感器上。李小龙发出的拳有很高的速度，拳和墙碰撞时拳的速度很快变为零，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力。由此可见，力的大小和碰撞两方的质量和运动状况有关。

在力的特点中，除了大小还有方向。力的方向通常用法向力和切向力表达。数学上，力可以用矢量来表达。李小龙的拳应该从正方打在墙上才能打出 400 磅。如果墙有点斜，这 400 磅就会有折扣。太极拳对抗中两方的关系同样受到力学定律的约束。下面讨论一下力的方向和大小与太极拳的化劲和发劲的关系。

作用力通常由法向力和切向力合成。例如，对方右掌背以捌劲向我正胸进招，我方以右掌根粘住对方，进而向右捋（见图 1）。我方要做横向的捋，但正向的捌劲不能丢。两方对捌产生一个法向力。这个法向力乘以摩擦系数就得出摩擦力。这里摩擦力沿切向，也就是捋的方向。我方用切向摩擦力将对方向横向捋。我方给对方的作用力是法向力和切向力的矢量和（平行四边形的对角边是另两边的矢量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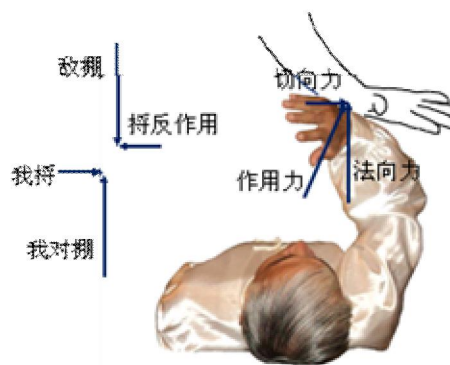


图 1 捋作用力的合成

再如：对方右掌按我正胸，我转胸以斜向粘住对方（见图 2）。法向力沿胸法线，摩擦力沿胸切线向右。我方给对方的作用力是法向力和摩擦力的矢量和，该力斜指对方。我们可以把该作用力沿对方按的方向和垂直方向分解。沿对方按方向反向的分量是我方的抗力；垂直分量就是反弹力，反弹力把对方推向右方。



图 2 反弹作用力的生成

前面两例讨论的都是水平力。一般情况下力有三个方向的分量，或者说力是一个三维矢量。例如，海底针下插力有向下的垂直分量，玉女穿梭前臂的捌有向上的垂直分量，等等。一个三维作用力仍能由一个法向力和一个切向力合成。这个三维作用力又能分解成抗力、顺力和另一个与之垂直的横力。抗力与对方的运动方向相反，是阻止对方的运动。顺力与对方的运动方向相同，是加速对方的运动。横力与对方运动方向垂直，是改变对方的运动方向。运用顺力和横力发放对方，体现了太极拳名言“四两拨千斤”的力学原理。

五、劲是人的动量

“劲”和“发劲”是太极拳常用的概念，但对其定义和解释多有不同，常与“力”和“发力”相混淆。仍分析李小龙发劲的例子，李小龙发一样的劲，对气球和墙却产生很不一样的作用力。可见李小龙发劲的劲和作用力不是一回事。从力学的角度看，“发劲”是拳者自身的过程，是自制的功夫；“发力”是拳者所发之劲作用到对方时对方产生作用力的过程，是自制加制人的功夫。这样看，“发劲”和“发力”是既有联系又区别的概念。前面给出了“力”在教科书中的定义，那么“劲”的定义是什么？目前，太极拳界对此没有统一说法，但常称棚、捋、挤、按、采、捌、肘、靠为八大劲法。我们从力学角度提出一个定义，供大家参考：劲是人的动量，劲法是人体动量的有机构成和有效使用。

质点的动量是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刚体有动量和角动量（见附录八）。角动量是转动惯量（见附录七）和角速度（见附录六）的乘积。一般物体的动量统指该物的动量和角动量的综合效果。人体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某些肢体，例如肘关节和肩关节间的大臂可近似看成一个刚体。另一些肢体，例如肘关节和腕关节间的小臂却无法近似看成一个刚体（因为小臂能旋转）。这些肢体的动量都能用微积分法算出。各肢体通过各关节连成一个整体，各关节帮助各肢体产生相对运动。将所有肢体的动量作矢量叠加，再加入关节本身的动量，就得出人的体系动量。这是理论，真要算得话，需要一台超级计算机。

两个物体碰撞产生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见附录九）。如果称作用力为作用于对方的力，则反作用力为作用于我方的力。图 3、4 示出了推手中的一个例子。我方发挤劲，对方捋劲转变成按劲。我方和对方接触时产生力：作用力指对方正胸，大小一样的反作用力指向我方正胸。两方原动量是各自的属性，中间靠力来相互作用。当一个作用力产生又作用于对方时，一个大小相等的力一定反过来作用于我方。并不因为某方功夫高强而能给另一方多一点力。关键是我们已经找到了相互间的力。下一步是把这个力分别作用于两方各自的情况来做分析，力学上叫作隔离体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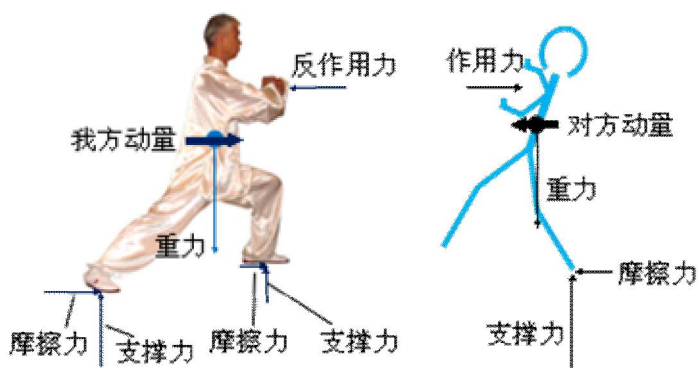


图 3 我方隔离体

图 4 对方隔离体

隔离体分析就是把一个物体与外界的因素都化成力来分析该物的运动状态。图 4 是对方隔离体示意图，作用力已经作为一个外力加入了重力、支撑力、摩擦力的行列。当然对方动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力学条件。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见附录四），所有外力使对方产生加速度，进而改变对方的动量。可以对我方作类似的分析（见图 3），所有外力，包括反作用力，重力，支撑力，摩擦力使我方产生加速度，进而改变我方的动量。

力学上两个具有动量的物体的相互作用过程称为碰撞。碰撞使两物体间产生相互作用力（见附录十）。碰撞时物体的动量产生变化，动量的变化称为冲量。如果把我方作用于对方的冲量称为作用冲量，则可把对方作用于我方的冲量称为反作用冲量。按照附录十一（碰撞时的冲量）的演算：作用冲量和反作用冲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按此推论，我方的攻势和对方接受到的作用冲量同向，我方可认为，我方将冲量传递给了对方。冲量是动量的变化，我们就把冲量传递称为动量传递。而对方的攻势和我方接受到的反作用冲量同向，对方可认为，对方将冲量传递给了我方。所以冲量是两方接触的产物，即有一部分动量可互相传递。

冲量和力不完全一样，冲量是力在一段时间里的积累效应（参见附录十一中的公式 25）。而发劲也有一个时间过程。例如在按时，是肌肉的力把掌推动一段距离，而掌需要一段时间来走过这段距离。因而用动量来描述发劲比较科学。动量是惯性的度量，动量有大小有方向。发劲就是积累动量。可以在单练时发劲，这时有动量产生，但该动量没有和别的动量接触，因而没有作用力产生。也可以在对抗时发劲，这时当然就有动量产生，而且该动量和别的动量接触而产生作用力，进而有动量的传递。这就解释了发劲和作用力不是一回事，发劲不一定产生力，

但力的产生却一定和发劲有关。动量和人体的质量成正比。同样的速度，人大质量大，动量也大，劲也大。所以人大占有一定的先天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推手比赛要分量级。太极拳讲究的发劲技术，体现在两个方面：合理使用我方动量和借用对方动量。

合理使用我方动量是指如何将我方的一部分动量传给对方；借用对方动量是说如何将传递过去的动量和对方原有动量叠加而使对方失稳。太极拳推手的重要目的是使对方失稳，而更重要的目的是保持自我稳定。推手是双方动量传递和感知的过程，是太极拳独特的训练方法，重在掌握双方动量叠加时保持己方稳定破坏对方稳定。

六、太极弹簧劲

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太极拳的精妙在于对“相互作用”的独到演绎。例如推手时的听力运用，双方在搭手之处（接触点）我方有意识的用自己的速度去应和对方的速度，而使双方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听力有两个用途：一是尽最大可能减低两方碰撞时的力；二是探知对方的动向。就其一而论，设想杨式太极拳的创始人在 18 世纪被称为“杨无敌”的杨露禅跨越时代与李小龙进行一场友谊赛。当李小龙向杨露禅发劲试图打出 400 磅的力时，杨露禅却应势而变，将两相接触时产生的力控制在听力大小范围内，使李小龙的拳如同打在棉花上，产生不出 400 磅的力。

设想对方向我正向猛攻，我方迎头反击（见图 5）。两方接触的瞬间将产生很大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如果接触后两方继续硬顶，很大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将继续存在。直到两方脱离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才会消失。如果我方手持弹簧迎头反击（见图 6），情况将大为改观。两方接触的瞬间，由于弹簧还没有被压缩，所以没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如果接触后两方继续沿原方向用劲，在弹簧被压缩过程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会逐渐变大。尽管两方继续沿原方向用劲，弹簧被压缩到极限后才开始反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逐渐变小。直到弹簧恢复原长度时将两方分开，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才会消失。弹簧的存在使原来的硬顶变成了弹性碰撞，而我方给对方的力学效应是柔中带刚。柔体现于开始时我方给对方的作用力很小，刚体现于作用力会随过程变大。弹簧反弹的过程相当于我方由防守转为进攻。

太极拳就是弹簧劲的艺术，是弹簧劲的三维艺术。太极拳的弹性功能来自于两个方面：肢体的相对运动和重心的移动。肢体的相对运动可以体现于拳架的设计中。例如，揽雀尾这式动作，作棚时要求大小臂撑圆（见图 7）。这样胸、臂、腕构成了一个人体弹簧。对方进攻时我方掌和胸间有自动的回收功能。当我方有意反攻时，我方掌和胸间可放能反弹（见图 8）。当然这回收的弹簧功能和我方掌和胸间放能反弹功能还得靠腕肘肩关节的松灵来实现。肢体的相对运动可以体现于打拳的要领中。例如垂肘的要领要求任何时候肘部都不要挺直。揽雀尾作按时要求沉肩垂肘（见图 28、29），这样肩、肘、掌构成了一个人体弹簧。甚至在我方总趋势是进攻时掌和肩之间仍有自动的回收功能。再例如松腰的要领要求腰能绕垂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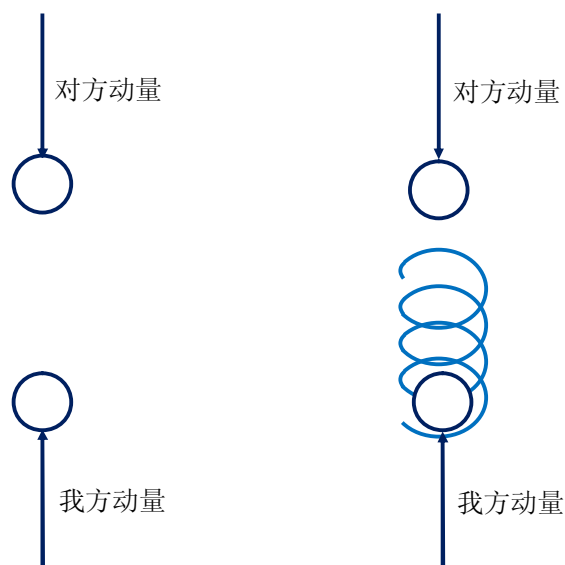


图 5 硬顶作用力

图 6 弹簧作用力

灵活转动。揽雀尾作捋时要求松腰沉胯垂肘（见图 19、20），这样胯、腰、掌构成了一个人体弹簧。甚至在我方总趋势是左旋时腰仍有自动的右旋功能。重心移动也是人体的重要的弹性功能。揽雀尾作按时要求沉胯曲膝（见图 28、29），这样胯、膝、脚构成了一个人体弹簧。这个弹簧使我方重心的位置具有弹性。甚至在我方总趋势是进攻时重心仍有自动的后撤功能。与此类似，揽雀尾作捋时要求沉胯曲膝（见图 19、20），这样胯、膝、脚构成了一个人体弹簧。这个弹簧使我方重心的位置具有弹性。甚至在我方总趋势是左拉时重心仍有自动的右回功能。

一般来说人体弹性功能由各相关关节的灵活运动，各相关韧带的宽松程度，各相关肌肉的柔韧程度合成。

由前面的讨论可知，两方接触时产生力，该力不但和两方的原动量有关，还和碰撞的性质有关。简单的碰撞产生较大的力，容易使人受伤。人体弹簧促成弹性碰撞，首先大大降低了初始的力，当力变大时又能将力逐渐分布在较大的承受区内，因而不易使人受伤，而且能将力有效地用于改变对方的位置。

太极拳的攻防艺术充满力学原理。人体弹簧首先将力限制在听力的范围内。这里已经有一部分化解对方攻势的功能，但听力的主要功能是探测对方的动向，是用皮肤感知对方力的大小和方向，由此判断对方的意图。听力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我方听对方给我方的反作用力，对方也可利用我方给对方的作用力来听我方的动向。太极拳讲究沾连粘随。在两方连接的全过程中都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存在。当两方攻防频繁时该力的量值会有变化。对方突然发劲时将使该力变大，我方应随机化解，很快将其控制在听力的大小范围内。如果我方发短劲，该力将徒然增值，将对方发出之际该力降为零。如果我方发长劲，该力将随势增值，将对方发出之际该力降为零。当然，如果对方及时应变，该力又将回到听力的范围。



图 7 棚能回缩



图 8 棚能反弹

七、太极发劲时的动量传递

有的文献把“我方力”和“对方力”作矢量叠加是不确切的（见图 10）。两方接触时并不产生大小和方向不同的我方力和对方力，因而也无法叠加。文献可能是想用“将我方力和对方力叠加于对方”的解释来说明太极拳“借力打力”的原理。但是，两方接触仅是一个接触点时只产生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作用力作用于对方（也就是图 10 中的我方力），反作用力作用于我方。力的叠加法只能用于一个物体，不能将两个作用于不同物体的力叠加。因此，图 10 中的“对方力”并不存在，“合力”也无法求得。因而“借力打力”无法用“我方力和对方力叠加”来解释。用力学原理分析太极拳“借力打力”的有效方法是隔离体图（见图 4）。图中的外力包括作用力、重力、支撑力、摩擦力等，就是没有“对方力”。因为“对方力”通常是指对方用来攻击我方的力。在对方接触我之前只有行动，没有力。因为力学上的力只产生于接触之时。所以“对方的力”其实是指“对方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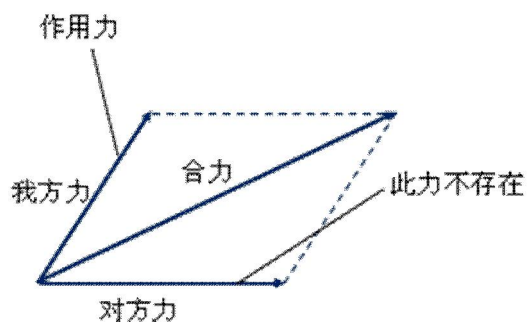


图 10 对方力不存在

太极拳发劲有短劲和长劲。以机械相模拟，可用枪弹模拟短劲（见图 11）；可用千斤顶模拟长劲（见图 12）。它们有三个共同点。一是都有放能系统：枪弹由炸药爆炸放能；千斤顶由油压系统放能。二是都有内部的相对运动：枪弹的枪身和子弹间有相对运动；千斤顶的顶杆和缸体间有相对运动。三是都有目的：枪弹是为了打靶（包括打空枪）；千斤顶是为了顶物体（包括顶空）。这样就可给发劲下个定义。发劲是人体放能使肢体产生动量而实现攻防意图。这个定义含有三个要素：放能、动量、意图。人从食物、空气等各处获取的营养在体内可合成化学能量，部分化学能量可转换成肌肉的机械能。发劲的放能主要指肌肉发放机械能。放能产生内力——人体内部的力（见图 13）。内力推动肢体产生加速度，在一段时间里积累成速度。速度和肢体质量的综合效果是人体的动量。所以在碰撞前发劲的力学效果是积累动量。意图是用这个动量去攻击或防御，用力学的术语说是去碰撞。碰撞已

经牵涉到另外一方，所以碰撞的结果有多种可能：我方稳定，对方失稳；我方失稳，对方稳定；两方都稳定；两方都失稳。在单练时也可发劲，这时物理上的对方是空气（意念上的对方是另一个人）。两个物体碰撞时动量守恒，即碰撞前两物体动量的矢量和与碰撞后两物体动量的矢量和相等。动量守恒定律可用牛顿第三定律来导出。两个物体碰撞时产生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作用于对方的作用力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形成作用冲量，作用于我方的反作用力通过同一段时间的积累形成反作用冲量。由牛顿第三定律可知，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因而作用冲量和反作用冲量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或者说两物体动量的矢量和在碰撞前后没有变化（参考附录十和附录十一）。两方的动量总和守恒，但两方各自的动量可以有变化，一方增量，另一方减同样大小的量（增减对于动量表现为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或者说动量由一方传递给另一方。这过程可称为动量传递过程。简言之，动量传递过程是指在两方接触时将我方的一部分动量转换传递给对方（反之也成立）。



图 11 爆炸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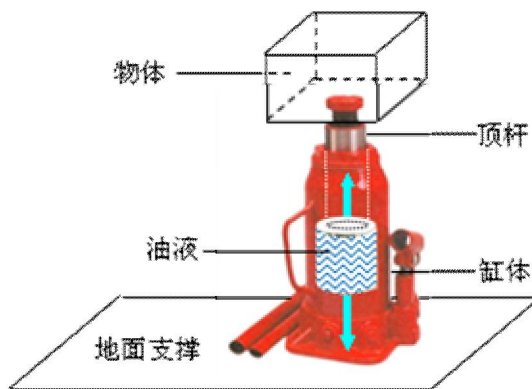


图 12 液压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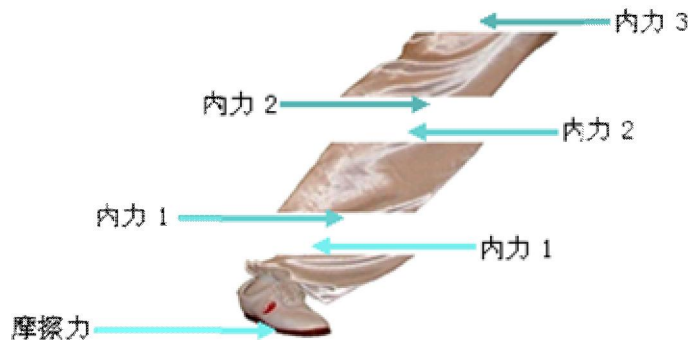


图 13 肢体隔离体

当动量传给一个物体时，该物体的速度增加。动量是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因而质量越大速度增加越小，而质量越小速度增加越大。两方接触时，反作用冲量和作用冲量大小相等，将使小个子增加较大的速度，而使大个子增加较小的速度。因而大个子的相对稳定度好一点。或者说大个子比较不容易被推倒。

太极拳推手的精妙在于三个方面：如何有意识的造成我方动量；如何将作用冲量和对方动量叠加而使对方失稳；如何在反作用冲量叠加于我方动量时我方仍然保持稳定。

八、八法本身是劲

八法是指“棚、捋、挤、按、采、捌、肘、靠”八种太极拳技法。棚为八法之首，并贯穿于其他七法之中。狭义讲，棚是一种特定的攻防技术，和其他七法并列。广义讲，棚是人体由训练产生的类似弹簧的伸缩功能和能发放或吸收能量的劲。这个劲可称为弹簧劲。从力学角度分析，弹簧劲运用于太极拳的平衡、运转、攻防，乃至每个招式之中，贯穿于整个八法，全面体现了太极拳的力学原理。

将八法定义为劲，是单指人体内力推动肢体形成的动量。单练时只有动量形成，没有加于对方的力。所以八法本身是劲。

八法在实际运用时，有和对方接触而产生的作用于对方的外力。所以有时也称八法为劲力，这是指八法的内劲和加于对方的外力。

另外，有时称八法为力，这是单指八法加于对方的外力。

九、棚捋挤按的动量传递

作用冲量是法向分量和切向分量的矢量和，与作用力同向。如图 1 所示，我捋时法向作用冲量阻止对方的攻势，切向作用冲量使对方向右移动。同样，图 2 中我转胸时的作用冲量也有法向分量和切向分量。作用冲量可沿对方按的平行方向和垂直方向分解。作用冲量沿对方按方向反向的分量阻止对方的攻势。作用冲量的垂直分量就是反弹冲量，该冲量把对方推向右方。由此可见，我方的劲是为取得一定力学效果而设计的。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例子。

在图 14、15、16 中我方以棚劲迎接对方的正面进攻。先分析一下听劲的动量传递，见图 17。对方动量正对我方，我方棚劲相迎而产生我方动量，两方接触产生作用冲量和反作用冲量。作用冲量和对方动量作用于对方，得出对方合动量。对方合动量决定了对方的运动速度和方向。反作用冲量和我方动量作用于我方，得出我方合动量。我方合动量决定了我方的运动速度和方向。合动量使某一方运动，重心在支撑面内则稳定，重心移出支撑面则失稳。熟练的太极拳师能控制作用冲量和反作用冲量的大小和方向。开始时我方的弹簧功产生听力，听力并不很大，由听力形成的作用冲量（即听劲）也不大。作用冲量和对方动量合成，但对方合动量不大，对方平衡（见图 17 右侧图）。反作用冲量和我方动量合成，我方合动量不大，更因为我方早有准备，因而我方对平衡掌握自如（见图 17 左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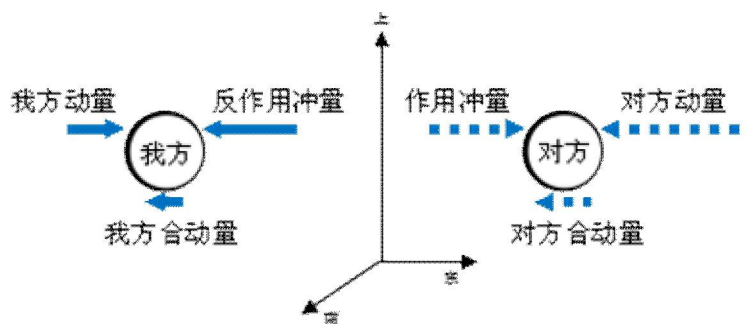


图 17 我棚听力的动量传递

当我方听出对方要向后退缩时，我方随之发劲（见图 18）。作用冲量大小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作用冲量和

对方动量顺方向合成，产生很大的合动量使对方失稳（见图 18 右侧图）。反作用冲量和我方动量逆向合成，产生不大的合动量，更因为我方早有准备，因而我方对平衡掌握自如（见图 18 左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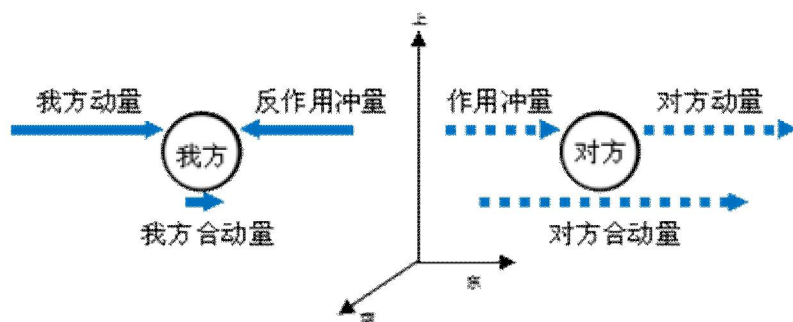


图 18 我方发棚劲时的动量传递

发劲形成动量，所以动量传递过程也可以用武术语言表述为：我方的一部分劲可以与对方的劲叠加。由此可见，“借力打力”的含义应该是“加劲借劲”。“加劲借劲”的目的是使对方失稳。因而“借力打力”的确切含义是“加劲借劲打平衡”。

在图 19、20、21 中我方以捋劲迎接对方的正面进攻。对方动量正对我方，我方向右后方发捋劲（见图 22）。接触时有顺向作用冲量和横向作用冲量。对方本来顺向进攻，顺向的稳定性比较好(步距比较大)，而横向稳定性比较差(步距比较小，侧向旋转刚度差)。横向作用冲量正好攻其薄弱环节。顺向作用冲量和对方动量顺方向相加，使对方加速落空。横向和顺向作用冲量和对方动量合成产生很大的合动量使对方失稳。顺向反作用冲量和我方方向动量逆向相加，横向反作用冲量和我横方向动量逆向相加，总的叠加产生不大的合动量，更因为我方早有准备，因而我方对平衡掌握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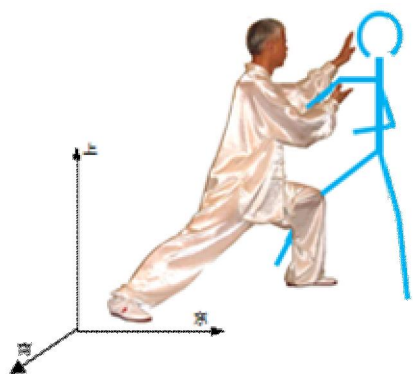


图 19 准备捋



图 20 向右后捋



图 21 捋定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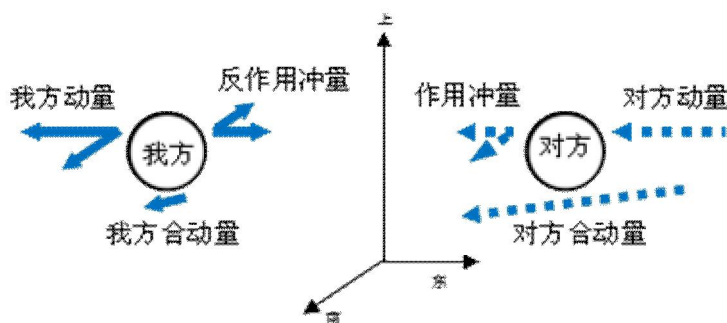


图 22 我方发捋劲时的动量传递

假设对方向横后向捋我，我方发挤劲（见图 23、24、25）。对方动量向左后，我方向前方发挤劲（见图 26）。

接触时有正向作用冲量和横向作用冲量产生。横向作用冲量和对方横向动量逆向相加，正向作用冲量和对方正向动量顺向相加，总的合成出很大的合动量，而使对方失稳。正向反作用冲量和我方正向动量逆向相加。横向反作用冲量欲使我方产生横向运动，但我方两臂合抱以增加侧向旋转刚度。对方不能有效的把我侧拉，我方反而顺势攻入对方重心。作用于我方的正向和横向动量叠加产生不大的合动量，更因为我方早有准备，因而我方对平衡掌握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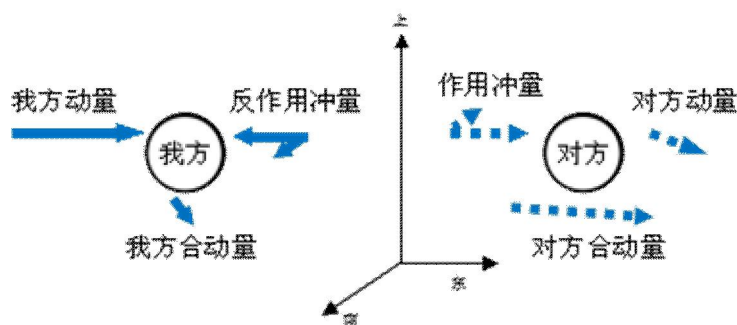


图 26 我方发挤劲时的动量传递

假设对方挤我，我方发按劲（见图 27、28、29）。对方动量正对我方，我方向前方发按劲（见图 30）。接触时，有正向作用冲量产生。正向作用冲量和对方向动量逆向合成，产生较大的合动量，而使对方失稳。有时我发按劲时对方已经退却，这时正向作用冲量和对方正向动量顺向合成，产生更大的合动量，而使对方失稳。反作用冲量和我方动量逆向合成，产生不大的合动量，更因为我方早有准备，因而我方对平衡掌握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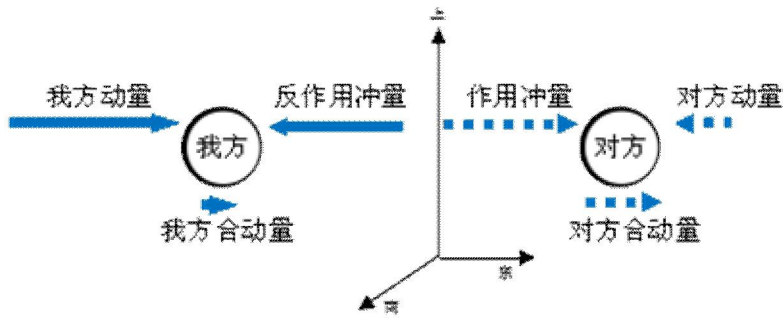


图 30 我方发按劲时的动量传递

由此可见，我方发棚劲、捋劲、挤劲、按劲时都将动量传递给对方而使其失稳；也都有动量传递给我方但我方仍能稳定。如果对采劲、捩劲、肘劲、靠劲作类似的分析可得出同样的结论。

附录一、质量

质量是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

质量和重力成正比。物体的重力由下列公式表示，

$$W = mg \quad (1)$$

其中 W 是物体的重力（用牛顿来度量）， m 是物体的质量（用千克来度量）， g 是重力加速度（单位是米/秒²）。重力俗称重量，公制用公斤来度量，市制论斤。由公式（1）可见 W 和 m 成正比，或者说物质越多，物体越重。

在物理学里，惯性是抵抗其运动状态被改变的性质。物质越多，运动状态就越难被改变。所以质量是物体惯性的量度。想象一个重物（物质多，质量大）和一个轻物（物质少，质量小）在冰上（摩擦力几乎为零）运行。使重物减速较困难，使轻物减速较容易。类似的，如果原来两个物体在冰上都不动，使重物加速较困难，使轻物加速较容易。想象该两个物体在冰上以同样的速度运行。如果没有额外外界干涉，它们将保值原速直线运动。

附录二、动量

在力学中，（线）动量是物体质量和速度的乘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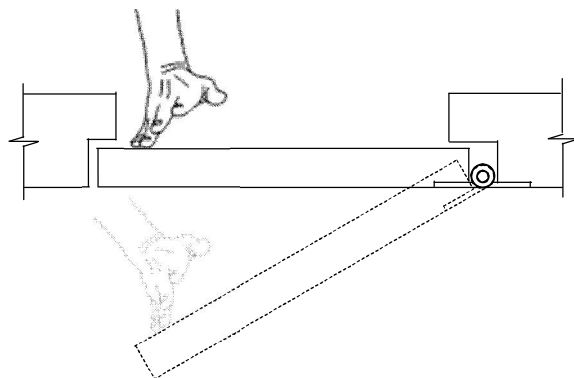
$$\vec{P} = m\vec{v} \quad (2)$$

其中 m 是质量， \vec{v} 是速度。速度有大小和方向，是个矢量。动量也是矢量，它的方向与速度的方向相同。

附录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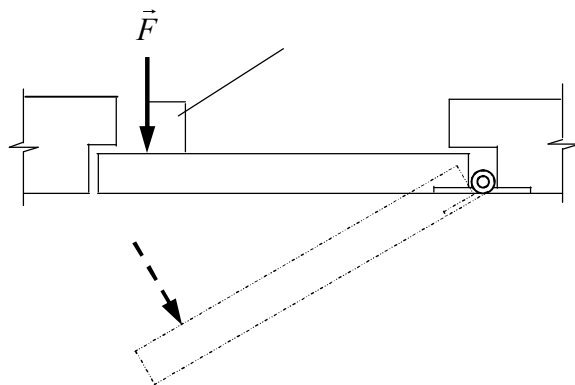
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是指一个物体的运动会因为其他物体的存在而改变。

例如，手能推动门是因为两者间有相互作用，即有力存在，见附图 1。



附图 1. 力是手和门间的相互作用

手对门的作用可用外力来表示，见附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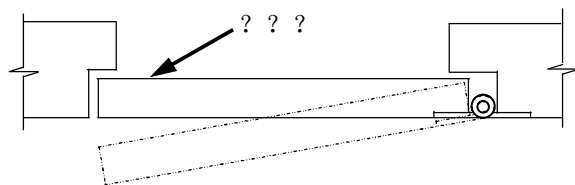
附图 2. 手对门的作用可用外力表示

力的作用效果可以在下例中定量表示。

1. 改变物体运动状态：外力使物体产生加速度。附录四中牛顿第二定律公式（4）表示力是质量和加速度的乘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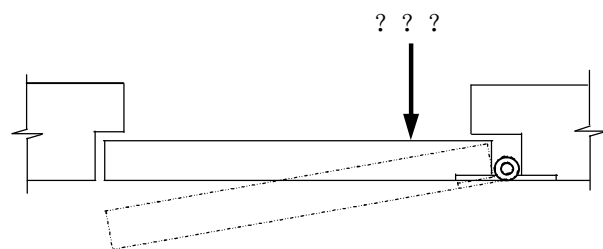
2. 使物体发生形变：外力使物体产生形变。附录五中弹簧公式（5）表示力是弹性系数和弹簧压缩量的乘积。
力有三个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

数学上称有大小和方向的量为矢量，所以力是矢量。推门要有一定的力量，才能推动门。这例子说明力的量值是一个要素。大都推门都用手在垂直方向推，见附图 2。很少有人故意在斜向推门，见附图 3，因为斜向推门的效果很差。这例子说明力的方向也是一个要素。



附图 3. 斜力作用效果差

大都推门都在铰链的远处推，见附图 2。很少有人故意在铰链的近处推，见附图 4，因为近处推门的效果很差。这例子说明力的作用点也是一个要素。



附图 4. 近铰链处的力作用效果差

附录四、 牛顿第二定律

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跟物体所受的外力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用公式表示，

$$\vec{a} = \frac{\vec{F}}{m} \quad (3)$$

更通常地表示为，

$$\vec{F} = m\vec{a} \quad (4)$$

其中矢量 \vec{F} 是外力，有大小，由方向。 m 是物体的质量。矢量 \vec{a} 是加速度，加速度的方向和外力的方向相同。

附录五、 弹簧的刚柔

在力学中弹簧的刚柔用弹性系数 k 来定量表示。力学中的胡克弹性定律指出：弹簧在发生弹性形变时，弹簧的弹力 F 和弹簧的压缩量 d 成正比即，

$$F = -kd \quad (5)$$

弹性系数大则弹簧比较刚，弹性系数小则弹簧比较柔。弹簧的势能为，

$$E_p = \frac{1}{2}kd^2 \quad (6)$$

现在来分析子弹打弹簧的例子，见附图 5。

假设子弹的速度为 v ，质量为 m 。则子弹的动能为

$$E_k = \frac{1}{2}mv^2 \quad (7)$$

当子弹的全部动能变成弹簧的势能时，弹簧压量增至极限 d_m 。根据能量守恒定理，

$$\frac{1}{2}mv^2 = \frac{1}{2}kd_m^2 \quad (8)$$

解出弹簧的极限压缩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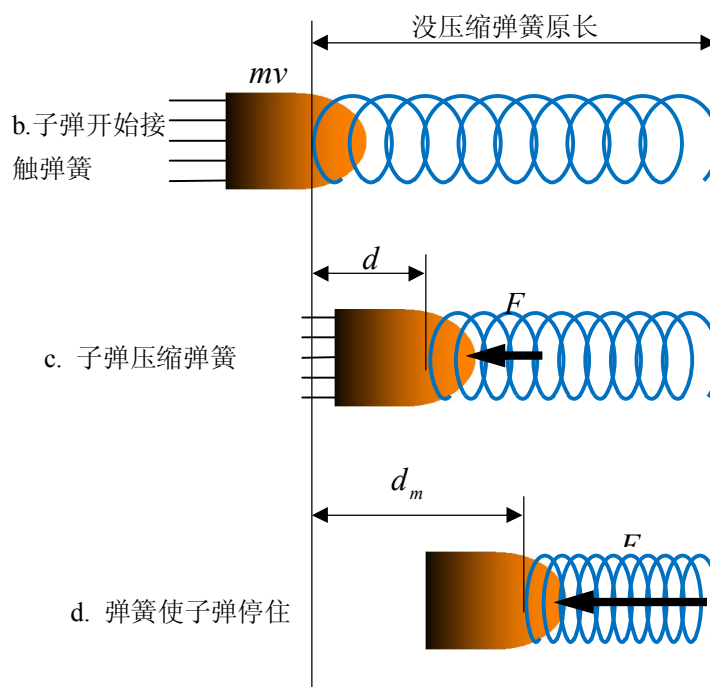
$$d_m = \sqrt{\frac{m}{k}}v \quad (9)$$

由公式 (9) 可见，子弹的质量越大，子弹的速度越高，弹簧的极限压缩量越大。弹簧越柔，弹簧的极限压缩量越大；弹簧越刚，弹簧的极限压缩量越小。

当子弹的全部动能变成弹簧的势能时，弹簧的弹力增至极限 F_m 。将公式 (9) 代入公式 (5) 中，得出弹簧的极限压缩力，

$$F_m = -kd_m = \sqrt{mk}v \quad (10)$$

由公式 (10) 可见，子弹的质量越大，子弹的速度越高，弹簧的极限压缩力越大。弹簧越柔，弹簧的极限压



附图 5. 子弹打弹簧

缩力越小；弹簧越刚，弹簧的极限压缩力越大。

附录六、角速度

角速度是角度关于时间的变化率，

$$\vec{\omega} = \frac{d\vec{\theta}}{dt} \quad (11)$$

其中矢量 $\vec{\theta}$ 是角度， d 表示变化，所以 $d\vec{\theta}$ 是角度的变化。 dt 是角度变化所用的时间。公式 (11) 中的除法表示变化率。角速度 $\vec{\omega}$ 是矢量，角速度的方向与角度变化量 $d\vec{\theta}$ 的方向相同。一般情况下，角度的单位是弧度。角速度的单位是弧度每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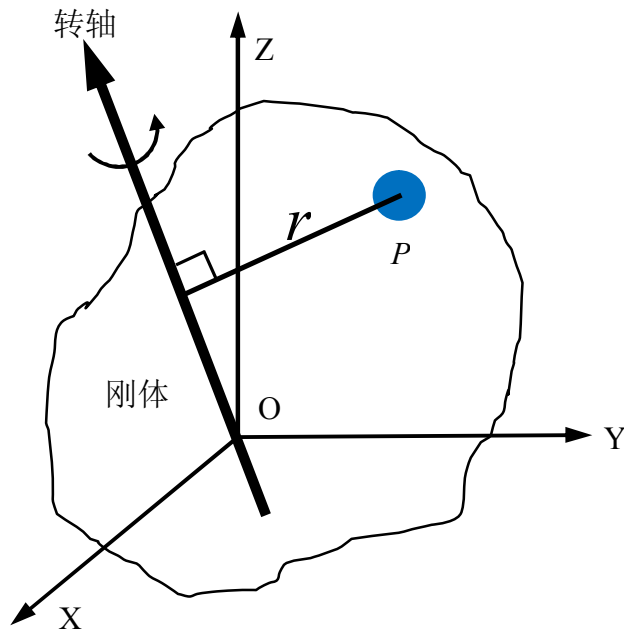
附录七、转动惯量

转动惯量是物体对于旋转运动的惯性的量度

一个质点 P 对转轴的转动惯量（见附图 6）由下列公式计算，

$$I = mr^2 \quad (12)$$

其中 m 是质点的质量， r 是质点到转轴的垂直距离， I 是质点对转轴的转动惯量。



附图 6 刚体转动惯量示意图

对于多个质点的系统，其系统转动惯量是各质点转动惯量之和，

$$I = \sum_{i=1}^n m_i r_i^2 \quad (13)$$

其中 i 是质点的编号，系统共有 n 个质点， \sum 表示求和。

附图 6 中的刚体由连续分布的相邻物质点组成，最好用积分法来计算其转动惯量，

$$I = \int_{\nu} r^2 dm \quad (14)$$

其中 dm 是微体元的质量，积分号 \int 表示对全刚体体积 ν 求积。

由公式 (12) - (14) 可见，转动惯量和质量的大小成正比，和该质量到转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或者说，转动惯量和质量的分布有关。质量分布越开，转动惯量越大。质量分布越近，转动惯量越小。

附录八、角动量

一个质点的关于原点的角动量是原点到该质点的位移矢量和该质点动量的矢量积，

$$\vec{L} = \vec{r} \times \vec{P} \quad (15)$$

其中， \vec{r} 是原点到质点的位移矢量， \vec{P} 是质点的动量，矢量 \vec{L} 是角动量。动量是，

$$\vec{P} = m\vec{v} \quad (16)$$

其中， m 是质点的质量，矢量 \vec{v} 是质点速度。将公式 (16) 代入公式 (15)，

$$\vec{L} = \vec{r} \times m\vec{v} = mr^2\vec{\omega} \quad (17)$$

其中，矢量 $\vec{\omega}$ 是质点角速度，见公式 (11)。将公式 (12) 代入公式 (17)，

$$\vec{L} = I\vec{\omega} \quad (18)$$

其中， I 是质点的转动惯量，见公式 (12)。

质点系的转动惯量由公式 (13) 给出。公式 (18) 对质点系仍成立。

刚体的转动惯量由公式 (14) 给出。公式 (18) 对刚体也成立。

总之，公式 (18) 适用于一般物体。公式 (18) 表示物体的角动量是物体转动惯量和角速度的乘积。

附录九、牛顿第三定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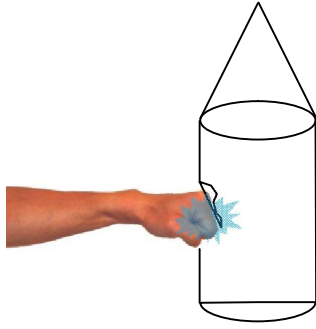
牛顿第三定律：当两个物体相互作用时，彼此施加力于对方。一个力称为作用力，则另一个力可称为反作用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作用于两个不同的物体上。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同时出现，同时消失。如果作用力为 \vec{F}_1 ，反作用力 \vec{F}_2 ，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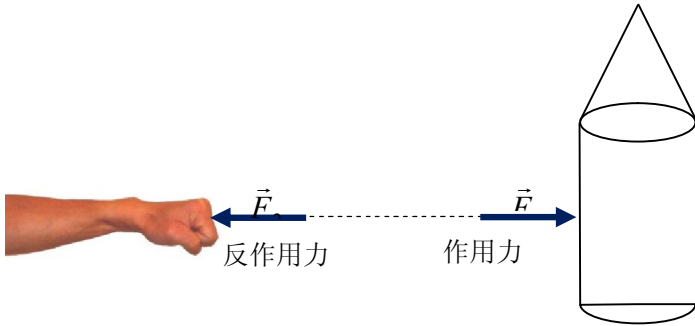
$$\vec{F}_1 = -\vec{F}_2 \quad (19)$$

其中 \vec{F}_1 和 \vec{F}_2 都是有大小有方向的矢量。等号“=”表示大小相等，负号“-”表示方向相反。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拳打沙袋，见附图 7。拳和沙袋相互作用。拳对沙袋施作用力 \vec{F}_1 ，见附图 9。沙袋对拳施反作用力 \vec{F}_2 ，见附图 8。公式 (19) 成立，两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作用力作用于沙袋，反作用力作用于拳。并不因为拳主动出击而不受力，而且拳所受的力一点不比沙袋受的少。如果拳停止打沙袋，对沙袋的作用力撤消，同时对拳的反作用力也消失。



附图7 拳和沙袋相互作用



附图8 反作用力作用于拳

附图9 作用力作用于沙袋

附录十、动量和冲击力的公式

能量引发使冲击器具有速度，因而具有动量，

$$\vec{J}_{\text{冲}} = m_{\text{综合}} \vec{v}_{\text{冲}} \quad (20)$$

其中 $m_{\text{综合}}$ 是综合质量， $\vec{v}_{\text{冲}}$ 是冲击器的速度。冲击器和对方碰撞， $\vec{v}_{\text{终}}$ 是碰撞终了冲击器的速度， Δt 是碰撞时间。冲击器的加速度为速度的变化除以碰撞时间

$$\vec{a}_{\text{冲}} = \frac{\vec{v}_{\text{冲}} - \vec{v}_{\text{终}}}{\Delta t} \quad (21)$$

将公式 (21) 代入牛顿第二定律公式 (4)，冲力为

$$\vec{F}_{\text{冲}} = m_{\text{综合}} \vec{a}_{\text{冲}} = \frac{m_{\text{综合}} (\vec{v}_{\text{冲}} - \vec{v}_{\text{终}})}{\Delta t} \quad (22)$$

可见冲击力和速度差成正比，和质量成正比，和碰撞时间成反比。因而冲击器的速度变化越大，碰撞时间越短，冲击力就越大。

碰撞终了冲击器的动量是，

$$\vec{J}_{\text{终}} = m_{\text{综合}} \vec{v}_{\text{终}} \quad (23)$$

将公式 (20) 和 (23) 代入公式 (22)，

$$\vec{F}_{\text{冲}} = \frac{\vec{J}_{\text{冲}} - \vec{J}_{\text{终}}}{\Delta t} \quad (24)$$

可见冲击力和动量差成正比，和时间成反比。因而冲击器的原动量越大，终动量越小，碰撞时间越短，冲击

力就越大。

附录十一、碰撞时的冲量

碰撞时某一物体的动量有了变化，动量的变化称为冲量。改写公式 (24)，冲量为，

$$\Delta \vec{J} = \vec{J}_{\text{冲}} - \vec{J}_{\text{终}} = \vec{F}_{\text{冲}} \Delta t \quad (25)$$

将公式(25) 运用于我方，

$$\Delta \vec{J}_{\text{反}} = \vec{J}_{\text{我冲}} - \vec{J}_{\text{我终}} = \vec{F}_{\text{反}} \Delta t \quad (26)$$

其中 $\Delta \vec{J}_{\text{反}}$ 是反作用冲量， $\vec{J}_{\text{我冲}}$ 是我方冲击器碰撞前的动量， $\vec{J}_{\text{我终}}$ 是我方冲击器碰撞后的动量， $\vec{F}_{\text{反}}$ 是反作用力。

将公式(25) 运用于对方，

$$\Delta \vec{J}_{\text{作}} = \vec{J}_{\text{对冲}} - \vec{J}_{\text{对终}} = \vec{F}_{\text{作}} \Delta t \quad (27)$$

其中 $\Delta \vec{J}_{\text{作}}$ 是作用冲量， $\vec{J}_{\text{对冲}}$ 是对方冲击器的碰撞前的动量， $\vec{J}_{\text{对终}}$ 是对方冲击器碰撞后的动量， $\vec{F}_{\text{作}}$ 是作用力。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见附录九），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等值反向。公式 (26) 和 (27) 中的作用时间 Δt 一样。将由公式 (26) 和 (27) 代入牛顿第三定律公式 (19)，我们得到

$$\Delta \vec{J}_{\text{作}} = -\Delta \vec{J}_{\text{反}} \quad (28)$$

结论是：作用冲量和反作用冲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Taijiquan Strength and the Momentum Transfer

GU Jie, GUO Zhen-xing

(Taiji cultural school, Handan College, Handan, 056005, China)

Abstract: Strength is the momentum of human body, strength technique is to construct the appreciate body momentum for usage. When two aviaries have interaction, momentum transferring happens. The three best mechanisms of Taijiquan are: how to consciously construct my momentum; how to superimpose the acting impulse to the opponent's momentum and get the opponent off balance; expecting the reaction impulse be superimposed to my momentum but still maintain balance.

Key words: Taijiquan; strength technique; Momentum Transfer

太极拳文化在建设健康社会中的价值探析

高国忠, 扈红英

(河北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18)

摘 要: 健康社会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身体健康, 远离疾病; 其次是心灵、精神健康; 再次是社会个体和群体正确、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太极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所具有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双重特性, 所承载、传递的随曲就伸、舍己从人、不丢不顶、蓄而后发等哲学理念在健康社会的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健康社会; 太极拳文化; 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 G85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70-05

收稿日期: 2013-11-10

基金项目: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课题: 中国哲学视域下太极拳文化的当代社会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 (HB13ZX003)

作者简介: 高国忠 (1961—), 男, 河北河间人,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院长,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种, 取阴阳五行之理, 结合中医经络学说和导引吐纳之术, 融攻防技击与养生健身于一体, 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与价值取向,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素有“哲拳”之称; 太极拳文化则是围绕太极拳运动形成的太极拳理、行为习惯、道德操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以物质和精神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既是观念文化又是行为文化, 其内含的身心兼修、随曲就伸、舍己从人、不丢不顶、蓄而后发等哲学理念, 可以影响和塑造习练者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 从而在健康社会的建设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 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期, 社会节奏加快, 压力增大, 各种身体、心理、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提高, 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冲击下表现为扭曲、迷茫和困惑。一个健康社会首先是人们的身体健康, 其次是心理和精神健康, 最后是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只有一个健康社会, 才是有活力的社会, 才有可能和谐、稳定的社会。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太极拳文化与健康社会的关系: (1) 太极拳文化如何强身健体; (2) 太极拳文化如何预防、治疗心理和精神疾病; (3) 太极拳文化如何塑造社会正义、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

一、太极拳文化的魅力之一: 强身健体、预防疾病

健康社会的首要前提是民众的身体健康, 目前我国民众的身体健康问题首当其冲, 各种生理疾病如高血压、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病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太极拳依托中国传统武术、中医经络学说的吐纳导引之术, 民众可以通过太极拳的习练, 增强体质, 预防、治疗各种疾病, 促进身体健康。太极拳尤其对预防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具有经济适用的独特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明显提高, 远远超过人体必需的水平, 多余的营养转化为脂肪, 堆积在体内导致肥胖, 从而诱发高血压、心脑血管和糖尿病等身体疾患。根据 2002 年调查数据, 我国 18 岁以上成年人中, 高血压患病率为 18.8%。高血压等相关疾病的患病率调查显示, 2002 年城市的标准化患病率为 19.3%, 农村的患病率为 18.6%, 从患病率的变化趋势来看, 城乡差距在缩

小。2010年，上海城区15岁以上的人群中高血压患病率为31.15%，在辽宁省患病率也达到28.7%；另据2007—2008年中国糖尿病和代谢紊乱研究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岁以上成年人中，高血压患病率高达26.6%，即高血压患病人数达2.54亿，其中20—44岁年轻人和农村人群中高血压患病率增长快。（参见图1）^[1]

高血压、糖尿病等都会产生并发症，从而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经济负担。上图显示，高血压病尽管知晓率较高，整体达到45%，但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36.2%和11.1%，相对处于较低的水平。医学控制或预防此类疾病的成本是较高的，也面临各地区医疗水平和条件的限制，因此，探索医学之外的其他途径控制此类疾病的发生非常重要。

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种，取阴阳五行之理，结合中医经络学说和导引吐纳之术，融攻防技击与养生健身于一体，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与价值取向，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素有“哲拳”之称。对普通大众而言，太极拳对于民众的吸引力首先源自于强身健体、健康长寿。习练太极拳可增强心肺功能，促进消化和吸收，锻炼全身肌肉、骨骼，强身健体。太极拳的《十三势歌诀》中有“若言体用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2]718}《陈鑫太极拳论分类语录》中有“打拳以调养血气，呼吸顺其自然”。^{[2]267}《太极拳全书》中有“欲天下豪杰延年益寿，不徒作武术之末也。”^{[2]717}作为健身运动，太极拳崇尚松静、柔和、舒缓，注意意念对动作的引导，动作与呼吸的配合。它不仅是典型的有氧运动，而且通过动作与吐纳导引的有机结合，可以使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以及运动、呼吸、循环、神经、内分泌等身体各系统机能得到充分锻炼，健身功效显著。此外，太极拳身心兼修的特性，非常适用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防止动脉硬化、冠心病、糖尿病、帕金森症等老年性疾病，而且可以保持老年人乐观向上，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健康心态。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长期习练太极拳，对于老年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保持身体平衡具有积极作用，并能够增加老年人对于神经系统的调适能力和对刺激反应的灵敏度（参看图表1和图表2）。^{[3]251-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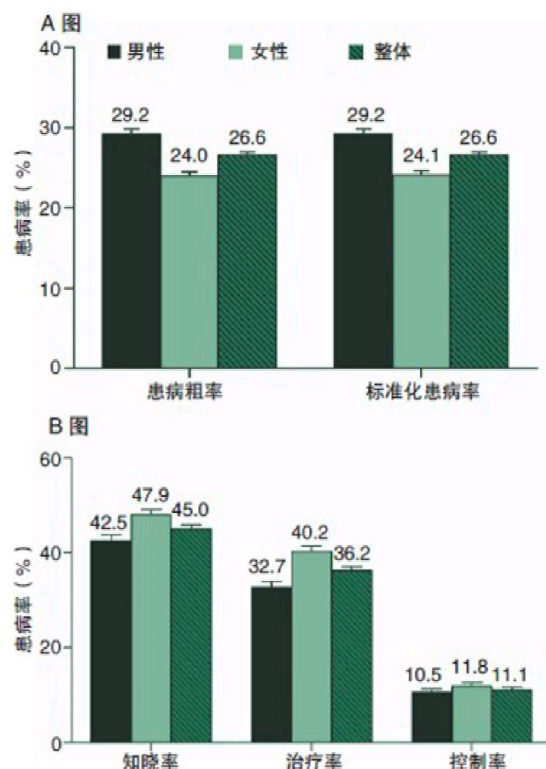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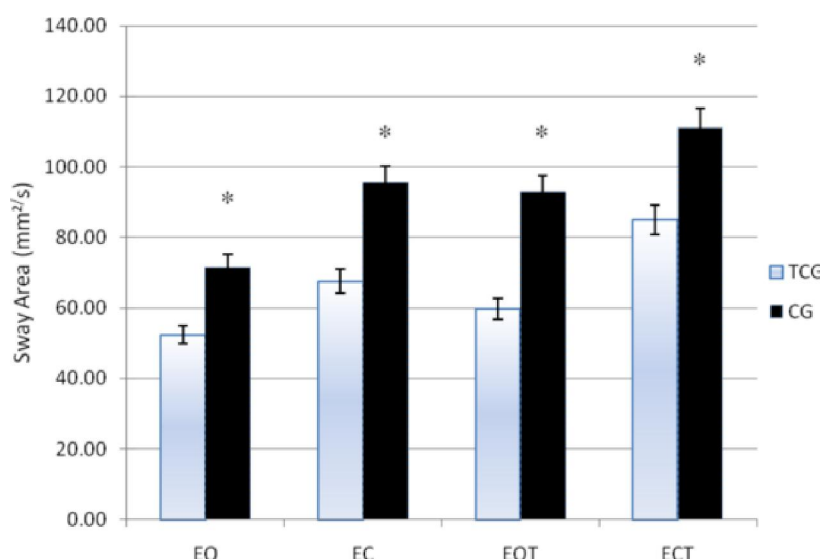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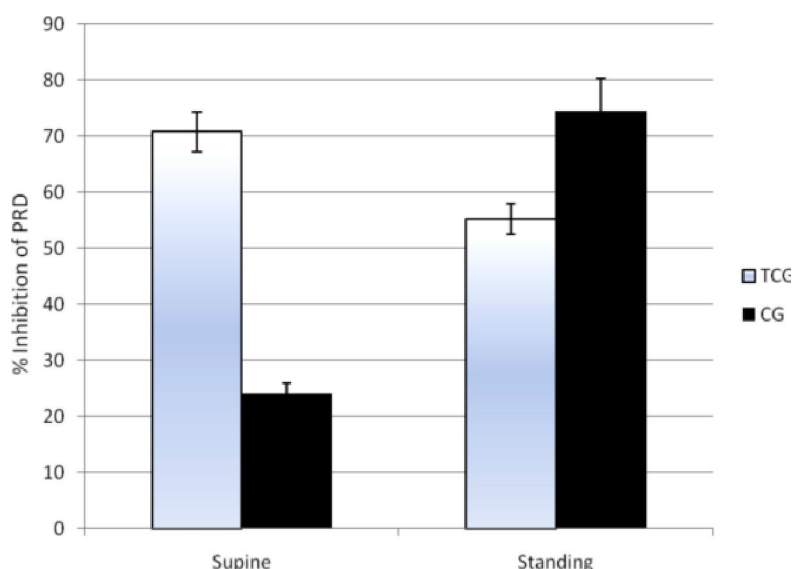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20岁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和控制情况



图表1：该研究者把TCG（长期习练太极拳组）和CG（控制组）进行对照研究，在身体动作，即睁眼或闭眼情况下，向左、右转头的动作中，太极拳组在转头的幅度、灵活性上高于控制组。



图表 2: 研究者对 TCC 个 CG 进行了对照分析, 结果表明, 比目鱼肌的配对式 H-反射测定 (PRD) 结果差异很大, TCC 组可以改变 PRD 值, 从而表明长期习练太极拳对于习练者的神经系统的反应能力具有良好的作用。

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西方社会面临的社会问题, 也是中国进入 21 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按照国际社会的通行标准, 60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 10% 或者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7%, 该社会即已步入老年社会。有统计显示, 进入 21 世纪以来, 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龄化人口已经达到 1.3 亿多, 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 2012 年底,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1.94 亿, 2013 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 2 亿大关, 达到 2.02 亿, 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4.8%,^[4] 我国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 老年病也呈现高发态势。据统计, 我国共有各类痴呆症患者总数在 800 万以上, 每年还有约 30 万老年人加入这一行列。这不仅会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而且也给许多家庭带来各种困难, 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太极拳运动在预防当前各种身体疾病、缓解老龄化社会问题, 保持民众的健康方面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 只有民众身体健康, 才有理由期待整个社会的健康。

二、太极拳文化魅力之二: 调适心理、愉悦精神

健康社会的第二方面是民众的心理和精神健康。当前,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社会矛盾加剧, 竞争压力加大, 很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① 亚健康状态虽然还不属于疾病状态, 但却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根据调查, 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患者年龄多在 15 至 49 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因为面临高考升学、商务应酬、人际交往、职位竞争等多种环境压力, 不能科学地进行自我调适和自我保护, 就容易出现精神活力下降和适应能力下降, 如果这种状态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则容易在生理和心理上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另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 2009 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 1 亿人以上, 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 5 成, 就诊率更低。有研究数据显示, 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 1600 万。^[6] 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 例如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 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 社会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 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 种种因素造成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断攀升。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目前, 精神疾病已经超过心脏病和癌症, 成为中国卫生系统最沉重的负担。中国 7% 的人口遭受精神疾病的折磨。^[7] 精神疾病导致大脑损伤、认知功能退化、社会功能下降, 无论是个体、家庭还是社会都是极大的负担。

临床研究表明, 太极拳文化对于民众心理和精神健康具有极大的预防和改善作用。

首先, 太极拳运动可以对于改善亚健康状态。太极拳注重“松”与“静”。就是全身处于放松状态, 要求每一个动作都安稳、舒展、放松、柔和、连绵不断。太极拳运动合于自然, 合于艺术, 是其他健身术无法比拟的, 对神经系统具有重要保健作用。曹一民先生等通过多年对中老年人群众的心电、脑电和血脂水平定量测试, 发现长

^① 所谓亚健康状态, 是指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将机体无器质性病变, 但是有一些功能改变的状态称为“第三状态”, 我国称为“亚健康状态”。

期练太极拳的人脑电波中 α 波(觉醒波)占明显主导地位,主峰突出, α 波频率同步化、有序化,大脑机能进入良好的觉醒状态。^{[5]375}有关研究还证明:习练太极拳可以促进脑垂体分泌一种被称为“快乐素”的激素——内啡肽,使人产生愉悦感,从而远离焦虑、抑郁、狂躁等不良情绪。

其次,太极拳文化中的“中庸”、“适欲”思想可以启迪人们不走极端,守中持正,力戒焦躁,净化心灵,防止精神疾病。人们在太极拳运动中感悟“中正”、“适欲”等思想和人生智慧,会减少自己内心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有助于预防心理和精神疾病的发生。太极拳运动讲究“身体中正”,一须“虚灵顶劲”,将百会穴轻轻向上顶起;二须“气沉丹田”,将气徐徐送到腹部肚脐下。三须“尾闾中正”。这种中正即是形体上的,也是“气”意义上的。身法中正才能求安舒,安舒才能保持平衡与稳定。在当前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如果能够保持一种“中正安舒”心态,以静制动,处变不惊,“心静用意”自然可以缓解精神的压力和疲劳,有助于心理和精神的健康。太极拳运动除了讲究身法中正之外,还贯穿着“适欲”文化思想。《陈鑫太极拳论分类语录》中写道:“心为一身之主,肾为性命之原,必清心寡欲,培其根本之地,无使伤损,根本固而后枝叶荣,万事可做,斯为至要。”^{[2]226}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精神疾病的发生,都是因为欲望太多,面对纷繁复杂的选择,人们失去了重心,导致心性、大脑的混乱,从而诱发精神疾患。如果能够在太极拳运动中感悟到“身法中正”、“适欲”的文化思想和人生智慧,自然可以很好的消除亚健康状态,预防精神疾病的发生。

三、太极拳文化魅力之三:浩然正气、积极向上

健康社会不仅仅是民众身体、心灵健康,还要求民众具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试想,一个民族、群体身体健康,心理、精神也健康,但没有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指引,误入歧途也是极有可能的。太极拳文化所体现出的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创新的源泉,是一个社会生机勃勃的动力。

太极拳运动中的搏击、技击理念有助于培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舍己从人、不丢不顶、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后发制人”是太极拳文化的主导思想,它内在地包含了一种力量、人格和文化自信,兼具战术和战略双重意义。在太极拳习练中,这种搏击、技击理念可以内化为习练者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处事的艺术。“舍己从人、不丢不顶”,从表面来看是从容面对对手的攻击,因势利导,避免正面冲突;从深层的理念来看则反应了一种对自身力量的自信,这种理念,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可以有效的化解矛盾,在解决问题时则追求“柔”、“势”和因势利导的方式,避免矛盾激化和两败俱伤,付出不必要的社会代价;“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后发制人”的理念则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并的宏伟胸怀,处事谦和又不失原则,可谓“坚韧的柔软”,最终实现“以礼服人”,不仅从物质上,更是从心理、精神上彻底让对手心悦诚服,达到文化教化的目的。

太极拳文化兼具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其观念文化可以引导民众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处事谦和,不丢不顶,另一方面,其行为文化特性可以又通过习练者的习练行为,在其理念和行为模式之间实现相互转换,越是习练太极拳,越是能够感悟到太极拳拳理中所包括的生存、管理艺术,越是能够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导引和自律规范,从而实现理念和行为、管理之间的互动。

从个体层面,太极拳的行为文化特性可以增强个体自身的自律意识和自我平衡、调节能力。习练太极拳的过程也就是一种文化熏习的过程。太极拳文化具有类宗教性质,其本身对习练者具有内在的规范要求,在习练过程中,太极拳的拳理可以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增强个体的自律意识和自我平衡、调节能力。这种能力对在当前浮躁、功利的社会中增强个体的适应社会的能力大有裨益。太极拳文化中所体现的“动静、阴阳、刚柔”等辩证思想对个体的行为方式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整体层面来看,太极拳的行为文化特性使太极拳习练群体对其它群体具有行为示范作用。目前,太极拳习练群体不仅有自己的会馆场所,公园、体育场的习练场所,还有很多大型的公益性演出,这极大地扩大了太极拳文化在民众中的影响,人们受天人合一、守中持正、崇尚和谐等太极拳文化濡养,往往会形成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从而注重身心健康,有较好的生活和行为习惯,处事谦和、儒雅自律、外柔内刚,在和谐社会方面发挥表率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太极拳文化可以引领我们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从家庭角度而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稳定,婚姻幸福,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健康和谐。当前,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社会娱乐场所增加,交通、通讯工具日趋发达,个体的交际、交往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尤其是 IT 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婚恋择偶、交友方式更加便捷。QQ、MSN、微博、微信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常规的交流、交往方式。体现在婚姻家庭上,则是网恋、网婚、闪婚、婚外恋等现象非常普遍。个体的道德观念、自我约束能力普遍下降,个人主义膨胀,自我欲望强烈,缺乏包容意识,加之经济纠纷等其他原因,离婚率居高不下。据统计,我国目前的离婚率已经超过 40%,80 后的离婚率上升速度尤为明显,“闪婚闪离”现象十分普遍。还有人追求性解放、放任自流,酗酒、吸毒,甚至越轨犯罪,这些现象都破坏了婚姻家庭的稳定,最终危害社会的健康和谐。

太极拳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准宗教性质,可以通过习练太极拳去感悟其内在的价值理念。太极拳的中正安舒、恪守中道、超然物外、浩然正气的拳理,可以涵养习练者的人格和品质,实现精神、心灵上的提升,增强习练者和受其感染者的自律意识。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太极拳习练者中,抽烟、酗酒者甚少,他们往往热心社会公益、严于律己,珍爱生命、支持环保。太极拳拳理中体现的“仁”、“德”、“中庸礼让”等儒家思想对提升个体的道德素养、培养包容的文化心态,增加自我的道德约束和责任意识以及抑制个人主义膨胀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太极拳还内在包含“和谐”的文化理念它不仅是“哲拳”,同时也是“礼拳”,太极拳有严格伦理道德规范,“内固精神,外示安逸”,拳理中的伦理思想有助于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助于健康社会的建构。

总之,太极拳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在使人强身健体的同时,儒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持中守正观念,培养健康和谐,绿色环保的意识,崇尚以柔克刚、舍己从人的处事艺术,在构建健康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杨珂君.我国 20 岁以上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26.6%[J].上海医药,2013(16).
- [2]人民体育出版社.太极拳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
- [3]Hongwei Guan, David M. Koccej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Vol. 39, No. 2.
- [4]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1.94 亿[EB/OL].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2/27/c_114823442.htm
- [5]余功保.中国当代太极拳精论集[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 [6]中国疾控中心公布数据我国精神病患超一亿[EB/OL].凤凰网, <http://finance.ifeng.com/money/roll/20100530/2251674.shtml>
- [7]至少一亿中国人患精神疾病[EB/OL].环球时报, <http://news.qq.com/a/20090429/001714.htm>

Analysis on the Social Value of Taijiquan Cultur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 Society

GAO Guo-zhong, HU Hong-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healthy society means three aspects, physical health, internal spirits health as well as the whole society's good, positive spiritual temperament. Taijiquan cultur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dual natures of ideational culture and behavior culture, which loads and conveys rich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aijiquan Culture would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 society.

Key words : health society; Taijiquan Culture; social value

四角号码检字法考略

陈振文, 何锦川

(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四角号码检字法”始于高梦旦, 成于王云五。该检字法与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并无瓜葛。从改进与推行“四角号码检字法”到出版《四角号码词典》并迅速普及全国, 无疑王云五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四角号码检字法; 高梦旦; 王云五; 张玉生

中图分类号: G254.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75-06

收稿日期: 2013-11-10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 2013 年项目“索引运动与学术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13B151)

作者简介: 陈振文(1969—), 男, 福建长乐人, 福建江夏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硕士。

1926 年, 署名王云五著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后的几十年间, 对该检字法的真正发明者是谁, 聚讼纷纭。商务老人蒋维乔(1873—1958)、庄俞(1876—1938)、章锡琛(1889—1969)、郑贞文(1891—1969), 老出版家、语言学家陈原(1918—2004), 汉字编码的先驱张玉生(1883—1939)之子张逢辰等人都先后提出不同说法^①。归纳起来, 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是王云五发明的; 第二种认为是高梦旦发明的, 由王云五加以改进; 第三种认为是张玉生发明的, 被王云五剽窃。究竟事实原委如何, 本文拟通过梳理、解读相关一次文献, 比勘对证, 窥本溯源。

一、王云五的《号码检字法》与《四角号码检字法》之演进

王云五(1888—1979), 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 原名之瑞, 号岫庐。早年上海当学徒, 不久入守真书馆学习, 1907 年任振群学社社长。1912 年 1 月在南京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秘书。后曾任《民主报》主编, 国民大学教授。1921 年经胡适推荐, 接替高梦旦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当时, 传统检字方法最流行的是《康熙字典》以形为序, 依部首建立的排检系统。但这一检字系统不断为后人所垢病。在 20 世纪初年, 伴随着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大规模译介, 外来学术思

想与治学方法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科学的读书方法、提高学习和科研效率的有效途径也备受学者们的重视。寻求简捷便易的排检法遂成为各界关注的课题。1924 年 11 月开始, 王云五热衷于检字法研究。他先是从电码本中得到以数字代替汉字的启发, 后又从笔画的计算中得到灵感, 对字的笔画进行分类。于是就有了 1925 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12 号上的《号码检字法》。

“号码检字法”的检字步骤和方法是:“(甲)把笔法分做五类(一)横和提;(二)点和捺;(三)竖和竖钩;(四)撇;(五)屈折和右钩。”“(乙)每类笔法的数目, 各用一个数字来表示, 依序排列。欲检某

^① 蒋维乔在《高公梦旦传》中曾追忆:“(高公梦旦)又因康熙字典, 检查困难, 苦思力学, 创为百部部首法, 研究十余年, 屡易其稿, 终不惬意。会王君云五, 亦抱斯志, 乃悉以其稿畀之。王因别创四角号码检字法, 在属草时与公面商或电商几无虚日。王氏之书, 今已通行全国, 而公勿与也。”见《高公梦旦传》, 东方杂志, 1936, 33(18); 庄俞在《悼梦旦高公》中也提到:“王云五氏创制四角号码检字法, 公乐为赞成, 且为之鼓吹。四角号码检字法今日已行诸全国, 公实与有力焉。”见《悼梦旦高公》, 东方杂志, 1936, 33(18); 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中更明确的说:“四角号码原系高梦旦发明, 由王云五参考陈文、何公敢等人的方案加以改进”见《漫谈商务印书馆》, 文史资料选辑, 2000, 15(43-44 辑); 郑贞文曾带有情绪的说:“到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成为一个可用的方案时, 高本着‘成功不居’的素志, 让王以个人名义发表, 王遂大肆夸张以独创的发明人自居, 当时馆内同人都在暗中窃笑。”见《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 53 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4: 155; 陈原在《陈原出版文集》中也曾用调侃的语气说:“‘姓王的所养的儿子四角检字法, 已经过继给姓高的了。’”见《陈原出版文集》,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5: 372; 张乐明补校的《先父张兆麟及其著作》中更是语出惊人:“在解放初期, 上海《晨报》曾刊登一则新闻, 称王云五的四角号码编法, 系剽窃温州张玉生的成果。”见张逢辰遗作、张乐明补校, 先父张兆麟及其著作, 温州文史资料, 1994 年第 9 辑。

字时，先计算这字所含的横笔和上提共多少，就把其数目记在第一位，次计算点和捺共多少，把其数目记在第二位，此外三类笔法，也照样计算，依序计算。如有某类笔法全缺的，就记上一个[0]数；又如某类笔法超过9数的，只记上一个9数。”^{[1]82-98}以“天”字为例：第一看横和提，“天”有两横没有提，就算号码2；第二看点和捺，“天”没有点有一捺就算号码1；第三看竖和竖钩，“天”没有竖和竖钩，所以用号码0表示；第四看撇，“天”有一撇就算号码1；第五看屈折和右钩，“天”没有屈折和右钩，所以用号码0表示。这样，“天”字的号码检字法的代码就是21010，以此类推各字的代码。

“号码检字法”的发明，在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得到不少学者认可，但该检字法自身的局限也招致热议：第一，检字时须将笔画分为五类，计算手续较繁，时间上不堪经济；第二，方法太新，和习惯相去太远；第三，采用间接的方法，不如部首之直接；第四，不能将同形体的字排在一起；第五，此法仅适用于字典，对于图书馆卡片及辞典索引等，不大适用。针对这些，王云五又作思考，也自认为计算全字笔画费时太多，遂整合高梦旦提供的研究了十几年的材料，对号码检字法进行创新和完善，后来又有了1926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3卷第3号上的《四角号码检字法》。

“四角号码检字法”的检字步骤和方法是：“每字分四角，其次序为（1）左上角；（2）右上角；（3）左下角；（4）右下角。”^{[2]95-103}再把部首分为九种，分别用数字表示为：1—横或提；2—直；3—交叉的直；4—撇；5—交叉的撇；6—点或捺；7—交叉的点或捺；8—左钩；9—右钩。以“洪”字为例：左上角是点用6表示，右上角是交叉的直用3表示，左下角是提用1表示，右下角是点用6表示。这样，“洪”字的代码就是6316。有些特殊的字，需要用四角号码检字法中的附角，此处不赘述。

“四角号码检字法”之新有两点：第一，摒弃之前“号码检字法”计算全字代之以计算四个角，此举解决了上述计算手续较繁，时间不堪经济的问题；第二，采用连笔破开，细分笔画，由原来五类增至九类，解决了笔画含糊，归属不清的问题。关于“四角”之名，据王云五自述，是将字头字脚推衍为四个角。但就高梦旦“改革部首之草案”来看，其方法但管字形，不管字义，将旧字典之二百十四部，就形式相近者并为八十部，并确定上下左右之部居，更像“四角”的来源。至于“连笔破开”，据王云五在《号码检字法》

中称是其朋友和同事提出的，但王云五嫌画数增加，计算的时间更长，又说汉字笔画对于有钩无钩一种，极不规则，因此他当初并未采用。

“号码检字法”与“四角号码检字法”都是采用以数（号码）代笔的方法来排序与分类，破陈标新，提高了检字效率。在当时，“四角号码检字法”在诸多学校、出版社等公共部门广泛应用，甚至国外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中文检索也多用此法，也为后来的字典检索、辞书检索、图书馆索书卡、户政部门的口卡等需要用及检索的学者、单位或部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四角号码检字法”影响中国文化长达半个多世纪，对科学研究、学术专研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与王云五的检字法关系之辨析

张玉生（1883—1938），幼名宝书，字兆麟，号惜阴馆主人。祖居永嘉（今温州市）。宣统元年（1909）己酉科拔贡，钦派直隶州州判，不赴，而投身教育维新事业。张氏有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和新式的数学头脑，这为他后来走上编码检字法的研究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玉生在“五四”前后积极改革汉字检字法，从笔形结构着手，提出了“四角编码”与“五笔四码”两种方法。他将《康熙字典》的214部首检字简化成96个部首，编成易于记诵的四字句，并以此为序编了一本《国音电码合刊》，约九千多字，逐字注音，作为倡议改革部首的样板方案。张玉生的后人和潘猛补通过比对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与张玉生“四角编码”方案，认为王云五只是将张氏笔形编码设置方案改动两处：“‘一’是六字头，应为（一）‘6’码，被王云五升格为‘变零头’；蛮好的‘口’形该为‘0’码，被王云五扯作‘方块六’。”“四角号码的设计原型基本上应是张玉生的‘四角编码’草案”，“如果没有张玉生的‘四角编码’草案，也就不可能有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3]55-56}言下之意，“王云五的四角号码编法，系剽窃温州张玉生的成果。”潘猛补甚至认为，王云五在《号码检字法》一文中曾提到“我对于这新检字方法的研究，……出发点就是一本电码书”^{[1]86}，其中所指的“电码书”就是张玉生编的《国音电码合刊》。^{[4]47}

到底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与“四角号码检字法”之间关系如何，需要对清末民初的“电码本”、

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与“四角号码检字法”等相关文献作一个全面梳理。

19世纪70年代，电报通信技术由西方传入中国。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威基竭(S. A. Vigner)为解决利用电报机器传递中国汉字的问题，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挑选了6800多个常用汉字，编印成《电报新书》。19世纪80年代末，清政府津沪电局总办盛宣怀与助手郑观应将《电报新书》改编为《中国电报新编》，并设计了电码代字法，由0至9数字编成四码一组，代表一个汉字。这就是汉字“电码本”编制和使用的开始。当时的电码系采用中国数目字，即阿拉伯数字排印，如，中(0022)、国(0948)、电(7193)、报(1032)、新(2450)、编(4882)。随着电报业的兴起，电码表的编制、电报收发的规则和挂号办法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明密码电报书》应运而生，1908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初版。^{[5]866}之后，又有多轮修订，到1939年5月国难后已修订至第94版。这里以1936版《明密码电报书》^[6]为例，简述电报收发方法，去电翻译“中”字时：(1)先将“中”字在《明密码电报书》内检寻，得“中”字在第28页，由《译去电量表》得28页上面所对应的密码是“00”，此密码代表千、百位数。(2)查得“中”字在直行第八格，所对应的密码是“2”，此密码代表十位数。横行在第二格，对应的密码是“2”，此数目代表个位数。(3)按千、百、十、个的顺序把前面步骤所得的密码组合，即“0022”。

1921年，国语统一会会员谭耀宗发明了《国音电报》，试用有效。《国音电报》的使用方法是，将国音字母、音标等用符号“·”或“-”按不同的排列组合而成，共可组成16个韵母符号，24个声母符号，15个记号符号，5个音标符号。^{[7]94}如，国音音标可表示为：阴平(-)、阳平(·)、上(··)、去(···)、入(····)。标点符号可以表示为：句号(·····)、分号(- - - ·)、问号(· - ·)，等等。使用时先把要拍发的电报内容用国音字母标注，再根据所标注的国音字母转换成相应的“·”和“-”组成的传送符号，然后进行拍发。

《国音电报》系中国以注音字母收发电报之始。蒋凤五在《国音电报成功记》^{[7]91-106}中提到，收发一国音电报，所需之时间仅为收发同字数之“国文电报”的三分之二，这也正是其后来能逐步推广的原因。^①《国音电报》和“国文电报”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传递“·”和“-”组合的符号，而后者是传递数字号码。

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未见存世。从张氏后

人所述，《国音电码合刊》是“以《中华国民字典》分部方法编排”，即“并《康熙字典》的部首为88部，不能归拼的统为闰部”，^{[4]54}共89部，选字9600个并逐字注音。其检字有规则可寻。但从王云五表述的拍发电报的人由文字翻译电码的程序是：“第一，须决定该字属于何部；第二，须从画数中找出该部首；第三，须从部首中所注该部的页数检得该部；第四，须从同部许多字中，按照笔画的多少，检查所欲检的字”来看，“电报号码都是武断的规定；为什么这个字要用这号码，那个字要用那号码，绝对没有一定的标准。”^{[1]86}据《明密码电报书》中《电码密钥表》知：(1)译去电与译来电各有一张电码密钥表格。(2)由《译去电量表》知页数是固定的，页数上面对应的密码是随机生成的，这就是王云五所称“没有一定的标准”的表现之一。(3)由《译来电量表》知页数是随机的，密码是固定的，这与《译去电量表》正相反。(4)该表格中的直栏和横栏所对应的格数是固定的，由第1格至第10格，但是每格所对应的密码是随机的。这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表现之二。总之，电报号码不存在客观标准，无规则可循。张氏后人所述的《国音电码合刊》应属《国音电报》，而王云五所指的“电码书”既非《国音电码合刊》，也非《国音电报》，而是指“国文电报”，亦即《中国电报新编》。^①

这里要提到的是，在王云五出版《四角号码检字法》后，张玉生认为从整体结构上取码，比截取四角编码更胜一筹，所以他仍然继续“五笔四码”方案的改进研究。所谓“五笔四码”，简单地说就是以“十”字笔顺横直画数编作两位数的“部码”，以“杏”字笔顺起末编作两位数的“组码”。部、组共为四码，定名为“十杏检字法”。它以“杏”字的笔顺“一、丨、丿、㇇、口”五笔形编码，故又名“五笔四码”。“十杏检字法”检字方法如下：(1)先计某字横画之数作为十位数，再计其直画之数作为个位数，并之得两位数码为几，即将某字归于第几部。(2)横直画数在10画以上时，减去10画以余数为画数，如“瞿”字12横6直，作2横6直，归于26部。(3)字之起笔计有“一、丨、丿、㇇”四类，分别以1、2、3、4四个号码表示，末笔有“一、丨、丿、㇇及其他”，分别以1、2、3、4、5五个号码表示。如欲检“晶”字，9横6直归于第96部，起笔为“丨”以2表示，末笔为“一”以1表示，归于第21组，部组合并为9621。“十杏检字法”是取字的横、直、起末笔，各用号码代之。而“四角号码

^① 国文电报指拍发电报时先将文字转换成数字号码，其实质是传递一组由四个阿拉伯数字构成的号码。

检字法”则取字的“四角方位上的笔画”，各用规定的号码代之。二者取法不同，是两种不同的检字方法。但其相同之处是都以号码代汉字。

张玉生一生从事检字法研究和文字信息编码工作，是系列语言工程的开拓者，值得后人所敬仰。

三、高梦旦的改革部首草案与《四角号码检字法》之关系

高梦旦（1869—1936），名凤谦，字梦旦，福建长乐县（今长乐市）人。曾任浙江大学堂教习、复旦学堂监督，190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0多年，是我国编辑现代教科书的开山鼻祖之一。高梦旦一生崇尚实务，信仰科学，任事宜专。他还积极提倡新历法，提出改革检字法、电报用码及度量衡制度等。

汉字是一个形、音、义的统一体。汉字检字法总是与汉字的形、音（韵）、义联系在一起的。从《说文解字》创立部首检字以来，一直以“字义”、“字形”、“六书”为原则来区别、类归汉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收录小篆9353个，采用“以意相属”的原则，按字源将汉字归纳为540部，形成了“始一终亥”的部首序列，为我国辞书编纂在字词检索方面，开创了一种习见常用据形分部检索的科学体例。但是，此法重在研究字的本义，而本义“多为常人所不知。古文之来源不易确定”，^{[8]545}所以，时移势易，其效用殆已不存，后人使用时为其加编了按后世检字法排列的检字表。

自《说文解字》创立部首排检以来，历代的字典在编排上对《说文解字》部首，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动，但实际影响不大。直到明神宗万历年间（1615年左右），宣城梅膺祚的《字汇》编成，才使我国字典的部首分部及其编排进入了一个由造字部首向检字部首转化的新阶段，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部首检字法的形成。^{[9]1-5}

从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开始，按汉字形体特点将部首简化为214个，部首之间的顺序以部首的笔画数来排列，同时以全字的笔画数（或者它们等效的除去部首之后的“余部”笔画数）来作同部首字在部内的二次排序。《康熙字典》采用了梅氏的这个排序与检字法，按地支将不同笔画的部首分别编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集里。由于《康熙字典》在文化领域里的权威性，使得这种检字法成为民国之前经典的部首检字法。

《康熙字典》检字法的特点在于它把形体复杂而

极不规则的大量汉字，经过分析归纳在二百多个部首里，不认识的字，可以通过字形求得字音、字义。但是，此法没能解决汉字的部首之间如何实现直观、清晰的字形排序，主要缺点有：部首在一个字中的位置不固定；某些字没有明显的部属特征，难辨别属于哪一个部首；有的字可以分属两个或更多的部，怎么把这些字归部；加上汉字在演变中部首又发生变化；同部首的要以笔画数进一步排序，而笔画数又不是直观的字形特征，非要一笔一划地数到底，才能知道究竟是多少笔画，这造成了在用部首法检字时，至少要数两次笔画数。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使得其只能是一种间接检字法，不能像英文字典那样实现“一次定位”，即看到字形之后就能依照某种特定的顺序直接检到字。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加，中西文字的差异日益显现，汉字识字难、检字难的矛盾更直接阻碍了彼此的沟通与了解。19世纪初，西方人为了便于汉字学习和汉学研究，开始尝试用西方通行的字典编纂法给汉字编次序，比如，1810年，维理雅本著《俄文字母切音法》^①、1841年，J.M.Callery著《中国音韵检字法》、“Poletti之《双部首法》（BiRadical System）；俄人瓦西里业夫之《汉俄画法字典》；Rosenberg之《五段排列字典》尤创思新颖，殊费匠心。”^{[10]26}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进入巨变时期。新文化运动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批判的同时，首当其冲提出了对汉字的改造。注音符号草案提出来了，简化汉字的呼声此起彼伏。在知识界，以蔡元培为首的现代学人着眼于普及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现代学术发展为目的，极力主张改革传统的汉字检字方法，探索新的排列汉字原则。同时，人民生活环境与条件也发生了改变，不但节奏加快，知识更新，而且出现了电话簿、商品名录、人名录等系列西式的日用品，对汉字排检也提出了“效率”的要求。特别是现代图书馆的出现，给传统排检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打破“四部法”之后，书目如何排检？单字的排检方法如何能完成对词组、单句的排检任务？逐字、逐句排检如何寻求更简捷的检字法？等等。

近现代最早对汉字旧式检字法进行现代改造的要数高梦旦。

高梦旦少时常为长兄译电，尝言：“每遇难检之字，必须辗转寻觅，如‘高’字，先检‘亠’部，再检‘口’部，再检‘冂’部，均不可得。于是翻阅全书至最后数页，始知‘高’为部首，且一部仅此一字。此外，

^① 用俄文20个子音为起音，以12个母音为止音，用起音与止音相切来拼中文字。

如：‘巨’入‘工’部，‘目’入‘己’部，‘才’入‘手’部，‘者’，均入‘老’部，与部首完全无关。当是时，即感偏旁检字之不便。及后编辑字书、词书，益知改革之不可以已。”^{[11]28}

据高梦旦的老友、同乡，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多年的郑贞文回忆：高梦旦在编撰课本的过程中，再次感到汉字笔画结构过于繁杂，不易认，不易写，很难普及，于是“编辑初小国文教科书时，即搜集简笔字、手头字、破体字、俗体字，就形式顺序意义，比较其优劣繁简异同，而定其需要之等级。”^{[12]16}进而与劳乃宣、王照等人研究汉字改革方案。往复讨论，积书盈寸。后来，在编纂《辞源》时，“嫌《康熙字典》的部首太多，而且因循《说文》，设部原则不统一，字的归部不尽合理，检查不便，所以很早就研究汉字的检字方法。”经过悉心研究，“提出单一以字形为设部原则”，^{[13]256-261}“初创为‘百部部首法’，后改为‘号码检字法’，研究多年。他曾经把这个理想告诉所中同人，引起大家的兴趣。有几位同事各就所见，提出一种方法，自行试验。”经长时间苦思冥想，始创改革部首法。约在1911年前后，高氏有“改革部首之草案”：“其方法但管字形，不管字义，将字典之二百十四部，就形式相近者并为八十部，并确定上下左右之部居。”^{[14]41}此即“四角号码检字法”之雏形。后虽经十余年研究和易稿，他仍自认不甚成熟，迟迟不欲公开发表。

王云五进商务印书馆后，也加入到这个研究队伍。高梦旦得知王氏对汉字号码检字法颇有兴趣，遂将自己多年苦心钻研的心得，悉数交王氏参考。“那时他（王云五）还坐在高梦旦的所长室内，高给他很多指示，解决了许多问题。尤其是高提出的补充了第五角，非常得力。”“后来王云五在梦旦单一以字形为原则的基础上，以字的四角形态编号，成为所谓‘四角号码检字法’”，^{[13]259}“到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成为一个可用的方案时，高本着‘成功不居’的素志，让王以个人名义发表。”^{[15]155}

这一点，在《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出版时，从王云五于书首的致谢中也得到证实：“高梦旦君为本检字法附角之发明者，且对于本检字法种种问题，为云五解决不少。本检字法能有现在之成绩，多赖高先生之力，谨此志谢！”^{[14]1}

令人感动的是，高梦旦在《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出版时所作序中，只字不提让稿之事。高梦旦的高风亮节，在商务印书馆内一直被传为美谈。王云五更是把高梦旦看作是符合现代标准的理想中人物，并

且认为“胡适之先生称他为现代圣人之一，绝对不是过分”，对高梦旦长期无私的帮助，在《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的纪念文章中，王云五饱含深情地缅怀高梦旦，充分肯定高梦旦的成就与贡献，以及对他个人的知遇之恩：“自从获交于现代圣人之一的高先生，有形无形都受了他的很大影响。假使近年我能够在任何方面有些贡献，高先生至少应居过半之功。高先生待我不仅是最知己的朋友，简直要超过同怀的兄弟。所以我正可模仿君珊小姐的话而说：‘别人家只不过死了一个好朋友，我却不但死了好朋友，而且死了最可爱的长兄。’”^{[16]10}

四、结语

综上，“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设计理念在高梦旦的“改革部首之草案”中已基本成型，而且就是在王云五定名此检字法为“四角号码检字法”之际，高氏又提出了“附角”——补充第五角，为完善该法“非常得力”。可以说，四角号码检字法，始于高梦旦，成于王云五。从改进与推行“四角号码检字法”到出版《四角号码词典》并迅速普及全国，无疑王云五是作出了重要贡献。该检字法与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并无瓜葛。

参考文献：

- [1]王云五. 号码检字法[J]. 东方杂志, 1925, 22(12).
- [2]王云五. 四角号码检字法[J]. 东方杂志, 1926, 23(3).
- [3]潘猛补. 四角号码发明者之一——张玉生[M]//瓯海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瓯海文史资料: 第5辑, 1994.
- [4]张逢辰遗作, 张乐明补校. 先父张兆麟及其著作[M]//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温州文史资料: 第9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 [5]北京图书馆. 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1911—1949下)[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 [6]商务印书馆. 明密码电报书[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7]蒋凤五. 国音电报成功记[J]. 东方杂志, 1926, 23(2).
- [8]卢震京. 图书学大辞典[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71.
- [9]骆伟里. 汉字部首检字的历史回顾[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1(1).
- [10]蒋一前. 汉字检字法沿革史略及近代七十七种新法表[J]. 图书馆学季刊, 1933, 7(4).
- [11]高梦旦. 序, 王云五, 四角号码检字法(附检字表)[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 [12]庄俞. 悼梦旦高公, 东方杂志[J]. 1936, 33(18).
- [13]郑贞文. 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3辑·文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14]郑贞文. 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53辑.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4.

[15]王云五. 自序, 四角号码检字法(附检字表)[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16]王云五. 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J]. 东方杂志, 1936, 33(18).

Inven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our-Angle Number Indexing System for Chinese Characters

CHEN Zhen-wen, HE Jin-ch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e four-angle number indexing system for Chinese characters” was introduced by Gao Mengdan and completed by Wang Yunwu. The indexing system for Chinese character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GuoYin code invented by Zhang Yusheng. Wang Yunwu undoubtedly made a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improv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four-angle number dictionary” and he helped publish the four number dictionaries and got it popular across the nation.

Key words: The four-angle number indexing system for Chinese characters; Gao Mengdan; Wang Yunwu; Zhang Yusheng

刘勰“六观”法下的“诗词赏析”题解

——以《登金陵凤凰台》为例

潘链钰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的鉴赏诗歌文章的“六观法”，能够运用到语文试题中的诗词解析这一题当中。通过学习“六观”中的位体可知道诗词的体裁，置辞可以推测诗人的情感以及“诗眼”，通变和奇正则把握作者的诗艺水准和全诗的“诗魂”所在，事义与宫商则能从音韵角度判别诗人的韵感。“六观法”能全面的推测诗人的内心世界和诗歌思想内涵，这对于解答诗词赏析这样的题目十分有益。

关键词: 六观法；诗词解析；《文心雕龙》；《登金陵凤凰台》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81-04

收稿日期: 2013-11-10

作者简介: 潘链钰（1988—），男，湖北鄂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助教。

一、刘勰“六观”法的内涵及学习的必要

（一）六观法的内涵

齐梁间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约公元 465—520 年）在《知音》中指出鉴赏作品要从六项内容入手，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1]715} 这是刘勰关于鉴赏诗歌做出的一种方法论的理论总结。刘勰所作的古代最为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堪称融体系、体例于一体的文学理论权威教科书。《文心雕龙》对于如何写文章，如何分析文章（诗词）做了十分精细的分析。首先，有必要对刘勰提出的“六观”之说的内涵做一些简单的讲析。

位体，是指作者对文学（文章）体裁的选用，体裁是作品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情有密切的关系。置辞，是指即分析作品语言的含义和特点。能否通过把握语言符号来还原为感性的形象，并在头脑中重现出来。通变，是指即运用比较的方法，看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对前人的继承和革新，是否能做到推陈继新。奇正，是指看作品的结构和风格是否多样统一。要求平中见奇，奇归于平。事义，是指即看作品题材的选

择，看作品中描绘的人、事、景、物，是否生动、典型，是否符合作品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表现主题、传达思想感情等的需要。宫商，是指即看语言的音乐性，即语言的节奏旋律是否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相符合。刘勰认为只有从内容到形式作通盘考虑，这六个方面都熨烫妥帖恰到好处，才可以使文章“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

（二）学习六观法解题的必要

刘勰这种鉴赏诗歌的方法完全可以运用于高考试题中的“诗词赏析”这一题当中。根据高考考纲要求，“诗词赏析”作为一项考察学生对于古诗词理解和阐释的能力，是最能检验学生对古代诗歌与文化掌握的形式之一。一般而言，诗词赏析的分数值虽然只占到 10 分左右，但是经过历年对高考试题得分率的分析，以及结合笔者在平时对学生的考核情况而言，这道题目的得分率并不是很高。湖北省 2010 年这道题的平均得分率是 6 分，2011 年是 7 分，2012 年是 6 分，2013 年是 6 分。统观学生的得分率可以看出，这道题对于学生而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属于在课本之外综合考察学生对诗词的鉴赏能力。最关键的是题目所给出的诗词绝大多数并不是高中课本上的诗词，而是课外的、甚至学生从未听过读过的，这样一来，教师

在课堂上所讲授的诗词只能是就一首论一首，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更不可能将所有的诗词统统讲授一遍，这在时间上也是不允许的。古人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方法的掌握对于一个要身经百战的高考学生而言显得尤为重要，以不变应万变的学习宗旨始终是每一个学生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

其实这道题最关键的在于如何把握题目的意思，进而根据自己所学习到的诗词知识进行语言的总结。很多学生表示对这道题没有固定的答题模板而烦恼。因此，我们认为，通过对刘勰“六观”的鉴赏方法的剖析，教会学生怎样答题，怎样组织语言就很有必要。

二、以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为例，分析如何使用“六观法”进行鉴赏

（一）全诗解析

从对历年的高考试题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诗词鉴赏这道题的题目设置而言，一般选取的古诗不会是十分生僻的作家，也不会是水平十分差劲的诗作。一般高考出题组选择的古诗词带有三个特点：一，偏爱在书本之外，却在大众熟悉之内的诗词。比如王维的《过香积寺》。二，偏爱选择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精华的诗人的诗作。比如杜甫《秋兴八首》。三，偏爱诗词艺术圆融，带有强烈个人感情的诗歌。比如孟浩然的《过洞庭湖赠张丞相》。这些诗作，对于学生而言，并非很难，但是又能在很多方面设置出题目，以便考察学生对古代诗词的熟知程度和分析诗词、遣词调句的能力。下面，我们选取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作为例子来使用刘勰“六观法”分析。

凤凰台上凤凰游，风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孟子曾有“知人论世”的观点，也就是在分析诗歌作品时，要知道作者和作者所处的时代，甚至诗作的背景。教师在讲授诗歌之前，也确实需要将诗歌的写作背景大致讲述，因为这对于学生理解诗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教师深情并茂、引人入胜，那么学生一定会对这首诗歌记忆深刻。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这首诗大约作于天宝六年或八年李白寓居金陵时。天宝年间，李白因高力士、杨贵妃进谗言而被排挤出京（长安），开始了以金陵为中心的漫游生活。天宝六年回金陵登临凤凰台时，触景生情，感时伤事，

写下了这首抒发个人感慨的名篇。凤凰台位于旧金陵城的西南。《江南通志》上有载：“凤凰台在江宁府城内之西南隅，犹有陂陀，尚可登览。宋元嘉十六年，有三鸟翔集山间，文彩五色，状如孔雀，音声谐和，众鸟群附，时人谓之凤凰。起台于山，谓之凤凰山，里曰凤凰里。”^{[2]355}凤凰自古就是吉祥之征兆，而此刻李白笔下的凤凰，却多了几分伤感。在知道写作背景后，还必须阐明的文学常识就是：首、颔、颈、尾四联的位置。一般而言，律诗八句四行，每行分别名曰“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这首诗，首联二句，虽连用三个“凤”字，但毫无重复之感，更无刻板生硬之病，自然而然，明快畅顺，跟崔颢的《黄鹤楼送别》之首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有异曲同工之妙。颔联“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极具“凤去台空”的悲凉意蕴。无论身处高位的吴帝还是潇洒风流之名士，都不能敌时间和岁月的清洗而变为尘土。颈联“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看似写景，却含无尽之情，王夫之所谓：情景相生，自是李白所携带的文化基因。从这样远阔的景致写去，仿佛是诗人将自己的内心散开而无所拘束。然而人世上始终不能摆脱的是作者的内心，即使苍茫如天地沙鸥，亦或巍峨之高山，都不能抚平诗人心中的各色清愁。而此愁最后的落脚，正是千古帝都——长安。长安所蕴含的政治意味不言而喻。正是作者心中的长安情结，让他的愁绪一丝丝的增长，犹如长江之水奔流不止。那种“不能见”、“不得见”，其实是人生的无奈与郁恨交织的苦果。尾联“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即是说此苦楚。

（二）“六观”视角下的诗歌解读

以上大致论述了这首诗八句的内涵。那么，从刘勰的“六观”而言，鉴赏这首诗歌又是怎样的呢？下面具体分析。刘勰所谓的“六观”，第一观便是“位体”。“位体”便是这首诗的体裁。这首《登金陵凤凰台》的位体很明显是律诗，具体而言就是七言律诗。律诗跟绝句比，最大的特色就是包容性强，掰肌分理，能够将作者所要论述的东西分层次讲清楚，一般结尾则抒情，含韵不断则上佳。绝句虽然短小，但要求意境深远，含无穷之貌才是最佳，比如柳宗元的《江雪》。此不赘述。李白最擅长的是歌行体，因为歌行体的自由能够将他肚子里的才华无限自由地倾倒出来。律诗则要求诗人心术工整，于有限的框架内发挥才思，较而言之显得拘束。但为什么李白这里选择的是要求工整、限制颇多的律诗呢？因为诗人感情的缘故。悲体

之诗，最适合用限制极多的律诗，尤其是七言律诗。因为这种“位体”犹如一个压榨机，能够将诗人本来要喷薄欲出的感情忽然压制，在一喷一压之间，那种愁苦的感觉则跃然纸上，就像这首《登金陵凤凰台》，李白没有直接书写他的那种愁死苦闷，而是借景抒情、借古怀今，直到诗的最后，诗人才用一个愁字，将自己内心的不得已倾斜出来。全诗尾部用一个愁字，能将悲凉的气氛全部凸显出来。而在这个方面，很多试题就会问“全诗的诗眼在哪里？”那么答案很明显，就是这一个“愁”字。如果学生大致知道，律诗的特点，再加上对这首诗的分析的话，这样关于“找诗眼”的题目不会很难，这是关于“位体”的分析。

关于置辞。置辞就是作者的用辞，写景写人等等。这首《登金陵凤凰台》的前三联全部是写景。而最重要的是，李白诗中全无死景，都是含情之景。不论是早已不见的凤凰、凋零的花草、久逝的衣冠还是天与水，李白（包括其他诗人）都会赋予他们一些别样的情感。这首诗的置辞大致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凤凰、江水、吴宫花草、晋代衣冠、青天、白鹭洲。沿着这样的写景顺序，李白的置辞别有特色，那就是由近及远，先是眼前的凤凰台，然后是历史远去的花草宫殿，最后是极目所见的青天白鹭。这是一种将自己感情慢慢延伸出来的写法。安置这些辞句，明显的用意正是“伤感”。在最后一联还有三个关键的置辞：浮云、蔽日、长安。浮云暗指奸佞之臣，蔽日则暗指圣上被小人蒙蔽，长安则是政治的意象，是皇权的意象。李白在“凤凰台”伤感“长安”，结合上文对凤凰台及吴宫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李白正在用一种怀古及今的手法，表达他对“现实政治的无奈”。那么，位体里面我们看到了全诗的诗眼，是一个“愁”，置辞中我们能看到的则是全诗的“诗魂”——“伤感”与“无奈”。这样一来，很多题目会问“全诗表达的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问题只要抓住“对现实的伤感”、“对政治的无奈”、“怀古伤今”等等这些关键句子，则可以拿到分数。

关于通变与奇正。通变与奇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刘勰说通变，主要是就诗艺之革新与否而言，而奇正则是风格是否达标而言。李白之诗向来被认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灿烂的明珠之一，与杜甫合称“双壁”。李白之诗艺革新最重要的是他能将他人难写之景写出，他人不可道出之句道出。首联的三个“凤凰”原本是作诗之大忌，但在李白手里成了名句。因为从音韵上讲，“游”和“流”都是朗朗上口之音，而“风之游”与“江之流”皆是漂浮不定之貌，意象相

通，因此很容易便成为人民心中意象画面的联合体。这是李白高妙之处。颈联“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一向为人所称道，乃全诗名句。这句运用的想象与夸张，一直是李白最喜欢和最擅长的写诗风格。而正因为李白将一个愁字写在一种洒脱的境界，将内心的伤感付诸天地，这是他人难以做到的，这算是李白特有的通变和奇正。刘勰说“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要分析一首诗是否有诗艺的变革或者风格的演化，则需要对历代诗歌作很多精细的研究，要看很多，要读很多，这是一种基本功的联系。那么通过分析，假设有题目问道“颈联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表达了作者怎么样的感情”，那么只要考生答出夸张、想象、双关，还有洒脱之情，豪伟之貌等等，都是可以拿到分数的。这便是分析诗歌通变与奇正的好处。

关于事义和宫商。事义其实大部分跟用典能有关联。事义就是作品题材的选择以及人、事、景、物，是否生动、典型，是否符合作品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表现主题、传达思想感情等的需要。李白的诗，论及用典则不胜枚举。在这首《登金陵凤凰台》里，用典的集中在颔联。吴宫花草之意象和晋代衣冠之意象，在前文已经分析，主要是作者面对历史上曾经的繁华而今的落寞所产生的无限悲凉之情。这是答“此诗用典及其所含的思想感情”这样题目的关键。至于宫商，一般而言，考题很少涉及到宫商之类的考察，是因为古代音乐有些失传，而有些则太过繁琐。高考很少有涉及到宫商音乐的考察，最多涉及音韵学方面的考察，比如悲凉诗用坎坷韵等等，首联三个“凤凰”则是回环之韵，表示起句则愁思环绕等等。这些不在考察重点范围之内。故不赘述。

结语

刘勰的《文心雕龙》在20世纪至今一直是显学，又被称为“龙学”。他是中国古代关于如何写作、如何鉴赏的智慧的结晶，被历代文人所重视和阐发。然而作为语文考试中的难点，诗词鉴赏却是考察学生古代文化与文学的关键。既然刘勰所阐发的六观之法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鉴赏诗歌，那么这样的方法我们应该好好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并让他被更多的人熟知和运用，相信这会给语文教学带来不一样的气象。

参考文献：

- [1]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2]四库官臣. 江南通志[M]. 京华书局. 影印乾隆元年刊本.

The Analyse on Poetry under the View of Liu-xie's *Liuguan Method*

——take fenghuangtai in jinling as an example

PAN Lian-y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Liu-xie "wen xin diao long" referred to in the concept of "six" appreciating poetry article, can use the poetry in the language try resolving this problem. By studying the concept of "six" in a body know poetry genre, buy can speculate that the poet's emotion and "poem", tong bian and no level and grasp the author's writing the poem "resolutely encourage", righteousness and palace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yme in judging the rhyme of the poet. Six view method can comprehensively speculate that the inner world of the poet and poetry thought connotation, this is very beneficial for answer poetry appreciation such topics.

Key words: liuguan method; analysis poetry; wen xin diao long; deng jin ling feng huang tai

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来我校辅导《荀子》读书研讨班

10月29日晚, 我校继续举办《荀子》读书研讨班活动。活动由学报编辑部主任、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康香阁编审主持, 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导师梁涛教授辅导研读《荀子·性恶》篇, 教务处、科研处、学报编辑部、中文系、历史系、法政系等系部的研讨班学员参加了本次读书研讨活动。梁涛教授针对学员在研读《荀子·性恶》篇中对字词含义和人性论义理的不同理解进行了点评, 与学员展开了充分的研讨。关于荀子的人性论问题, 梁教授提出, 我们理解《性恶》篇最大的误区是: 忽略了荀子人性论思想的真正内涵, 而过度关注篇题“性恶”。以“性恶”作为篇名有其偶然性, 以此来理解全部人性论思想是不正确的。梁教授继而指出荀子“心性论”问题, 其实与孟子心性论是不同的。并且归纳孟子心性论思想是“即心言性”, 荀子则是“以心治性”。读书会在激烈的思想争辩和问难中结束, 参与教师意犹未尽, 梁教授布置了下次读书研讨的篇题《非相》篇。(邯郸学院学报编辑部)

郁达夫 30 年代散文的诗化艺术

许羽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 通过对郁达夫 30 年代散文文本进行详细解读, 尝试从诗化的语言、意象和情景和文化心理四个维度着手, 层层深入分析郁达夫 30 年代散文所体现的优柔怅惘, 情韵浓郁的诗化艺术特色。

关键词: 郁达夫; 散文; 诗化艺术; 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 I20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85-03

收稿日期: 2013-09-05

作者简介: 许羽 (1988—), 女, 云南普洱人,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方向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郁达夫先生一生著作颇丰, 他的笔触涉及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不同领域, 各成一家, 皆独具特色。郁达夫自 20 年代初入创造社以来笔耕不辍, 其散文创作方面成就后得到很高评价, 被认为“散文的艺术成就, 实不在他的小说之下”^{[1]98}。在他写于 30 年代的散文作品中, 若干篇幅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优柔怅惘, 情韵浓郁的淡淡情怀, 完好地体现了创造社浪漫主义抒情派的主张, 后有人评:“达夫的散文, 如行云流水, 时映霞蔚。他和古代写景抒情之作不相蹈袭, 而又得其神髓, 写到山水, 尤其他故乡富阳一带风光, 不愧是一位大画师。他把诗人的灵感赋予了每一朵浪花、每一片绿叶、每一块巉岩、每一株小草, 让大自然的一切具有性格和情味。”^{[2]序}可见, 相比早期郁达夫的散文为小说之名所掩, 30 年代他的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遂引起广泛关注。

二、语言的诗化

郁达夫不仅是个浪漫的才子而且是位多情诗人, 他的旧体诗词创作成就很高, 只旧诗今存就有 600 多首, 诗的创作陪伴了他飘零的一生。他的诗词造诣得以成就郁达夫行文的独特浓厚的诗人气质, 诗意的语言和字句, 往往化为一缕缕柔缓的清流, 流淌在他的散文作品中。

诗歌是一门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自古以来, 诗词歌赋之美体现在文辞精炼, 韵味悠长的语言特色。郁达夫无意将他的诗人气质融入了他的散文创作之中, 兼容并蓄铸就了作品中字

句间饱含诗化的美感。在郁达夫的散文中, 一则多爱直接书写诗词句式、惯用典故, 例如《志摩在回忆里》(1931 年) 一文的附记中缀:“三卷新诗, 廿年旧友, 与君同是天涯, 只为佳人难再得。一声河满, 九点齐烟, 化鹤重归华表, 应愁高处不胜寒。”借以表达对情同手足的旧友的深沉哀悼。“三卷”对“一声”, “廿年”对“九点”, 都是宽对; “佳人难再得”取自《汉书·外戚传》中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一诗是书写深得武帝宠爱的后妃李夫人的典故, 喻示而“高处不胜寒”则来自苏轼《水调歌头》一词, 比喻人的地位或者能力太高而受到重视, 往往会被别人疏远, 也有孤独寂寞的之意, 借用前一句表达知己难得的感慨, 后一句表达失去一个知己的沉痛和惆怅, 两处用典都恰如其分, 文辞流畅, 尽显哀思。短短两行字, 郁达夫便在其中赋予人人熟知的典故以新的含义, 寄语表达对旧友的哀悼和人生难得几知己的无尽怅惘。二是散文语言多具有诗化特点。譬如在他的《钓台的春昼》(1932 年) 一文中写着:“空旷的天空里, 流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 云层缺处, 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 和一点两点的星, 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却仍是欲藏还露, 将见仍无的那半规月影。“空旷”、“流涨”、“灰白”取辽阔畅远的冷色调意境, “半角的天”、“一点两点的星”、“欲藏还露, 将见仍无的半规月影”这些词中又略带灵动俏皮之意, 寥寥几笔将一幅“天光云影共徘徊”的风景图画勾勒得极美。三是用词凝练, 尽得诗词之传承。郁达夫的散文中少有长句, 多用短句, 精简干练。如《杭州小历纪程》(1933 年):“午后五时, 赶到三廊庙江边, 正夕阳暖, 萧条垂暮的时候。”; 或“倚窗呆望, 拥鼻微吟”; 或“有涌雪泉, 泉水溢出, 激石成林, 状似涌雪”,

虽言简意赅却字字珠玑，诗倦意浓。可见，郁达夫的散文语言不仅从遣词造句的语言技巧上将景物、事物的神韵和美感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将个人的思绪怅惘寄托其中，尽情宣泄，语言的诗化特色更使其作品独具风采韵味。

三、诗化的意象和情景

“意象”是诗歌中的重要概念。在中国古代，“意”与“象”最初是分开的，刘勰将两者结合起来，并认为意象是诗歌的最高目的，是诗歌成败的关键。^[3]意象不仅是诗歌的专有，在散文中运用意象也使得郁达夫的散文更富有诗意之美。郁达夫30年代期间的散文以山水游记，闲话漫谈居多，清秀隽永的笔调颇具晚明小品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气质。

《浙东景物纪略》（1933年）中，作者首先分别以“方岩纪静”、“烂柯纪梦”、“仙霞纪险”、“冰川纪秀”作不同章节之名，既简约明晰又蕴含诗情画意的格调。《方岩纪静》一章中写到丽泽祠时：“风雨莫及，冬暖夏凉，而红尘不到”用“红尘”比喻凡俗尘世，外界的纷扰，“红尘不到”更突显建筑物建在山峰石壁之间，陡险奇俏，远离尘世，仿若置身另一方与世隔绝的脱俗空间，其仙其境、无不令人神往。更有“仰视天小，飞鸟不渡，对视五峰，青紫无言，向东展望，略见白云远树，浮漾在楔形阔处的空中。”其中，“飞鸟”、“白云”、“五峰”、“远树”自然都是自然意象，前二者是动态的，后二者是静态的，两组意象遥相呼应，同时显现画面中这一小小世界是“浮漾”在空旷广阔的天地之中。“青紫”、“白”是色彩意象，皆是偏冷色调，更体现意境的幽静清新。而“青紫无言”一句实为妙绝，本可“言”而“无言”，欲语还休的势态将整个画面顿时渲染到沉默寂静的极致。张梦阳评书郁达夫的散文时说：“郁达夫的散文，尤其是抒情或写景的散文，特别讲究情韵或情调于音韵之外，文字之间暗暗透露着一种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情韵美。”^[4]

《烂柯纪梦》中有“一湾碧绿碧绿的晴天，云烟缥缈，山意悠闲”，用“一湾”比喻山间天色，带着如水般婉约诗意的清韵，晴天之下一副云烟缠绵山峦静谧的图画勾人心魂，读罢不禁要与作者一并悠然其中，享受天地之寂静安宁，更是沉浸在一夕恍如隔世的美梦之中。《仙霞纪险》中写到“鸟飞不到的绝壁千寻”“诸峰青影”、“蛇腹似的”石级鸟道，突显的是如同柳宗元笔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情景，书写人烟罕至，万物静谧的幽深景观。“绝壁”、“青影”、“蛇腹”，既是自然物意象又不仅是单一的景物描写，一连几个冷色调意象的叠加，营造出优柔怅惘的气氛，蕴含无限遐想的空间。另一章节《冰川纪秀》更写到：“有山有水，还有水车，磨房，渔梁，石坎，长闸，长堤，凡中国画或水彩画里所用的着的各种点景的品物，都已经齐备了”，为构筑“人境”^[5]^[45]水墨画般的诗意显露买下了伏笔。流连于树林“疏散的逸韵”或是水上微波的“红影”，

乍看突起的山峰如“倒插的笔尖”，一路景色隽秀，如诗如画，最终以戴叔伦的一句“冰为溪水玉为山！”结束，便觉得“这一次旅行的煞尾，倒很有点儿像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小说”，作者的心境从一开始是诗意的，落于笔尖便是诗意的意象精彩纷呈，散落在散文字句之间，烘托出郁达夫的诗化散文情韵浓郁的意境。

散文研究者喻大翔教授在《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一书中将郁达夫提为学者散文家，且书中探讨论及郁达夫使用的散文意象。喻大翔先生在提到，所谓学者散文与非学者散文在选取意象时的不同在于：学者散文家“即使采用非学者散文较多选取的自然和现实生活意象，在对‘象’的描述和对‘意’的挖掘上，也必定不会停止在观察和自身体验层面，喜欢向横的剖面尤其是纵的深处开掘，以尽量使意、象饱满，使五官的感觉根植在浓厚的学术理性之中。”^[5]^[194-233]这一点在郁达夫的散文中得到良好印证。郁达夫诗化的散文意象往往在作者笔下成为一种借以抒情的客体，经过对语言文字进行不断糅合、改造、通达，显现出文句婉约幽逸，清静悠远的色彩。往往是不经意间淡然的笔调，兼蓄并用自然意象、色彩意象、具体意象和抽象意象，共同渲染出全文的意境，营造了一方寂静的、遥远的空间，具有了辽阔而深远的意味。诗人对意象的选取，兼具理性的思索，对现实社会的抨击和其中对慰藉灵魂的殿堂的寻找，则不仅是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思考的影响，也出自诗人本身感伤忧郁的气质和对个体生命关怀，内心关照的深层体悟。诗化的语言和意象，成就了传统诗词韵味与现代文法表达相融的典范，字句间散发着知识沉淀的馨香，展现出一番独特的艺术风采和魅力，令人沉醉其中。

四、散文文化心理

散文的文化心理关于：“散文文本的心指的潜在层部分正是体现着那些或明或暗、或显或隐、或进或退的文化心理内容。”^[5]^[58]其作用于“经由作家全部写作（不只是散文创作）的系统话语，延伸到作家散文之外的一切广义文本和巨大无垠的无意识心理时空之中。”^[5]^[58]郁达夫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注重主观的内心感受，通过写作表达自我的真挚情感。他的散文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积极实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同时，他的生平也与时事政局密切相关，郁达夫不仅是位文坛杰出的作家、诗人，同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革命烈士。自1930年3月郁达夫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至4月他移居杭州，此间写下了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词，成为他在30年代散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时任福建省参议；1938年，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的常务理事；1945年8月29日，在苏门答腊失踪，终年49岁。在他不断进行着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从事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胡愈之先生曾评价他：“在中国

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品阅郁达夫 30 年代的散文，《沪战的生活》（1932 年）一文直书沪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问题，本不过是与友人“且走且谈且梦想”的光景，“兴奋着，高谈着，梦想着”，一切美好却被现实击破，“飞机声，枪声，火光，火焰与叫号呼唤的声音”区区几词交织出一片战乱缤纷的残破惨景。眼下正临战争的喧扰让作者感受到“许多幻象消灭的悲哀”。爱国主义与感伤情怀油然而生，如丝如缕，作者以文字作为武器，讽刺和抨击外来帝国主义的侵掠者的无耻行径，且积极投身爱国主义的活动中，以文诛笔伐和行动力表现出对于外来侵掠的自卫态度和积极表态。《移家琐记》（1933 年 5 月）写搬到杭城东隅租借的一所闲房的轶事。记事的笔调是暗淡低沉的，如写到：屋内是“黝黯矮阔的大厅”，“向晚雨歇，电灯来了。灯光灰暗不明……”；天上“浮照着一层明灰的云幕”；门外则是“冷街僻巷”，“百业的凋零”，“城市的萧条”一片民不聊生的惨淡之景。散文中常见“灰”、“暗”、“冷”、“夜”等生冷的字眼，照应着作者善感的情怀和忧国的愁思。郁达夫书写游记，但内心仍牵挂着时事，如《杭州八月》一文虽写杭州八月是个极热闹的月份，末尾仍不忘提到：“沧桑的变革，实在厉害得很……”可见，作者身已行，心未远。从文化游历中取材，所做游记闲话等散文篇幅，寄托了内心的文化使命感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热切关怀。

郁达夫很多散文并不是直接关乎时政的，比如他的山水游记和闲话小品，多为自身感受的坦诚抒写，但都自觉不自觉与社会时事，国家命运有关。个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文学创作离不开根植于社会的土壤。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个人命运也和时事变幻难做分离，作家个人的气质是与生平经历和所遭遇的境遇息息相关的，如果说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上的浪漫主义倾向，于他本人忧郁感伤的个人气质造就的，而这种感伤情怀尽数体现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寄语了作者的政治抱负和家国情思。30 年代的散文，创作了很多山水游记，内心情感与他的命运轨迹关联密切。从作者的自身经历和作品内容来看，山水小品文的书写，并不是逃避避世的心态，也不是寻求归隐的寄托。相反，从散文的文化心理层面来看，郁达夫的处理方式可视作一种转化：将讽喻抨击的笔触转为优柔怅惘的笔调，虽书写不无相关的景物、事物，流连于描绘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和令人难忘的奇景，但对外物的喜爱和称颂反而是对应了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和愤慨。这种转化并不是逃避和空想，而是在对光明前途的追求中积蓄战斗的力量，隐含了对现实情境和国民遭遇的刻

骨揭露和深刻思考。苏雪林在她的《郁达夫及其作品》中指责郁达夫的作品称：“郁氏的笔每每偃蹇纸上，站立不起。即遇着感情激动时，读者以为他必有一篇沉痛热烈，气充词沛的议论要发表了，谁知他只‘哟！哟！’发几声感叹词便了事。说来说去，他的文字只是缺乏‘气’和‘力’。”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苏雪林的评价可视作只站到了作品的显性层面，显然至少她未达到郁达夫散文的“隐藏层”^[5]^[8]，即文化心理层。否则，仔细品读之后不难发现，郁达夫的作品无一不是与他的诗人气质和个人品行相关联，他的忧国忧民，不懈战斗的爱国主义者的心情始终贯穿他的一生。至于郁达夫 30 年代的散文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做出过评价。温儒敏的《略论郁达夫的散文》^[6]认为郁达夫 30 年代散文“清丽，疏朗和隽永。张梦阳的《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4]称他：“既赤热、明丽，又老练、精密。”并认为这个时期的郁达夫“语言变得纯净、谨严而又绚丽、畅达，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对他的 30 年代的散文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纵观郁达夫 30 年代的散文作品，其成就斐然是肯定的，无论从文字语言，词句意象，意境铺垫和文本的文化心理方面，都突显出作家优柔怅惘，情韵浓郁的诗化艺术特色。而更进一步，则委婉寄托了作者时刻准备抵抗侵略，誓死捍卫祖国的不屈风格，与他的散文文句的忧郁感伤反衬出巨大的张力，彰显出无穷的艺术魅力。

五、结语

郁达夫先生不仅是位杰出的文学家，更是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他的散文成就是中华文坛上璀璨夺目的一抹光亮，带给我们更多阅读的体悟和思索。郁达夫 30 年代的散文中一方面充满了诗化的语言、诗意的意象和情景，字字句句饱含着感情，表现出优柔怅惘，情韵浓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照应了埋藏在文本深处的作者的深层文化心理，寄托了作者厚重的文化精神和使命感。最后，郁达夫先生的诸多著作保存至今，使我们得以一览他的丰硕成果，并从中汲取文化精神的精华内涵，不失为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1]许子东. 郁达夫新论[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 [2]郁云. 郁达夫传[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 [3]刘勰. 《文心雕龙》译注[M]. 周振甫，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 [4]张梦阳. 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
- [5]喻大翔. 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 20 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双语教学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黄崇岭, 徐璟华, 蒋启恒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 采取动态研究的方法, 前后历时一年。实验组为上海某小学三年级参加双语兴趣课的学生, 在一年内他们接受了每周一次共 80 分钟的双语教学, 对照组为该校同年级的所有其他同学。经过前期测试、后期测试和问卷调查, 课题组得出了实验组和对照组成绩无明显差异的结论, 并对此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关键词: 双语教学; 绩效评估;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88-05

收稿日期: 2013-10-21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11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双语教学绩效评价研究”, 课题批准号: GPA115076

作者简介: 黄崇岭(1970—), 女, 江苏南京人,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德语语言文学博士。

我国的双语教学自 2000 年前后正式启动以来, 经历了如火如荼的局面, 教育界人士在双语教学的实践活动、双语教学模式的创建、双语教材的建设和双语师资的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双语教学开展的深入, 面临的难题不断出现, 在越来越激烈的升学压力面前很多学校退出了双语教学。与我国双语教学的举步艰难相比, 欧洲许多传统的单语国家, 如德国、荷兰、奥地利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坚决引入双语教学, 并且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是双语教学本身存在缺陷, 还是它在与我国文化接驳的过程中水土不服? 社会各界对此态度不一。在我国双语教学经历瓶颈阶段的时候, 外语教育研究者有必要对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进行一项实实在在的调查, 让数据来说话, 这也正是本课题的初衷。

为了检验双语教学的效果, 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查: 专业知识的习得是否因双语教学而产生缺陷、目标语能力有多大程度地提高、第一语言的发展是否受到影响等。鉴于我国目前实施双语教学的周课时少、课堂目标语使用比例不高等现状, 双语教学不会影响第一语言能力的发展和专业知识的习得已经是各方承认的事实。因此对我国双语教学的绩效评价主要集中在对学生第二语言能力的考查方面, 这也是本课题的重点。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本课题采取了动态研究的方法, 前后历时一年。实验组为上海某小学三年级参加双语戏剧兴趣课^①的学生, 该双语兴趣班共有 25 名同学, 所有同学全部为自愿参加。对照组为该校同年级的所有其他同学。2011 年 9 月, 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前期测试, 以期获得受试初始英语水平的数据。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实验组接受了每周一次每次共 80 分钟的双语教学。一年后, 于 2012 年 10 月对全体同学进行了后期测试。为了排除无关变量的影响, 同期对受试还进行了问卷调查。实验组 25 名同学全部接受了前期测试和问卷调查^②, 但由于各种原因只有 21 名同学参加了后期测试, 因此只有这 21 名具有前期和后期两次测试成绩的同学成为实验组最终的成员。问卷调查以匿名的方式进行, 无法剔除那 4 名没有参加后期测试的同学的数据, 考虑到样本较大, 本研究认为结果的可靠性基本

① 双语戏剧兴趣课被安排在每周五下午举行, 参加此双语班的同学来自同一年级 6 个不同的平行班, 其他的同学在此时间参加不同的兴趣课。按照问卷调查的反馈, 52%的家长希望孩子能藉此提高对英语的兴趣, 48%的家长希望孩子对英语的兴趣和学习成绩都能有所提高, 没有一位家长表示选择该课程仅仅是出于提高学习成绩的动机。该课程由学校的两名英语教师主讲, 授课语言百分之百为英语, 学生的合作语言也必须是英语。课堂内容主要是表演戏剧小品、为电影配音等等, 需要英语和肢体语言的配合, 很适合三年级的学生。

② 问卷调查由家长填写。

不受影响。对照组为该校同年级所有参与了两次测试的 152 名同学，其中 135 名同学接受问卷调查并提供了数据。通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数据的比对，我们得出该项目双语教学效果的结论。

二、研究结果

(一) 无关变量的对比结果

为了保持无关变量的一致，问卷设计了 4 个调查指标：父母的英语水平、课外英语课程学习时间（包括培训班学习和在家自学）和父母辅导孩子学习英语的时间。对于父母的英语水平问卷设计了四级量表供选择（数值 1-4 分别表示水平由低到高），课外英语课程学习时间和父母辅导时间由家长自由填写，数据利用 t 检验，检验均值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1 和表 2。

表 1 受试父母的英语水平

英语水平	实验组		对照组		值	显著性 p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母亲	2.52	0.82	2.28	1.05	1.34	0.18
父亲	2.52	1.05	2.50	1.00	0.099	0.92

表 2 家长辅导和课外英语课程学习时间

英语学习时间 单位：小时/周	实验组		对照组		值	显著性 p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家长辅导时间	2.16	1.55	2.07	1.29	0.02	0.98
课外英语课程 学习时间	3.80	2.97	3.67	3.08	0.08	0.94

上述显著性 p 值均大于 0.05，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父母的英语水平、课外英语课程学习时间和父母辅导孩子学习英语的时间这四个变量上没有差异。

(二) 前期测试结果

前期测试共分 10 个分项进行，实验组的成绩均值在 3 个分项上略低于对照组，在 7 个分项和总分上略高于对照组，然而这些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3。由此我们可得到结论：在实验开始前，两组受试的英语水平相当。

表 3 前期测试成绩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值	显著性 p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词汇听音辨析	9.90	0.30	9.85	0.45	0.51	0.61
听觉词汇联想能力	4.95	0.21	4.98	0.13	1.05	0.29
词汇能力	11	0	10.91	0.47	0.87	0.38
语篇听力理解	7.95	0.21	7.98	0.14	1.63	0.10
词汇复用能力	5.76	0.44	5.80	0.57	0.32	0.75
正字法能力	5.80	0.51	5.72	0.60	0.91	0.36
词汇发音能力	4.86	0.91	4.69	1.13	0.69	0.49
词法和句法能力	19.93	1.78	19.45	2.47	0.89	0.37
语篇的衔接与生成	14.73	1.32	14.35	1.56	1.12	0.26
阅读理解能力	8.98	1.03	8.50	1.74	1.26	0.21
总分	93.83	3.69	92.19	6.08	1.31	0.19

(三) 后期测试结果

后期测试也分 10 个分项进行，其中 9 个项目与前期测试相同。实验组的成绩均值在 1 个分项上略低于对照组，1 个分项与对照组持平，其余 8 个分项和总分略高于对照组，但只有词汇听音辨析这一项显著性 p 值小于 0.05，

说明实验组只在这一项上成绩明显好于总体，详见下表。

表 4 后期测试成绩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值	显著性 p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词汇听音辨析	14.67	0.43	14.08	1.06	2.55	0.01
听觉词汇联想能力	5	0	4.96	0.19	0.96	0.34
词汇能力	4.81	0.40	4.74	0.48	0.67	0.50
语篇听力理解	9.52	0.74	9.22	1.21	1.14	0.25
词汇复用能力	4.95	0.22	4.83	0.55	1.00	0.31
正字法能力	4.57	0.68	4.62	0.69	-0.46	0.65
听觉句子联想能力	9.95	0.22	9.77	0.55	1.50	0.13
词法和句法能力	18.36	1.40	17.80	2.01	1.27	0.20
语篇的衔接与生成	17.93	1.58	17.37	1.92	1.36	0.17
阅读理解能力	4.90	0.43	4.90	0.51	0	1.00
总分	94.62	3.29	92.31	5.72	1.85	0.06

(四) 结果分析

实验开始时，双语组的成绩略微好于总体，经过一年的双语教学后，双语组保持了这个微弱的优势，但这个优势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性意义，也就是说一年的双语教学并未像我们事先所设想的那样对学生英语成绩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样的结果似乎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迄今为止国外所做的所有相关研究全部支持双语教学能够促进语言能力发展的结论，如 Lambert 和 Tucker 对加拿大 St. Lambert 小学接受沉浸式教育的一年级到四年级学生的跟踪测试^[1]、Genesee、Polish 和 Stanley 从 1969 到 1974 年对加拿大 The Protestant School Board of Greater Montreal 中学接受英法双语教育的学生的测试^[2] 318-332、Baetens Beardsmore 和 Lebrun 对卢森堡接受多语教育的学生的成绩测试^[3] 107-122、Baetens Beardsmore 和 Kohls 对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学校学生的法语水平^[4] 240-260、以及 Wode 等对德国石荷州接受双语教学的学生的英语水平的测试^[5]。但仔细分析后却发现这样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主要原因可能在于：

1. 国外的双语教学或者双语教育历时长的从学前班持续到高中，短的从初中持续到高中，起码也要历经 3-4 年。在这些年里学生大多接受的是一种浸润式或部分浸润式的双语教育，课程中有不少于一半的内容采用目标语教学，因为当语言使用的比例少于 50% 时，学生便不能沉浸在语言的“浴缸”里，也就不能称之为“浸润式”^[6]。不论浸润式还是部分浸润式第二语言始终是课堂唯一的工作语言。在一些不实行浸润式双语教育的国家，如欧洲的德国、法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双语教学的课程每学期也有 2-3 门，课时量接近总数的 30%-50%。就实施双语课程的学科来看，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到历史、地理、政治，无所不包，而且都是高中毕业需要考试的主干课。如此看来，他们的学生接受的是一种真正的双语教学。反观国内的双语教学，在中考和高考的压力下，没有一所常规学校（非国际班）愿意在自己的学生中实施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学，双语教学只是作为一种教学改革实验，每学期三五次课，聊胜于无。本课题选择实验对象时就考虑到这一点。尽管有上海市双语教学主管部门的推荐，但我们还是无法找到一所一学年持续在一门主干学科中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无论是中学，还是小学。我们的研究对象能够持续地每周用两课时的时间在兴趣课上实施双语教学，已属不易。所以，这样的双语教学强度不能给学生的英语水平带来显著的提高也就不言而喻了。

2. 国外的学生课后很少被家长安排到补习班去学习外语，但在国内大城市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本实验中不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学习课外英语知识的时间都达到了 3.5 小时/周以上。如果说学校英语课的时间计为 3 小时/周（35 分钟×5 课时=175 分钟），做家庭作业的时间计为 3 小时/周的话，实验班所接受的每周不到 1.5 小时的双语教学对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根本不足以和课堂英语教学以及课外补习相匹敌。这也就必然造成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学习成绩没有明显差异。

3. 在后期测试中我们遵循了国内外测试惯常使用的方法，主要考查了学生听、读、写、语法和词汇的能力。实验组学生仅仅在“词汇听音辨析”一项中取得了较明显的优势，可能是一种偶然，也可能是他们在接受双语教学的过程中听力得到了锻炼、词汇量有所扩大，但其余分项和总成绩的对比无法让我们看到双语实验班在语言能力上的优势。这可能和课程是兴趣课不无关系。学校开设此课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在对实验班的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家长也表示选择该课程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在对该课程的随堂听课中我们看到，教师准备了很多图片、音频和视频资料，她们鼓励孩子参与活动，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并不在意学生学到了多少英语知识。虽然实验班的英语成绩没有明显提高，但在采访中几位英语任课老师都明确表示参加双语兴趣班的孩子在英语课堂上胆子明显大了，发言积极了，参与也更加活跃了，这可能是他们参加双语班最重要的收获。

4. 双语班和全体同学在英语成绩上没有能够测试出差异，可能部分归因于测试卷设计得不够理想。由于受试处于小学三年级，他们所学的英语知识非常简单，经过反复衡量课题组决定设计一份比较容易的测试卷，结果平均分较高，没有拉开差距。课题组之所以放弃设计一份难度略大的测试卷的想法，一方面是担心对于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来说要求太高，另一方面则担心难度大一些的测试卷会让孩子们过于沮丧。

三、结论和建议

1. 目前国内的双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完成促进学生第二语言能力发展的任务。双语教学因其加大了第二语言的输入量和输入强度，从而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这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证明，而且也从国外的多项实验中得到检验。为什么唯独在中国的实践不能验证这一点呢？关键在于我们所开展的双语教学不论在强度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谈不上是真正的双语教学，期望从中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是不现实的。只要中国的应试教育不改变，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学就不可能实现，双语教学绩效评估研究也就没有大的意义。那么现在这种浅尝辄止的双语教学在中国有没有必要开展呢？在笔者看来，它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唤起孩子们对语言学习的兴趣，而对它能够促进第二语言能力的发展不应抱有太多的奢望。

2. 虽然本研究是个案，但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我们对上海市常规学校（非国际学校）开展的双语教学状况做了深入的了解和细致的研究，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找到更合适的研究对象。而上海市的双语教学走在全国的前列，如此看来，中国目前的双语教学状况对双语教学绩效评价研究来说不能提供完美的样本。

3. 中国学生在课外补习英语的时间是评估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它超过了双语教学的时间，因此对学生第二语言能力的影 响可能远远超过双语教学。而学生在课外补习的时间因人而异，补习内容更是五花八门，如何控制好这个无关变量是研究的难点之一。这一难点是国外迄今为止的研究中从未碰到的，因而也是我们今后研究中要重点关注的。

4. 在以后的评估中可以考虑综合采用测试法和观察法。一般而言，测试法的优点是客观性强，且实施简单，省时省力，所以它是被使用的最多的评价方法。但它仅仅适合对大龄儿童的语言能力进行评估，对那些低龄儿童的语言能力评价，测试法有些力不从心。对低龄儿童语言能力的评估可以采用观察法。观察法由调查员观察评估对象的语言行为，并同时做下观察记录，有时还可以附带语音或录像记录，然后再把观察到的测试对象的语言行为或录下的语音数据进行分值的量化，最后进行统计学分析。观察法主观性强，且实施起来费时耗力，无法大面积地跟踪被评估对象，因而与测试法相比不占优势，往往不是首选的方法。但如果评估对象是小学中低年级的学生，观察法则有它自身的优势。

参考文献：

- [1] Lambert, W. & G. Tucker: Bilingual Education of Children: The St. Lambert Experiment [M]. Rowley Massachusetts: Newbury House. 1972.
- [2] Genesee, F., E. Polish & M. Stanley: An Experimental French Immersion Program at the Secondary School Level 1969 to 1974 [J].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1977, (33).
- [3] Baetens Beardsmore, Hugo & N. Lebrun: Tr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A]. In O. Garcia (ed.) Focus on Bilingual Educ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 [4] Baetens Beardsmore, H. & J. Kohls: Immediate Pertinen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Multilingual Proficiency: The European Schools [J].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1988, (44).

[5]Wode, H.: Bilinguale Unterrichtserprobung in Schleswig-Holstein [M]. Kiel: I&F. 1994.

[6]Genesee, F.: Learning Through Two Languages [M]. Boston, Mass.: Heinle & Heinle. 1987.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HUANG Chong-ling, XU Jing-hua, JIANG Qi-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is project, which in all lasts for one year, adopts the dynamic research metho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nsists of third-grade pupils from a Shanghai primary school,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an 80-minute bilingual interest-oriented course once a week for a year. The control group is made up of all the other pupils of the same grade. After the pre-test, post-test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earch group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st scores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On this basis the research group has conducted analysis and argumentation from four aspects.

Key words: biling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后方法”教学理论及其对高校英语课堂教学的启示

吴 婵, 郑玉琪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 要: 中国高校英语课堂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依据“后方法”教学理论的教学参量与宏观策略, 通过调查问卷方式调查高校英语课堂教学现状并诊断其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如下四方面的启示: 转换教师角色; 从实践循环到理论创造; 注重课堂活动, 打造和谐氛围; 将语言与文化有机结合。这些启示对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后方法”教学理论; 教学参量; 宏观策略; 学习者自主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93-05

收稿日期: 2013-07-07

基金项目: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后方法时代’英语教学原理与实践探究”(11YJA740121); 2011 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英语教学理论范式嬗变与重构研究”(11YYA001)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婵(1987—), 女, 河北邯郸人, 东南大学在读研究生; 郑玉琪(1955—), 男, 江苏南通人,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教师、学生与教学环境构成外语教学的三大要素。教师怎么教决定了学生怎么学。然而中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目前教学存在着高投入、低产出的困扰。受到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的影响, 学生最关注的总是词汇记忆、语法知识和一些零散的语言规则。而教师则扮演着“活字典”、“语法书”这样的角色。课堂气氛相对死板, 学生沉默不语, 空有知识而没有交际能力已成为困扰中国语言教学的顽症。另外, 在外语教学中母语存在着“被边缘化”的趋势,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忽视母语的影响, 因盲目崇拜而摒弃本国文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个世纪以来, 应用语言学界一直致力于寻找一个能够在全世界二语教学领域中普遍适用的教学方法。其实, 正如 Allwright 所说, 没有一种方法能够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教学场所, 因为教师不同, 学生不同, 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语言层次不同, 教学目的也不同, 甚至可以说, 方法已经死亡。^[1]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研究以“后方法”教学理论为基础, 结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方法时代’英语教学原理与实践探究”, 运用 SPSS19 软件分析统计了 595 份问卷中提供的相关数据, 解读了学习者对英语课堂教学现状的评价, 并在理论探讨与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启示。

一、“后方法”教学理论探寻

Kumaravadivelu 首次提出“后方法”的概念, 之后逐步深化和发展了“后方法”教学理论, 并在其著作《理解语言教学——从方法到后方法》中对“后方法”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诠释。其内容主要包括: 教学参数 (pedagogic parameter), 教学指标 (pedagogic indicator) 和教学框架 (pedagogic framework)。^{[2][7]}

下面是该理论体系中的三个教学参量和十个宏观策略框架。

(一) 三个教学参数

“后方法”教学理论是由如下三个层面(教学参数)组成的三维理论体系: 特定性、实践性、可能性 (particularity, practicality, possibility)。^{[3][50]} 特殊性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特定的教师在特定背景中教一组追求特定目标的

特定学生。它要求放弃既定的原则，致力于寻求基于具体社会文化和适合具体环境的教学。实践性涉及教师与研究者的关系。它拒绝把理论家视为生产者，把教师视为消费者的二分法。鼓励教师在充分了解理论的基础上持创新态度，在实践中凭自己的经验、直觉和洞察力不断反思，对理论进行修改和再创造，在实践中摸索适合学习者的理论。可行性指外语教学要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文化保持敏感，重视对学习者的身份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文化现实。把学习者看成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在此基础上进行语言教学，而非将二者割裂开。特定性、实践性和可行性三个教学参量三位一体，互相交织协作，为中国课堂外语教学的改革提供着指引作用。

(二) 十个宏观策略

Kumaravallivelu 提出由如下十个宏观策略构成的语言教学框架：1) 学习机会最大化：教师应平衡角色，从课堂主宰者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帮助学习者自我提升和创造。2) 意图曲解最小化：使教师意图与学习者解读相匹配。3) 促进协商式的互动交流：促进学习者与教师，学习者之间的相互交流，鼓励学习者勇于表达意见，拓展话题。4) 培养学习自主性：使学习者掌握个性化的学习策略，提高学习过程中的自我监控能力。5) 增强外语语感：培养学习者对于目的语的交际价值和社会功能的了解能力。6) 启发式语法教学：通过大量的语料输入，增强学习者对于目的语的语法规则的了解和掌握。7) 外语输入的语境化：为语言交流设置背景，使学习者掌握语言的交际能力。8) 语言技能综合化：听说读写技能培养协调进行。9) 语言教学的社会关联性：将语言学习与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等相关背景相结合，实现真正的交际意义。10) 提高文化意识：学习者是文化社会的载体，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把其首先看成是主观的文化产物。^{[4]39} Kumaravallivelu 指出，教师应该被鼓励并完全有能力根据自己所处的特定背景与学习者需求制定教学策略，但这样的理论创造需要遵循既定的原则。^{[4]238} 以上十条宏观策略为教师制定适合学生的微观策略提供了指引作用。

二、调查问卷反馈与解析

使用 SPSS 软件分析从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 7 所高校收取的 595 份学生问卷调查表中反馈的信息可以解析学生对英语课堂教学现状的评价与需求。

(一) 学生基本信息

表 1 学生基本信息

学校所在地区					学校类型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华南	139	23.4	23.4	23.4	有效	综合型大学	246	41.3	41.3	41.3
	华东	395	66.4	66.4	89.7		师范院校	256	43	43	84.4
	华中	61	10.3	10.3	100		职业技术学院	93	15.6	15.6	100
	合计	595	100	100			合计	595	100	100	

在被调查的七所高校中，位于华东地区的高校最多，占 66.4%，华南地区占 23.4%，华中地区占 10.3%。其中 43% 为综合型大学，41.3% 为师范类院校，15.6% 为职业技术学院。

(二) 对当前教学状况的评价

1. 您所在的课堂上教师与学生话语量的比例

表 2 您所在的课堂上教师与学生话语量的比例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未选	5	0.8	0.8	0.8
	教师二分之一，学生二分之一	108	18.2	18.2	19
	教师几乎全部，学生几乎为零	159	26.7	26.7	45.7
	教师三分之二，学生三分之一	323	54.3	54.3	100
	合计	595	100	100	

结果显示, 81%学生表示教师课堂话语量多于学生, 可见, 课堂中教师仍处于完全掌控者, 而学习者则处于相对被动地位, 较为消极。

2. 您所在的课堂上教师英语使用量

表 3 您所在的课堂上教师英语使用量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未选	7	1.2	1.2	1.2
	全部	110	18.5	18.5	19.7
	三分之二	339	57	57	76.6
	一半	89	15	15	91.6
	三分之一	41	6.9	6.9	98.5
	几乎不用	9	1.5	1.5	100
	合计	595	100	100	

仅 18.5%的英语教师完全使用英语授课; 57%的教师英语使用量为 2/3; 23.4%的教师一半或更少的时间中使用英语。无疑, 大量充足的语言输入有助于打造英语交际环境, 促进学习者进步。

3. 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课堂的实际情况而调整教材的使用方法

表 4 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调整教材的使用方法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未选	7	1.2	1.2	1.2
	总是这样做	47	7.9	7.9	9.1
	经常这样做	241	40.5	40.5	49.6
	偶尔这样做	246	41.3	41.3	90.9
	从未这样做	54	9.1	9.1	100
	合计	595	100	100	

教材是教学大纲的重要体现, 规定了教学内容、教学重点、课堂活动形式等。50.4%的教师严格执行教学大纲, 偶尔或从未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课堂情况调整教学内容、讲解方式、课堂活动、考核方式等。48.4%的教师经常根据学习者的情况进行调整。

4. 课堂上教师运用学生配对、角色扮演、小组活动等形式完成教学任务

表 5 课堂上教师用角色扮演等活动形式完成教学任务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未选	8	1.3	1.3	1.3
	总是这样做	27	4.5	4.5	5.9
	经常这样做	173	29.1	29.1	35
	偶尔这样做	277	46.6	46.6	81.5
	从未这样做	110	18.5	18.5	100
	合计	595	100	100	

在课堂活动方面, 33.6%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师经常运用角色扮演等形式完成教学任务, 46.6%的学生认为教师偶尔安排课堂活动, 18.5%的学生从未体验过任何课堂活动。

为了增强课堂交流交际, 打造和谐课堂氛围, 增强学生自信, 课堂活动是极为重要的手段, 教师需重视其作用, 并充分利用。

5. 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将学生专业背景等个体差异与具体教学内容相结合

表 6 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将学生专业背景等个体差异与教学内容相结合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未选	14	2.4	2.4	2.4
	总是这样做	52	8.7	8.7	11.1
	经常这样做	118	19.8	19.8	30.9
	偶尔这样做	310	52.1	52.1	83
	从未这样做	101	17	17	100
	合计	595	100	100	

28.8%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师会有意识地将学生性别、地域、专业背景等个体差异与具体教学内容相结合, 52.1%的学生认为教师偶尔这样做, 17%选择教师从未这样做。教师不能够忽视学习者身上的文化社会因素, “后方法”教学理论注重教室的环境敏感型, 主张教师充分重视学习者的背景与需求。

6. 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表现给予精神上的鼓励

表 7 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表现给予精神上的鼓励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未选	35	5.9	5.9	5.9
	总是这样做	56	9.4	9.4	15.3
	经常这样做	240	40.3	40.3	55.6
	偶尔这样做	185	31.1	31.1	86.7
	从未这样做	79	13.3	13.3	100
	合计	595	100	100	

从课堂上教师对学生表现的精神鼓励角度看, 仅不足半数(49.7%)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师会经常或总是对其表现给予精神上的鼓励, 31.1%选择教师偶尔这样做, 而 13.3%的学生认为教师从未给予学生精神鼓励。中国的学生具有腼腆、爱面子、内敛等性格特点。教师应尤其重视鼓励的作用, 增强学生的自信, 使课堂气氛更活跃, 语言学习更顺畅。

7. 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将语言教学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

表 8 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将语言教学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总是这样做	62	10.4	10.6	10.6
	经常这样做	275	46.2	47.1	57.7
	偶尔这样做	172	28.9	29.5	87.2
	从未这样做	75	12.6	12.8	100
	合计	584	98.2	100	
缺失	系统	11	1.8		
合计		595	100		

57.7%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师总是或经常将语言教学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 可见超过半数的被调查教师能够保证其教学内容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然而 41.5%的教师偶尔或从未这样做。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只有把语言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 它才具有切实的使用意义; 而学习者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把语言学习放入文化背景中有助于引起学习者的兴趣与求知欲。

三、对教学改革的启示

以“后方法”教学理论为依据, 结合问卷中折射出的高校英语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笔者总结出以下四方面

的启示：首先，教师应试图转变课堂角色。教师目前需要放手的是课堂的统治权，只有将更多的自主权交予学生，在课堂上充分给学生提供交流、表现的平台，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其次，教师应实现从实践循环到理论创造的转型。“后方法”教学理论鼓励教师由被动的知识消费者转变为自主的理论创造者。教师可在教学原则的指导下，根据学习者的需求与特点和自己的教学经验来归纳最适合我国英语课堂的教学理念。第三，应注重课堂活动，打造和谐氛围。课堂活动是促进协商式互动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降低学生焦虑情绪，增强其自信，促进语言学习的重要方式。更多的英语教师应重视课堂活动的作用，通过如角色扮演、小组讨论、课堂辩论等方式的课堂活动来辅助外语教学，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和课堂自主性，促进教学的顺利进行。第四，应将语言与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意义的语言教学需要充分考量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在学习语言时，既要充分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又要充分尊重母语国文化。只有这样，二语国家的学习者才不会被边缘化。英语教师肩负着传递目的语国家文化的重任。同时，教师也应把学习者看作是文化的载体，充分考虑学习者的背景和兴趣。只有将语言教育与社会文化相结合，语言才具有真正的交际意义。

四、结语

“后方法”教学理论为中国英语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教师不应拘泥于某种教学方法，而要发掘课堂中的问题，关注学习者的诉求，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反思和改进找寻最适合的教学策略，为学习者的能力培养，外语教学的长足发展而努力。

参考文献：

- [1] Allwright, R. L., *The Death of Method* (Working paper #10) [A]. The Exploratory Center, The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England, 1991.
- [2] Kumaravadivelu, B., *Understanding Language Teaching: From Method to Postmethod* [M].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6.
- [3] Kumaravadivelu, B., *Toward a Postmethod Pedagogy* [J]. *TESOL Quarterly*, 2001 (35): 537-560.
- [4] Kumaravadivelu, B., *Beyond Methods: Macrostrategi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a.

The “Post-method” Pedagogy and its Inspirations to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WU Chan, ZHENG Yu-q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A slew of recurrent problems are waiting to be solved in China’s college EFL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ing.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the paper reviews the parameters and macrostrategic framework of the “post-method” pedagogy and presents findings from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wards college students about their evaluation on current EFL classroom teaching condi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research, the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EFL teachers, namely, alteration of teacher role; from practicing to theorizing; more attention directed to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combina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suggestions are expected to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FL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 “post-method” pedagogy; parameters; macrostrategic framework; learner autonomy

《颜氏家训》家庭教育思想研究

骆毅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189)

摘要: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在借鉴前人家庭教育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的家庭教育实践, 提出了立德为上、家教宜早、一视同仁、严慈相济、言传身教、重视环境等家庭教育思想。其中许多富于生命力的内容, 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 颜之推; 《颜氏家训》; 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098-04

收稿日期: 2013-10-07

作者简介: 骆毅(1971—), 男, 江苏盱眙人,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提到家训, 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有“古今家训之祖”^①之称的《颜氏家训》, 它是现存第一部以“家训”为名的家训专著, 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颜氏家训》继承了传统儒家家庭教育学说的精髓, 并结合颜之推自己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及其家庭教育的实践经验, 系统地阐发了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 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对后世家训及封建社会家庭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根据儿童、青少年心智发展特点以及道德养成规律, 提出了立德为上、家教宜早、一视同仁、严慈相济、以身作则、重视教育环境等家庭教育思想, 即便在今天仍能给我们以积极的启示和有益的借鉴。

一、“立德”为“上”

在传统儒家的价值观体系中, 自古即有“三不朽”之说^②, 三者之中又视“立德”为“太上”之功。这种“立德”为“上”的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了古人的教育观念, 因而特别重视对子孙的伦理道德教育。颜之推虽然并不忽视子女的语言教育和技艺教育, 如《颜氏家训·音辞》云:“吾家儿女, 虽在孩稚, 便渐督正之; 一言讹替, 以为己罪矣。”^{[1]530}《颜氏家训·勉学》云:“人生在世, 会当有业: 农民则计量耕稼, 商贾则讨论货贿, 工巧则致精器用, ……”^{[1]143}“谚曰: ‘积

财千万, 不如薄伎在身。’”^{[1]157}强调语言、农、工、商等技艺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因而更为强调教育应以“立德”为“上”。

(一) 强调“守道崇德”

《颜氏家训·省事》明确告诫子孙:“君子当守道崇德”,^{[1]334}而不可单纯为了仕进利得, 凭借雕虫小技投机钻营、谄事权贵。《颜氏家训·教子》载:“齐朝有一士大夫, 尝谓吾曰: ‘我有一儿, 年已十七, 颇晓书疏, 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 稍欲通解, 以此伏事公卿, 无不宠爱, 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 此人之教子也! 若由此业, 自致卿相, 亦不愿汝曹为之。”^{[1]21}颜之推教育子孙, 读书治学当以“增益德行, 敦厉风俗”^{[1]157}为第一要务, 对当时目光短浅、思想狭隘、谄媚邀宠之徒的家教观念和实实践给予明确否定。颜之推还教育子孙要忠诚、明礼、恭谨、节俭、仁义、信实。《颜氏家训·勉学》云:“未知事君者, 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 见危授命, 不忘诚(本应作忠, 避隋文帝父名讳而改)谏, 以利社稷, 惻然自念, 思欲效之也; 素骄奢者, 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 卑以自牧, 礼为教本, 敬者身基, 瞿然自失, 敛容抑志也; 素鄙吝者, 欲其

① 宋人陈振孙在其著名的目录学著作《直斋书录解题》中称:“古今家训, 以此为祖。”

②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 此之谓不朽。”

观古人之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1]166}

《颜氏家训·归心》云：“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1]395}《颜氏家训·治家》云：“可俭而不可吝己。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1]42}《颜氏家训·省事》云：“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义之事也。凡损于物，皆无与焉。……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1]337-338}他甚至认为：“不识仁义，……慎不可与为邻，何况交结乎？”^{[1]406}

《颜氏家训·名实》云：“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程，非所以得名也。”^{[1]303}又云：“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橛也。”^{[1]306}他还以自己“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1]4}之反面典型教育子孙应尽早磨砺节操品行，以“德”立世。

（二）注重家庭人伦教化

俗话说：“家道和顺”，“家和万事兴”，中国古人特别注重家庭关系的和谐融洽，提倡以儒家的“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伦理准则。颜之推信奉儒学，十分重视家庭人伦关系的和睦亲善。《颜氏家训·兄弟》云：“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入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1]23}因而特别重视以儒家家庭伦理准则为依据，对子孙进行家庭人伦教化，协调家庭人伦关系，培养家庭成员的家庭伦理道德素养，形成良好的家庭道德风尚。

二、家教宜早

颜之推认为，对后辈子孙的家庭教育开展得越早越好。否则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颜氏家训·勉学》云：“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1]172}就是说，小孩子知欲未开，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应当在孩子精神专一的时期抓紧教育孩子，切不可等到孩子长大成人，思想已懒散的时期才去教育他们，那就丧失了孩子教育的最佳时期。教子宜早的教育理念反映了颜之推在家庭教育上积极

主动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其对个体认知发生规律及道德养成规律的认识，对于当今的家庭早期教育仍具有积极启示。当然，颜之推强调早教、早学的重要性，却并不认为，一旦失去早期教育便可以自暴自弃，而是明确肯定了晚学、晚教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颜氏家训·勉学》指出：“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又指出：“幼而学者，如开月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1]173}可见，《颜氏家训》虽然赞同“教妇初来，教儿婴孩”，^{[1]18}而一旦失去早教机会，只要发奋努力，老而弥笃，仍然可以大器晚成。^{[2]273}

三、一视同仁

颜之推主张父母应一视同仁地爱每一个子女，而不能偏宠偏爱，偏宠偏爱背离为人父母之道，也不利于子女的成长与家庭的和谐稳定。《颜氏家训·教子》云：“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至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持。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1]19}因此，父母在对待子女时任何小小的偏爱，都会在孩子们中间引起不良反应，以致造成他们之间的分裂，影响各自良好品性的形成。被偏爱者往往自高自大，骄横跋扈；被冷落者则可能自暴自弃，失去进步的勇气和信心。所以，无论是“贤俊者”，还是“顽鲁者”，都应同样对待。^{[3]339}虽然目前我国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独享父母全部的慈爱，父母在慈爱子女时也不存在厚此薄彼。但也还有少部分家庭有两个或以上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就应不分男女、俊丑、乖淘、智愚等，对他们一视同仁，慈爱他们，教育他们，为他们创造符合各自个性的发展机会。并且，当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与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区别，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从长远看，我国今后大多数孩子可能不会再是“独生子女”，到那时对子女一视同仁地爱、育就成为家庭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四、严慈相济

中国自古就有“养不教父之过”、“慈母败子”、“孝子不生慈父之家”等观念。反对溺爱子女，只爱不教；强调家教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家长在家庭生活、家庭教育中的权威性。这一家教观念对颜之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颜之推早年即丧父母，跟随兄长生活，兄长对他慈爱有余而严教不足，致使他走了一断坎坷

之路，所以颜之推特别强调，对子女光有爱是不够的，一定要寓爱于教、严慈相济。《颜氏家训·教子》云：“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118]这一训诫确是真知灼见，发人深省，值得为人父母者牢记。不过，颜之推在主张严慈相济的同时，尚存在肯定严苛粗暴教子的片面化倾向。《颜氏家训·治家》云：“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力见”，^[141]认为棍棒体罚是管教子女的必要手段。《颜氏家训》还肯定了王大司马之母魏夫人对其子“少不如意，犹捶撻之，故能成其勋业”^[113]的极端做法，这一“棍棒底下出孝子”、“家庭之内肃如公堂”式的封建家长制作风与粗暴家教观念理应摒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体罚从根本上说是强制性的、消极的教育方法，它虽然可以取得一时的、表面的效果，但往往会扭曲被教育者的个性，影响被教育者身心的健康，其效果也不会持久。^[420-23]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独生子女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独生子女几乎被每一位家长视为“掌上明珠”。在家长过度宠爱与无微不至的照顾下，造就了许多自私、任性、脆弱、孤僻懒惰的家中“小皇帝”，诸多家长陷入了极度矛盾与焦虑之中。作为家长，应当切记，溺爱不是真正的爱，娇子犹如杀子！当然，家教过严是对子女身心的摧残，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家庭教育要落到实处，必须使慈爱性与威严性、严肃性与民主性有机结合起来；有爱无教或家教过严，都达不到教育的最佳效果。家庭教育如此，学校教育也是如此。教师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并不等于对学生的溺爱、纵容和放任，而是把爱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只爱不严，不是真爱；只严无爱，不是真正的教育之道。^{[5]90}

五、言传身教

颜之推认为，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与孩子关系密切，情感深厚，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对于家庭早期教育，家长及亲近的人的谆谆教导更易激起孩子们感情的涟漪，获得他们的信任，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颜氏家训·序致》云：“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鬪，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11]颜之推重视言传，更重视身教，他把父母等居上位者的身教作用称为“风化”，此“风化”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仿效，不需要居上位者的强制，教育感化的效果如何，完全取决于居上位者自身的言行。《颜氏家训·治家》云：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141]颜之推认为，上行则下效，因此，为人父母者首先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先正己身，然后才能发挥表率、示范作用，不断地熏陶和真诚感染子女，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形成良好的家庭道德风尚，培养子孙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一思想是对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6]134}“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6]136}与孟子的“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7]327}重视身教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对于当今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家庭道德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六、重视教育环境

重视教育环境对子女的影响，是我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古代教育家墨子和荀子曾分别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8]11}和“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9]3}“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9]96}形象地概括了环境对于人的巨大影响。颜之推继承了这一家教传统，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特别强调客观环境对子女教育的影响。《颜氏家训·慕贤》云：“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以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11]27-128}意思是说，人在年少的时候可塑性强，和贤者交往密切，潜移默化中就会受到对方的熏染，言行举止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效仿，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颜氏家训·慕贤》又云：“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也。君子必慎交游焉。”^{[11]28}所以和善人相处，如同进入了满是芝兰香草的居室，时间久了，自己也会变得芬芳起来；与恶人相处，就如同进入了满是鲍鱼的店铺，时间久了，自己也会变得腥臭起来。墨子看到染丝的情况，感叹丝染在什么颜色里，就会变成什么颜色，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颜之推告诫子孙要注意选择良师益友，择善而居，择善而处，择善而交，揭示了人际交往对象的道德品行对自身品行养成的重要影响。这一注重环境，强调慎择师友的家教思想，反映了道德养成的一种客观规律，具有普遍适用价值。

七、余论

《颜氏家训》作为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家庭文化环境和个人人生际遇中形成并流传下来的垂

询子孙的家训专著，其中所蕴含的家庭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产生的时代印迹，受到特定阶级关系的制约，代表特定阶级的要求，体现特定阶级的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如主张“夫主妻从”，肯定严训体罚等体现封建家长制作风的家教观念，有悖于现代家庭教育的平等、民主理念，理应予以坚决批判与否定。然而，《颜氏家训》中阐述了立德为上、家教宜早、一视同仁、严慈相济、言传身教、重视教育环境等符合家庭教育普遍规律的家教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即使到了今天仍未丧失其应有的理论光辉，值得我们去发掘、提炼、批判地继承，给现代家庭教育以积极启示。

参考文献：

- [1]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徐少锦、陈延斌. 中国家训史[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 [3]王正平. 中国传统道德论探微[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 [4]杨明. 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J]. 华夏文化，1996(3).
- [5]赞科夫. 和教师的谈话[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 [6]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7]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8]孙诒让. 墨子闲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9]梁启雄. 荀子简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Discussion on Domestic Education Thought in “*the Yan Domestic Instructions*”

LUO Yi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Yan Zhi-tui’s Yan Domestic Instructions was based on domestic education experiences of the ancients and domestic education practice of his own. It considered moral education as the most important, advanced early domestic education, equal treatment, the methodology of integrating loving and stern, the principle of practicing what he preached, the thought of valuing environment. Lot’s of the vital contents of domestic educational thought in the Yan Domestic Instructions up to the present are still worthy of our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Key words: YAN Zhi-tui; *the Yan Domestic Instructions*; domestic education

闲暇教育构建的社会响应机制研究

张春玲, 张东云

(邯郸学院 地理与旅游系, 河北 邯郸 056005)

摘 要: 社会层面的闲暇教育对于构建文明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及乐生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社会层面闲暇教育的社会响应机制研究, 确定以政府为牵头, 监督管理闲暇教育实施; 具有专业性、导向性培训机构为实施主体, 负责闲暇教育工作具体开展; 以有效的评价体系作为衡量标准, 检验教育的成效性。在该响应机制的具体实施工作中, 确定以相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为依托, 实施开展闲暇教育, 全方位的建立社会闲暇教育机制。

关键词: 闲暇教育; 构建; 社会响应机制

中图分类号: G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102-04

收稿日期: 2013-11-10

基金项目: 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资助经费青年专项课题, 课题编号: 06040003

作者简介: 张春玲(1972—), 女, 河北邯郸人, 邯郸学院地理与旅游系副教授, 硕士。

一、引言

“闲暇”最早的设想是由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就提出: 当闲暇时, 为满足爱好和情感的一切活动是人类重要的活动内容之一。^{[1]59} 随着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 人类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发展, 闲暇时间的不断延长, 人们对于高质量闲暇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杜马泽德认为: 所谓闲暇, 就是当个人从工作岗位、家庭、社会所赋予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为了休息, 为了散心, 或者为了培养并无利害关系的知识和能力, 自发地投入社会, 发挥自由的创造力而完全随意进行的活动总体。^{[2]23}

闲暇教育可以让学习者通过学习, 掌握如何科学、合理、有价值的充分利用和安排闲暇时间, 进而获得并具有信念、情感、态度、知识、技能和行为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对于社会层次的闲暇教育, 旨在通过全民教育, 使得社会公众具有良好的闲暇自我管理、自我操作、自我控制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对于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以及良好风貌的形成尤为重要。

二、社会层次闲暇教育构建的必要性

(一) 闲暇教育是构建文明社会的重要手段

伴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却出现了公众对现有闲暇生活满意度较差、闲暇生活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源于公众对闲暇的认识不足、缺乏科学合理的闲暇方式和策略, 导致的结果是: 随着闲暇时间增多, 在缺少正确的引导情况下, 会增加人的孤独感、失落感、心理失衡, 甚至引起犯罪行为的发生。在美国, 闲暇导致了孤独、无聊、自杀、犯罪的发生; 在日本, 工作狂们在闲暇时间更多的是失落、愧疚、心理失衡^{[3]32}; 在我国, 青少年群体, 尤其是其中的留守群体, 闲暇时间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犯罪呈现的低龄化、冷漠化让人深思。

所以，科学的闲暇教育能够丰富人们闲暇时间，使公众保持健康的、平和的心态，提高公众素质，一定程度上抑制、减少犯罪的发生，对于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闲暇教育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以公平、正义为首要前提，强调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的同时，促进人的及社会的全面发展，保障、尊重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创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这一核心不仅仅体现在党的各项工作中，更落实、贯穿于公众的终身学习过程中，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提升公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保障人民的各项利益。在公众的终身学习过程中，闲暇时间的教育、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全面提升公众各项素质、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闲暇教育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策略

学习型社会倡导学习求发展，力求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多样学习的教育格局。

学习型社会的内涵是通过个体学习、个体的发展，实现国家的学习、国家的整体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建设学习型国家、学习型社会。内涵以终身的学习追求终身的发展；以灵活的学习追求多样的发展；以自主的学习促进内在的发展，把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促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看成是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条件和根本动力^[45]。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形成终身学习体系，强调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获得和掌握智力、体力、情绪、伦理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和技能来促进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闲暇教育以终身教育为指导思想，通过积极发展闲暇教育，引导、组织、构筑社会层面的闲暇体系，使公众形成科学的闲暇价值观、正确的闲暇态度和良好的闲暇行为，能够把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要求落到实处，通过具体的闲暇教育策略，如社区、学校、家庭、企事业单位具体闲暇教育的开展，真正地、全方位的建立和实现学习型社会。

（四）闲暇教育是构建乐生型社会的重要内容

“乐生”是人的心理感受和生活状态，紧张工作之余，人们更应该学会如何“乐生”，如何充分、高效、有意义的利用空闲时间，这是全面建立乐生型社会的重要内容。乐生型社会的创建是在社区活动室、社区保健室、社区购物室、社区阅览室、社区建设场所等硬件齐全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教育机构、闲暇教育机制，教会人们如何运用这些仪器设备，如何“乐生”，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闲暇教育及闲暇活动的开展，使公众掌握基本的闲暇技能，能够对个人的闲暇生活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促使人们工作之余，放松身心、提高自身修养、学会健康地休闲与生活方式，做到勤于工作、乐于生活，以积极、健康、乐观的心态对待工作、生活。通过对个体的闲暇教育，实现人人乐享生活、乐于生活。对于由个体构成的社会，必将会形成乐观、开朗的社会风貌，进而全面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公众的生活质量。

三、闲暇教育的社会响应机制构建原则

闲暇教育本身具有教育目的乐生性，教育形式自主性、灵活性，教育内容广泛性、多样性，教育阶段终身性的特点，闲暇教育的对象具有年龄跨度大、学历水平不一、区域差异大的特点，据此在建立闲暇教育的社会响应机制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政府的导向性、监管性和保障性原则

社会层面闲暇教育的构建过程中，政府起了主导作用。由政府层面相关部门作为牵头，制定全民闲暇教育规划，指导全社会闲暇教育的开展，并责成相关部门进行活动的实施、活动的监管及活动有效性评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法律监管作用，保证社会闲暇教育的顺利、有效实施。

（二）教育资源有用性、有效性和可得性原则

闲暇教育资源应具有有用性、有效性原则，才能对公众形成很强的吸引力；对于该类资源，应借助网络、媒体、杂志等媒介形成共享资源，免费对公众下载、开放和浏览，为闲暇教育实施提供一开放的基础平台，保障闲暇教育活动的开展。

（三）课程设置的合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原则

相关机构、部门在具体闲暇教育课程设置上，应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针对不同的群体、对象，科学、合理的设置闲暇课程，使其更符合本地特色和本民族特色；同时课程设置也应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得公众“乐享”、“乐学”。

（四）课程选择的自主性、自愿性和指导性原则

在课程选择上应突出闲暇对象的主体性原则，突出闲暇对象的自主性，由其自愿接受闲暇教育、选择具体闲暇教育课程；同时可由相关部门进行课程选择指导，通过相关程序对闲暇对象进行分析评价，帮助其科学合理地选择闲暇教育课程。

（五）闲暇教育实施的广泛性、渗透性和终身性原则

闲暇教育是社会层面的教育形式，地域范围涉及城市、乡村，教育对象涉及幼儿、小学、中学、大学、社会人员等，在教育实施过程中应本着广泛性原则，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对象和群体进行开展；闲暇教育开展的主体是家庭、学校、社区、厂矿机关、事业单位等部门。但是，闲暇教育的实施不是任何一个部门能够独立完成的，需要在家庭、学校、社会等环节协作完成，闲暇教育的实施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环节，需要公众在终身的学习过程中掌握和完成。

四、闲暇教育的社会响应机制构建探讨

（一）充分发挥政府牵头、监督管理功能，支持、保障闲暇教育开展

政府的高度重视是社会层次闲暇教育构建的重要保障，为确保社会层全面开展闲暇教育。

第一，应以政府部门牵头，制定响应的全社会闲暇教育近期、中期以及远期规划，指导社会层次闲暇教育的开展。

第二，完善政府相关监督、管理机制，出台相关法律制度，责成相关部分开展闲暇教育，并以此作为衡量文明城市建设、地方政府年度工作情况的重要指标和考核内容。

第三，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担负培训功能的机构，如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进行监督管理，保障闲暇教育的实施。

第四，拨出专项资金，对全社会的闲暇教育进行专项资金扶持。

（二）培训机构应具有专业性、导向性作用，积极开展闲暇教育

培训机构受上一级管理机构的直接监督、管理，负责闲暇教育理论、实践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各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应结合各自特点进行针对性闲暇教育授课。

第一，企事业单位，应结合单位特色，在闲暇时间对本单位职工及社会人员进行闲暇教育，由专门人员进行特色课程设计及课程实施。在选课过程中应突出闲暇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依据自主、自愿与指导结合性原则接受闲暇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可结合科普宣传等活动进行具体开展。

第二，学校是进行闲暇教育的主要机构。闲暇教育作为一项受教育者的终身培训，更多的是一种素质培训，如果从娃娃抓起，让受教育者从小养成良好的、科学的闲暇习惯会让其受益终身。幼儿园、中小学应结合孩子的年龄特征、身心发育特征、充分考虑孩子的兴趣点，免费开设兴趣班、特长班等，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活动。在孩子闲暇之余，让孩子学会闲暇技能，能够自主进行闲暇安排。大学及成人的闲暇教育可依托地方专、本科院校，结合学校专业特色、专长进行开展。不仅仅吸引在校学生、同时也允许社会人员进行学习。在新生入学之初即对新生进行闲暇教育，指导学生做出大学四年的闲暇规划，使大学生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

第三，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经常和社区居民打交道，对辖区家庭、居民有较深的了解，可以针对性的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教育；也可以通过社区科普小课堂、文娱流动站、小小俱乐部等形式对辖区的特殊群体，如老人、儿童、妇女、留守人员进行专门的生活机能、文娱技能的培训，如开设西点班、厨师班、舞蹈班、曲艺班、发艺班、幼儿教育班、儿童心理班、汽车养护与未修技术等，吸引不同群体前来学习。

第四，不管是哪一个培训机构在硬件、软件上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课程设置上一定做到科学、合理，并提前下发授课安排，供受培训者选择学习；有专门的授课场所和授课设备，保障授课的顺利进行；具有一定的资金支

持，保证教育的顺利实施；要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及专业的闲暇教育人员，进行相关的管理和教学工作。

（三）形成科学的闲暇教育评价体系，有效的评价闲暇教育效果

要形成有效的闲暇教育实施效果的评价机制，对各个培训机构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衡量，并有效的反馈到上一级管理机构及相关的培训机构，作为其课程设置、工作开展的重要依据。对评价效果好的单位和部门，应对其予以奖励，并在评文明城市、地方考核时予以侧重，并允许其继续开设闲暇教育及资金扶持。对于评价不合格的单位和部门，取消其第二年教育资格及资金支持（图1）。

通过该手段督促各培训机构按时、高质的完成闲暇教育任务，一定程度上保证全民的闲暇教育有效实施。

五、结束语

闲暇教育是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明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及乐生型社会的建立具有重要推进作用。闲暇教育社会响应机制试图通过政府牵头，具体部门负责，各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具体实施，自上而下的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学习体系，供公众选择学习，使得公众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良好的自我闲暇的控制、管理能力。同时，全社会也能形成自信、自主、创新、和谐的社会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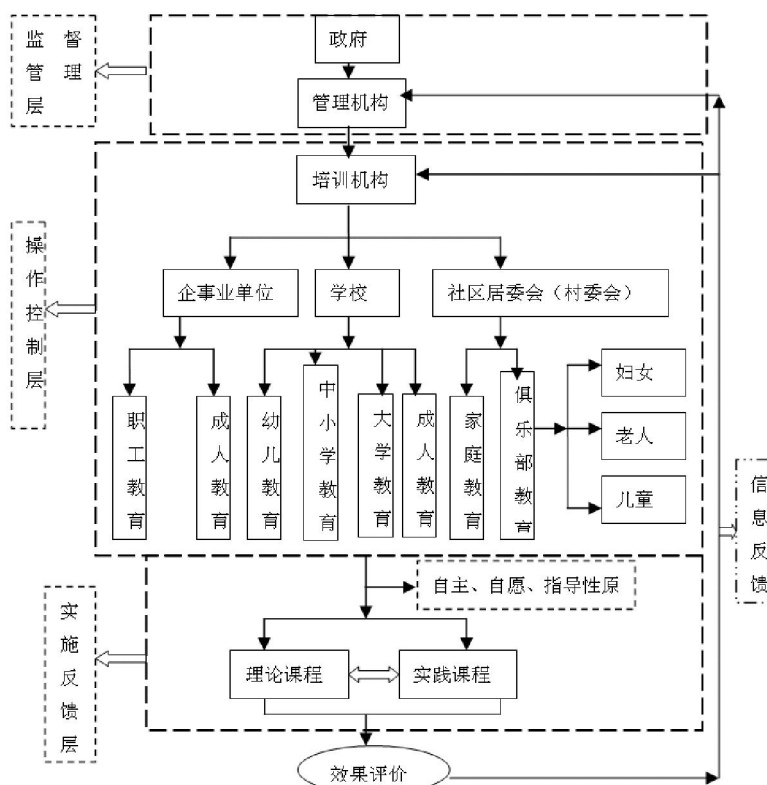


图1 闲暇教育社会响应机制图

参考文献：

- [1] [英]赫·斯宾塞. 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 胡毅,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 [2] 王铁群. 闲暇教育—教育实践中予以关注的课题[J]. 辽宁教育研究, 2003(5).
- [3] 张棘. “乐生型”社区闲暇教育模式构建研究[J]. 成人教育, 2010(5).
- [4] 吴远芳. 闲暇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使命[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汉文综合版, 2008, 28(4).

A study on the Social Response Mechanism of Leisure Education

ZHANG Chun-ling, ZHANG Dong-yu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and College, HanDan, 056005, China)

Abstract: Leisure education as to the social perspectiv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build a civilized, harmony, learning society. An was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as for the social leisure education. In this system, several parts were integrated, each of which played a specific role and acted actively on their own to make sure of the whole may effective fulfill the mechanism thoroughly. Firstly, the government is leader and manager, who supervise the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all parts. Secondly, professional and aim-oriented training institutions as the main force are in charge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Finally but the most necessary, an eff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results of teaching is a key part to make sure that the system running eff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cooperation from the corresponding firm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of all social units is another inseparable force pushing the system to fulfill its final aim.

Key words: Leisure education; building; all-around system

辽南京休闲景观研究

吴承忠, 田 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9)

摘 要: 辽帝在南京地区的捺钵活动包括延芳淀猎鹅、凉淀避暑。辽南京城内和近郊的风景名胜有内果园等。节日休闲习俗有上巳节走马射兔、佛诞日游城、重五射柳等。体育游艺竞技活动有打马球、角抵等。艺术演出活动包括说唱、舞蹈等。南京贵族官员的户外休闲主要在宗教胜地和公共休闲空间。城市的军事化管理影响了城市文化的发展, 限制了城市休闲功能的开发。

关键词: 休闲; 捺钵; 南京; 辽代; 习俗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106-06

收稿日期: 2013-06-18

基金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11JGB69)

作者简介: 吴承忠 (1971—), 男, 湖北武汉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清华大学管理学出站博士后,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访问学者。

李旭旦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曾经指出, 历史人文地理学要重视对古代社会人们感情生活和娱乐生活的研究, 除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之外, 以后还会建立历史社会地理学。史念海先生也在《中国古都与文化》一书中注意到古都是各地域文化、中西文化的融汇区。20 年来, 我国历史地理学中没有开始对休闲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历史地理学界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休闲活动的发展状况及其重要性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我国的情形与外国相似, 有着漫长的休闲发展史, 休闲活动普遍存在于从贵族、商人、文人到最下层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各阶层, 而且每个时代的休闲活动常有着不同的特点, 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古代、近代贵族和平民休闲文化。本研究课题“辽金元明清北京休闲地理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确定的。该课题的开展既建立在以往侯仁之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者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又借对古代北京城内居民休闲行为的研究, 希望为北京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增添新的方向——历史休闲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学科中的人口地理、民族地理、军事地理等研究领域不同, 历史休闲地理学以研究一定历史时期一

定区域的休闲的地理学相关问题使命, 休闲活动场所、休闲者、休闲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规律应成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 而其中休闲活动场所的空间分布与变迁规律应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 休闲行为的地理学与社会学特征、休闲文化的地理学扩散问题也应该被纳入研究的视野。

“城市是人类文化集中的聚落和区段, 城市文明以其主导作用制约人类社会。中华文化和区域文化都以城市文化为重心”^[1]。辽代是一个契丹贵族掌握统治权的朝代。契丹族由一个崛起于古华夏边地, 以游牧和渔猎为其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 发展到据有东北、西北大部、华北北部广大地域, 建立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政权, 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辽朝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并不是孤立的, 它对于整个华夏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影响作用。这不仅体现于辽与五代政权、与北宋、西夏、金国的政治、外交、军事交流与斗争, 而且对华夏地区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历史影响有些甚至延续到了金、元、明、清时期。这种历史影响在一直作为古代华北重要城市的北京表现得更为典型。辽代的南京城, 对金代都城休闲文化的形

成和发展影响深远。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来揭示辽代南京地区（本文的中南京即今北京）各类城市居民的休闲文化生活景观。本文主要分析了辽代帝王在今北京地区的休闲活动、市民节日休闲习俗、体育游艺竞技活动、文艺演出活动、官僚贵族的休闲生活以及辽南京城市居民休闲的总体特征。

一、辽的“四时捺钵文化”与帝王的休闲生活

（一）辽捺钵活动休闲功能的探讨

捺钵是辽代帝王及其贵族集团分四时前往各地，从事游猎、政务活动的一种政治制度。辽代的捺钵地兼有开展政治、军事、休闲活动和保留原始生活习俗的复杂功能。而且，辽代的捺钵是一种世代相袭的政治制度。

1. 辽代的捺钵活动具有丰富的休闲功能

这是因为辽代帝王在捺钵地所开展的活动带有很强的娱乐消遣成分。如打猎、捕鱼显然不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严肃性生产活动，而是在保留和传承民族传统的同时对生活乐趣的一种追求。如《契丹国志》“渔猎”条曾经记载了宋真宗时派往辽贺生辰的使者晁迥在长泊（疑为长冻）观辽主围湖射猎鹅、鸭的盛况。其场景极合《辽史》所记。当时，辽主亲射，每初获战果，即“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又好以铜及石为槌，以击兔。”^{[2]226}不仅春捺钵如此兴味盎然，而且“每秋则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毡帐，籍草围棋、双陆，或深涧张鹰。”^{[2]226}辽太宗自称“以打围食肉为乐”。^{[3]1532}辽庆历十三年（963年）三月，穆宗在猎获很多雁鸭后即“还宫，饮至终夜。自是，昼出夜饮，迄于月终。”^{[4]1320}辽帝出外捺钵，往往母子兄弟、妻妾相随。如“隆庆者，隆绪之弟。契丹国母萧氏之爱子也。……炭山北有凉殿。夏常随其母往居之，妓妾皆从。穹庐帘幕，道路相属。……。”^{[5]892}辽帝及出游者的休闲活动包括射鹿、射虎、张鹰、猎鹅鸭、钓鱼、下围棋、玩双陆等，这些活动娱乐性较强，以至有些帝王乐而忘返，痴迷其中，对国家政治活动带来了不利影响。对于这些游猎活动带来的危害，辽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官员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耶律余睹曾在保大元年《降金上书》中说“辽主沉湎。荒于游畋。……”^{[6]337}

2. 辽主选择捺钵地点时十分重视休闲功能因素

辽主选择捺钵地点时十分重视休闲功能因素，如春水、秋山、夏避暑、冬避寒。所选地点要有独特的气候优势，适于居住。春水常在东北松花江一带，秋

猎常于庆州境内诸山，夏天则前往较北的永安山、炭山纳凉，冬天则多去永州广平淀等地避寒。从具体选址上看，捺钵地常具备居住和开展多种休闲活动的地形地貌和植被特点。如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多沙碛，多榆柳杏林。”^{[4]374}又如广平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4]375}秋猎之地，必动物山林繁盛之处。《辽史·营卫志·行营》所反映的捺钵地点四季各有一个，但从《辽史·皇帝本纪》和《辽史·游幸表》来看，辽代诸帝出行范围远远超出了以上四处。根据傅乐焕的研究，由《宋使使辽路线系统表》可以发现，宋使使辽的目的地除幽州、中京、上京、东京四个都城外，其余见到辽皇帝的地点多在休闲地，有炭山、九十九泉等。

辽捺钵制度是对过去游猎迁徙习俗的保留，但同时加入了强大的政治功能。由于辽帝不习惯于宫中的定居生活，因此除少量时间住在五京的宫中外，其余时间均在各地过着流动的捺钵生活。辽“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4]375-376}正如著名辽金史专家傅乐焕先生指出：“辽代政治中心，不在汉人式的五京，而在游牧式的捺钵，……。”^{[7]94}与此同时，在捺钵地开展的各类射猎、击鞠活动对于保持辽兵的战斗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体现了捺钵的军事意义和功能。

（二）辽帝在南京地区的捺钵活动

1. 延芳淀猎鹅

延芳淀是辽帝春捺钵的地点之一，在今通州区南境，当时主要活动内容为捕鹅。《辽史·地理志》南京析津府《灤阴县》下云：“本汉泉州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灤阴镇，后改为县。在京东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鸞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擒之。鹅坠，恐鸞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鸞，得头鹅者例赏银绢。”

据《辽史·本纪》统计，辽帝幸延芳淀游猎活动集中于圣宗一代，尤其圣宗统和年前半期。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辽宋连年战争，使辽南京成为前线军事重镇，为加强南边的防御，辽圣宗与其母承天太后多驻南京，

就近从事春猎鹅活动。

2. 凉淀避暑

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划出了辽代北京昌平县的湖泊凉淀的范围，从图上可知，该湖泊位于小汤山镇东南，连辽温榆河，疑是辽帝夏避暑凉淀之一。是否圣宗朝为多？因缺乏史料依据无法深入研究。

二、辽南京城内和近郊的风景名胜

辽代京城内常以果园、菜园为风景区。南京城也是如此。见于历史文献的有内果园、柳园、凤凰园，其中以内果园最著名。《辽史·圣宗纪》载：“太平五年（1025年）九月，圣宗驻蹕南京。……十一月庚子，幸内果园宴，京民聚观。”^{[4]264}内果园为南京城内一处皇家园林，允许京民观赏游览，带有较大的开放性。辽代南京城的皇家园圃特色休闲活动主要为长春宫观牡丹。《辽史》中多见圣宗游长春宫，观牡丹的记载。如“统和十二年（994年），壬申，如长春宫观牡丹”。^{[4]265}辽代称今北海公园内的琼华岛为“瑶屿”。《辽史·地理志四》云南京“中有瑶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言：“琼华岛，在太液池中。……其巅古殿，相传本萧太后梳妆台。”

三、辽代南京城的节日休闲习俗

辽朝官定的重要节日有正旦、上巳节、中和节、中元节、狗头节、重九节、烧甲节、冬至、腊辰日等。^{[8]431}这里只探讨有典型休闲活动的几个节日。上巳节走马射兔是一项辽代很时兴的休闲活动。《燕京杂记》载：“辽俗，三月三日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者下马跪进胜者酒，胜者于马上接盏饮之。”^{[2]228}而佛诞日游城玩乐则胜似一场古代的全城大狂欢。每年四月八日，京府及诸州，各用木雕悉达太子一尊，城上舁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①重五日则流行射柳和打马球。射柳，在辽代先是祭天仪式中的一种必备活动。在遇到干旱时，契丹帝王常举行祈雨仪式，仪式后“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4]835}次日再让子弟射柳。以后，演变为契丹人在端午节的重要活动项目。《辽史·礼志》仅记载有端午节辽人采艾叶、食艾叶糕、戴“长命缕”、君臣宴乐之事，未谈及射柳。《契丹国志》也未有端午射柳之记载。但《金史·礼志》载：“辽俗，重五日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

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弛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帐，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至三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击鞠入网者为胜。球状如小拳，以轻韧木枒其中而朱之。”可见，辽代端午射柳之俗是事实。由此可推断，端午射柳像辽其他节日习俗一样，很可能是契丹族对汉族端午习俗的一次再创造，揉入了游牧民族的特点和爱好。辽南京的中元节盂兰盆会也别具特色。七月十五日称中元节。辽契丹从七月十三日开始过中元节，帝王习俗与百姓不同。《契丹国志》卷二十七《岁时杂记》云：“七月十三日夜，国主离行宫，向西三十里卓帐宿。先于彼处造酒食，至十四日，应随从诸军并随部落动番乐，设宴至暮，国主却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早，却往西方，令随行军兵大喊三声，谓之‘送节’。此节为‘赛离舍’，汉人译云‘赛离’是‘月’，‘舍’是‘好’。谓‘月好’也。”《日下旧闻考》引《燕北杂记》与《辽史》皆载有契丹人有迎节、送节、笑节之俗。而南京的汉人则因佛教中的目连救母日时常举办盂兰盆会，“以百味五果置盆中，供养十方僧众，并于此日设道场祭悼亡魂。后被称为‘鬼节’。”^{[9]352}辽代的南京城居民在重阳节有射虎饮宴、登高饮茶、食兔肉的习俗。“辽俗，九月九日打围，赌射虎，少者为负，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地高处卓帐，饮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酱拌食之。”^②在《辽史·本纪》中也有皇帝重阳登高饮菊花茶的记载。后食兔肝改为食兔肉。辽人食兔肉的习俗一直流传到明清时期。《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八引《陈琮诗注》云：“重阳前后设宴相邀。席间食兔谓之迎霜兔。”

以上这些辽代节日休闲习俗反映了辽契丹人在进入南京后很好地将本民族生活特点与汉族节日习俗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生活习俗。王玲的研究认为，契丹的节日习俗正源于幽燕地区。因此《日下旧闻考》的《风俗篇》并未单列幽燕风俗篇，而只是录入了《辽史》和《契丹国志》的内容。

① 悉达太子为西域净梵王子，即佛祖释迦牟尼。各文献中对佛祖诞辰日的记载差异很大。《契丹国志》卷二十七《岁时杂记》、《辽史》卷五十三《礼志六》均作“二月八日”，《岁时广记》卷二十《佛日》作“四月八日”。《辽文汇》四作四月八日，实应为四月八日。

②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风俗》引《燕北杂记》、《契丹国志》卷二十七《岁时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325页。

四、辽代南京的体育游艺竞技活动

辽南京的体育游艺竞技活动包括：打马球、角抵、棋类等活动。朱瑞熙等学者对古代球类有很好的研究。“球类运动统称为‘球鞠之戏’，从前主要流行于上层及军中，宋代普及到民间。乘畜挥杖击球称“击鞠”，又称打马球。乘马击球叫大打，通常实行双球门制，乘骡、驴击球叫小打，一般实行单球门制。球用木料制成，体积如拳头，表面涂漆，或素色，或彩绘。击球入球门即得筹。先赢三局者胜。”^{[8]281} 辽代盛行打马球。《金史·地理志》云：“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宋史》卷262《李涛传》称：辽穆宗“好击鞠”。《辽史》卷十八《兴宗本纪一》载，兴宗曾“召善击鞠者数十人于东京，令近臣角胜”。兴宗本人“击鞠无度”。道宗也乐此不疲，耶律塔不也“以善击鞠，幸于上，凡驰骋，鞠不离杖”。《辽史·本纪》中皇帝击鞠的记载有很多。《辽史·地理志四》云南京城“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朱瑞熙等学者认为“相扑又称角抵或争交，即摔跤。辽朝的相扑可分为两类：一为自我娱乐。另一为相扑表演。”《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载：太祖在处死耶律化哥等叛逆者时，赐犯人们一日宴，酒罢，可纵情随意歌舞、戏射、互相角抵为乐。此为角抵的自我娱乐功能。角抵的表演功能体现在它常被用于接待外国使节的宴会或满足帝王贵族的休闲需求上。这样的记载很多。辽代将一些特别流行的文艺娱乐项目列入国定的礼乐制度中，如击鞠、角抵、杂剧表演等。《辽史》卷五十四《乐志》就规定：“皇帝生辰乐次：酒一行，箏策起，歌。酒二行，歌，手伎入。酒三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四行，……。酒五行，笙独吹，鼓笛进。酒六行，箏独弹，筑球（击球）。酒七行，歌曲破，角抵。……。曲宴宋国使乐次：酒一行，箏策起，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五行，……。酒六行，笙独吹，合法曲。酒七行，箏独弹。酒八行，歌，击架乐。酒九行，歌，角抵。”^{[4]892-893} 这实际上构成了一台综合性文艺汇演。张舜民《画墁录》称：辽人“角抵以倒地负，两人相持终日，欲倒地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覆面而走”。辽上京的角抵艺人，尤以“并、汾、幽、蓟为多”。^{[2]238} 有学者认为这些相扑手自唐末、五代以来由幽州进入辽境，为辽代相扑的兴盛做出了贡献。^{[8]281} 也有人猜测由于辽南京是我国北方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高丽和日

本的角抵也可能是由燕京逐步传入。^{[9]355-356} 辽代北京流行的棋类活动有围棋和双陆。《契丹国志》卷二十三《渔猎时候》称：“夏月以布易毡帐，籍草围棋、双陆。”南京作为辽朝文化最发达之地，棋类活动十分普遍，水平较高。据《方輿纪胜》等史籍记载，辽与宋常举行围棋比赛。宋“蔡州有村童，能棋，里中无敌”。他往辽国赛棋寻偶，在燕京与“棋国手”“校胜负”，对方“乃一女子妙观道人”，最后“卒得女为妻”。^{[10]398} 此故事成为明代凌蒙初著《二刻拍案惊奇》中小说《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的素材来源。双陆是我国古代流行的一种棋类活动。双陆玩者分黑白两方，相向而坐，局如棋盘，左右各六路，因此叫双陆。每方各有棋子十五枚，棋子为马头形，因而玩双陆又称“打马”。辽南京十分流行。洪皓《松漠纪闻》载：“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设棋具也。”汉族人和契丹、女真贵族也擅此棋。

此外，辽还有种类多样的博戏活动，如叶子格即后世的纸牌。^{[8]290} 《归田录》卷二称：唐世士人宴集，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犹然，后渐废不传。辽穆宗曾“与群臣为叶子格戏”^{[4]142, 2478}。然而辽时最流行的博戏为双陆。

五、辽南京地区的艺术演出活动

艺术活动又可分为说唱、舞蹈、杂技、戏曲四小类。说唱包括“说话”、“杂说”和“演唱”。说话即讲故事，讲故事的艺人被称为“说话人”，讲故事的底本称“话本”。杂说以机敏、诙谐的语言引人入胜。^{[8]269-270} 目前所见的文献尚未发现北京说唱者的事迹。对辽舞蹈的研究限于资料的缺乏，目前还不够深入。由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十二《真定舞》可知在辽有唐、宋舞蹈演出。由《涑水亭杂识》及王曾《使辽录》可进一步发现在辽南京至少有“手伎”、“踏追”、“莽势舞”等舞蹈流行。辽画《卓歌图》等，为了解与研究辽舞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广义的杂技包括魔术、口技与马戏，狭义的杂技当时叫“踢弄”。踢弄因杂技节目往往离不开踢与弄而得名。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载，金初继承辽朝艺术传统，有“踏索”、“上竿”等杂技表演。这说明了辽代的存在几种杂技表演节目。戏剧包括傀儡戏、影戏、杂剧和南戏。辽代盛行杂剧。《辽史》卷五十四《乐志》载，辽朝庆祝皇帝生辰及宴请宋朝使者，席间均穿插演出杂剧。辽代杂剧主要流行于南京地区。当时辽演杂剧需化妆，有

故事情节，常以宋代历史事件或中原历史人物入戏。这可能与南京长时期作为文化经济交流中心有着密切关系。在北宋开封和南宋的杭州城中，艺人不仅结社，^{[11]67}而且部分社团有自己固定的演出场所，这些商业化的文艺演出场所被称为瓦舍、勾栏。北宋开封的瓦舍见于《东京梦华录》者有 10 座，即新门瓦子等。南宋临安的瓦舍见于《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者有 23 座。都城以外的不少城市也有瓦舍，如建康府的新瓦。^{[8]268}此外开封还有露台供演戏之用。韩光辉先生认为辽南京城内的人口有 2.2 万人，^{[12]59}辽政府每年税入的一半来源于南京地区。南京是五京中最大、最繁富的一个。^{[13]79}作为一个辽文化最发达又处在与宋文化交流最前沿、杂剧流行的北方重要城市，也可能存在固定的演出场所。遗憾的是，由于辽代文献的缺乏，我们至今无法找到有关南京城市演出活动地点瓦舍、勾栏的记载。

六、南京贵族官员的休闲活动

（一）宗教胜地的观景与崇奉活动

值得关注的是金章宗八大水院之一的阳台山清水院在辽代即已存在。辽咸雍思念沙门志延就记载了当时阳台山的胜名。“……阳台山者，蓟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跨燕然而独颖，侔东林而秀出。那罗窟邃，韞性珠以无类。兜率泉清，濯或尘而不染。山之名，传诸前古。院之兴。止于近代。……俗流士女，时顶戴而请福。……”。^{[6]187}说明当时清水院已成为佛教胜地。据《全辽文》卷四附《金石萃编》跋文，“按清水院在京城西七十里，距圆明园三十余里，宛平县所属。山半有泉，下注如垂绅。……清水院之额，始于辽而沿于金，《帝京景物略》载金章宗有八院，此其一也。后易名‘灵泉’，明宣宗宣德三年建寺，更额「大觉」，今仍之。”陈述先生认为阳台山清水院即今北京西山大觉寺。^{[6]188}侯仁之先生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亦持此说。^{[16]22}但当时的清水院功能从现有资料来看属于纯粹寺庙，周围风景较好，不同于后来金的行宫。

房山云居寺也是辽代著名的佛教胜地。“……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仅有万家，预馈供粮，号为义食。是时也，香车宝马，藻野纒川，灵木神草，赦赫芊绵，从平地至于绝巔。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先是庚子年，寺主谦讽和尚为门徒之时，会仆自皇后台操觚之暇，被褐来游，论难数宵，以道相得。……”。^{[6]80}可见，当时百里之内大概相当于今北京近郊范围内的

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皇室女眷都乐于前往求香拜佛或与高僧交友。不仅如此，此山及寺也易引起游客青睐。石室所藏石经就是在辽圣宗太平年间枢密直学士、时涿州知州韩绍芳在从政之余“命从者游是山。……陟是峰，暨观游间”而发现的。辽南京城中新建的著名寺庙有大开泰寺、大昊天寺、城东大延寿寺等。前代庙宇中，奉福寺（在栗园）在道宗时得到重建，“每岁四月八日大阐佛会，都人咸瞻敬焉”。唐的宝集寺也是辽时盛刹。“尽管在香山有中丞阿弥勒的私人园囿，在阳台山有清水院，但当时郊区庙宇分布的重心还是在燕京城的西南郊房山一带。房山境内的上方山，自隋唐到辽益加兴盛，成为当时京郊著名的佛教盛地之一……。”^{[17]3}辽著名文人王观曾认为新建的大昊天寺“……或鹿苑龙宫之旧迹。……”^{[6]186}，也是著名的佛教圣地与游览地。

（二）官员在公共空间的闲暇生活

终辽一代，正史对贵族官员的闲暇生活少有记载。现存史籍中北京地区官员休闲生活的记载更少。倒是《全辽文》为我们留下了一点珍贵的史料。辽圣宗朝名臣析津府宛平县人张俭于南京有皇帝所赐“北第”。其在世时，“……西园之冠盖相望。客常满座。北海之樽壘不空。……”。^{[6]128}涿水人耶律琮“优游自得，不拘官爵，而乐之以琴棋歌酒，玩之以八索九丘。雪落西园，□□□王之赋。花开南馆，□□宋玉之诗。……”。（注：□符号表示该处缺一字）^{[6]85}由此可以推测，辽时北京的西园、北海、南馆是官员常观景聚会之所。但具体地点无考。此外，南京城“又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皆邀朝士游观。城南门外有于越王麻，为宴集之所。”^{[13]77}城南门外的永平馆，旧名碣石馆，也是官僚、使者宴集之所。辽兴宗于重熙十一年九月“闰月，幸南京，宴于皇太弟重元第，泛舟于临水殿夜饮。”^{[4]1315}

辽代南京地区是一个汉、契丹、渤海、女真等多民族聚居的北方重要城市，它又处于辽宋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最前沿，因此这种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使这个城市的休闲生活既区别于南边的宋，又区别于北方契丹传统的生活习俗。这座城市的开放性使它能够较快吸收汉族的生活方式，又结合契丹的本民族特点进行了改造，使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成为契丹内地新的生活习俗的发源地。如上巳节走马射兔、端午射柳、击鞠等，重阳登高饮菊花酒、食兔肉等习俗。而且其中一些习俗一直延续到金元明清时期。这是值得给予足够关注的。我认为辽南京的这些变化实际上

是辽契丹族汉化程度的标尺，也反映了汉族儒家文化、民间世俗文化和佛教文化对这个少数民族的强大影响。这一时期由于南京仅是一个陪都，加之它大多数时期只是作为一个防御功能较强的军事重镇，城市的军事化管理也影响了城市文化尤其是市民文化的发展，使得城市对于帝王贵族和市民的休闲功能不够完善。这表现在辽帝在南京近郊没有建设大的行宫，庙宇多集中在城内，近郊的庙宇主要在西南房山、近郊马鞍山（建了戒台寺）一带发展，近郊也缺乏以游览为目的的风景名胜区，园林风光崇尚自然。也就是休闲地的建设明显缺乏。庙会活动虽然规模较大，但其中宗教朝拜和世俗功利的动机可能占了主要成分，休闲娱乐动机发育不够。当然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还很难准确把握辽南京城市休闲文化景观的全貌。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文的探讨无法从北京地域的空间格局上展开系统的地理研究。本文的写作目的旨在引起历史地理学界和休闲学界对辽南京休闲问题的重视，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参考文献：

- [1]皮明麻. 城市史研究略论[J]. 历史研究, 1992(3).
- [2]叶隆礼. 契丹国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3]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脱脱. 辽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5]江少虞. 宋朝类苑[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6]陈述. 全辽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7]傅乐焕. 辽史丛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8]朱瑞熙等. 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9]曹子西主编. 北京通史: 辽代卷[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4.
- [10]洪迈. 夷坚志补[M]. 何卓,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1]周密. 武林旧事: 卷 3[M]. 李小龙, 赵锐, 评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2]韩光辉. 北京历史人口地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13]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 北京史[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14]侯仁之. 北京历史地图集: 第 1 集[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5.
- [15]伍旭昇. 北京城及近郊庙宇分布的历史变迁与庙宇对文化的塑造和影响[D]. 北京: 北京大学, 1988.

The Leisure Landscape Research of Nanjing City during the Liao Dynasty

WU Cheng-zhong, TIAN Yun

(Research Center of Culture and Leisure Industry,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nabo activities of emperors in Nanjing City during the Liao Dynasty included: hunting the geoses in the Yanfangdian Lake, passing the summer in the he city in Liangdian Lake. There were many places of interest in the inner city and suburban part of Nanjing City, such as Neiguo garden and so on. Riding horses and shooting rabbits in Shangsi Holiday, excursing the city on the buddha's birthday, shooting the willow in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so on, were popular leisure customs in holidays. The sport leisure and amusement activities included: playing polo, rassle and so on. The art performance activities include: spoker word, dancing and so on. The sacred sites and public leisure space were the main outdoor leisure area for the noble and officials in Nanjing city. The militarize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it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culture, and restricted the exploitation of city' leisure function.

Key words: leisure; nabo; Nanjing; Liao Dynasty; Customs

继承中国传统宗教文化 发展现代宗教休闲

吴树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旅游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 以佛道二教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 其对现代休闲的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借助于宗教休闲文化可提高休闲活动的创造性与建设性, 克服非积极的休闲方式带来的负面效果; 二是宗教休闲有助于改善休闲者的健康状况, 实现身心的和谐统一。发展适应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的现代宗教休闲, 应遵循如下原则: 以服务社会大众为根本宗旨; 与传统宗教的现代转型相结合; 保持必要的宗教神圣性和超越性。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基础上, 可从彻底取消寺庙的门票收费、大力推广普及寺庙休假、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弘扬宗教休闲文化、探索发展宗教休闲文化产业等方面着手, 推进现代宗教休闲的发展。

关键词: 传统宗教文化; 宗教休闲; 佛教; 道教

中图分类号: B916; G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112-05

收稿日期: 2013-07-27

作者简介: 吴树波 (1979—), 男, 湖北天门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讲师, 休闲学博士。

一、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之于现代休闲的意义与价值

以佛教和道教这两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宗教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 曾对传统社会中的士人和庶众的休闲思想与休闲行为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是传统中国人休闲生活中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在传统中国社会, 儒释道三教形成三足鼎立的文化结构, 佛道二教对于官方所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 是不可或缺或有益的补充。佛道二教开出的休闲空间, 为历代众多士人提供了在经世活动之余安宁心身的人生后花园。从历史上看, 亲近宗教者未必一定会成为虔诚的宗教徒, 对很多人来说, 宗教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休闲选择。与宗教有关的休闲生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不仅职业教徒的宗教生活有不少休闲成分, 非教徒的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 如游访寺庙, 与出家人一起谈佛论道、品茶弈棋或是吟诗赋词等等, 亦皆属于宗教休闲。在传统中国社会, 宗教休闲的惠泽对象也并不仅限于知识阶层, 普通百姓亦可通过闲暇时前往佛寺道观朝拜、观香等活动获得心灵的安慰, 更可在与传统宗教有关的民俗活动 (如节庆、

庙会) 中体验到轻松与欢愉。

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今天, 传统社会早已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 国人所拥有的休闲时间的数量, 休闲的内容与方式, 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 传统宗教文化是否仍然能在人们的休闲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答案是肯定的。一如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其他成分一样, 传统宗教文化亦有其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 这一点在休闲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现今中国民众拥有的闲暇时间已较往昔大为增加, 节假日和双休日已占到全年的 1/3, 而且还可能会继续增加; 民众的休闲娱乐方式也空前多样, 且新的方式还将层出不穷。然而, 自由时间和可选娱乐方式的增加并不能保证休闲体验的内在丰富性。如果闲暇不能利用到有价值的活动上, 如果休闲娱乐活动的品位不高, 休闲者可能会因意义的欠乏而感到空虚和无聊。早在 50 多年前, 埃里希·弗洛姆 (Erich Fromm) 即曾指出: 尽管现代人有的是时间和财力进行娱乐消费活动, 但很多活动是缺乏创造性的, 因而不仅不能带来自我内部的发展, 反而加重了现代人的一种普遍的精神情绪——厌倦^{[1]161-162}。查尔斯·布莱特比尔 (Charles K. Brightbill) 也曾在 1960 年出版的《休闲的

挑战》一书中充满忧虑地写道：“对于那些不知道如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使用闲暇的人来说，随着闲暇的增加，厌倦的威胁也在增加。”^{[2]24}“除非我们有正确的价值、兴趣、技能和机会来建设性地使用正在增多的自由时间，否则就会出现更多的厌烦、绝望、消沉，以及对性刺激的屈从和流血事件。”^{[2]27}弗洛姆所说的“创造性”和布莱特比尔所说的“建设性”，均指向休闲的正向价值，是一种应然的追求。创造性、建设性的休闲实质就是有文化内涵的休闲。然而，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的不是休闲时间，而是休闲文化^[3]。由于缺乏良好的休闲文化的引导和润泽，不少人选择了不够积极甚至是消极的休闲方式来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如长时间看电视或上网聊天，沉迷于虚拟的网上游戏或现实中的麻将牌戏等。甚至还有一部分人等而下之，选择“黄赌毒”等反文化的方式来打发剩余的时间。这些非积极的休闲行为，均可能削弱人的创造力和活力，使人对现实生活产生厌倦。

弗洛姆指出，根本性地回避厌倦的方法，乃是“通过富于创造性的生活体验快乐”^{[1]62}。富于文化内涵的休闲正无疑是这样的根本性方法，因为“文化所能提供的一切文娱活动都是帮助人从多方面逃离厌倦状态的避难所，目的在于让人容易逃脱自己的现状，避开厌倦的威胁”^{[1]62}。

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文化形式，素以“治心”为最首要的功能，即通过为人提供精神慰藉与意义支撑，转换人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从而有效地消解包括厌倦在内的种种负面情绪，使人从心灵失序的生存状态中摆脱出来，得以满怀信心、从容自在地直面人生的种种际遇。以博大精深之佛、道二教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倘能加以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发挥其内蕴的“治心”功能，必将有助于闲暇宽裕的现代人找寻和领略生命的意义，有助于人们真正享受休闲这一人“成为人”的过程。

传统宗教文化的现代休闲价值还体现在其养生功用上。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和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化，身心失调已经是相当普遍的问题。身心失调在生理上的表现常常是身体的亚健康化。一项全球性调查的结果表明，真正健康的人仅占 5%，经检查、诊断患有疾病的人也只占 20%，其余 75%的人则处于亚健康状态；我国卫生部对 10 个城市的工作人员调查的结果也表明，处于亚健康状态者占总人群的比重高达 48%。^[4]通过休闲来放松自我、增进健康是不少

现代人的养生追求。此一追求恰为宗教休闲文化提供了用武之地，因为宗教休闲带来的对心理压力的缓解和对生存焦虑的克服，会有利于身体的放松，有利于机体免疫力的提高和活力的增强，从而使休闲者的整体身心健康状况得到改善。通过宗教休闲而获致心安身泰并非一定要信仰某种宗教。如不信仰佛教者也可以通过了解佛教文化而获得关于平常心的启发，或是借鉴佛教徒的禅修而习练静坐，以获得身心的安泰。道教中更有着众多的养生之术，如静坐、吐纳、存思、胎息、导引等各种动静功法，无论有无神仙信仰皆可习练，且一般来说只要习练得法，都能有裨于健康的恢复与维持，能助使人在神清气爽的基础上达致身心的和谐统一。

二、发展现代宗教休闲的原则

传统宗教文化对于现代休闲来说既有如上文所述之意义与价值，则宗教休闲理应成为现代休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如何将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嫁接，发展适应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的现代宗教休闲，就成为我们应该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笔者以为，发展现代宗教休闲应该遵循如下原则：首先，应以服务社会大众为根本宗旨。

中国佛教和道教本皆有着平等地普济群生的崇高追求，然而在传统社会中，不同阶层的社会人群受惠于佛道文化的程度却存在很大差别。一般来说，身居社会上流阶层的文人士大夫们相比位于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能从佛道教文化中获得更大的休闲益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止一端：文人士大夫们在闲暇时间方面通常较庶民百姓更为宽裕，因而能更多地接触宗教文化，体验宗教休闲；文人士大夫们因其文化素养较高之故，对宗教文化多有较深的理解（普通百姓的理解常停留在求神拜佛可消灾得福的浅表层次），通过宗教文化所得的休闲体验也更为纯正和深刻。此外，宗教徒们自身的意愿偏好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中国古代，不少僧人道士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明清以前尤其如此），在面对俗世大众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倾向性，即更愿意与文人士大夫（而非普通百姓）作较深入的接触交往。文人士大夫和僧人道士皆属于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所说的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有闲阶级，有闲阶级比属于劳动阶级的普通百姓更能享受宗教休闲似在情理之中。然而，现代中国社会早已不再是有闲阶级独享休闲的社会，而是进入到了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

如前文所说，当前中国人所享受的节假日和双休日已经占到全年总天数的 1/3；另据调查显示，中国人平均每日的自由时间也已经达到 6 个小时以上^[3]。在普遍有闲的现代社会中发展宗教休闲，应该以所有的社会大众而非某些小众人群为服务对象，应尽量为有意于宗教休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和待遇，使宗教平等利生的精神在现代休闲中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落实。

其次，应与传统宗教的现代转型相结合。

发展现代宗教休闲是传统宗教实现现代转型的一个极好的切入点。现代宗教休闲以服务全体社会大众为根本宗旨，这就要求宗教不能太过于注重自利清修，而应该走出山林，走向社会大众，使大众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认识乃至接受宗教文化，并从中得到其他文化形式所难以提供的休闲益处。宗教为适应时代的要求而走向社会大众，也可以说是新时代的民间化。宗教在新时代的民间化与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民间化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封建社会末期，宗教的民间化多表现为一味迎合民众的世俗需求，通过经忏、斋醮等法事活动为之超亡度魂，消灾祈福，以赚取经济报酬。如此民间化之后的佛道教常常夹杂着不少世俗迷信的成分。而在当今时代，为契现代社会之机，走进民间大众的宗教应带有更多的理性色彩。为此，便有必要对传统宗教的有关教义内容做出创新性的诠释或调整。佛教在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佛教现代转型的根本方向是建设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提倡者们通过考索佛教的原始经典，论证了出入世并重、自利兼利他乃是佛陀本怀，强调欲成佛道应先修人道，以人间为关怀的重点。有了这一思想框架，在现代社会中藉助种种休闲形式以弘传佛教文化便具备了相应的合理性。在道教的教义调整方面，笔者认为牟钟鉴先生的建议较为可取。牟先生说：“传统的神仙形象，一是长生不死，二是逍遥自在，三是神通广大，现在相信的人不多了。应当对‘神仙’的内涵作新的诠释，使人们觉得做神仙是可能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就有许多活神仙。我想神仙并不神秘，他是人修炼而成的，他应具有这样的特性：一是生命力深厚旺盛，因而能够健康长寿；二是精神境界高超，摆脱‘小我’而成就‘大我’，所以精神可以不死；三是智慧超群，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却又大智若愚，和光同尘；四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功德在世；五是潇洒自在，豁达从容，善于化解烦恼，始终保持喜乐的心境。能够做到以上五条，就可以称为活神仙。”^[5]对神仙概念作这种与时俱进的新诠释，能使道教信仰被更多的现代人认

可和接受，也能使道教休闲更易推广和普及。

第三，保持必要的宗教神圣性和超越性。

宗教之所以能异于其他文化形式，并成为人们的信仰对象，乃在于其对神圣境界的崇高追求，在于其超越现实的品格。应当承认，出于救赎的目的，“宗教也不可能没有‘世俗性’”，“因为宗教也是社会中的一分子，它所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俗世信众，如果一味神圣清高，则会脱离群众”^[6]；然而，若过于世俗化，就会稀释宗教的神圣性和超越性，甚至使宗教丧失掉区别于其他文化形式的独特价值。过于世俗化的宗教，也可以说就是庸俗化的宗教。宗教走向过度的世俗化或曰庸俗化，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过于商业化，二是过于娱乐化。宗教商业化的现象古已有之，前文曾谈到的古代僧道们通过为民众提供经忏、斋醮等法事服务而换取物质利益的现象就是宗教商业化的表现。在现今社会，宗教商业化不仅没有绝迹，反而赶乘市场经济之风潮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例如曾见诸媒体报端的“天价香”、“天价养生班”，收费服务的“高考祈福法会”等，均难脱庸俗化之嫌，因而招致社会大众的普遍讥议。现今宗教界也存在过于娱乐化的现象。如有些寺庙在举行宗教节庆或法会活动时组织锣鼓队表演、演唱流行歌曲，剪彩时邀请模特并安排礼仪小姐，等等，这些带有极强的世俗娱乐色彩的活动，将宗教圣地肃穆庄严的气氛冲得荡然无存，不能不说是走过了头。牟钟鉴先生在谈论生活道教时曾说：“它（道教）仍然要保持它的宗教理想，保持它的超越精神，保持它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只不过，“它的超越精神不能脱离生活，恰恰只能在积极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中实现生活的超越。”^[5]笔者以为牟先生的话不仅对于道教，对于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来说，也是至理之言。

今日中国宗教中存在的过度世俗化的现象，应引起宗教界的高度警惕和深刻反省。宗教界应该在守持宗教核心精神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地摸索调整，“在神圣性和世俗性中探寻最适合的切入点，尽量争取在‘度’上的把握”^[6]，从而达至某种动态的平衡，防止过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行为将宗教引向彻底的世俗化和庸俗化。

三、发展现代宗教休闲的思路

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推进现代宗教休闲的发展：

第一，彻底取消寺庙的门票收费。寺庙收取门票，是当代中国大陆宗教界特有的现象。从佛道教兴起，

一直到建国以前，大陆的寺庙都不曾收取过门票；而在现今的日本、缅甸、泰国、尼泊尔以及台湾、香港等诸多宗教隆盛的国家地区，宗教场所也都是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大陆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也无一收取门票。门票制度违背了宗教平等利生的精神，剥夺了部分人群进入寺庙从事宗教活动和进行宗教休闲的权利，即使是那些有足够经济实力者，其赴庙热情也会因门票而受到打击和压抑。寺庙收取门票，有些是寺庙自身所为，但更多的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相关部门（如文物、园林、旅游等部门）出于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制性或半强制性采取的行为。无论是何种原因所致，寺庙收取门票都不合于宗教的基本精神，不利于传统宗教休闲文化的普及与传承，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中国大陆旅游景区的收入多以门票收入为主，而在旅游业成熟、发达的国家地区，门票收入通常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更多的收入来自游客在景区内的餐饮、购物以及各种娱乐活动的消费）。无论用何种理由为寺庙的门票收费制度进行辩护，都是站不住脚的。一些不收或仅象征性地收取少量门票费用的寺庙，一样生存得很好。如福建莆田广化寺就从来不曾收取门票费用，湖南长沙的陶公庙多年来每张门票仅售一元钱。近年来，关于取消寺庙门票收费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些地方已响应大众要求率先取消门票收费。如安徽九华山风景区从2007年9月1日起取消了景区内寺庙的门票收费，厦门南普陀寺从2011年3月22日起也不再对进寺者收取门票费用。在2013年5月召开的湖南省佛教协会第六次代表会议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长沙麓山寺方丈圣辉法师率29所寺院住持共同宣布：包括长沙麓山寺、玉泉寺等29所寺庙在内的湖南寺庙从2013年5月10日起一律免票。消息一出，立即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欢迎。笔者认为，现在是时候彻底取消寺庙的门票收费制度了，相关部门应出台具有约束力的政策，责令各宗教场所限期取消门票收费；对取消门票收费以后难以自养的寺庙，可由政府从地方税收收入中拨给补贴。

第二，大力推广普及寺庙休假。寺庙休假是指在寺庙中短期居住并感受宗教氛围、体验宗教生活的一种休假方式。寺庙休假作为一种新兴的休闲旅游方式，在日本、泰国等地颇为流行，深受工作压力大的年轻白领的欢迎。我国也有寺院提供类似的服务，最有名的是河北赵县柏林禅寺举办的“生活禅夏令营”。该项活动以全社会范围内的佛教青年为招收对象，不收取

任何费用（参加者可自愿随喜）。自1993年以来，柏林禅寺每年举办一届“生活禅夏令营”，每届为期一周，参与人数一般多达三、四百人。在夏令营期间，营员们除与寺内僧人一起上堂做早晚课、一起出坡劳动外，剩下的时间多是听法师或专家学者讲解佛法知识，或在法师的指导下练习参禅打坐，或者在普茶会上交流禅修心得。柏林禅寺的禅修夏令营活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现在国内举办类似禅修活动（禅修夏令营或冬令营）的佛教寺院已有多家。道教方面，湖南常德的德山善德观、浙江金华的黄大仙祖宫都曾成功举办过以体验道教养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养生夏令营。除夏令营和冬令营活动外，还有一种称为“短期出家”的活动，也可算作寺庙休假。提供短期出家服务的多是佛教寺院，一般要求参与者在短期出家期间与出家人过完全同步的寺庙生活，而且常常要求短期出家者剃光或是剪短头发。无论是禅修或养生夏令营（或冬令营），还是短期出家，都是很有意义的寺庙休假模式，值得大力推广普及。不过，笔者以为，发展寺庙休假也未必定要拘守某种固定模式，在有些方面完全可以更加灵活一些，如：除夏冬两季外，在其他时间内也可举办短期禅修或养生培训班；对短期出家者可适当放宽要求，不必强求剃发或剪发；到寺庙休假者也不必要求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只要有休假意愿并能做到遵纪守法即可。总之，鼓励寺院道观敞开大门接纳对寺庙休假有兴趣的社会人群，尽力为其提供深度体验寺庙生活的休闲机会。因各庙宇均有其容纳上限，可采取“限额报名，报满即止”的方式；相应的开支较大时，寺庙可酌情收取成本费用，不以盈利为目的即可。

第三，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弘扬宗教休闲文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文化传播，可极大地拓展文化发展的平台与空间。能广泛运用于宗教文化传播的科技手段主要有两类：广播电视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港台地区的宗教界在利用广播电视弘扬宗教文化方面发展得比较成熟，两地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均拥有自己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而在大陆，受管理制度所限，宗教界在这方面难有作为。利用互联网弘扬宗教文化的限制则要少得多。宗教界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现代网络科技，将传统宗教休闲文化的优秀内容普及于众。事实上，在互联网上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弘扬佛道文化的站点存在，其中既有佛道教居士和佛道文化的爱好者们办的网站（占多数），也有各佛道寺庙自己主办的网站。

笔者以为，出家僧团和道团在宗教休闲文化方面拥有资源优势 and “专业优势”，在利用互联网弘扬宗教休闲文化方面还应该有更进一步的作为。如除了开通一般的寺庙门户网站和僧道个人博客、微博之外，还可开通网络广播和视频点播，开发宗教文化题材的在线游戏，或利用多人在线语音交流软件（如 YY 语音）搭建网络即时交流平台，以及采用 3D 虚拟技术建设网上寺庙或网上佛道博物馆，等等，为宗教文化的爱好者们提供更多的学习、交流和休闲娱乐的网上空间。

第四，探索发展宗教休闲文化产业。宗教休闲文化产业要求借助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管理模式，开发与宗教休闲有关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在工作之余的精神文化需求。大陆一些拥有宗教文化资源的地方，如少林寺、峨眉山、普陀山、武当山、青城山等宗教名山和西安、洛阳等城市已经在发展宗教休闲文化产业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有不少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但由于观念、制度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原因，这些资源未能得到足够开发，或虽在开发却存有误区，有待进一步调整开发理念和开发措施。发展宗教休闲文化产业势必涉及到经济收益的赚取，但同时又应注意切不可过度商业化。这似乎又是一个悖论，其实未必。这里的关键还是如何把握好“度”的问题。以产业的方式开发宗教休闲文化资源难免会有企业的介入，或者是将宗教休闲文化资源交由既有企业开发和管理，或者是成立新的企业（如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江苏无锡的灵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固须盈利才能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但宗教素以利济众生为

崇高追求，这就决定了企业的经营行为不仅要符合世俗法律，也须符合宗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不能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因此，从事于宗教休闲文化产业的企业，其经营所得利润的分配必须合理，须有相当部分拿来用于寺庙自身建设和弘法（弘道）利生，或是用于社会慈善事业。为达此目的，最好由对宗教有正知正见的出家僧道或聘请具有宗教正信的社会专业人士来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

继承传统宗教文化，发展现代宗教休闲，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践问题，故上文之论仅是个人思考所及的一些方向性建议，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实践模式，对一些具体问题亦难以给出细节性的预测和指导。不过笔者相信，在政府、宗教界以及各方社会力量的联合努力下，经由不断的摸索和调整，必能克服种种实践偏差，并找到更多的发展路径，最终使宗教休闲获得长足的发展，在现代人的休闲生活中发挥更大的、更为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E. 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孙恺详,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 [2] Charles K. Brightbill. The Challenge of Leisure [M].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0.
- [3] 孙晓华. 中国的休闲时代从未真正到来[EB/OL]. http://www.stnn.cc/cul_review/200609/t20060929_347434.html. 2006-09-30.
- [4] 杨占清. 认识亚健康[J]. 解放军健康, 2010(4).
- [5] 牟宗鉴. 关于生活道教的思考[J]. 中国道教, 2010(4).
- [6] 黄夏年. 佛教与中国社会——兼谈人间佛教的世俗化问题[J]. 社会学家茶座, 2006(4).

Inherit Chinese Traditional Religious Culture, Develop Modern Religious Leisure WU Shu-bo

(School of Tour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modern leis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religious culture, mainly Buddhist and Taoist culture, are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at the creativeness and constructiveness of leisure activities can be improved by virtue of religious leisure culture and therefore the negative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non-active ways of leisure can be got rid of; the other is that the health status of people practicing leisure c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religious leisure and their body-mind harmony be achieved. When developing modern religious leisure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times and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principles as follows should be abode by: to take serving social public as the basic purpose; to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ligious leisure with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religions; to keep necessary holiness and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religions. On the basis of abiding by these principl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ligious leisure can be advanced by adopting such measures as thoroughly abolishing the system of temple entry fees, actively popularizing temple vacations, making full use of modern mea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arry forward religious leisure culture, and exploring the ways of developing religious leisure culture industry.

Key words: traditional religious culture; religious leisure; Buddhism; Taoism

低碳—循环经济耦合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

宋继革，温利华

(邯郸学院 地理与旅游系，河北 邯郸 056005)

摘 要：首先阐释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理论基础，依据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分析了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最后基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耦合发展的新探索，对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中国；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13)04-0117-05

收稿日期：2013-11-10

基金项目：2012 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2454106）；2013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民生调研专项课题（201301189）

作者简介：宋继革（1969—），男，河北邯郸人，邯郸学院地理与旅游系副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空气、水污染严重、耕地总量减少、水土流失及土地沙漠化进一步加剧，淡水资源和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灾害频繁等自然现象，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角色，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恶化日渐威胁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促进节能减排，寻求一种新型的、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与创新。创新经济方式中又以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两种方式最为典型，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体系，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产品”为主线的资源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的经济发展体系，在环保的新道路上二者存在着积极的双向因果关系，明确体现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理念，表现了相互促进良好耦合的关系，若能在经济发展中建立“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强效耦合的长效机制，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将有助于缓解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的突出矛盾，最终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84-86. [2]86-89}

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早在 1962 年，美国人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对传统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破坏做出反思，引起各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对西方工业化国家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重质疑。1987 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代表世界环境与保护委员会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在不危及后代人需求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3]10-12}。1989 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等人在《绿色经济蓝图》中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强调通过对资源环境产品和服务进行适当的估价，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统一，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2010 年我国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要以“绿色发展与创新”来应对我国推进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中国如何避免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缺陷，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答案就是我们必须以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为理论基础，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循环经济理论

18 世纪 60 年代以来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达到空前水平，至 20 世纪 90 年代，发达国家为提高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而以生态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以最小的代价和最高的效益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化，做到物尽其用。循环经济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质往复循环过程^{[4]6-8}。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途径，从资源流动的组织层面来看，主要是从企业小循环、区域中循环和社会大循环三个层面来展开；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来看，主要是从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和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三条技术路径去实现。我国在“十一五”期间组织开展的两批循环经济试点已取得了较好成效，“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从试点走向示范和全面发展，深入推进国家循环经济示范，推动循环经济形成较大的规模。

（二）低碳经济理论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上升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化石能源等常规能源的使用造成的环境问题及后果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近年来，废气污染、光化学烟雾、水污染和酸雨等的危害，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将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已被确认为人类破坏自然环境、不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常规能源的利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的特征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构筑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体系。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之中，以煤为主的这样一种高碳结构，对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和环境污染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三）生态经济理论

“生态经济”，是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运用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在不断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保障生产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形成生态上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现阶段我国城市在现有条件下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式，其本质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可承受的基础上，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形成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布局合理，资源更新和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集约、高效、持续、健康的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

可持续发展理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满足后代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其核心是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须兼顾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以资源合理利用和科学发展为目标，旨在促进社会进步并维护生态平衡。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耦合发展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保证，三者最终殊途同归，共同点都是强调人类与环境和谐、永续发展的理念。

二、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愈来愈重要，并将成为城市未来发展中的决定性要素而制约城市发展的方向和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应实现以下 4 个方面的转变：（1）从“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经济效益”的“两高一低”发展模式，转变为“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经济效益好”的“两低一高”模式；（2）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黑色经济”，转变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绿色经济”；（3）从对资源掠夺式开发、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生态侵略”，向“自然和谐”转变；（4）通过大规模的生态工程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从“生态赤字”向“生态盈余”转变^{[5]39-43}。

可见，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作为内在于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模式。在可持续发展中，环境不仅是一种发展生产力，也是一种国际竞争力的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把环境因素纳入生产率函数中、反映在 GDP 核算中，把环境财富纳入国民财富的核算中。因此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由于评价体系必须能反映城市自然生境、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水平，并鼓励城市为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为整个城市的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既要能体现城市本身的发展现状，同时要结合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为政府确定城市的发展、规划及决策等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对可持续发展评价方

法的研究还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国内实践中广泛应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一种适合利用层次分析法把选取的指标指数化，赋予权重后加总，以得分高低排名。另一种方法是给各个指标设定不同的阈值，以是否达到这一目标值为考核标准。这种方法常见于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国内学者已经初步探讨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以及如何选取指标的权重并把指标无量纲化的方法，但并没有在实践中对指标体系加以应用。有些研究没有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显然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北京工商大学构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从资源、消耗、环境、社会经济和政府 5 个方面构建了总计 70 个指标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分为参考性指标、指导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但都是定量指标。由于指标较多且多为定量指标，为评价方法的推广应用带来了相应的难度。

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和麦肯锡公司建立了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性的评价方法^[6]。从基本需求、资源充足性、环境健康、建筑环境、对可持续性的承诺 5 个方面进行衡量，共 18 个指标（表 1），对中国城市总体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由表 1、表 2 可知，哥伦比亚大学创建的评价体系，相对比较简单，主要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问题，但此评价体系对指标选择的依据和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进行分析。

表 1 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类别	定义	参数	参数描述
基本需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可以获得安全的水源、居住条件、教育和医疗服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水供应 ● 住房 ● 医疗 ● 教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水获得率(%) ● 居住空间(人均平方米数) ● 人均医生数量 ● 师生比例(小学)
资源效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能源、电力和水的高效利用；废物循环利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电力 ● 水需求 ● 废物循环 ● 重工业占 GDP 的比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电力总消耗(每 GDP 千瓦时) ● 水消耗量(人均立升数) ● 工业废物循环利用率(%) ● 重工业增加值(亿元)
环境清洁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清洁的空气和水 ● 废物管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空气污染 ● 工业污染 ● 废水处理 ● 废物管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SO_x、NO_x、PM₁₀的密度 ● 工业 SO₂ 排放在 GDP 中的占比(%) ● 废水处理率(%) ● 家庭废物搜集和运输(人均万吨)
建筑环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密集的，以交通为导向的绿色、高效设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城市密度 ● 大众交通的使用 ● 公共绿化密集 ● 建筑物效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城市地区每平方千米的人数 ● 使用公共交通的乘客 ● 人均公共绿化面积(人均平方米) ● 建筑物供暖效率
对未来可持续性的承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对人力资源和实物资产的投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绿色职业 ● 环保投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人均拥有环境专家的数量 ● 环卫资金占 GDP 的比重

资料来源：哥伦比亚大学等（2010）。

三、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从表 2 分析结果来看，近几年，中国城市的可持续性总体状况得到改善，人们的居住空间，生活质量有一定提高，但某些指标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其中在资源效率和环境清洁度两个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国际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一直采用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遭遇了经济增长的瓶颈，2005 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 50 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分别约占世界消耗量的 7.4%、31%、30%、27%、25%、40%，而创造的 GDP 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 4%。高消耗换来的增长，导致废弃物排放多、环境污染严重，我国单位 GDP 的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水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我国在人均 GDP400—1000 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 3000—10000 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问题。2003 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为 2159 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大大超

过环境容量，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位增长，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土地、森林、水等自然资源浪费严重，煤、电、油等能源需求量与日俱增，“荒”声四起。可见，以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工业和以冶金、建材、化工材料为主的原材料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规划面临严峻考验，同时，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防方式在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导致近年来环境问题逐年显现，2013年出现的大范围雾霾天气笼罩了中国的蔚蓝天空，也笼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表 2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评价

类别	参数	趋势	对标	评价
基本需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水资源可得率 ● 居住空间¹ ● 医生¹ ● 师生比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 ■ □ 	财富的不断增加直接更好地满足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
资源效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电力消耗² ● 家庭水消耗¹ ● 工业废物循环 ● 重工业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 N/A N/A 	整体而言，资源效率尚未改善，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
环境清洁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SO_x、NO_x、PM₁₀浓度 ● 工业 SO₂排放² ● 废水处理率 ● 搜集的家庭废物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 □ ■ 	即使有改善，中国的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仍非常糟糕，远远落后于西方标准
建筑环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城市密度⁴ ● 公共交通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 	不断增加的城市密度显示中国有可能避免无序的分散性发展并继续依赖公共交通
对未来可持续性的承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环境专家数量¹ ● 环保资金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N/A N/A 	中国城市正不断增加环保方面的资金投入，这显示了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

注：□达到发达国家标准；■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改善中；→持续稳定；↓恶化中；¹人均；²单位 GDP；³占 GDP 份额；⁴每平方千米人数；⁵人均乘公共汽车次数，资料来源：哥伦比亚大学等（2010）。

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是树立科学发展观，规划引导、政策推动。政府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建设中应发挥立法者、提供者、示范者的主导作用，以建设可持续为目标，结合国内各城市的环境资源容量和经济发展需求，研究制定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台建设绿色城市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将具有约束力的环境指标纳入市、区国民经济中的长期规划，并分解到各级政府、企业和相关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科学的规划、精细的设计和周密的部署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序进行。

二是经济调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目前，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以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等高耗能、重污染行业为先行，产业发展的循环利用和低碳化的空间很大，作为探索绿色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一是要调整二、三产业内部结构，加快新一代新材料、精细化工、生物制药等战略性产业，大力发展创新金融、网络信息、创意设计等高端服务业。二是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项目，逐步降低传统重化工业部门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工业园区、企业的试点工作。早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已经开始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政府近几年来所制定和采取的国家战略、政策和行动计划等都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雏形。从“十一五”提出的战略安排看，中国在近几年提出的一系列新思维和新战略，包括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两型社会”等就是重构发展模式，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部署。从具体行动上看，中国在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推动低碳经济、经济刺激方案中的环境保护投资、建立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等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三是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政策。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工业是主导产业，企业是具体的实施者，循环经济只有能为企业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企业才会主动自愿地去实施。因此，发展循环经济要特别注意充分利用价格、税收、奖惩制度和财政等经济政策来刺激和激励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对废弃物（粉煤灰、工业废渣等）进行综合回收利用企业给予经济支持，运用资源再利用的盈利模式来提高企业循环利用资源、高效利用能源的积极性。另外政府要建立绿色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贴息、税前还贷、技术改造资金安排及集团采购时优先购买绿色产品等方式，引导循环经济的建设。

四是推动环境科技进步，积极发展环保产业。中国城市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跨越性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取决于环保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技术创新是增长的发动机，是缓解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矛盾关系的主要手段。强化环保科技平台建设，将重大环保项目优先列入国家科技计划。加快环保产业的国产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政策扶持和市场监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环保产业的发展。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环保技术装备和基础装备，培养一批有品牌，核心技术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能够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优势环保企业。加快发展环保服务业，推进环境咨询市场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

五是推动建筑和公共设施的低碳化。全面推行建筑物的低碳化，一是全面提高建筑节能效率，积极开展对所有建筑和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对现有建筑采取补建完善保温层、实施供热分户计量和收费、改造门窗和通风系统等方式完善建筑物的节能改造，二是大力推广发展绿色建筑，积极鼓励开发建设符合美国 LEED 绿色建筑标准的国际标准绿色建筑，尽最大努力用清洁能源和替代化石能源，利用再生建筑材料替代一次原生建筑材料，大力推广太阳能在建筑物取暖中的应用。进一步推进市政公共设施的低碳化，大力发展市域和城际货运和大流量客运轨道交通，发展轻轨、快速交通，优化优先公共交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体系，提高公共交通的便捷程度；另外应进一步加强水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提高固废污染物的防治能力，建设垃圾分类收集、储运系统，鼓励发展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固废减量化。

六是加强环境保护教育，营造气氛、示范带动。加强环境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研究制定和免费发放绿色发展、低碳生活的指南，吸引市民关注，鼓励企业参与，努力形成全社会关注，参与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浓厚氛围。着力控制“奢侈性排放”，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盒互联网等宣传媒体以及单位、公园、社区等宣传栏，开展广泛宣传，逐步使市民树立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对建设绿色城市的认知度。

五、结语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十二五”时期乃至今后未来更长的发展时间内，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耦合发展长效机制的建立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产业转型、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举措。这一耦合模式建设将催生新的能源革命，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生活方式革命。不仅是顺应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正确战略选择，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应对复杂多变国际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意义重大，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 [1]卢红兵. 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耦合发展研究[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2, 16(4).
- [2]鲍文. 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统筹发展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1(4).
- [3]罗勇. 城市可持续发展[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 [4]尹建华. 产业层面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5]王金南, 曹东, 陈潇君. 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规划初步构想[J]. 环境保护, 2006(6).
- [6]潘家华, 庄贵阳, 朱首先, 等. 低碳城市: 经济学方法、应用与案例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河北省文化体制改革现状与对策研究

刘颖辉, 王丽萍

(邯郸学院 地理与旅游系, 河北 邯郸 056005)

摘要: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发展文化产业是党中央做出的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 也是河北省更快更好发展、构建和谐河北面临的紧迫而重大的任务。当前河北省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 制约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本文通过对河北省文化体制改革的现状进行分析, 深入剖析我省当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现实困难与问题, 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我省文化体制改革的措施。

关键词: 文化体制; 改革; 河北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3)04-0122-03

收稿日期: 2013-09-23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改革课题“我省地方文化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课题编号: 201102023)

作者简介: 刘颖辉(1982—), 女, 河北邯郸人, 邯郸地理与旅游系系讲师, 硕士; 王丽萍(1958—), 女, 河北肥乡人, 邯郸学院科研处, 教授。

一、引言

文化是一种生产力, 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越来越重要。同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 科技体制改革等一样, 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有了突飞猛进地发展。但长期以来, 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事业相混淆, 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 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 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二、我省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近些年来, 我省文化体制改革在探索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 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尽管在推动文化建设方面不断取得新成就, 但

在改革的进程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问题, 突出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 文化体制改革面仍然面临着体制机制性障碍
政府多头管理、职能交叉问题仍然存在。新改组的文化新闻广电出版部门并没有能够实际行使起相应部门的统筹管理职能,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各个门类目前仍然分别属于文化新闻广电出版厅局、报社、文联、电视台、旅游、教育、体育等不同部门的多头管理, 不可避免地存在政府职能交叉、工作相互推诿、各行其是、重复投资、缺位与越位并存、统筹协调困难等诸多问题。^{[1]10-11}

(二) 文化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从目前的立法情况看, 我国在公共文化领域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法律法规不健全, 立法盲点较多, 文化领域诸多方面仍无法可依。到目前为止, 只有《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图书馆法》、《博物馆法》以及全国人大刚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还相对完善, 其他许多文化重要领域, 如文艺创作、文化建设、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 还没有相对完善的相关法律, 有法可依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根据领导兴趣好恶和文化理解力高低

来决定文化发展的情况在许多地方仍普遍存在。与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立法相比，文化立法总体比较迟缓，尤其是备受关注的电影电视方面没有规范的法律。

（三）政府在绩效考核中侧重于经济指标而忽视文化指标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对经济指标的强调，政府部门推行哪类文化服务、文化服务的效果如何等指标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中过度关注 GDP，惟 GDP 至上的现象普遍存在。除此之外，政府财政在文化上的投入也非常有限。据统计资料显示，我省城乡居民的人均文化资源占有量与同等水平省份或地区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基础设施在建设数量上明显不足、服务范围上十分有限。这些无一不与政府绩效考核中忽略文化指标有关。

（四）多元化投融资体制和文化创新机制亟待建立

现行的投融资体制仍未突破投资主体单一化的政策框架，社会化、多元化、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渠道不够畅通，吸引外资及民资投入文化产业的政策体系尚未建立。由于目前河北省大多数文化单位属国有性质、资金的来源主要靠政府投入和财政优惠政策，在调动民营资本和引进外资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尚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因而抑制了文化产业资本扩张。

三、加快我省文化体制改革的措施

（一）进一步理顺宏观管理、微观搞活的体制和机制

要以加强宏观管理和减少直接控制为原则，明确界定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与基层文化单位、文化组织团体的职能。由微观管理为主转为宏观管理为主，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具体地办文化转为间接地管文化。政府应从对基层文化单位的人事、财务、业务等具体管理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考虑事关文化发展的方针大计，切实履行好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运用文化政策、文化法规和文化经费，对文化艺术和对外文化交流事业进行调控，发挥政府应当发挥的导向作用。基层文化单位作为独立的法人，与政府主管部门不再是下级与上级的隶属关系，而是被指导与指导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赋予基层单位自主权，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市场运

营主体，充分调动基层文化单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增强其自身活力，真正实现“政事”、“政文”分开，宏观掌控，微观放活。

（二）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

文化法制建设的目标首先应该是法律框架比较完整，文化保护、公共文化、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市场管理等重要领域都建立起相关的基本法律制度，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化法律体系框架。另外，在完善相关框架性制度的同时，不断细化具体制度，各相关领域有专门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进行规范，逐步解决制度空白的问题，并且相关制度措施要具有科学性、有效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基本形成相对完善的具体法律制度。与此同时，既要抓好相关改革实施意见和法规的制定出台，又要贯彻好已出台的一些具体措施，努力取得人民满意的实际成效。按照“谁出台改革意见、谁负责具体落实”和“一级一级，逐层落实”的原则，确保改革措施落实到位。^{[2]29}

（三）进一步拓宽文化投融资渠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经营

自筹资金有限，银行贷款不畅，成了许多文化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尽管我国民资丰厚，但文化企业与金融市场脱节还是比较严重，资本在与文化企业对接时始终不够顺畅。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已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应鼓励、支持、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文化企业。^{[3]59}要按照“内外有序、逐层开放”的原则，逐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建立市场准入机制，对于需要产业化的文化领域或单位，逐步向社会资金开放并尽快出台文化开放领域的市场准入标准、准入程序及管理监督办法；要加大对社会投资的政策扶持力度，在项目审批、土地使用、税费征收、贷款获得、贴息享受、股票上市、债券发行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实行无差别政策待遇。

（四）政府在绩效考核要加大文化考核指标的比重，完善政府文化管理职能

政府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改变以往的过多关注经济指标而忽略文化指标的现状，切实把文化考核指标纳入到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去，建立文化 GDP 的概念，构建基于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文化 GDP 指标体系。^{[4]271-272}只有当文化发展成为考核指标，才能对文化体制改革起到积极的助推效果。江苏省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据了解，江苏省盐城

市为进一步推进文化盐城市建设，市委宣传部和市统计局定期对全市和各县（市、区）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绩效进行定量评估，具体包含：文化发展、政府投入、文化服务、文化消费四大类别，共 15 项指标。评价方案采用指数化的综合评价方法，通过合成一个单一的、体现文化发展绩效的综合指数。动态地观察分析全市文化发展状况，监测各地文化发展进程。

（五）完善和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
设立专门的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用于文化项目扶持和艺术创作。可以从各级电视台广告收入当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来补贴文化项目和艺术创作，特别是对重大题材，可以加大提取比例。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税收政策来加大对文化项目的支持，比如说减免

销售增值税等。再者就是通过彩票发行来募集资金，或者通过激励手段，完善社会资助制度。^{[5]16-17}

参考文献:

- [1]王丽萍. 邯郸市“十二五”文广体卫社会事业发展研究[R]. 邯郸市发改委“十二五”规划重大研究课题研究报告.
- [2]谢鲁. 加强文化立法推动文化发展大繁荣[J]. 宁波经济, 2008(6).
- [3]杨巍. 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以绥化市为例[D].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23(6).
- [4]周国梁. 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经济与文化, 2010(3).
- [5]赵勇. 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中地方政府行政责任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The Curret Situation and Measures of Cultural System in Hebei Province

LIU Ying-hui, WANG Li-pi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and College, HanDan, 056005, China)

Abstract: Deepening cultural system reform and developing cultural industries are major decisions of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at concern with overall situation, simultaneously, are the important and urgent task of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HeBei province. Now, the cultural system reform of HeBei province is facing many problems that seriously restrict the reform process. This article analy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system reform, deeply discussed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at the cultural system reform faced, and put forward the measures of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system reform.

Key words: cultral system; reform; HeBei province

深掘地域文化，强化精品意识，弘扬爱国精神

——《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解颐

贾永生

2009年，杨金廷先生（时任邯郸学院院长）、康香阁先生（邯郸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编审）主编的《赵文化与华夏文明》一书（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以立论精当、阐述精辟、史料精确、开掘精深、持论精准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好评如潮，科学时报，光明日报先后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了这部好书；四年后，杨金廷教授（邯郸学院党委书记、硕士生导师）、康香阁编审又主编了《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史学大家李学勤先生欣然为之作序，系统推出了一大批赵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32篇学术新作主题愈加集中，视角愈加新颖，阐释愈加深刻，涉猎愈加广博，是赵文化研究日益深化的显现。赵国古城研究、赵氏人物研究、荀子研究、赵国军事研究、赵国经济研究、赵女研究上均有新的拓展，新的突破，填补了不少学术空白，为发展中的中国学术研究增色不少。本书有这样几个显著特色，写出来与大家共研。

一、出新中求突破，精准中求深邃，开掘中求拓展，着力将赵文化研究推向更高阶段

本书一个突出的特质即是既做到了视角新颖，又能拾遗补阙，既在学术上答疑解惑，又能做到重点突破。书中首篇乃是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撰写的《关于赵王城在中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文，首次公开论述了赵王城的特有性质与西城布局的特殊构建，并专门阐释了赵王城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宫殿建筑——“龙台”，为赵王城的深入研究开了新篇。独树一帜，掷地有声。

孙继民、张润泽、董寅生三位先生共同撰写的《山西境内赵文化遗迹考察报告》一文，是在他们行经数千里，足迹遍六、七个县，详尽考察了八、九处历史遗迹，走访了数十位村民，重点勘查了和顺东部赵奢垒、和顺西部横岭镇仪城村的赵简子城、襄垣邯郸村后精心写成的。功到自然成，考察大获成功，才有了

论证周严、论据充分、论述深入的好文章，将赵文化研究推向了深层。本书在赵氏人物研究上更是别开生面，振聋发聩。在《赵简子与孔子史迹述略》一文中忠实记录、逐层剖析了晋国政治家赵简子与鲁国思想家孔子的思想交锋与政治对垒，他们二位关于铸刑鼎上的交锋，对阳虎评价的迥然不同，对中牟归属的不同政见，均写得恰到好处。孔子适值“鲁国三桓”时，赵简子正值“晋国六卿”时，两人的关系深刻反映了春秋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化与冲突，应当说，这两位政治家与理论家的冲突也是执政者赵简子与在野者孔子的冲突。两人各有千秋，两人间争端客观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活跃。该文先声夺人，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在荀子研究上更是创新多多，硕果累累，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刘又铭先生撰写的《儒家哲学的重建》一文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当代新荀学的内涵与发展，并深刻诠释了荀子未说透的生活世界，进一步论述了元气、自然、人生、社会、历史的有机关系，以气为本，理在事中，自成一统。书中一些学者深刻论析了荀子的辩证思想与科学理念；有的学者还做了以理服人的荀子故里考辨；有的学者细致探析了荀子的礼文化；有的学者逐层剖析了荀子的“等分说”、“群分说”、政治、经济“一体化”思想架构；有的学者对荀子的天人说做出新解；有的学者专门论述了荀子的美学理论特别是“隆礼圣法”的服饰美学思想；有的学者重新解读了荀子的“慎独”思想、“君子人格”论、人性论、天人关系学说，众说纷纭，但持之有故，一句话，本书的荀子研究观点新，视角新，开掘深，启迪深。

各持己见，竞相争鸣，但有一定之规，服膺真理，大胆创新，科学求证，在实事求是、慎之又慎的基础上求精，求深，求新，追本溯源，由博返约。书中对赵国军事研究、赵国经济研究、赵女研究上也有不少真知灼见，不逐一列述。总之，这是部高品位、多视角、有新意的好书，值得细读。

二、科学求证中求立论确当，详尽占有史料后求深刻挖掘内涵，博古通今，去芜取精，切实将赵文化研究推向更高阶段

这部书有个明显特征即是重事实、重考据、重阐释、重本原。有的学者花费了数十载心血，研读了大量资料，采访了许多有关人士，才去伪存真，集腋成裘，写成了呕心沥血之作。有的学者辛劳一生，求索一生，才弄清赵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这种科学求实、严于律己的精神可钦可敬。书中每一篇都下了真功夫，比如，武庄先生的《中山国灵寿城与赵都邯郸城比较研究》一文有理有据，逐层深入，多方比较，用不可辩驳的事实与说理有力论证了“都城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这样一条至理。后晓荣、胡淼二位先生的《赵国置县考——以赵国兵器铭文和玺印考古资料为主》一文是出色的重事实重考据重说理的学术论文，文中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悉心考察了邢县、埕县、南行唐、武平、井陘、宁寿、兹氏、栾县、武城、房子、邯郸、铜鞮、柏人、石城、汪陶、富昌、当城、卤城、乐城、南宫、皋狼、武阳、上艾、阳原、安国、元氏等26处地名的来龙去脉，尤重置县导因、历史沿革、突出特色，对赵国置县做了深入阐释，无懈可击，令人信服。沈长云先生以《荀子故里考辨》一文以大量确凿的历史事实与深入浅出的论析让“荀卿是赵都邯郸之人”成为定论，可信度极高。雷鹤宇先生在《略论战国时期赵国对代地之经营》一文中对代地的历史由来、本质属性、重要变迁、时代功用做了深刻剖析，对当时赵国这一重大“特区”的构成及赵国统治核心的政治智慧高度肯定。合情合理又入木三分。

科学治学精神一以贯之，求真务实精神随处可见。程动田先生在《战国邯郸‘地薄人众’国情与农商并重政策之关系探析》一文更是有据可查，有迹可寻，鞭辟入里，科学分析了战国邯郸“地薄人众”的国情与农商并重政策之有机关系，辩证求实，知古鉴今，闪烁出真知的光芒。赵艳玲女士在《入后宫‘赵女’的婚姻价值取向探析》一文中从务实性与功利性、政治性、开放进取精神三个角度论证、挖掘出入后宫“赵女”的婚姻价值取向，进而从大量历史事实中逐层分

析出这种婚姻价值观深植于赵国能歌善舞、“仰机利而食”、“游媚高贵，入后宫”的功利追求的民俗沃壤，并与赵人变革进取精神血脉相连。

三、承继中求超越，弘扬民族传统中迈向世界前沿，自觉将中华大文化这一世界瑰宝发扬光大

绚丽多姿、源远流长的赵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一典型的华夏文明充分彰显了中华大文化的丰沛内涵、多元视角、不尽风采。这部《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善于继承，巧于借鉴，勇于超越，不少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前沿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荣耀。

书中对赵王城的刻意揣摩与悉心研究，对邯郸古城的反复考察与认真研析，对当代中外建筑研究上有诸多可借鉴之处，特别是赵王城的西城布局独出机杼，“龙台”建筑别出心裁，堪为世界建筑史之奇葩。书中对区域文化研究过细务实，求深，着意将赵文化这一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高度结合的多元文化推向了高峰，为国际区域文化研究谱写了华章。

本书对荀子的研究上不少思想是超前的。特别在荀子美学思想研究上超越了时空限制，走在世界前列。荀子的美学专论《乐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双峰并峙；荀子的美学思想比叔本华更接近于完善，彪炳千秋。书中的赵国军事研究堪为现代战学启示录，民本战争观、功利战争观、军权与将权相分离原则国际适用，举世共仰。赵国经济研究、赵女研究上也有独步天下之处。

这确实是一部值得精读细研的宝书。

（作者简介：贾永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作家、书评家）

“高端”与“研究”是灵魂

——读康香阁主编《学术高端访谈与研究》有感

蔡子谔

康香阁先生主编的《学术高端访谈与研究》，继是康香阁作为主编之一的《学术名家访谈录》（下简称《学术高端》）梓行之后，于2013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高华先生在《序》中指出：这是“又一部匠心独运的学术精品”。

我通读全书之后，深感诚如书名所标志的那样，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学术高端访谈与研究”的学术精品。而“高端”与“研究”，则是这部学术精品的灵魂。

当然，这部学术精品有诸多特点，而他的“学术访谈”的“高端性”，则是居于首位的。诚如陈高华先生指出的那样，“从访谈的范围来看”，无论是“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还是“各个领域学者中的后起之秀”。都无一例外地保持和坚守着他们的“高端性”——他们都是该学术领域的或则巨擘、耆宿，或则领军人物。由此，我们可以在“目录”中看到他们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李学勤、刘庆柱、朱绍侯、安作璋、汤一介……周汝昌、乐黛云、王一川、梁衡等等。

“灵活性”、“延伸性”，是保持其“高端性”的另二个鲜明特征。在《再访李学勤先生》、《再访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之中，着重访谈他们不同的治学经历和研究方法，这种不拘一格，另辟蹊径的做法，以及在“原有的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数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十几个学科的基础上，访谈的领域不断扩大，学科的视角不断延伸。最新访谈的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新闻学家梁衡先生等”（陈高华语）均是保持和坚守“高端性”深度和广性的有力措施。使得“高端性”在多层次、多视角、多维度的观照之中，以更加饱满、鲜活地凸现出来。

书中的每一个“高端采访”，都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小系统”。其内有：被采访者近照、简介，然后是“高端采访”，再择取该被采访人的博士生或研究有素者对其的主要学术成果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精确而深湛的阐释。呈现出“一花五叶”或曰“一花一世界”的美丽魅力；这便使“小系统”成为该学科前

沿的一靓丽风景的缩影。这，我们可谓之“系统性”。

康香阁是邯郸学报的常务副主编、编审，多为莘莘学子着想。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方法）”的道理。故访谈中都不惮其烦地恳请这些被采访对象谈他们各具个性和特色的学术生涯和治学方法以惠泽后学。这可谓是采访者苦心孤诣表现出来的“裨益性”。那么，这些睿智启迪和淳淳教诲，在这喧嚣浮躁的世界里，能引起青年学子的关注和眷顾么？于是“可读性”和“趣味性”便成了实现“高端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关键。顾颉刚认为再深奥的道理，也要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让读者能看懂、能接受。这也是严复提倡的“信”和“达”；还有“雅”便是要以美文使人怡情悦性，兴味盎然。在这书中，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做得很好。语言的质朴、干净、明达、简洁，本身便是“雅”，也是一种绚烂归于平淡的“美”。写评论，一般说来，浮光掠影地披览一过，花个一天半天的功夫便可率尔操觚了。但我却整整看了三天三晚上（睡觉前）。因为此《学术高端》深深地吸引了我而不忍释卷。为什么，因为这里谈到了很多极其有趣的问题，如李学勤先生的《殷虚文字缀合》的卜辞中“甲寅卜，呼鸣罗，获风？丙辰，获五。”表明：在甲寅这一天，名叫作鸣的这个人设好罗网，能捉到风吗？到了第三天丙辰，果然捉到了5只。这卜辞是殷王武丁时代的事情。宋代出土的周初铜器铭文里也发现有捕捉到风的记载。因此，李学勤先生说，风在古代是真的，“不过是一种很长的尾羽的鸟类罢了。”还有如刘庆柱先生谈的一些关于具有神秘色彩的“未央殿”、“阿房宫”和“秦始皇陵”等问题，都充分地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皆娓娓道来循循善诱。也是实现“裨益性”的有力保证。

说到“学术高端”的“研究性”，有三层意思：一是被采访者的丰硕研究成果达到学术前沿的“高端”水平，产生了“无限风光在顶峰”的极诣境界。二是评论文章对学术高端成果的通过深入研究，所进行的

全面、深刻和精准的阐释或解读。三则是主编康香阁他为进行的“学术高端访谈”所做的一切，都建筑在他对被采访者学术造诣和及其丰硕成果，所进行的认真，深入和全面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如“学术高端访谈”的设立，前述“小系统”的设计，被采访人研究阐释文章的确定和撰稿人的选择，乃至或剥茧抽丝，引人入胜，或犀照牛渚，洞察幽微的导读性的“学术

高端访谈”等等，无一不是他扎扎实实、细致深入的“研究”成果的生动体现；也是该著成为学术精品最为可靠保障。“高端”和“研究”是这部学术精品的灵魂，然而它们不论从哪个层面讲，又都是相辅相成。

（作者简介：蔡子谔，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书画家，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

康香阁编审在华南师范大学作报告

2013年12月12日，《邯郸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康香阁编审应邀为华南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作治学经历报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周焯成教授主持了这场报告会。康香阁编审以《从赵文化、学术名家到荀子思想——治学经历漫谈》为题，谈了自己从地方（赵国文化）、全国（学术名家）到国际（荀子思想）三个层次的研究实践经历。整个报告分五个方面：其一，通过谈研究学报史，明白了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可以达到的最高目标。康香阁编审告诉同学，无论从事任何研究，一定要了解它的历史，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难于达到更高的境界。以自己的研究作为个案，希望从提炼方法上对同学有所启示。其二，通过谈赵文化研究，说明选题要立足现实，扬长避短，符合客观实际；其三，通过谈学术名家研究，说明从事研究要不断进步，要有更高的视野和追求；其四，通过谈赵文化和学术名家的有机结合，成功举办荀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说明了知识互通的重要作用；其五，通过谈综合创新，确定了下一步更高的目标。在报告会上，研究生们对于康香阁编审三个层次研究实践的跨越成功由衷的钦佩，并踊跃提出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从提出的问题，可以反映出华南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有很好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在报告会结束之后的路上，同学们还在提问题继续讨论，并要求互留电话和邮箱，希望加强联系。（《邯郸学院学报》编辑部）